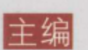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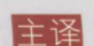
万卷方法 | 心理学研究方法丛书
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教学工作委员会推荐

ANALYSING QUALITATIVE
DATA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质性资料的分析

伊凡希雅·莱昂斯
(Evanthia Lyons)

阿德里安·考利
(Adrian Coyle)

毕重增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ANALYSING QUALITATIVE DATA IN PSYCHOLOGY

本书力图围绕三个主要目标进行组织。第一个目标是，提供给读者一些必要的背景知识，引导读者树立问题意识，以帮助其明智地决定他们是否确实需要做质性研究。

我们的第二个目标是通过提供详细的情境化说明，让读者掌握以下四种方法/取向的基本分析工具：解释现象学、扎根理论、话语分析和叙事分析。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本书还以手把手的方式，运用以上四种方法分析了一个真实案例的资料，以为读者的理解提供具体的抓手。

我们的第三个目标是提供给读者撰写质性研究报告的一般指南，以及如何运用四种特定的方法来报告研究。

上架建议：学术社科类

ISBN 978-7-5624-5363-5



定价：39.00元

万卷方法 | 心理学研究方法丛书
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教学工作委员会推荐

ANALYSING QUALITATIVE DATA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质性资料的分析

伊凡希雅·莱昂斯
阿德里安·考利 主编

毕重增 主译

毕重增 窦刚 王金良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版贸渝核字(2008)第 6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理学质性资料的分析/(美)莱昂斯(Lyons,E.),
(美)考利(Coyle,A.)著;毕重增主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5
(万卷方法——心理学研究方法丛书)
书名原文:Analysing Qualitative Data in Psychology
ISBN 978-7-5624-5363-5

Ⅰ.①心… Ⅱ.①莱… ②考… ③毕… Ⅲ.①心理学研究方法 Ⅳ.①B8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3183 号

心理学质性资料的分析
伊凡希雅·莱昂斯
阿德里安·考利 主编
毕重增 主译
责任编辑:吴文静 版式设计:雷少波
责任校对:张洪梅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张鸽盛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 174 号重庆大学(A 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4.75 字数:330千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 000
ISBN 978-7-5624-5363-5 定价:39.00 元

万卷方法——心理学研究方法丛书
选编委员会

万卷方法学术委员会

学术顾问

学术委员(以下按姓氏拼音排序)

作译者简介

阿德里安·考利(Adrian Coyle)　萨里大学心理学系的社会心理学家和高级讲师,心理治疗与心理辅导应用博士项目的导师。他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做质性研究,主要采用解释现象学分析及扎根理论和话语分析。他的研究和出版物主题范围广泛,包括身份、丧亲、宗教与灵性,以及男女同性恋心理学。

马克·克雷文(Mark Craven)　注册咨询心理学家。在健康行业成功就业后,对本体论的好奇心和热情让他回到了高校,并最终走进了"心理学科"。他在罗汉普顿大学获得了第一个心理与咨询学位,并在那里对社会建构主义和批判取向心理学发生了兴趣,接着他又获得了心理治疗与心理辅导的应用博士学位。

米歇尔·克罗斯利(Michele Crossley)　利物浦约翰穆尔斯大学卫生和应用社会科学系社会工作教授。米歇尔有大量的叙事心理学作品,特别是她还将叙事应用于新兴的批判健康心理学及各种健康领域。

维吉尼亚·伊托夫(Virginia Eatough)　伦敦柏贝克大学的心理学讲师,教授社会心理学和质性研究方法。在此之前,她任教于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她的主要研究兴趣是现象学和社会心理,尤其是情绪和情感体验。这些兴趣体现在,她最近用解释现象学研究妇女愤怒的生活经验。

尼尔·哈比森(Neil Harbison)　一个不希望透露身份的撰稿人的化名。

希拉·霍克(Sheila Hawker)　从南安普敦大学获得学士和博士学位。她是一名保健服务研究者,已在数个项目中工作过,主要关注老年人和癌症治疗中的生活质量。这些项目包括系统地回顾了质性研究文献中关于老年人出院时行业内沟通的问题,评估护士—专科医生实施化疗服务的可行性,以及用多重方法考察英国社区医院提供给老年人的保守治疗护理。

克瑞斯丁·科尔(Christine Kerr)　在南安普敦大学获得的学士和博士学位。她曾在以老年人保健为重点的研究项目中工作。这些项目包括:系统地回顾了质性研究文献中关于老年人出院时行业内沟通的问题,用多重方法考察英国社区医院提供给老年人的保守治疗护理,以及评估社区医院在工作时间之外提供的护理。

伊凡希雅·莱昂斯(Evanthia Lyons)　一个社会心理学高级讲师,领导萨里大学的欧洲社会心理学研究所(SPERI)。她的学位是在贝德福德学院和伦敦大学教育学院获得的。她教硕士和博士水平的社会心理学与质性研究方法。她的研究兴趣包括身份、在群际冲突和多元社会文化背景下社会表征的进程。她用质性和量化方法来研究儿童国家认同的发展,社会记忆在维持群际冲突中的角色,欧洲7个国家不同民族渊源的青年人的政治制度信任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她还利用质性

研究方法挑战当前关于污名对精神病患者、学习障碍者、老年人和年轻母亲等社会弱势群体成员自我有潜在影响的文献。

希拉·佩恩(Sheila Payne) 有护理背景的健康心理学家。她目前在兰开斯特大学健康研究所的安养院，主持与临终生命护理国际协会合作的“帮助安养院”研究。她学识渊博、对保守治疗研究由来已久，以前曾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领导保守治疗和临终生命关怀研究小组。她研究的重点是保守治疗、老年人的临终关怀及居丧支持。她拥有此领域数个重点资助，是博士生导师。

安尼尔·里德(Arnie Reed) 一位在卡迪夫的注册咨询心理学家。他在国家卫生局信托的社区精神卫生队工作，也是一位私人执业者。在经历过充实而有意义的军旅生涯后，他加入了心理学，并于2001年从萨里大学的心理治疗和心理辅导应用博士项目毕业。他现在从融合的立场提供心理评估，为各种成年人心理健康问题提供范围广泛的短、长期心理治疗。此外，他任教于卡迪夫大学的临床心理学应用博士学位项目和精神病学硕士项目。

乔纳森·史密斯(Jonathan A. Smith) 伦敦柏贝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教授社会心理学和质性研究方法。在此之前，他曾在基尔大学和谢菲尔德大学任教。在过去的15年里，他一直致力于开发和应用解释现象学分析法。他的主要研究兴趣是健康与社会心理学。

麦吉·斯圭厄(Magi Sque) 南安普敦大学护理和助产学院的高级讲师。她曾在伦敦的盖伊医院学习护理，专攻肿瘤护理，在皇家马斯登医院、伦敦和萨顿以及多伦多的玛格丽特公主医院从事临床工作17年。麦吉因在器官捐赠方面的工作而赢得了国际声誉。她与希拉·佩恩编辑的新书《器官和组织捐赠:一种实践的实证基础》即将出版。

莱斯利·斯托里(Lesley Storey) 一位英国国家癌症研究院研发协调员。她在萨里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探讨往昔对于生活在英国的非洲与加勒比人后裔建构“黑人”及黑人和英国人之间联系的重要性。

克里斯·沃尔顿(Chris Walton) 兰开斯特大学心理学系社会心理学讲师。他于2004年在萨里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提出了关于男性与情感的关键话语心理分析。从那时起，他利用质性研究方法——主要是话语取向——来检验其他各种主题，如新基因技术以及学习障碍。

毕重增 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南大学心理学院基础心理学系主任。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庆市人文社科基地重点项目等；出版专著《自信品格的养成》；主要从事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研究，研究主题为自我。

窦刚 基础心理学专业博士，主要研究兴趣为人格心理和社会认知，长期从事心理学和教育学的教学和普及工作。其教学和工作对象从刚进入专业领域时的儿童逐渐转向青年大学生，直到近年来逐渐转向成人；研究观念也从专注于量化立场逐步涉及解释性的主题。

王金良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博士，西南大学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主要研究兴趣为心理健康、人格心理和组织行为学。教授学生心理健康、变态心理学、心理学英语等课程。

总 序

自古以来,人类一直在探索着自己的内心世界: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在许多方面我与周围人们如此相似,而在其他方面又如此不同?我们是怎样认知世界的?为什么有时记忆会错误有时记忆会很牢固?喜怒哀乐、爱恋、责任感是如何产生的?情绪能自我调控吗?意识是怎么回事?梦是怎么回事,它能预测未来吗?为什么一个人独处时和在群体中的行为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怎样理解语言的,又是怎样组织和表达语言的?如此等等的问题,从传说、神话、甲骨文中我们都能发现,可见,人类长期以来一直对理解自身的内心世界有着浓厚的兴趣。然而直至1879年冯特(Wilhelm Wundt, 1832—1920)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心理实验室之后,人类才开始借助科学方法来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通过精密严格的数据收集与事实分析来研究心理与行为,积累知识,从而发展出今日的心理学。而随着心理学的发展,其研究方法也发展起来。

心理学家的科学研究是一种自觉的、有目的地探索精神世界的求知活动。这种探索,不仅有理论,还有与理论有关的观点及方法、仪器等。当代心理学主要有五种理论取向在探讨人类内心世界的奥秘,并对大脑如何工作提出了不同的假设,因而它们所采用的方法也不同。持生物学理论取向的心理学家认为心理是脑的机能,采用脑电图(EEG)、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PET)、功能核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等方法来探讨人类是如何产生知觉、记忆、推理、情绪和某些人格特征的。持学习理论取向的心理学家认为心理是个体对环境条件作用积累经验的生理变化,采用操作条件作用、奖赏、惩罚、观察学习等方法来探讨人类和动物行为的形成及矫正。持认知理论取向的心理学家把人类的心理活动视为类似于计算机的信息加工,用反应时、正误率和口语报告等手段来探讨人类的知觉、记忆、言语和思维等心理过程。持精神分析论取向的心理学家把人的心理视为潜意识本能的表现,采用个案调查、诠释学方法来探讨个人内部的驱力、冲突或心理疾病等潜意识活动。持人本主义理论取向的心理学家把人的心理视为自我实现需求的表现,采用相关法、诠释学方法来探讨自由意志、个人成长、潜能实现等问题。在心理学研究中理论观点与方法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的。它们既是指导这种探索活动的武器,又是保证这种活动取得成果的基础。正因为有了这一套套理论观点与方法的有机结合,心理学的科学研究才成为一种自觉的、有目的的定向活动,心理学也才成其为科学。因此,学习心理学研究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有助于我们自觉地将理论与方法相结合,养成科学思维的习惯。心理学家的科学研究都具有明确的目的,即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就要对该问题以往的研

究和目前的现状进行文献综述,并按照一定的有效程序对其进行探讨。即是说,心理学研究的基本程序与任何科学研究是一样的,都包含下列步骤:选题和提出假设——设计研究方案(用以检验假设的真伪)——收集资料——整理和分析资料——解释结果和检验假设。从心理学研究程序的各个环节可以看出,在心理学研究中,精密的仪器和先进的实验设备固然重要,然而最重要的还是研究者的头脑。通过对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学习,将有助于我们养成善思考和科学思维的习惯。心理学研究方法,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运用自己的智慧去进行科学研究,而且它还可以帮助我们去鉴别自己和他人的研究成果的正确与谬误。正因为如此,有经验的学者在评价一篇学术论文时往往不只是看它的结论,而且,甚至是更重要的还要看论文作者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和方法而获得结论的。

其次,有助于激发我们的创新观念和达成创新目标。心理学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是多样性的,其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也不同。学习了心理学研究方法之后,我们了解到心理学研究的各种方法,如个案法、相关法和实验法在心理学研究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用途,其信效度也是不同的。个案研究在心理学研究初期是有用的(有助于发现可供研究的现象和变量),但是要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建立科学理论,则必须借助于实验法。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根据自己对歇斯底里病人的临床观察和对梦、失误和笑话等的现象分析,建立起以潜意识动机为基础的精神分析理论。这个理论不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其中许多概念和命题缺乏实证效度。然而,熟悉实验法的学者想到用实验法来检验弗氏理论中的许多概念。例如,对于潜意识这种现象,他们发展出一系列的内隐实验程序来进行检验,结果发现有内隐学习、内隐记忆、内隐情绪、内隐动机的存在。虽然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心理潜意识研究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的性本能和死亡本能有本质的区别,但却加深了我们对心理成分和潜意识性质的认识。自我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主题,在科学心理学的早期,一些著作从理论上探讨自我的性质,到了20世纪70年代不少学者开始用相关法和实验法探讨自我的成分和机能,后来由于引入神经科学方法(如脑的电刺激、功能核磁共振成像技术)才开始探索自我的脑机制。正如巴甫洛夫(И. П. Павлов, 1849—1936)所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方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着种种新的、更加广阔的远景。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方法。"①

第三,有助于年轻心理学工作者快速成长。做任何事情都要讲究方法。方法对头,事半功倍;方法不对,事倍功半,甚至导致失败。心理学史表明,有些心理学家之所以能在学科上有所建树、有所贡献,除了他们的天赋聪慧,当时的科技水平和良好的学术环境外,还往往与他们能正确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有密切的关系。系统地学习心理学研究方法显然比只凭个人经验、漫无边际地去摸索,更能促进年轻心理学工作者的快速成长。

2005年秋天,重庆大学出版社"万卷方法"总策划雷少波同志带着已出版的新书来征求我对翻译这套图书的意见。我很高兴看到他们对这套书的设想:"万卷方法"是重庆大学出版社从2004年开始出版,拟系统深入地介绍各门社会科学研究方

---

① 巴甫洛夫选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49

法的大型工具性丛书,其中包括心理学研究方法。这是一项促进我国心理学事业发展的开创性工作,我给予热情鼓励和支持。在我看来,“万卷方法——心理学研究方法丛书”具有以下特点:

(1)品位高。对于研究方法的著作来说,质量优、品位高是最重要的。丛书所介绍的是国外心理学领域中,许多有成就的心理学家所普遍认可的心理学研究工作的原理、方法,研究课题设计,以及如何正确使用各种可以应用的技术手段等。例如如何做心理学实验、如何进行心理学的质性研究、如何撰写心理学学术论文,以及在心理研究中如何使用数理统计、应遵循哪些伦理道德等。其中像心理学质性研究、心理学研究伦理道德等著作,国内至今未见有专题著作翻译出版,是国内急需的。

(2)适用面广。丛书所介绍的心理学研究方法是相对基础性的,可供高校心理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作为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使用,也可供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参考。

(3)开放性。根据我国心理学教学和科研的需要以及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出版社将通过版权引进和本土开发,使丛书不断丰富与完善。

我相信广大读者会喜爱“万卷方法——心理学研究方法丛书”,祝愿“万卷方法”不断发展,日益完善。

是为序。

黄希庭

谨识于2009年10月

西南大学 有容斋

译者导言

为了较好地运用本书，我们建议读者先了解以下内容。

一、本书的阅读顺序

我们建议的阅读顺序是首先读第一单元，然后是附录部分，最后回过头来再看第二单元。

第一单元综合介绍了质性研究的一般性问题。虽然本书主要面向心理学读者，但对于科学化取向或定量化取向占主导的心理学专业学习者而言，这部分内容却是相对陌生的。因此，在学习各种具体的质性研究方法操作之前，有一个整体的认识是必要的。如果条件允许，我们还建议阅读第 1 章和第 2 章"延伸阅读"部分介绍的著作（这些著作大多有中译本）。

附录 1 和附录 2。附录 1 是操练书中所介绍的四种方法的资料，仔细地阅读这些资料，有助于体会这些看起来有些相似的方法的侧重点及其特色。同时也能够了解到，对于同一个资料，不同的方法带来的视角和洞察力。附录 2 的四篇研究报告节选，则会让读者直观地感受这些方法的操作和写作是怎么样的。

第二单元是本书的主体。对于所介绍的四种方法，本书编者采取的编排方式是：每种方法两章内容，前一章介绍具体方法的背景和原则，后一章则以示例介绍该方法的操作过程。从学习成果的获得以及学习信心的角度来看，我们建议先从叙事分析开始，而后是扎根理论、话语分析、解释现象学。之所以这样建议，是因为叙事分析可以从读者自身的经验开始学习方法的使用。第 9 章还专门介绍了一种相对容易掌握的个案化方法。扎根理论的操作难度较大，不太适合初学者操练，而解释现象学分析涉及的基础知识较多，掌握所需的时间也较多。

对于质性研究方法，多数心理学专业的本科学生甚至研究生都觉得似是而非。不过，这类方法和量化方法一样，也是对心理现象或心理过程进行系统性探究的手段，同样具有一整套操作的理论立场、理论基础和操作规程，也同样取得过非常丰富并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相对而言，质性方法显得更为丰富及更具弹性，"技术性"和"操作性"也要弱一些。这涉及采用这类方法的另外一个条件，就是研究者的专业素质对研究结果内部效度的保证。也就是说，采用这类方法的研究者如果对相关主题有丰富而深厚的积累，那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就会得到很好的保证。当然，这也并不是说质性方法是专属于某一类研究者的，无论什么类型的研究者都可以在质性研究的实践操作中获得使用这类方法的经验。

我们建议对质性方法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打开自己的视野和思维方式。当三位译者还处于心理学幼稚期的时候交流过这样一个情况：在美国心理学协会出版的

《梦》这本期刊中，研究报告基本上都是陈述性和解释性的。看似也使用关于梦境内容的问卷，但从性质角度讲，这种问卷在信度和效度指标问题面前是无敌的。原来心理学研究的质性方法是这样的。

译者在翻译本书时的一个体会就是，质性方法往往并不以发现规律性事实为主要的目的，而是以意义和价值的揭示为最主要的指向。因此，当面对质性方法或量化方法的选择时，我们可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直接指向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二、译者对译稿的影响

本书由三位译者合作译出，三位译者均在科学心理学的语境中获得博士学位，对于翻译的主张也不尽相同。

译者知识背景和翻译分工：毕重增博士主要研究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教心理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心理测量学、数据处理、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等量化心理学课程；他翻译的是第一单元，第二单元的四种方法比较，附录1及第二单元的引言、附录2的引言，以及索引等。窦刚博士研究的领域是人格心理与社会认知，他是三位译者中哲学和心理学史阅读相对较多的一位，以前对量化手段在心理学的使用也颇感兴趣，近年来因为工作的原因逐渐涉及非量化的研究内容——这主要是因为其开始于学生时代的对价值问题的执著关注。他翻译的内容是解释现象学分析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报告，扎根理论的理论和方法。王金良博士主要研究心理健康、教师工作心理，教授学生变态心理学、心理学专业英语等课程，目前他的研究兴趣也开始扩展到人格领域，探讨人格与心理健康、自我适应之间的关系。他翻译的是话语分析、叙事分析的理论、方法及附录报告。三位译者的知识结构跟本书所介绍方法的适用领域是契合的，这对于准确把握原文是一种保证。本书最后由毕重增做了统校。

对于翻译的取向，三位译者对两种意见进行了讨论，并采用了折中的做法。一种意见认为，这些文字的原作者本身就具有不同的写作风格。例如，专长于教材写作的作者，其行文本身比较规则，翻译时就比较容易措辞。而本书的行文方式比较口语化，这也算是质性思维方式的一个特点。对于这种行文的翻译就应该尽量体现原作风格，力求保留其语言和文化方面的细节特色，选用与源语表达方式对应的译文。另一种翻译取向则认为，80万字的《飘》（又译作《乱世佳人》，英文为 *Gone with the Wind*）而并非百万字的《飘》，才是我们翻译的典范，译文要向读者靠拢，符合中文规范，我们要对有关的句子成分位置、短语结构作出处理。

本书是一本方法性的书，准确表达原文含义应该较少涉及翻译取向方面的问题。但如果将研究方法视作确定的程序，就是用莱谱化的观点来看待质性研究方法。本书不止一位原作者强调，其介绍的方法不宜简化为一步步的步骤，这与方法的本质是相违背的。四种质性方法不但涉及与科学方法差异较大的认识论基础，还要处理研究资料与研究者的动态交互。因此，在表达时需要较多限定性的语汇才能表达准确的含义，这使得书中长句非常多，如果直接翻译过来，意思表达的十分完整，但要多读几遍才能懂。对这样的句子要做必要的分割，但又不能阉割原文的含义。另外，在说明书中介绍方法的资料时，有少数内容必须做灵活处理，例如，大卫用了狗、黄鼠狼、鲸三个动物比喻，译者就无法对三者等同处理。“黄鼠狼”可以直

译，“狗屋”表达名声扫地，翻译为“狗”读者也能在语境中体会其意思，但“鲸”用来表达玩得很开心，若直译则令人费解。好在，这样的内容在书中较少。

在本书最终统稿时，正值2010年元旦，各位译者的家人均对此作出了无限的支持，为此我们感怀在心！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我的研究生原芳如、李琼分别参加了扎根理论和叙事分析初稿的翻译工作，特此致谢。

本书的翻译一直得到资深教授黄希庭先生的关注。作为心理学界的名家、长者，他不仅以宽广的视野将质性研究方法引入《心理学研究方法》教科书，而且还鼓励我们做质性研究，并亲自复印马斯洛、弗洛伊德等大家的经典的文本，与我们探讨其中的方法对于建设中国文化氛围中的人格心理学的意义。在科学取向占主导的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中，先生洞察人格心理学、心理健康、社会心理学发展对方法和理论多样化的内在诉求，从方法基础做起，扎实工作，令人肃然起敬！

毕重增

2010.1.6 于西南大学

目 录

第一单元 心理学中的质性研究:背景介绍

第二单元 资料分析的取向

附录1 资料集

附录2 质性研究报告

1*

心理学中的质性研究：背景介绍

第一章

* 此处为英文版页码，与"索引"部分对应。全书同。

1

做质性研究：开始的问题

伊凡希雅·莱昂斯

本章将概要介绍此书的目的，概观书中的内容，描述研究者在质性研究过程的不同阶段所面临的主要不确定因素和抉择，以及提出在阅读各章时读者须记在心中的某些问题，以尽到本书的最大效用。

关键术语

描述的（descriptive）
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认识论（epistemology）
评价标准（evaluation criteria）
解释（explanatory）
扎根理论取向（grounded theory approach）
解释现象学取向（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意义生成（meaning-making）
叙事分析（narrative analysis）
社会批判（social critique）

本书的背景

作为一名教师和研究者,我经常遇到将要从事或正处于质性研究过程中的激动而焦虑的学生和同事。他们指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研究过程中的抉择总是与诸多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质性研究者很快认识到,诸如收集资料中访谈风格的采用、选择资料分析的取向、在分析中如何确认一个主题,以及该用什么样确切的标准(criteria)来评价(evaluate)研究等问题,都没有统一、正确的答案。

本书旨在提供给新手和较有经验的研究者以必要的方法工具和概念地图,以指导他们的质性研究过程。它描述了围绕质性研究的不确定性因素,以及研究者必须面对的诸多两难抉择,并援用各种专业水平质性研究者的经验来说明这些问题。它还提供给了读者以必要的背景知识,帮助他们了解一些可能遇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从而使其在处理这些不确定性和两难选择时能做出合理的决策。

做质性研究:困惑和不确定性

对于研究过程和资料解释,质性研究法较难提供确定的、不容置疑的答案。这部分归因于作为其根基的哲学假设,关注的是我们应如何生产心理学知识。尽管"质性研究"是个涵盖一组不同方法的术语,最起码,这些方法中的绝大多数享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没有"客观的"现实或普遍的真理。更准确地说,他们的基本信念是,知识以及产生知识的过程都是具体的(Lyons,2000;Willig,2001)。进而,此研究假设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以及其他相关的个体、群体、意识形态、社会结构都整合成为了研究现象的动态背景(Dallos and Draper,2000;Harré and Secord,1972)。因此,没有程序化的方法和蓝本来说明质性研究应如何概念化和执行,因为,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所做出的选择与决策,会限定和影响研究什么、该搜集什么资料、如何说明资料的意义,以及如何做出结论。

然而,有一点是重要的,即强调质性研究不是一个由同类型研究方法组成的领域:不同的研究取向和方法基于不同的哲学假设,这些哲学假设是关于我们如何产出心理学知识以及什么是可知的,不同研究取向的科学目标不同,什么是好的实践的指南也不同(Denzin and Lincoln,2005a;Henwood and Pidgeon,1994;Willig,2001)。进一步而言,它们关于语言、认知和现实之间关系的概念基础不同。这些假设的焦点是科学哲学,也即认识论(epistemology)(Benton and Craib,2001)。第2章对于什么是认识论以及不同方法蕴含的认识论观点做了较充分的讨论。

关于知识生产及我们如何感知和叙述社会世界的假设,具有情境式特点,它与众多可选择的方法一起,给想做质性研究的研究者,在研究的各个阶段均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例如,在研究旅程伊始,就要决定是采用质性研究还是量化研究来探讨研究的主题。如果你决定了做质性研究,就面临着选用何种特定研究取向的问题。

在研究设计阶段,研究者必须要决定如何利用已有的理论和经验知识。例如,我们在形成研究问题和/或设计访谈提纲时,或者选择文本以形成想要分析的资料时,是否将这些知识考虑在内?在我们解释资料的前、中、后各阶段,是否要整合既

有的知识？以及我们如何保证预设的观念不会明显地影响我们理解研究对象所告诉给我们的内容？这些内容我们需要吗？我们是否给予理论、研究对象的叙述或其他提供给我们的文本以同等的地位？进一步，我们需要反思我们作为研究者的概念。我们是否认为研究者的角色只是一个研究对象意义生成的努力的纯粹接受者？或认为研究者是研究对象表述的接受者和解释者？或是将自己的角色视为一种现象文本叙述的解构与建构者，并因此提供了一种社会现状的社会批判（social critique），以及开启了建构我们社会世界的另一种途径？

新手和较有经验的研究者，在面对一页又一页质性资料分析的任务时，都会有一种兴奋感、迷惑感，以及常见的焦虑感。他们当然有教科书，书中有他们所选用分析取向的手把手指南以及质性资料分析技术。但如何将它们运用到自己的资料上呢？质性研究者很快就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直截了当的过程。不管采用哪一种质性研究方法，确认资料中的“主题”、“类别”或“讲述”都是不容易的。虽然教科书中清楚地描述了分析的过程和步骤，但将它们运用到资料分析中却不是一个机械的过程，而是一个意义生成（meaning-making）的过程。它要求研究者将自己沉浸在资料中，获得资料的意义，确认“主题”、“类别”或“话语”，以及提供给资料以可以被承认的、有用的说明/解释。然而，什么是可被承认的、什么是有用的，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主观判断。从这种意义上说，没有一种解释是“正确的”或“真的”，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任意的一个解释都是好的解释。有人主张一个质性研究应从两个主要维度来评估：首先是它的严谨性和质量，其次是它的有用性（更多这方面的信息，参看第2章和第11章）。因此，一个研究者如何知道哪些主题、编码或讲述是相关的/有用的？是因为它们可以提供给资料一种描述（descriptive）或解释（explanatory），就判断它们是相关的和有用的吗？抑或以它们与已有的理论和经验知识的整合程度或它们应用于真实生活情境中的相对适用性，来判断它们的相关性和有用性吗？以及，在何种情境下，它们与研究对象或研究资助者及其他研究发现的潜在应用者是相关的和有用的？

6

进而，质性研究者还面临传播他们研究发现的任务——以一种被研究对象、同事、其他感兴趣的读者认可的方式作出有益的贡献。鉴于潜在读者的多样性，如何以口头或书面的方式呈现研究发现又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例如，如何呈现研究的严谨性和质量以使我们的学术同行接纳其可靠性和有用性？如何使研究发现到达参与此研究的群体？质性研究经常是使用小样本，所以我们如何说服政策的制定者注意到一个只研究了少数个体的研究发现？我们如何保证研究发现具有期望的政治和社会用途，并避免将研究用在我们并不赞同的目的上？

以上只是质性研究者面临的诸多主题中的少数，对此，研究界并没有准确而公认的答案。这些主题的解决，主要是基于研究者寻求解决的问题和他们确切的假设：我们可以知道什么？什么是产生知识的有效途径？以及言语、认知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本书的结构

本书内容是以反映三个主要目标的方式而组织的，这些目标是阿德里安·考利和我在开始构想此书时确定的。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给读者提供一些需要知道的

必要的背景知识,并引导读者树立问题意识。具备了这些背景知识和问题意识,读者就可以明智地决定他们需要进行的是质性研究还是量化研究。如果读者决定了要遵从质性研究的路径,那么,某个(些)质性研究方法就是最适合他们研究目标的方法。我们的第二个目标是通过提供详细的、情境化的说明,让读者掌握以下四种方法/取向的基本分析工具:解释现象学(Smith,1996,2004)、扎根理论(Glasser and Strauss,1967;Strauss and Corbin,1990,1998)、话语分析(Parker,1992;Potter and Wetherell,1987)和叙事分析(Crossley,2002a)。另外,本书还以手把手的方式,运用以上四种方法分析了一个真实案例的资料①。我们的第三个目标是给读者提供撰写质性研究报告的一般指南,以及如何运用四种特定的方法来报告研究。

因此,除了本章外,第一单元还包括阿德里安·考利撰写的另一章。叙述了有关质性研究方法在英国发展的历史,并讨论了质性研究中几个核心议题的细节。该章旨在提升读者的敏感性:质性研究在心理学中的价值、认识论与方法的关系,以及如何评估质性研究。该章给出了质性研究的一般背景,提出了读者需要牢记在心的问题,从而使其在阅读第二单元有关理论和分析的章节时,能留意四种质性研究取向分别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 7

第二单元的第3、5、7、9章,概要介绍了本书关注的四种质性研究取向中每种取向涉及的理论基础与方法问题。这些章节通过给出丰富的实例,讨论了研究者在使用每种分析取向时所面临的主要议题,并给出了在特定研究中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示例。

每一理论章节后都紧随着对应的练习章节,即分析组员之一使用理论章节中所描述的方法来分析特定资料的反思。这些章节的主要目标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它们反映了研究新手使用特定方法的经验;其次,它们提供了一个比较的标准,读者可以探索四种取向的相似性和不同。练习中所使用的资料见附录1。

第二单元的最后一章(第11章)提供了一些关于四种分析取向的相似性和分歧方面的反思,拓展了在引言章及稍后理论和资料分析章节所提出的一些主题。在此章中,我总结和比较了各种取向处理这些主题的立场。另外,我还仔细考虑了在研究过程中所进行的选择的政治意义,特别是我们作为研究者在与研究对象的关系方面如何概念化自己。

最后,附录2是已经发表的运用每种方法的研究实例,以及写作过程的评议。这些报告给读者提供如何写作质性研究的实例及其注意要点,从而完成整个研究过程。

做质性研究注定是个令人激动的和富有挑战的过程。其吸引力部分是由于它产生的丰富的资料,以及它提供了机会——让我们去探索那些复杂的、模棱两可的,以及经常矛盾的我们感知和建构我们社会的方式。我们希望,通过阅读本书,能使探索不仅对社会和政治,而且对个人同样重要的议题变得简单。然而,它并不承诺回答所有的问题,因为有诸多的问题在研究界还没有答案,另外,本书有限的空间亦

① 三组研究生在专家的指导下,分别使用解释现象学分析、话语分析和叙事分析对同一组资料进行了分析(资料见附录1)。这些研究生参加了在2002年7月由编者组织的经济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高级培训"工作坊。其中三组研究生的指导专家是本书相应章节的作者(乔纳森·史密斯、希拉·佩恩和米歇尔·克罗斯利)。第四位指导者是卡拉·威利格,他指导了使用话语分析方法组所进行的分析。

不能覆盖特定方法的特殊性。

8

小 结

本章强调了质性研究取向中各种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描述了这些方法所共有的一些假设。它认为，关于意义生成过程的假设、产出知识情境过程的特定性，使研究者感到做研究和呈现他们的分析叙述的不确定性。本章还提出了质性研究者经常要设法处置的问题，以及概观了本书的结构。

延伸阅读

覆盖许多质性研究取向，以及处理了这些研究范式之争和主张的书是 N. 邓津和 Y. 林肯撰写的《SAGE 质性研究手册》(N. Denzin and Y. Lincon，2005b)。而卡拉·威利格的《心理学质性研究入门：理论与方法历险》(C. Willig，2001)、乔纳森·史密斯的《质性心理学：研究方法实战指南》(J. Smith，2003)则对一些广泛使用的质性研究方法，以及质性研究领域中的方法论争议，提供了清晰而严谨的叙述。

2

质性心理学研究导论

阿德里安·考利

本章向读者介绍了质性心理学研究中的几个核心议题——从检讨心理学标准的“科学方法”中那些关于我们怎样才能知道及我们可以知道什么的假设开始。这些假设与各种质性方法的假设是相左的。这个讨论包括概要叙述心理学中质性方法的发展和使用历史。然后，本章将焦点转向了质性方法的某些相对优势，以及将关注点放在方法而不是研究问题上的潜在危害。本章还检视了有关如何评价质性研究的议题。最后它讨论了质性研究中一些需要进一步发展的领域。

关键术语

一致性(coherence)	承诺(commitment)
情境(context)	经验主义(empiricism)
认识论(epistemology)	假设—演绎主义(hypothetico-deductivism)
独特的(idiographic)	冲击力与重要性(impact and importance)
整合质与量的研究方法(integr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纵向质性研究(longitudinal qualitative research)	
方法学(methodolatry)	研究普遍规律的(nomothetic)
现象学的(phenomenological)	实证主义(positivism)
严谨(rigour)	科学方法(scientific method)
情境敏感性(sensitivity to context)	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m)
话语立场(speaking position)	透明度(transparency)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看家本领经历了一种显著的变革。还记得1980年代中期我读本科时，从未想过用质性方法做心理学研究的可能性，因为我们从老师那里得到的非常清楚明了的信息是，可以接受的心理学研究（个别的除外），是谨慎地测量变量、控制无关变量，以及针对量化数据进行恰当的统计分析。事实上，我记得质性研究工作是我们那些非常不幸的社会学同行们的专业。我认为，他们好像从未意识到他们的研究永远不可能合乎“科学的”。时代变了——而且迅速如斯。

我自己转变的契机源于做博士学位论文时。当时我用的是冗长的结构化问卷，并应用因素分析和多重回归进行数据分析。在那时，我听说了一个为心理学家开设的质性研究方法工作坊，因为我读博士期间的一些经历，这唤起了我的兴趣。随着博士研究的进行，我对于自己使用问卷的方式搜集数据越发不安，无论做多么广泛的准备工作和预备测试，问卷中的反应类别对研究对象总是有太多的局限。除了给出评定和做出反应之外，他们经常草草地写下限定和附加说明。当然，在分析中我通常不会理会这些内容，因为我找不到一种有意义的途径来处理它们。即使研究对象不辞辛劳地在每个问题后的“其他”选项中写下他们对自己经验的理解，这些数据也会被编码并确定测量等级，但接下来它却会在数据分析中消失，因为每个编码类别中的实例太少。这些因素使我怀疑自己所获得的研究发现的可靠性。我的研究发现看起来是代表了总体的共同特征，但却没有了个体故事的错综复杂与微妙，而它们会揭示这些共同特征在现实生活中起作用的范围。这个质性工作坊给我的研究问题提供了一些可喜的答案，即在心理研究中如何使生活体验的复杂性与生动性进入研究的中心。这个结果使我此后变成了质性研究方法的拥护者（尽管自此以后我理解的质性资料与“生活体验”之间的关系不再那么直接）。

当然，如果我没有得到研究体制的支持，如果英国心理学没有在最近几年对质性研究表现出更大的开放性，我也不会获得这样的支持，我可能就不会有如此的魄力去从事感兴趣的质性心理学研究。这方面的例证有很多，比如说，心理学会议文章及不以方法为中心的质性研究作为专题会焦点议题的频率，在许多同行评议的心理学刊物中质性研究文章的增长，心理学中众多的关于质性方法应用的书籍，以及心理学学位培养中建立起来的模式和专门而完整的质性方法课程。质性研究已经变成了许多心理学分支的标准特征，特别是社会心理学、健康心理学、女性主义心理学、精神病和咨询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总地来看，可以公正地说，尽管质性研究方法间或被用来装点门面，甚至在某些边远的地方仍然遭到抵制，但当今英国大学中心理学专业的学生与我读本科时的经验相比，已经有了相当不同的方法社会化。

本章在历史的脉络中审视了心理学对质性研究方法高涨的兴趣，评判了当前心理学从质性研究中获得的好处，以及从质性方法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可能获得的额外收益。首先，我们先关心一个极其重要的、在任何质性研究中都不可能被忽视的议题——认识论。

认识论与“科学方法”

从最根本上说，质性心理学研究可以说是通过心理学的镜头（不管我们如何定

义它)搜集和分析非数字的资料,以提供关于意义生成——人们怎么感知世界和体验特定的事件——的丰富的描述和可能的解释。正如卡拉·威利格(Carla Willig, 2001:9)指出的,质性研究"旨在理解经历特定状态'像什么'(例如,和慢性病患者生活在一起或即将失业的意义是什么,感受是什么),以及人们如何处置特定的情景(例如,人们如何协商家庭生活或工友之间的关系)"。本章概括描述了本书所关注的四种方法的原理和实用性,详述了这些方法擅长解决的研究问题类型。当然,质性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内涵远不止如此。

质性研究是与知识存在的基础或知识的可能性有关的一系列假设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质性研究与认识论(epistemology)有密切的关系。"认识论"这个术语指的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是关于知识的理论,试图回答我们怎样才能知道以及可以知道些什么。一个研究的认识论立场决定了此研究能够发现的事物的类别。不同研究取向和方法与不同的认识论联系在一起。将这一点牢记在心非常重要,否则,我们在论及"质性研究"方法时就会认为我们在讨论相同的范畴。然而事实正相反,术语"质性研究"包含了认识论基础不同的多样化方法,这导致了此领域分歧和紧张(潜在的创造性)的特点(Denzin and Lincoln,2005a)。在本部分和下一部分,我们将审视与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关联的主要认识论。

12

特定研究采用的认识论可通过一组要素来确定。研究者会有自己偏好的认识论,并将他们的研究置于其中,以此立场来选择方法(或据此创造方法)。或者,研究者热衷于在自己的研究中使用特定的方法,因而他们通常以与此方法相关联的认识论作为研究的架构(尽管需要注意许多质性研究方法在认识论上具有某种程度的灵活性)。不管一个研究采取的认识论立场是什么,在写作时通常要能确保这个立场(包括有关所执行的研究可以获得何种知识的假设)始终如一,这有利于产出条理清楚的研究报告。然而,有时,一个更具灵活性的立场也是需要的,例如,在同一个研究中使用认识论基础不同的方法。我们将在本书的后面再讨论这个问题。

第一次接触质性研究方法的研究者和学生,有时会认为对于认识论的关注是不必要的,因为它会使质性研究的过程变得复杂。如果他们已经使用实验取向做研究,或者以其他的研究设计来搜集和分析量化数据,那么,他们可能未曾遇到过关于认识论的主要讨论。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类型的研究没有认识论立场,而只意味着这些研究取向采用了一种通常在研究和更一般的生活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认识论。此认识论即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和假设—演绎法,尽管严格地说,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是有轻微差别的。

实证主义(positivism)主张,世界(即事件、客体和其他现象)和我们对于世界的知觉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即世界上的事物和我们对它们的知觉之间是一种直接的对应关系),并假设有关因素不会使我们的知觉偏离、损害这种对应关系,例如我们的既得利益。因此,假定我们采用了公正、无偏而客观的角度,就可能获得关于世界事物的准确知识。与此相关联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则认为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必须从搜集与分类我们对世界的知觉/观察中才能获得。这种分门别类让我们能够创建关于世界的复杂的认知,并发展理论来解释它。

事实上,当前只有极少数科学家无条件地采用实证主义或经验主义观点,因为我们的观察和知觉并没有提供关于世界纯正而直接的"事实",这些过程从来不是

完全客观的，这一点已经被广泛地认可。我们的观察和知觉通常是有选择性的，我们会对于所看到的任何事物的某些方面给予更多的注意。现在争论的焦点是，我们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趋近世界的真实或客观知识。然而，发展知识要求搜集和分析资料这一基本主张仍然是经验主义的核心。这一点也是质性研究者的共识，尽管与经验主义相比，我们关于什么构成了恰当的资料、应当如何搜集和分析资料，有非常不同的看法。

13 在传统心理学方法氛围中（特别是实验心理学）成长起来的研究者和学生，对于针对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和假设—演绎主义（hypothetico-deductivism）的缺陷而提出来的理论是非常熟悉的。与假设演绎主义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人物是卡尔·波普（K. Popper,1969），他相信科学理论都不能决定性地证实为真。因此，目标不是获取证据来支持一个理论，而是去确认理论的主张（假设）是虚假的（包含一种演绎过程），以及最终的理论是错误的。采用假设演绎立场的研究因此会从理论中提出假设并检验这些假设。这其中的假定是通过确认错误的主张，我们可以获得关于真理更清晰的认识。

随着心理学发展成为一个学科，它日益认同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和假设演绎主义的假设，也就是所谓的“科学方法（scientific method）”。假设检验以力争客观、中立、精确的测量为特征，并认为这可以使研究者获得关于心理与社会世界准确的、未受蒙蔽的信息。据信，研究者可以超然于他们的研究而获得客观和中立，以避免他们在研究主题上任何可能的个人卷入而染污研究过程。例如，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接触或被降低到最低的程度，或被标准化，从而使每一个被研究者获得相同的指导语。在写研究报告时，研究者通常使用被动语态而不使用人称代词，从而将自身从研究过程中隐去。因此，研究者不会写“我设计了一个问卷（I developed a questionnaire）”，而是写“一个问卷被设计（A questionnaire was developed）”，以将过程的执行者隐去，从而造成一种研究并没有受到研究人员的参与而受污染的印象。任何心理维度都被假定为是可以精确测量的。正如安娜·君士坦丁堡（A. Constantinople,1973:389）所指出的：“心理学的学生多半都听说过一个著名的格言，表达了心理测量中不言自明的基本原则，‘即任何存在的事物都有其数量，凡是有数量的事物均可以测量’。”这即假定，通过设计日趋精细的测验和测量法，可以精确地测度任何心理维度。如果不能以使人满意的方式测量某事物，其存在就是值得怀疑的。

这样，在“科学方法”范畴之内进行的质性研究，就成为“纯正”研究非常初始的14 步骤。例如，在研究一个从未被涉及或很少被研究的领域时，质性工作可以用来确认此领域的关键成分，从而成为诸如问卷之类的测量工具的基础。然而，只有少数几个质性研究方法接纳“科学方法”及其所有的器具。其中的一个例子是柯里潘道夫（K. Krippendorf,2004）的结构化内容分析，尽管此做法是否构成真正的质性研究方法还有争议，因为它会系统化地分类和量化质性资料，并且以一种其他质性研究方法不会采用的方式去关注信度。我们将在后面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对“科学方法”的反抗：供替代的认识论

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假设演绎的研究取向已经在心理学的一些分支学科中遭

到抵制。例如,在各种心理疗法中,早期即强调质性个案研究法是知识发展的手段(如 Freud,1909/1955)。不过,通过科学实践来判断这些领域是否具有真正的“科学”地位是靠不住的,它们只是方法的不同而不是科学性有差异。它们开始于1960至1970年代,但在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呈现出了更多的证据显示其在英国心理学中有一种可以察觉的递增,使心理学趋向于接受至少某种形式的质性研究。这是长久以来关于心理学研究应该和可能指向什么样的知识目标的争论(换言之,知识论的争论)的顶点,尽管这种争论尚未发生在主流心理学最显著的地方。

在对质性心理学发展历史的叙述中,亨伍德和皮吉昂(Karen Henwood and Nick Pidgeon,1994)将此争论追溯至 W. 狄尔泰在1894年的著作中的论述:人文学科应以建立理解为目标,而不是进行因果解释(亦可参见 Norman Denzin and Yvonna Lincoln,2005a 关于质性研究跨学科历史的综述)。这种挑战是持续不断的,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关于探求普遍规律——发现独特性的争论中还可以听到它的回响。这个争论关注二者的优缺点:探求普遍规律(nomothetic)取向的研究寻求概括化的发现以揭示客观现象的规律,而发现独特性(idiographic)取向的研究则致力于以细致入微的仔细检查来理解某结果。像 G. 奥尔波特(G. Allport,1962)这样的研究者们,认为只通过抽象维度总加的统计分数,不能捕捉到一个人人格的独特性。在一些有影响的早期文献中同样可容易地发现这些主题,它们主张心理学转向质性研究方法。例如,在1972年的文献《解释社会行为》中,R. 哈利和 P. 西科德(Rom Harré and Paul Secord,1972)表达了自己对变量操纵方面所隐含的还原论(reductionism)的担忧,以及心理学研究中量化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忧虑。他们认为这反映了一个有限的、机械化的人类模型。在他们1981年的经典文本《人的研究》中,P. 瑞森和 J. 罗文(Peter Reason and John Rowan,1981)以此(及其他的)观点来鼓吹他们所谓的心理学“新范式”,特别是合作的、参与的、行为中心取向的研究。相类似的是,在1985年的文本中,Y. 林肯和 E. 古巴(Yvonna Lincoln and Egon Guba,1985)基于寻找细致的描述而号召一种“自然主义”的范式,旨在通过被研究者的眼睛来描绘现实,并对情境中行为的复杂性和意义保持敏感。

15

这些关切同样成为1960至1970年代第二轮女性主义心理学特色的写照。女性主义心理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揭示和挑战运作在心理学中的男权,因为它忽视或故意对女性的经验做错误的报道,例如,心理学长期以来用男性常模来评估女性经验,所以其发现女性是“不足的”当然不会令人吃惊。心理学在各个领域都寻找“性别差异”,并且找到了建构女性劣于男性的差异——那些允许女性因“天性”而擅长的领域例外,如家庭主妇和抚育子女的角色(Wilkinson,1996)。她们希望以自己的术语探索女性经验,在没有强加的预设、不适当的完美框架下呈现女性的声音,所以许多女性主义心理学家求助于强调现象学的(phenomenological)质性方法。这些方法关注获得精细经验的描述,以便于为经历过的人辨明其本质。这些方法不关心产生经验的客观陈述,相反,要获得对经验个人化的认识和理解。例如,语音关系法是一种明确的女性主义质性方法,它的一个目标是倾听常被压制者和沉默者的声音,如青春期的女孩(McLean Taylor et al.,1996)。它通过对访谈誊本细致的、引导性的“倾听”来实现。

本书研究方法的一些关注点,可以看作是对那些心理学中运用“科学方法”做

出批评的回应。例如,解释现象学分析(IPA)有明确的现象学承诺,致力于用质性资料来描述独特的意义生成,明确强调独特性(参见第3章)。然而,女性主义和其他的心理学研究者同样寻求这样的取向:不但对经验进行现象学解释,而且也寻求批判性地理解那些决定经验的经济与社会因素。语音关系法和IPA允许这样做,但希望彻底承担评判工作的研究方法的核心,却产生于完全不同的认识论——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m)。

16 社会建构主义取向在心理学研究中广为人知的标志事件,是J. 波特和M. 韦瑟雷尔在1987年出版《话语与社会心理学:超越态度与行为》(Jonathan Potter and Margaret Wetherell,1987)。这对于社会心理学有深远的、令人不安的影响,并激发了本学科及其他学科更多的讨论与争辩,因为它挑战了(曾经被认为是)心理学研究中合法的根基。以更宽泛的术语来讲,社会建构主义对我们理解世界及我们自己的那些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方法采用了一种批判性的立场,例如,我们用来解释世界的与"真实的"、"客观的"对应的类属方面的假设(Burr,2003)。从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我们是通过社会过程,特别是通过语言的相互作用来建立起对世界和自我理解的,因此它们并不存在不变的或必然的特性——它们是特定文化与历史情境的产物。在社会建构主义框架中进行的研究,关注那些在特定的文化与历史情境中的建构社会现实的方式,那些建构方式中所使用的条件,以及它们对人类经验和社会实践的含义(Willig,2001)。

在此意义上,社会建构主义与其他质性研究取向的认识论截然不同,它们倾向于认为在研究资料的分析结果和分析报告叙说的实际情况之间具有若干联系。因此,例如,如果我要分析采自男性表达情绪经验的质性资料,许多分析取向会假定分析报告必然会反映出某些潜藏于这些经验之中的"真实"或"现实"。许多取向可能会认为分析和那些经验之间的联系是不确切的,因为那些男性可能会忘记他们描述的某些细节,或因为他们会侧重于特定的自我呈现,或因为分析被看作是代表了资料和解释框架(由个人和专业的投入共同组成)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解释框架由研究者带来并会对研究资料产生影响。尽管如此,在分析与"真实"或"现实"之间,通常被假定存在某些关系。社会建构主义对事物的看法颇为不同。一些采用了社会建构主义认识论的质性方法认为,资料描绘的事物是外在于资料的存在;其他的则大多对质性资料之外是否存在与之对应的真实不感兴趣,因为弄清楚这一点是困难的。因此,返回我们的示例:情绪的资料不被看作是反映了情绪的某些真实,而是以特定方式建构情绪的叙述,以"情绪交谈"来执行特定的社会功能。理解社会建构主义可能非常困难,因为它如此多地违反了在我们的世界中和多数心理学研究中被
17 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对这方面有兴趣做出更多探索的读者,可以看本书的第7章和第8章,在哪里检视了重要的社会建构主义研究方法——话语分析。

当你看到质性方法在认识论方面根本不同于标准的科学方法后,就不会对质性研究方法在心理学研究中日益被接受时仍遭遇某些阻抗而感到奇怪了。这种阻抗既指向一般的质性方法,也指向特定的方法。心理学中的质性研究被批评为主观、多轶事趣闻且缺乏严密性,它不能提供任何易于标示"真实生活"的问题,类似于新闻业,而且最十恶不赦的是,它几乎不能与社会学区分。由于质性方法不寻求控制那些在实验取向中所认为的潜在"干扰"变量,质性分析甚至被比作在"下水道中做

外科手术"(Shevlin,2000)——当然,建构实验心理研究的精确而实际如同外科手术一样重要。这些批评中的一部分,代表心理学科学方法倡导者在学科方法学转换时突然感受到了剧痛。当然,有一些批评是值得认真对待的,例如关于质性研究的实践应用问题。我们将在后面再讨论这个问题。

通过质性心理学获得情境化理解

我们已经指出,心理学家转向质性研究方法是因为不满于长久以来被当作心理学"金标准"的"科学方法",以及希望获得研究对象用他们自己的术语描绘的切身经验,或希望对研究主题采用一种彻底的批判分析立场。然而,在心理学研究中使用质性方法可产生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潜在益处是,它能帮助研究者以复杂性和流动性来获得情境(context)的关键因素。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渴望获得研究现象的情境化理解是林肯和古巴(Lincoln and Guba,1985)号召在研究中采用"自然主义"范式的一个原因。

"情境"是在心理学研究中(尤其是在社会心理学中)经常被援用的术语,但它很少被概念化或以最佳的、富有成效的方式被探究。基于达洛斯和德雷珀的系统理论(Dallos and Draper,2000),我倾向于用社会系统和反馈循环来看待情境这个术语,个人嵌入其中并通过它们感受、建构世界,也被世界所建构。因此,情境并不是简单的"背景",它是我们所研究的任何事物的一个构成部分。在此框架中,在微观社会水平下,情境的内涵指的是诸如伙伴关系、家庭关系、职业关系网和朋友关系网。这个水平的情境影响更广泛的社会系统并受后者的影响,例如性别角色、社会阶层、种族地位以及性行为,反过来它们也被宏观的社会意识形态或叙事所渗透。 18

一个彻底的情境化的分析希求照顾到所有这些水平,并描绘它们对变化的反响,以及在它们作为一部分的社会系统中,对个人研究对象及其地位的影响。这样的一个分析将主要为社会心理学家所关注,但是发展一个适当的情境化理解也会对其他领域的心理学研究者有巨大的益处,如健康心理学、咨询心理学及临床心理学。执行这样一个分析对于任何研究方法均非易事,但对于技巧娴熟的研究者,许多质性方法可以容易地通过研究对象的主观叙述来追踪这些与情境相关的运作。作为一种选择,我们可以从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议论、探索由研究对象创作并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文本的可能性,以考察特定情景中允许某些话语的交流却堵塞其余的方式(换言之,使一些事情可以言说,而另外一些则不能)。这并不是说量化研究不能够提供有关情境的重要信息,只不过它是限定于研究对象自己的话语可以捕捉的复杂性和流动性之中而已。

情境的一个方面在多数量化研究中或被忽视、轻视,或被认为是污染,这便是研究者在生产资料和执行分析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此相反,许多质性研究方法是以明确他们的"言说立场(speaking position)"——换句话说,适合他们的研究问题、启发他们分析的解释框架——为特征的,并且他们会反思这个过程。

在一些研究中研究者对此有象征性的处置,他们会呈现小传记,却未能确认他们话语立场的哪些方面在研究中是重要的,以及这些承诺影响研究进程和研究成果的方式(进入研究者的知觉意识的程度)。然而,适当的做法是承认研究者所扮演

的角色，这会提升研究过程的透明度，也会帮助读者理解、评价研究工作。研究本身是个社会过程，这有助于读者澄清这个过程的本质。研究者对他们话语立场反思的一个实例见专栏 2.1。顺便提一下，像在一些合作研究取向中的那样（Heron, 1996），研究作为一个社会过程概念，可以延伸到研究对象，使其作为联合研究者而积极地影响研究的结果。甚至读者或研究的消费者也可以包含在此研究过程中，尽管反驳和重塑一个已发表分析的机会通常是相当有限的，许多质性研究方法还是邀请读者根据提供的资料核查研究的解释。

19

专栏 2.1 研究者对他们话语立场的反思

在一份未出版的研究离婚或分居男性与子女分开居住经验的报告中，咨询心理学家娜塔莉·钱伯斯反思了自己带给研究过程各个方面的影响，这影响了她如何看待研究对象、访谈叙述内容以及所谈及的人（Chambers,2006）。例如，她认为她面临的一个挑战涉及"我的身份既是女性也是女儿。尽管是向一个女性研究者谈话，但研究对象却对他们的前妻或前女友的叙述没有保留，而我发现自己会因为听到女性或人们会对另外的人举止如此残暴而沮丧，在有些情形中他们看上去似乎不关心正剧（即他们子女的幸福）。作为一个特别珍视与父亲关系的女儿，我觉得难以想象有些儿童不该与他们的爸爸有关系。如果这个男性是暴虐的、严重忽略孩子的，我能理解，但我访谈的这些男人显然不属于此类。当然，我实在太在意这个男人的叙述了，而它只代表故事的一面，其中的另一'角色'（即此男性的孩子和他们的前妻或前女友）可能秉持一种不同的看法。在一个案例中，我发现自己不相信研究对象的叙述，认为按他说的她的行为方式，他的前妻或前女友的反应一定不限于此。再三考虑，我觉得自己只是不想相信一个人竟会如此残暴！"

像这样的反思可以容易地嵌入研究生和本科生所做的质性研究中，特别是对于咨询心理学、临床心理学这类期待进行反思的学科中。学生可以在其研究叙述的特定位置做这样的反思。例如，上面的反思可以置于分析程序和分析过程的表述之中。在这个问题上唯一有点困难的是，如果报告的其余部分以较超然公正的风格来表述，那么，用"我"来表述个人的反思就显得不和谐。在此情况下，仔细思考整个研究报告如何最大限度地获得始终如一的风格就是必要的了，例如通篇以一种较个人化的风格行文。作为一种选择，个人反思可以独立于文本主体。然而，这样的话则会遇到新的风险，这意味着个人维度并不真的重要，或者它在某种程度上污染了质性研究过程而必须与研究的"真正"事务（即分析）分割开来。事实上，个人维度是许多质性研究方法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尽管个人反思可以也应当包含在学生的研究报告中，但为出版而准备的写作却通常是另外一码事。只有少数的学术期刊刊登以个人反思贯穿始终为分析特性的文章。因此，研究者需要仔细

20

查看个人反思会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为特定的期刊所接受，以及希望随着时间的过去，限定因素会缓慢地转变，贯穿始终的个人反思会成为刊登质性研究杂志中一个被期待的部分。当然，这需要的是一种最优水平的个人反思，太多的个人反思会给人一种印象，即分析更多地是针对研究者的，而不是研究对象的。

尽管质性方法有潜力带给心理学家很多益处，但把某些益处归功于它们是有问题的，因为可能会造成这样的印象：许多质性研究方法能以某种方式接近研究对象纯正的、没有掺杂的主观世界。这与事实不符，因为所有研究结果都是在研究对象的表述和研究者的解释框架之间不可避免的动态交互过程中产生的。经常不讲明地假定质性方法会以某种方式自动达致研究过程的民主化，这也是有问题的。确定研究者和

研究对象的能力差异会涉及较多的批判、坦诚、反思对话及灵活性,而它们并不是采用了质性研究方法就能神奇地被赋予的。质性研究也不一定是激进的。事实上,正如邓津和林肯(Norman Denzin and Yvonna Lincoln,2005a)指出的那样,不但不是天生的激进,心理学领域之外的质性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与殖民进程紧密联系的。也正如我们所指出的,许多质性研究方法并不包含挑战心理学领域中那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假定,许多研究方法与量化研究具有相同的前提假设。真正激进的思想和原则更多是由研究所采用的架构与理论提供的,而不是来自于研究所采用的方法。

质性研究的评价标准

上文仔细地考察了质性方法可能带给研究的益处,有关的问题也由此产生,那就是研究的消费者(不管他们是学生、学者还是心理服务提供者)如何评价质性研究的价值呢? 心理学中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假设—演绎、量化研究倾向于以信度、内部和外部效度这些标准来评价研究。这些标准依赖于客观性假设,即研究者和研究主题是彼此独立的。因而,这种研究范式的目的就是限制研究中的"偏差", 21 而"偏差"则是以偏离某些确定的事实或真相来定义的。既然多数质性研究者认为自身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他们的研究中,那么,任何与消除"偏差"有关系的评价标准都是不适当的。

不过,某些质性研究方法诉诸于这些传统的标准来评价其研究产品及研究过程。我们曾提及的结构化内容分析就是这样做的,尽管它们是否为真正的质性研究方法是值得怀疑的。一种毫无疑问的质性研究方法则采用了"资料展示"法作为评估的标准。这种经验取向认为,"社会现象不仅存在于头脑中,也存在于客观世界中——它们当中有合理合法的稳定关系等待被发现"(Miles and Huberman,1994:4)。分析的过程包括收集和简化资料、展示资料以及作出和验证研究发现。它以容易获取作为管理和展示资料的主要标准:资料以总结表、矩阵、流程图表的形式展示出来。这可能是一个有价值的研究取向,特别适用于那些对数量庞大的质性资料进行组织时感到不知所措的研究者,尽管研究者需要考虑他们可否"购买"方法的认识论。这个认识论使 M. 迈尔斯和 M. 休伯曼(Matthew Miles and Michael Huberman,1994)给出了评价资料展示分析的标准,它展示了传统的评估标准和非传统的、专门为质性研究设计的标准之间的重叠,如可靠性与本真性(更多这方面的内容,可参看 Lincoln and Guba,1985)。然而,正如 K. 亨伍德和 N. 皮吉昂(Karen Henwood and Nick Pidgeon,1994)所指出的,不同的研究者对于支持这些判断标准的研究过程有着不同的理解,导致理解上出现冲突,并且这种理解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质性研究有时被不适当地用传统标准来评价,因此发现它不合格也就毫不奇怪了。正如重金属乐评专家以重击声、强劲的节奏和响亮的物理声响、期待中的飞快的吉他曲调来评价歌剧一样。因为此类理由,质性研究者希望在他们的研究报告中可以具体地说明另外的标准,并期待以此来评估他们的研究。当前,已经有许多这样的评价标准被提出来。其中最为系统的一个评价方案是埃利奥特和他的同事提出的(Elliott et al. ,1999)。通过缜密的咨询过程,他们提出了心理学中评价质性研究的"评估指南"——它由质性、量化研究中的共同标准(明晰的科学情境和目标、

适当的方法、对研究对象的尊重、方法的详细说明、恰当的讨论、清晰的报告和对知识的贡献)和特别适用于质性研究的标准(有自己的视角、定位样本、扎根实例、提供可信的检核、一致性、完成了一般的或特定的研究任务以及与读者产生共鸣)组22 成。一些质性研究者对此标准表达了保留意见(Reicher,2000),而偏爱其他更为宽松的评估方案,如L.雅德莉(L. Yardley,2000)的方案,尽管她的方案在某些方面与埃利奥特等人(Elliott et al.,1999)的方案是交叠的。

雅德莉认为一个好的质性研究应该包含的要素有"情境的敏感度"、"承诺与严谨"、"透明与一致性",以及"冲击力和重要性"。对于"情境的敏感度(sensitivity to context)",她认为与其他的事物一样,研究应该能够解释由以往的研究者用相似方法和/或分析相似主题所形成的理论与认识情境、研究的社会文化情境(例如,规范、意识形态、历史、语言和社会经济对于研究对象及研究者的信念、目标、期望、谈话的影响),以及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社会关系脉络(参见专栏2.2)。"承诺(commitment)"指需要对所从事的研究主题表现出长时间的投入,"严谨(rigour)"与资料搜集和分析的完整性有关。"透明(transparency)"指需要详细说明资料搜集和分析过程的每一方面,并说明/讨论研究过程的所有方面;"一致性(coherence)"指向研究叙述的质量,是指研究问题与所采用的哲学观点"相适合",调查和分析的方法"相适合"。"冲击力和重要性(impact and importance)"与研究的理论影响、实践影响和社会文化影响有关。

专栏2.2 研究工作场所遭遇欺侮的旁观者经验中的"情境的敏感度"

为了举例说明雅德莉(Yardley,2000)所提出的一个评价标准如何应用于实践,我们来审视一个质性研究,该研究旨在寻求增进对工作场所中被欺侮的人们如何感受旁观者(也就是,见证或觉察欺侮但未采取干预措施来阻止的工友)的角色方面的理解。我们假定研究者是通过对那些曾报告过在工作场所遭受欺侮的人的个别访谈来收集他/她的资料的。

为了使本研究能说明"情境敏感度",需要将此研究与相关的研究及一般的欺侮、工作场所的欺侮、旁观现象的理论联系起来。我们预期研究不但注意到了回应以前研究工作的发现,还应该与之有区别,并提出工作场所中欺侮旁观者效应概念化的新途径。

我们同样期待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置于情境之中,这包括描述研究对象的人口学和相关的"背23 景"细节(例如,性别、年龄、民族、教育成就及职业经历),以及在呈现研究发现时,指出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了研究对象所提供的诉说。因此,例如,一个女职员在遭受男性上司指责其"竞争性"不够时,就不会期待男性旁观者能出面干预,因为她觉察到欺侮者和旁观者对于工作情境中的竞争伦理及女性对此并不是理想的适合者,持有相同的观念。我们同样期待研究者会去揭开他/她自己在工作场所或其他场合是否遭遇过欺侮,假如遭遇过欺侮,则应说明这些经历如何影响他们对研究的预期,以及如何影响了分析。

我们同样期待看到研究者对他/她与研究对象之间关系的社会情境做出反思,特别是在控制力分配方面。尽管研究对象因拥有研究者需要的东西而在会谈过程中有影响力,但研究者通常更熟悉访谈情境,并可能会利用这种熟悉性施加控制。在这个特定的研究中,我们期待研究者妥善地协调控制问题,因为如果研究者过度控制,被研究者就会知觉到这像是在重复他们正在谈及的欺侮。因此,我们希望看到研究者讨论访谈过程中及以后(例如,研究者将分析的草稿寄给研究对象,让他们在解释资料中扮演积极的角色)控制议题是如何处理的。

到现在为止，尽管所提出的标准有重复主题，而这些标准涉及提供研究对象的情境化描述、细致地叙述分析的过程、表明研究者的“言说立场”及其如何影响分析，以及研究资料解释基础的一致性，但关于质性研究最佳的评价标准却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其实，质性研究方法是异质的，宣称达成意见一致是不可能的。因此，有一个供我们使用的潜在评估标准范围可能就足够了。这样，研究者就可以从中选择最适合他们研究的部分，为他们选择的标准辩护并允许读者评估这些理由，以及如果他们同意的话，用这些标准评估相应的研究。

在埃利奥特等人（Elliott et al.，1999）和雅德莉（Yardley，2000）的方案中，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是值得认真对待的，该标准涉及的内容我在前面叙述批评质性心理研究问题时已经提及。我挑选出的问题是关于质性研究的实践应用，它与埃利奥特等人关于与读者产生共鸣的标准交叉，也是雅德莉“冲击力与重要性”标准的一部分。 24 这个问题有时指的是“那又怎么样？”，它产生于“最好的心理学研究，除了其他事项外……尤其鼓舞专业实践[和]传递公共服务”的主张（Bruce，2002：620）。例如，一个从事慢性病患工作的临床心理学专家，可能会乐于阅读一份对一位与帕金森综合症患者生活在一起的人的叙述资料进行的细致的质性分析（参见 Bramley and Eatough，2005）。不过，他们可能会问自己：“那又怎么样？对于在自己工作中遇到的许多帕金森综合症患者的经验，这又能告诉我些什么呢？通过此研究我自己的实践又如何得到提高呢？”鉴于很少有质性研究会自信地声称已经记述了他们研究主题的所有变化，这些“那又怎么样？”这样的问题他们就会频繁地遇到。当然，研究者可以质疑那些以实际效用才能显示研究价值的假设，也可以表明知识本身就是有价值的。然而，如果问题的前提被接受，各种各样的反应就是可能的。研究者可以解释研究主题的概貌是通过一系列互补的质性研究逐步建立起来的，每一个研究都为拓展这个描述添加了新的内容。因此，单个研究所展示的，是建构可用于提升干预疗法更一般的理解过程中的一步。另外，能否通过特殊性来窥知普遍性历来是有争议的（Warnock，1987）。

质性心理学未来发展的领域

尽管目前质性研究方法已经相对好地在心理学领域内得以立足，但在实践中某些方法的内涵仍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完善（毫无疑问，未来的质性研究实践会发现需要发展的新领域）。在本部分，我将集中于方法领域两个不断发展的关注点。

第一个关注领域是质性与量化研究方法的整合（integr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尽管质性与量化研究范式趋向于与迥异的认识论联系在一起，它们却没有必要在概念上彼此不相容：量化法不必执著于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假设演绎主义的认识论，质性方法也没有必要对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假设演绎主义抱有敌意。前面我们曾指出的结构化内容分析法就是植根于此认识论的。尽管我们认为它可能不是真正令人信服的质性方法，它还是可以被描绘成一种表现结合质性与量化两方面的单一方法——我们可以称之为“混合”取向（Fielding and Schreier，2001）。 25 不过，需要注意这个方法并没有整合质性与量化这两方面，因为整合需要不同的方法，它们指向于同一个研究目标或问题，被赋予同样的重要性（参

见 Moran-Ellis et al. ,2006)。有很多可能的途径来整合研究方法。例如,一个研究可以由相对互不关联的质性与量化元素组成,对于回答研究问题的不同侧面各自作出了同样的贡献。比如,参见 R. 谢菲尔德(Richard Shepherd)及其同事(即将出版)的研究报告,该研究考察了公众对新一代基因技术的态度,其中包括一个全国性的量化调查,一个包含片段描写的量化研究,以及用焦点群体访谈法和媒体信息进行的一组质性研究。

有意义的方法组合带来的各种潜在益处已经被认识到了。例如,质性方法可以更充分地接近研究对象(Mayring,2001),量化研究方法可以获得更具普遍意义的研究结果。然而,这并不是假定质性与量化研究方法的组合会从根本上优于单一的范式——本书呈现的几种重要的方法(以及在附录 2 的经验报告中)中的一部分研究问题,不能在无损其丰富性和细致的前提下使用量化方法来处理。应该由最适合回答的研究问题来决定是否使用质性与量化合并方法。有时,该关注的问题是如何确切地实现质性与量化方法的最佳组合及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参见 Brannen,1992;Schreier and Fielding,2001),但这是个持久的讨论,需要进一步的探究(Todd et al. ,2004)。

要关注的另一个领域是纵向质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 for longitudinal research)的发展,即长时间地追踪个体并在不同时点与他们会谈,以探索发展和变化。质性研究往往通过要求研究对象回顾他们的经历来探索其随时间发生的变化。这种做法有不利之处,例如,研究对象可能以他们当前的境况和视角来看待过去。R. 汤姆森和 J. 霍兰德(Rachel Thomson and Janet Holland,2003)在关于他们做的一项历时九年的青春期转变研究的反思中,讨论了在纵向质性研究中遭遇到的某些特定的挑战。到这个研究要结束时,大约有 100 名年轻人分别被面访了 6 次,至少参加了一次焦点群体访谈,以及其他的研究活动。他们指出的挑战之一便是研究对象可能对长时间地叙述自己的发展与进步而不是困难与失败感到有压力。另一个问题是,在资料分析的任一阶段所提出解释的暂时性特质,即某个阶段提出的解释在稍后阶段随着新资料的出现而需要修改。同样,如果研究由一个团队执行,那么,成员的变更就可能使研究解释连续性地面临困难,新研究者可能发现他/她与前任所关注的资料侧面不同。不管怎么样,与潜在的收益相比较,任何挑战看起来都被夸大了,例如,通过对研究对象不同时点的个别访谈而获得更好理解的机会。如果研究问题是关注更好地理解某一维度的演变过程,而不是某种静态的特性(例如,身份),那么纵向的质性研究就是恰当的。当然,与纵向质性研究相关联的挑战也是纵向量化研究所要面对的,例如,如何避免流失研究对象,以及研究工作的经费投入。追踪研究对象发展(指的是扩充心理及社会过程方面的知识并用作指引相关服务)过程中的变化有着如此大的价值,以至于纵向研究肯定会在将来成为质性研究体系的标准组成部分。然而,这需要一些既有的质性方法做出新的发展,以武装使用它们的研究者,来满足纵向研究的需求。

26

质性研究中避免"方法至上"和提倡方法学的灵活性

在本章的开始,我为英国心理学近年对质性研究发展出更大的开放性而喜悦,却以较大的方法多样性变成常态后所应给予的告诫结束本章。在对自身所卷入的

理解研究过程的反思中,C. 威利格(Carla Willig,2001)谈到了作为一个本科生,她是如何视研究方法为“诀窍”的:必须正确地使用这些诀窍规定的成分(例如,有代表性的样本,适当的测量工具和切题的统计检验)及其顺序,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透过自己的研究经验,她认识到研究过程是个更以关注创造性为核心的活动,不是正确地使用技巧,而是以最佳的方式来回答研究的问题。对于她,关注点已经从方法转换到了研究寻求回答的问题。正如我们建议的兼用质性和量化研究方法可能看到的景象,这种研究问题的优先次序是至关重要的。着迷于方法吸引力的人,会对尽可能地完全使用自己偏爱的方法更关心,有时会因此使研究丧失了根本上重要的发现。我们可能会内疚于“方法至上(methodolatry)”——奴隶似地依附和使用某种方法。

这当然提出了一个关于本书目标指向的问题。本书的重心是呈现在心理学研究中越来越多地被使用的四种质性研究方法的原理及其实用性,那么,会不会遭遇在心理学中拔高质性研究的风险呢? 此问题的答案部分依赖于以何种方式去使用本书中的资料。对于那些第一次使用某种特定质性方法的学生和研究者来讲,有一组可供遵循的步骤是有益的。如若不然,他们会对于从何开始、如何推进分析缺少清晰的认识,从而可能会对自己是否采用了合乎要求的质性研究方式感到焦虑。这会导致研究者在分析上停滞难行。因此,本书中第3、5、7、9章概要介绍的各种方法的步骤或策略,可以成为指导这些方法上的初学者或研究者的一种有效的“路线图”,进而,重要的是要牢记这些路线图只是一种分析路线。如果研究者执著于此路线,并视其为使用某种特定方法的唯一合乎要求的方式,那么他就会陷入方法立场上的危险之中,研究者也会因此面临产生有限分析的危险;如果他/她尝试不同的分析路线的话,就可能提升分析,这些路线会引领他们遵循一种更具创造性和出乎意料的途径。这并不是说有一种纵贯四章的灵活性主题,这四章各自代表一种重要的方法。这些方法的每一位作者都承认,在某种研究取向上存在一种以上可接受的分析方法。在所有的作者中,米歇尔·克罗斯利在叙事分析的一章(第9章)中表达得最为明确。她将叙事分析表述为一种解释的艺术,它包含了条理清楚、有说服力的分析故事,而不能也不应该简化为一步一步的分析指南。 27

然而,研究者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改良和采用某种特定的方法是有条件的。研究者对特定方法改变得越多,所面临的风险就会越大,即他/她的分析就会越发不被视为合理使用此方法的实例。哪儿是特定方法灵活性的确切边界是相当难以确定的。革新过程的本质是新发展,一开始可能会遇到某些特定方法倡导者的抵制,但如果这种改变被证实为是有用的、适当的,并且被使用此方法的其他研究者所采用,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可能会成为该方法中可以被接纳的变体。对于一种既存方法达致可靠变更的最佳途径,可能是随着时间的过去一点一点改变它,而不是彻底地改变它并期望其他人接受这种改变。随着经验的增加,研究者对于特定方法的局限、对于它不能清晰或很好地处理的议题会获得一种敏感,并能发展可能的策略来确定这种局限以更有效地回答研究的问题。例如,在我早期尝试使用IPA(参见第3章)时,我不能确定如何将既存的心理学理论应用于分析之中而不违反方法对于凸显研究对象意义生成的承诺。通过尝试各种选择,我发展出一种方法可以使理论丰富研究而不是掌控研究,并可运用理论的光亮(我希望它是)增加分析的心理学深度(参见第4章的专栏4.2;关于在质性研究中运用理论的更多信息,请参看 Anfara and 28

Mertz,2006)。运用这个取向出版的研究报告已经被 IPA 的开创者认可性地引用,这表明它已经被认为是该方法中一种可以接受的版本。

另一种发展新取向的可能途径是合并既有的质性方法或这些方法的不同方面。合并质性方法与量化方法,会拓展一个研究取向的视野,以保证它能对研究问题提供更完整、更有效的答案,以及可能给研究问题处理以更广泛的范围。同样是合并质与量的研究方法,合并质性方法(或其方面)的过程会变得难以处理,当这些方法是基于不同的认识论时尤其如此。如果是那样的话,研究者最终会产生缺乏认识论一致性的取向——假设认识论的一致性是所有研究必需的品质的话,这就洞开了争议之门。例如,一个有社会建构主义倾向的研究却不用 IPA 作分析,这是没有理由的。同样,如果在研究访谈中关注研究对象的意义生成,其分析就应该关注研究对象在他们的谈话中如何使用通过社会过程建立起来的范畴,以及通过研究对象谈话所展示的社会功能。不过,如果允许研究保留 IPA 对研究对象谈话具有的与其所谈真实之间关系的核心理解,寻找一种途径来处置此问题就是必需的了。

因此,假如本书的章节没有被视为运用其所展示方法唯一确定的方式,那么,判定本书并非鼓吹方法至上就是公平的。相反,这些章节应该被看作是提供给研究初学者有益的初始路线。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经验的增加,这些研究者关于这些方法会获得属于他们自己的"理解",甚至可能开创性地发展出为将来研究者所使用的方法。

小 结

本章展示了一组相关的议题,在某些情况下,会有益于脉络化本书所关注的四种质性研究方法。细心阅读本书资料以及查阅这里所引用的重要著作的读者会发现,他们为做优质的质性研究做好了准备。然而,决定他们研究最终质量的关键因素是技巧、创造性,它们才是适用于各种方法的通则。

29

延伸阅读

第一次接触质性研究的读者是幸运的,因为现在有很多优秀的质性研究方面的书,它们提供了心理学质性研究方法出现的背景,以及特定方法的细节(尽管它们的操作性不及本书,与本书的关注点也不同)。跨学科的质性研究"巨著"是邓津和林肯编著的《SAGE 质性研究手册》(Denzin and Lincoln,2005b)。在英国,一种综合性稍低但非常方便阅读的书是约翰·理查森编著的《心理学与社会科学中的质性研究方法手册》(Richardson,1996)。接下来值得一提的例子包括卡拉·威利格的《心理学中的质性研究入门:理论与方法的历险》(Willig,2001)和乔安娜·史密斯编著的《质性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实践指南》(Smith,2003)。有用的文本同样也出现在特定心理学领域的质性研究中,例如健康心理学(参见米歇尔·默里和克里·张伯伦编著的书籍《质性健康心理学:理论与方法》(Murray and Chamberlain,1999))、心理治疗和咨询心理学中(参见约翰·麦克劳德的《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中的质性研究》(McLeod,2000))。

资料分析的取向

第[illegible]单元

32

正如在第1、2章中所指出的，在质性研究框架下有大量的研究方法，并且已在心理学研究中使用。这包括内容分析（Krippendorf,2004）、资料展示取向（Miles and Huberman,1994）、原始记录分析（Gilhooly and Green,1996;Green and Gilhooly,199）、扎根理论（Glaser and Strauss,1967）、解释现象学分析（Smith,1996,2004）、语音关系法（McLean Taylor et al. ,1996）、话语分析（Potter and Wetherell,1987）和会话分析（Hutchby and Wooffitt,1998）。此外，其中的一些方法不是单一的方法/取向，而是存在几种不同的形式。没有一本书会期望深入报道所有在心理学研究中已经使用或可能使用的质性方法。

在本书中，我们选择把重点放在了四种方法/取向：解释现象学分析、扎根理论、话语分析和叙事分析。我们选择这些方法有两个方面的理由：首先，每一种方法都在许多心理学分支学科的研究人员中广泛使用；第二，这些方法各自基于不相同的认识论假设。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方法的对比，促进理解认识论与方法之间的关系，及其对研究过程不同方面的影响。

首先由有相当经验的研究者介绍了各种方法的原理与实用性。解释现象学分析由乔纳森·A. 史密斯和维吉尼亚·伊托夫介绍，扎根理论由希拉·佩恩介绍，话语分析由阿德里安·科勒介绍，叙事分析由米歇尔·克罗斯利介绍。值得注意的是，乔纳森·A. 史密斯是其所介绍方法的创立者，米歇尔·克罗斯利在英国叙事分析的普及中扮演了领导角色。

33

这些章节中详细讨论了各种方法对应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他们介绍了这些方法的理论与哲学背景，讨论了这些方法的不同版本与自己偏好的版本之间的关系。例如，在第5章，希拉·佩恩谈到了扎根理论的历史发展，该方法与格拉泽和斯特劳斯在1967年首次提出的版本及他们其后发展的诸版本之间的区别，以及该方法最近的发展，如雷尼（Rennie,2000）的有条不紊的诠释学（methodical hermeneutics）、克拉克（Clarke ,2003）的后现代版及卡麦兹（Charmaz,2006）的社会建构主义版本。在第7章的话语分析中，阿德里安·考利对该方法在英国的两大变种——话语心理学（Edwards and Potter,1992）和福柯式话语分析（Parker,1992）——进行了区别，并对二者进行了整合。

每个章节均讨论了最适合其所关注方法的研究问题的类型，并给出了使用该方法探索研究问题的范例。他们还顾及了最适合各方法分析的资料类型。例如，在第3章中，乔纳森·A. 史密斯和维吉尼亚·伊托夫详细讨论了不同类型的访谈，并认为，半结构化访谈是解释现象学分析资料收集的最适合的方法。因此，读者应查阅

该章并了解关于质性访谈有用的资料，虽然其中所述的基本原则有可能需要按照其他方法的要求做出改变。在第5章和第9章中，希拉·佩恩和米歇尔·克罗斯利分别讨论了扎根理论和叙事分析搜集资料的最佳方式；在第7章中，阿德里安·考利考查了话语分析中文本选择的过程。这些章节还给出了宝贵的分析过程分步指南，以过去的研究项目为例来说明各种分析原则和策略。

本书中呈现的方法由各研究生小组在一名该方法专家的指导下，分别应用到了同一份资料的分析中。这样做的目的是，允许明确地比较各种方法如何建构分析的重点、所涉及的分析任务是什么，以及在分析过程结束时得到的是什么。用于此练习的访谈誊本连同该资料的介绍载于附录1，由安尼尔·里德收集，该资料是他在萨里大学接受心理辅导博士培训时所进行的研究的一部分。这是一项通过质性分析退伍军人的叙述，来重新定位他们离开军队后身份的研究。在此练习之前，这些研究生大部分还少有运用指定方法分析此类资料集的经验。

每个分析小组的一个或多个成员在“做……”的章节撰述了他们的分析，并对分析过程中的经验进行了反思。这些作者都承认，虽然小组内的争论、分歧和洞察力已经被给予了始终如一的注意，但他们的叙述必然是对这一分析进程的个人化解释。例如，在第4章讨论的解释现象学分析中，莱斯利·斯托里提到了她的小组中关于理论在分析中作用的讨论，并动用现有的解释现象学研究来说明如何使用了理论。在第6章对扎根理论的反思中，希拉·霍克和克瑞斯丁·科尔分享了能够展示研究“决策尝试”重要性的见解，它通过记录分析中产生的所有观点、编码、意义、分类以及分歧，启于研究伊始而终于最后浮现理论。他们认为，分析过程的透明度有利于提升分析的严谨性和有效性。在第8章，克里斯·沃尔顿报告了话语分析的应用，并反思了福柯式话语分析中的某些假设与研究发现的行为或实践意义相协调的问题及其与现有理论契合的问题。在第10章，尼尔·哈比森讨论了叙事分析的应用，并提出了有关文本资料支配质性研究的问题，以及所做的研究以不同风格（学术性的、戏剧化的等）呈现时的理论选择问题。

这些作者都毫不犹豫地指出了自己所在小组遇到的困难，以及他们试图克服这些困难的方式。开始的理论章呈现了如何运用每种方法处理资料的“理论”，而接下来“做……”的章，则通过研究初学者的实践经验表明这些方法真正能解决的是什么！我们建议读者同时学习每一种方法的两章，这样，就可以获得该方法更全面的了解和认识。重要的是，为了完整地遵循“做……”的章节，请读者先自行熟悉附录1的资料。

在本部分的最后（第11章），伊凡希雅·莱昂斯讨论了四种取向的主要异同。她特别重视四种质性研究取向中的每一种在执行过程中如何概念化，以及研究人员处理现有的心理学知识、其个人经验及话语立场的方式。她还讨论了心理研究的目标，以及评价运用每种方法所执行研究的最合适的标准问题。

在本部分的各个章节中，读者都会发现四种研究取向的理论与哲学基础的详细讨论，以及关于在研究项目中如何运用它们的丰富而详细的技术信息。我们请读者给予这些方面以同等的重视，也许最重要的是反思它们之间的关系。

——伊凡希雅·莱昂斯 & 阿德里安·考利

3

解释现象学分析

乔纳森 A. 史密斯 & 维吉尼亚·伊托夫

本章概述解释现象学分析(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IPA)的理论基础,讨论适宜于IPA研究的问题类型,并考察取样和资料收集方法,最后提供实施IPA研究的一些准则,其中包括访谈和分析过程。

关键术语

个案研究(case study)	个人记述的(idiographic)
冷认知(cool cognition)	解释(interpretation)
双重诠释(double hermeneutic)	意义生成(meaning-making)
诠释学(hermeneutics)	现象学(phenomenology)
热认知(hot cognition)	半结构式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身份(identity)	主题(themes)

理论基础

组成IPA的三个词汇中的每一个都具有很长的知识历史。不过,在过去的大约十年间,这三个词汇的特定组合已经产生了一种极具特色的心理学研究取向,被一系列不断涌现的心理学研究所支持。IPA的主要理论基石是现象学(phenomenology)(Moran,2000)、诠释学(hermeneutics)(Palmer,1969)和个人记述研究取向(idiography,或称特殊规律研究取向)(Smith et al.,1995)。同时,IPA还与心理学中对个人陈述和主观体验的传统关注(Allport,1942;James,1890)及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Blumer,1969)联系在一起。

IPA的目标是对个体详细的个人和实际生活经验进行探究,并且考察研究对象 36 如何理解他们的个人世界和社会世界。一项IPA研究通常主要关注的是特定经验、事件和状态对于研究对象的意义。譬如,IPA尤其适合于探究健康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领域,以及那些需要探明人们是如何知觉和理解自己生活中重要事件的主题。这一特点反映了IPA的现象学特性(Giorgi and Giorgi,2003),即指向于个体对客体或事件的个人知觉或解释,而与试图制造出对客体或事件的客观描述相反。

与此同时,IPA还以研究者在此过程中的灵活作用来强调研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对研究对象经验的获取依赖并取决于研究者自身具有的概念,实际上为了通过一个解释活动过程理解他人的个人世界,研究者自身的概念也是必需的。所以分析包括了一个两阶段的解释过程,或可称其为双重诠释(double hermeneutic)。研究对象设法理解他/她的世界,而研究者则设法理解研究对象是如何设法理解他/她的世界的。这一双重诠释过程很好地说明了研究者的双重角色。从某种角度来看,研究者就如同研究对象,在利用他们共享的心智能力。同时,研究者也不同于研究对象,因为他们还通常对他人经验进行二阶解读(诠释学的历史可参见Palmer,1969)。

换个角度,把IPA的双重诠释视为共情式诠释(empathic hermeneutics)与批判式诠释(critical hermeneutics)的结合也是合理的(Ricoeur,1970)。因此,与其现象学起源一致,IPA关注的是设法搞清楚处于人们的不同观察点——站在他们的角度,或是从离研究对象尽可能远的角度(这种情况从未完全实现)——会有什么效果。同时,详细的IPA分析也可能由研究对象的位置后退一点,并对其做出的陈述提出一些细致的和批判性的问题。譬如,"此人试图达到的是什么","此处透露出来的东西是否是故意的","我是否觉察到了某事正在发生而他/她们自己没有觉察到"。两种风格的解释均能够成为持久质性探究的组成部分,并且IPA研究通常包含这两种成分。允许两个方面都存在于探究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个结果更丰富的分析过程,并且对研究对象的总体把握也更为妥当,而且"毫无掩饰"。

IPA的理论立场是将人视为一种认知的、语言的、情感的及生理的生命,并且假定在人们的言谈、思想和情绪状态之间存在着连接的链条。同时,IPA研究者认识到这一链条绝非直接联系——人们对于表达其所想所感是有所挣扎的,所以他们不愿意自我暴露是有理由的。研究者不得不从他/她所说的来解释人们的精神和情绪 37 状态。实际上,这涉及研究者采用的解释性思考的不同方式,譬如,在建立主要基于

研究对象自身措词的丰富体验描述与建立一个更具质疑性的替代性陈述之间权衡。IPA 还承认任何分析说明都是局部的——我们不能够想象这是这个主题的最终结语。

对人整体内在特性(holism inherent)的描绘还把 IPA 与建立于 1960—1970 年代的、反对实验和实验室范式人的概念化方式的人本主义心理学连接在了一起(Graham,1986)。人本主义心理学具有一种对学术世界之外个人及社会活动的政治立场,且具有社会促进色彩,譬如:自我实现、团体治疗以及和东方哲学的连接。IPA 具有关于人的人本主义化的整体性模型(humanistically informed holistic model),但仍将研究定位于学术以及心理学学科之内。因此,IPA 试图从内部改变心理学,同时从人是什么以及关于人的研究如何构建这两个方面扩展心理学的概念化方式。

同时,IPA 强调研究对象和研究者的意义生成,这意味着它分析的关注点可以被描述为以认知为核心,也表明其与当代心理学中占据优势的认知范式有一种令人感兴趣的理论关联。不过,虽然 IPA 的确与认知心理学及社会认知(Fiske and Taylor,1991)共享对心理过程的关注,但 IPA 与主流心理学在决定考察心理现象的恰当方法时存在严重分歧。主流心理学仍坚决支持量化的和实验性的方法学,IPA 则使用深度质性分析。在这一背景下,了解认知取向建立者之一布鲁纳(Bruner,1990)的观念变化历程就比较有意思了,他对取向从意义及意义生成的核心关注向信息加工科学的迅速转变感到懊恼。

IPA 是一种个人记述式研究模型(idiographic mode),是心理学中占据优势的共同规律取向(nomothetic approach)的对立面(Smith et al. , 1995)。在共同规律研究中,分析处于小组和群体层次并且对个体仅能做出概率性推断,譬如,某人将以此方式做出反应的可能性有 70%。在个人记述式研究中,因为来源于对个体个案研究的考察,其也就可能对个体做出具体的说明。因此,对于 IPA 来说,分析过程总是始于单个个案记录的详细阅读。此个案记录继而可能整理成文成为一个个案研究(case study),否则研究者将会转向第二个个案记录进行同等的精细分析,如此等等。基于分析对象属于一组个体的假设,一个好的 IPA 研究总是允许其自身从两种不同的角度被解析,而对分析过程中的重要的普遍性主题(generic themes)有所了解以及对讲述其故事的特定研究对象的叙述性生活世界有所了解应该是合理的。更多地了解 IPA 的理论基础,可参考史密斯的相关著作(Smith,1996, 2004)。 38

在过去的十年中,IPA 已经发展为一种完全系统性的质性心理学研究取向,并且已经能够从已出版著作的内容中显示出特定的主题,这些著作是 IPA 专注于人们如何思考和理解其生活中重要事件和人物的成果。这些主题包括对研究对象的意义生成(meaning-making)和解释的专注、对身份(identity)的关注,以及对自我感受和对生活经验中躯体感的关注。

研究问题、取样和资料收集

如前所述,IPA 关注深度探究个体个人的和实际生活的经验,以及他/她如何理解其生活经验。这种特点有助于定义适用于 IPA 的研究问题。专栏 3.1 举例说明了一些具体的、已出版的研究问题,其引导了 IPA 式研究项目指引。

专栏 3.1 IPA 研究中的心理学研究问题示例

- 艾滋病(HIV)病毒感染如何影响人际关系?(Jarman et al. ,2005)
- 具有遗传缺陷的人如何看待不断变化的医学技术?(Chapman,2002)
- 精神信念(如果存在)在帮助老人忍受丧偶之痛方面发挥什么作用?(Golsworthy and Coyle,1999)
- 父母们如何体验一种罕见的疾病感染其孩子?(Smith et al. ,2006)
- 心理健康护士所使用的理论模型是什么?(Carradice et al. ,2002)

正如能够看到的那样,IPA 研究通常涉及一些"大问题"、对研究对象相当重要的问题,不是正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性问题就是某个特定的关键时机点。通常这些问题是转换性的并且通常涉及身份,因为对重要经验或事件的个体陈述几乎总会影响到个人和社会身份。IPA 研究可能关心那些明显非常具体的问题或恰当定义的问题(譬如,人们是如何决定是否进行遗传检验),或者更为宽泛的问题(譬如,职业生涯变化如何较广泛地影响此人的生活)。IPA 问题能够进入到"热认知(hot cognition)"领域,从而对涉及急切的、情绪性的和两难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也可以进入"冷认知(cool 39 cognition)"领域,涉及跨越生命历程的长期反应等问题。研究可能是单一快照式的,也可能是对研究对象进行纵向跟踪的。所有这些研究和研究问题所具有的共同之处,是在研究中专注于详细探究研究对象的个人和社会经验。

IPA 研究以较小的样本规模实施。需要优先考虑的是公平对待每一个个案,而且对个体访谈转录内容和陈述进行的详细的逐案分析会持续较长时间。这意味着,在分析过程早期,研究者需要做出一个决定性的选择,问他/她自己:"我是想要对某个特定的人进行详尽而细微地说明呢,或者是对这些团体和群体进行更一般化的说明?"方法学和设计将会因对此问题的回答的不同而不同。有的时候学生们会试图通过使用较大样本规模而"不用冒险(play safe)",希望消除担心因审稿人可能对量化研究感觉更舒服而带来的忧虑。在我们的经验中,这很难奏效:这些样本不能满足量化的标准,而研究工作很可能草草了结于资料的泥沼之中,或者仅产生一个表面化的质性研究。

在继续讨论样本规模问题之前,我们将说明最近我们就单个案的样本持续进行的争论(参见,Smith,2004)。由此,在诸如帕金森氏症(Parkinson's disease)患者生活体验(Bramley and Eatough,2005)、愤怒的主观体验(Eatough and Smith,2006)、遗传基因检测(Smith et al. ,2000),以及自愿的、受虐施虐的及主从关系的性游戏(Weille,2002)等主题上出版了一系列单人个案研究结果。认真地实施个人记述式研究,确实是一个符合逻辑的步骤。虽然单人个案研究在心理学领域内已被充分肯定(Radley and Chamberlain,2001;Smith,1993;Yin,1989),但我们认为,其在自身正当性范围内充当了重要的学理功能。当然,如果研究结果用于提交申请学位,那么实施单人个案研究则是个高风险的策略,不宜轻率采用。实事求是地说,如果选择会被置于这种严格审查中,谨慎选择这种做法是合乎情理的。不过,越来越多的研究生发现继续使用这种极具吸引力的、麻烦的、复杂的个案研究是有价值的,并且在转向其他方法之前,试图在其自身正当性范围内做到合理。

像这样的详细个案研究的价值是双重的:很明显大部分是获得特定人物的相关

信息以及他/她对具体情境的反应,也还有部分是获得研究对象陈述的不同方面之间的连接。不过,沃诺克(Warnock,1987)论述了一个重要而深刻的观点,更深入地钻研独特性也使得我们更接近普遍性。我们因此获得了更好的定位,以思考我们和他人如何对待那些成为研究对象的特定情境,我们与某个表面上个人境遇完全和我们隔绝及不同的人,如何在最深的层次上存在着许多共享的东西。因此,在某些方式下,个体某些方面的详细信息也使我们接近一般性的重要方面,与他/她个体独特生活的连接也就连接了共享的人性。　40

假设你拒绝使用单个案研究,那么,应该在研究中包括多少研究对象呢?对这个问题是没有正确答案的。这部分取决于对分析和报告的个案研究这一层次的投入程度、个体个案的丰富性以及操作的限制。已发表 IPA 研究的样本规模从 1 个到 42 个不等,且以朝向人数少的这端为正常情况。在临床和健康心理学研究生课程中恰当的样本规模是 6 到 8 个,看起来这与 IPA 研究的情况较接近(Turpin et al.,1997)。照目前的情况,我们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这一数目提供了足够的个案数来考察研究对象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却没有多到使研究者因为所产生的过量资料而陷入不知所措的危险中。不过,重要的是一个确定的数值或数值范围不会成为固定的期望值。如同我们在上面说的,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主张"随机单人(n of 1)";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中,详细考察每组中三个个案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将是可行的最佳途径。经验告诉我们,每组三个个案对大学生研究项目效果非常好,可促进学生公正对待资料,同时也给予他们一种如何透过材料识别模式的感觉。

IPA 研究者们通常试图寻求完全同质的样本。基本的逻辑是如果你进行访谈,譬如,六个研究对象,考虑取样的随机或代表性帮助不大。IPA 因此倾向于相反的方向,通过目的性取样,寻求更为严密定义的样本组以使研究问题更有意义。如何定义样本的特异性则取决于研究。在某些情况下,被研究的主题可能本身就罕见并且/或者研究不足,并且因此而定义了恰当样本的范围,譬如具有诸如少年亨廷顿氏症(Huntington's Disease)这类罕见遗传障碍的患者的生活经历。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中,研究特异性较低的问题,样本可从具有相似的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中抽取,譬如,如果你对人们如何对政府关于健康饮食的建议做出反应感兴趣的话。

这种逻辑类似于人类学家在某特定社区内做民族志研究的逻辑。人类学家详细地报告其中的特定文化,但并不宣称能够对所有的文化进行描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后续研究当然能够以其他团体为对象,渐渐地更为普遍化的研究推断也会产生,不过每一项研究都基于对一组个案的详细考察。

这可能要从理论角度而非实证性的、普遍化的角度去思考。在这种情况下,读者需要在一项 IPA 研究的不同发现、他/她的个人及专业经验、以及现有文献中的主张之间建立联系。IPA 研究的效力大小,由其在较广泛背景下所给出的解释来评判。　41

同前所述,这些问题必然会被强烈的实用主义做法所调节。你的研究样本的选取,是按潜在研究对象是(或应该是)自由决定参加研究的方式进行的。所以,当你不能够说服足够的原定义研究对象团体成员参与到研究中的情况发生时,你也许不得不修改或重新划定纳入研究的标准。

资料收集方法是怎样的呢?大量的 IPA 研究从半结构式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中获得资料,并且这种资料收集形式也许被看作是这类研究中最佳的一种资料收集方式。相对于 IPA 半结构式访谈的优势在于,它处于一个对访谈期间出现的令人感兴趣且重要的话题进行实时跟进的位置。不过,重要的是在此问题上不

可教条主义。通过其他手段收集丰富的言语陈述也有可能。譬如，可以要求研究对象写自传或其他的个人叙述，或者坚持写一段时间的日记。本章的第一作者在一项关于向母亲身份过渡的研究中，使用了所有这些资料收集形式，而日记是分析尤其重要的来源（Smith, 1999）。

半结构式访谈

访谈类型的连续变化体

考虑到多数 IPA 研究使用一对一的半结构式访谈，我们在这里将专注于这种资料收集形式的实践操作。鉴于在团体访谈中追踪个体意义生成的难度，IPA 研究中倾向于不使用“焦点小组（focus group）”方法（更多地了解焦点组访谈，可参考 Cronin,2001;Millward,2006），然而，也可以以小组作为访谈对象。虽然半结构式访谈很明显位于一个从非结构式访谈到结构式访谈的连续体之上，但人们对这些术语定义的差别可以相当大。因此，为了帮助理解 IPA 意义上的“半结构”式的特色，我们将其与结构式访谈进行对比。

结构式访谈共享了诸多的心理实验逻辑。通常，研究者预先会非常精确地决定所需数据的构成。有时研究者会提供给研究对象一组可能回答的选项，而这些问题以引发相应回答的方式编制，这样也易于将回答包括在随后可数字化分析的预设类别之中。在另外一些情形中，研究者允许研究对象做开放式的回答，并在随后对其进行分类。为了加强可靠性，访谈者应严格地实施访谈计划，多次访谈之间的操作变化尽可能地少。结构式访谈在对研究者提出了极大控制的同时，显然也给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会面设置了相当大的限制。

42

实施半结构式访谈，研究者会有一组列在访谈计划上的问题，但是访谈将是被计划所引导而不是被其所限定，所以问题的提出顺序没那么重要。访谈者是自由的，他/她可以去探究逐渐显现的令人感兴趣的领域，也可以跟进研究对象的兴趣和关注。

这些差异是依据 IPA 的基本关注而得到的。研究者具备的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领域的观念以及一些需要探究的问题，与此同时，还存在一个尽可能设法进入研究对象心理与社会世界的打算。对于访谈的进行，研究对象是一个活化媒介（an active agent）。研究对象可被看作是有经验的专家，因而应该给予其最大的机会来述说他/她的故事。当然，这种访谈形式减弱了研究者对情境的控制。

建构访谈计划表

虽然研究者很可能根据其自身的特点将半结构式访谈看作是一种共同决定的相互作用，但预先编制一个访谈计划对以这种方法进行研究工作仍然是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预先编制一个访谈计划，会迫使你明确地思考你所考虑/希望的访谈可能覆盖的范围。这也使你能够思考有可能碰到的困难——譬如问题的措辞或敏感问题的处置，以及对这些困难如何处理。对于访谈本身，预先考虑进行访谈的不同途径，会使你更自信、更彻底地专注于研究对象实际所说的内容。作为一个示例，专栏 3.2（选自一项作者进行的关于妇女愤怒和攻击性体验的研究）展示了一个访谈计划表的前半部分。

专栏3.2 访谈计划(有删节)

1. 你能否和我说说你童年以及长大过程中的生活是怎样的?
   提示:可能会专注于一些特定的年龄点(童年期、少年期、青年期)及背景(家庭、学校、大学、工作、人际关系)
   最近怎么样呢?
2. 你能否和我说说在你长大过程中那些卷入冲突情境中的时候?
   提示:也许会专注于一些特定的年龄点、背景(家庭、学校等)描述、原因、主要参与者、行动、情感、认知反应,然后
   最近怎么样?
3. 你能否和我说说"愤怒"这个词对你意味着什么?
4. 你能否和我说说在你长大的过程中的那些愤怒的时候?
   提示:也许会专注于一些特定的年龄点、背景(家庭、学校等)描述、原因、主要参与者、行动、情感、认知反应,然后
   最近怎么样?
5. 你能否和我说说你在愤怒的时候是如何行动的?
   提示:年龄点、背景

43

在这种类型的访谈中,你作为访谈者应尽可能地少进行提示,努力鼓励访谈对象就主题述说。所以良好的访谈技巧通常包括来自于访谈者温和且不是太过明显的推动。你会明确地发现这一点:在你编制访谈计划的过程中,第一次草拟的问题可能会过于直截了当(譬如,"被解雇的那天,你的感觉有多糟糕?"),通过改写,这些问题会变得较温和且负担较少,(譬如,"能否描述一下你被解雇的那天?以你意识到这事有可能发生作为开始。")但足以使研究对象知道令研究者感兴趣的领域是什么,并且认识到就此问题有话可说。其目的在于确保研究对象基于其生活背景针对访谈主题所表达的内容的价值,这样可以促进研究对象提供丰富的体验陈述。

有时研究对象可能在理解问题或对问题做出反应上存在困难。譬如,对于某些人,特定的问题可能过于开放。要为此准备,你可以编制更为明确的提示。实际上,某些你第一次草拟的问题也许就能够充当这种提示。你不必为每个问题都准备提示——只有那些你预期存在些许困难并且这些困难不可能简单地通过复述问题来处理的情况。所以,以专栏3.2中的内容为例,问题1具有与研究对象可能考虑的领域有关的提示;问题2、4中有一组给访谈者的范围提醒,可能对询问研究对象有用。

因此,访谈者以最普通的可能问题开始,并且希望这足以使研究对象能够谈论访谈主题。如果研究对象存在困难,说他/她不理解或者给出一个简短的或不切题的回答,接下来访谈者可以转向更明确的提示。如果顺利的话,这将足以获得研究对象的谈话。更为明确的具体层次上的问题用于应对研究对象比较犹豫的较困难的情形。看起来一个成功的访谈将包括一般性和较具体两种层次上的问题和回答,并且能够在两者之间完全无缝地变换。

44

编制完你的访谈计划表,你应该在访谈开始之前将它牢记在心——就像剧本一样。所以,当进行到访谈阶段—如果需要的话—计划表充当心理提示,而并非持续参考的对象。

实施访谈

半结构式访谈通常持续一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而且可能会变得紧张而复杂，这取决于具体的主题。因此，尽可能地设法确保访谈不间断地进行，通常最好按研究对象自己的时间来实施访谈。当然，这也有例外，譬如，对于幼儿这样做就是不明智或不可能的。访谈进行的地点也会影响气氛。人们通常对其熟悉的情境感觉最舒服，譬如，在他们自己家里，但这样有时也可能会出现不可行或不适当。

在访谈的开始，你要使研究对象处于自在状态，而且在开始引入任何实质性领域之前，都要使他/她在和你的交谈中感到舒服。如果顺利的话，接下来这种积极且反应良好的"定势"将持续整个访谈。

访谈不必遵守计划表上的顺序，也不是每个问题都要被问到或者对每个访谈对象均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提问。因此，如果一个问题刚好接上研究对象刚刚谈及的事情，访谈者就可以决定不按其在计划表原有的位置而提前询问该问题。与此类似，问题如何措辞及其如何易于理解，将会部分依赖于访谈者如何感受访谈对象的反应。因此，研究者很可能脱离访谈计划上的问题，最好是访谈能够进入到某个研究者未预料到却又对研究项目整体非常恰当且有启发性的领域。事实上，正因为研究对象在未经提示的情况下提供了这些问题，它们对他/她可能特别重要，因此，这些新的途径往往是最有价值的。另一个方面，当然，访谈者需要保证交谈不会太过远离商定的话题。

重要的是设法为访谈建立一个缓慢而舒服的步调，尽量不要赶得太快。在继续下一个问题之前要给访谈对象时间来答完已问的问题。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通常需要一些时间来反应，并且如果访谈者跳得太快则有可能错过较为全面的回答。此
45 外，一次一个问题——对于研究对象，多重问题可能难以分辨。

最后，你需要监控访谈本身如何影响研究对象。研究对象有可能对问题的某些内容感到不舒服，这可能会表现在其非言语性行为之中或回答方式上。你需要准备着对此做出反应，譬如，回避或更温和地再次尝试，或者思考继续使用此研究对象探究此领域是否合适。关于访谈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伯吉斯（Burgess，1984）、柯费尔（Kvale，1996）及泰勒和波格丹（Taylor and Bogdan，1998）的著作。

对于 IPA，记录（记录在录音磁带上，或者使用可获得非常清晰记录的数字化记录设备）和转录誊写整个访谈（包括访谈者所说的话）是必要的。在转录内容的两侧要留足空白以书写你的分析性注解。不过，对于 IPA，你并不需要会话分析（Drew，2003）和某些话语分析形式中所要求的那种对谈话音韵特征更详细的誊写。录音誊写需要很长时间，这取决于记录的清晰性和誊写人员的键盘熟练程度。大体上，你需要为每个小时的访谈留出至少七个小时的誊写时间。

分　析

IPA 不是一种规定式的取向，它提供了一套灵活的指导原则，研究者们可根据其研究目标进行调整。当进行到分析阶段时尤其如此。本小节通过介绍我们的愤怒和攻击性研究来描述分析步骤，目标在于帮助读者了解如何展开分析，但这不应该被当作是实施 IPA 的"正确配方"。在一定程度上，这应该仅被视为实施途径之一的示例。

这个项目是针对研究对象的愤怒和攻击性体验及其人际关系背景和病源学模型的详尽的、个人记述式的考察。简而言之，分析步骤包括：(a)对资料严格而详尽地阅读从而获得一个整体观念，以便于未来的解释始终基于研究对象的叙述；(b)识别初始主题并组织进不同的类型中，并且参照资料进行核对；(c)为了主题之间连接，对其提炼、浓缩和核查；(d)对研究者的解释活动与研究对象以自己的话对其体验进行的解释之间的相互作用，做出叙事式说明(Smith and Osborn,2003)。

后面将介绍贯穿分析过程的各个步骤，并将其用于每个研究对象的转录内容。首先，在誊写过程中，访谈者留下了初始的想法、注释和具有潜在重要性的点。这些被认为在分析时是会有益于返回的，并且可用于对后继解释的核查。其次，每份转录被阅读多次，左边空白处用于对任何看起来重要和令人感兴趣的内容作笔记。每一次阅读，研究者应当期望着感觉到更为深入资料，逐渐对到底说了些什么变得更为敏感。这一阶段好像是一个自由文本分析，笔记可以采取注释的各种形式：对特定语言风格及形式的标注、对阐明研究对象的含义初始尝试、对他/她的谈话中的集中趋势和矛盾之处的识别。 46

下面的摘录使用了第一个被访者黛比(化名)的访谈记录中的一个小节来演示分析的这个阶段。

访谈者对由研究对象引出的一个主题作出了反应：

	访谈者	能和我说说你和妹妹的争吵吗？
发脾气——立即 愤怒 角色转换——黛比成为攻击者 身体攻击 想要妹妹感觉一样	黛比	我曾深陷其中，我的意思是我现在也是这样。经常是我在洗玻璃杯，接着我妹妹拿着满杯的茶或咖啡走过来并且直接倒进水池里，我一下子就发了脾气。我只是记得我对她特别生气，我不能容忍她再对我作威作福了，于是我和她做了个角色转换。我只是把她按在墙上并且开始把她的头往墙上撞，看看她感觉如何，看看我对她感觉如何。
	访谈者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放声大哭 出门——想要逃避 言语攻击 感到高兴、感到懊恼 再次感到高兴 想要妹妹的感觉像自己一样 多重情绪 奇特、异常的体验 眼泪 脱离情境	黛比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对妹妹这样做了，我放声大哭并且不可控制地冲了出去。我的意思是，我和妹妹从没有过这样的冲突。我们曾经有过口头争执，但在我这样做以后我只是觉得，我体会到了许多复杂的情绪：我为自己对她如此神气而感到高兴，但我也对自己感到懊恼，因为我伤害了她，接下来我又高兴了，因为她得到了报应并且知道了我的感受。这不可思议极了！一次感受如此多的情绪。我以前从未一次感受到过如此多的情绪。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但是我放声大哭了，接着我知道我不得不出去。所以我出门散步去了。

下一个阶段包括回顾访谈内容的转录并且使用右边的空白将初始的笔记和想

法转换到更为具体的主题(themes)和短语。这一个阶段需要心理学的概念及抽象过程。研究者试图更为简洁地获取与初始笔记及研究对象自己的话语一致的心理特性。在这一点上必须谨慎,以保证不丢失研究对象自己的话语与研究者的解释之间的连接。

47

访谈者	能和我说说你和妹妹的争吵吗?	
黛比	我曾深陷其中,我的意思是我现在也是这样。经常是我在	
	洗玻璃杯,接着我妹妹拿着满杯的茶或咖啡走过来并且直	
	接倒进水池里,我一下子就发了脾气。我只是记得我对她	情绪快速转换到愤怒
	特别生气,我不打算再让她对我作威作福了,于是我和她	
	做了个角色转换。我只是把她按在墙上并且开始把她的	动力驱动机制
	头往墙上撞,看看她感觉如何,看看我对她感觉如何。	身体攻击
访谈者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黛比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对妹妹这样做了,我放声大哭并且	嚎哭
	我不可控制地冲了出去。我的意思是,我和妹妹从没有过	逃避的愿望
	这样的冲突。我们曾经有过口头争执但我只是觉得,在我	言语攻击
	这样做以后我体会到了许多复杂的情绪:我为自己对她如	自相矛盾的情绪
	此神气而感到高兴,但我也对自己感到懊恼,因为我伤害了	
	她,接下来我又高兴了,因为她得到了报应并且知道了我的	自我感觉的投射
	感受。这不可思议极了!一次感受如此多的情绪。我以前	多重情绪
	从未一次感受到过如此多的情绪。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	
	觉。但是我放声大哭了,接着我知道我不得不出去。所以	嚎哭
	我出门散步去了。	回避

接下来的阶段,由通过建立初级主题之间的连接以及对其进行恰当分类的更进一步的资料"压缩"组成(参见专栏 3.3)。作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你可以"设想某种主题的磁石吸引其他主题并使其获得意义"(Smith,2004:71)。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是选择性的,所以某些主题可能会被删除:或者因为其没有很好地与正在形成的结构相协调,或者因为在正在形成的分析中并不具备足够强的依据基础。

专栏 3.3　主题的分类

身体攻击
言语攻击
快速向愤怒转换的情绪
嚎哭
自相矛盾的/多重的情绪
逃避的愿望
动力驱动机制
自我感觉的投射

最后,制作出显示每个高阶主题及其所包括主题的表格(参见专栏 3.4)。这些

分类将有一个描述性的标签(高阶主题标题),以表达这些主题内含的概念特性。采自研究对象的关键词,用作提醒是什么引出了此主题。

48

这个表格是一个迭代过程的结果,研究者于其中在不同的阶段不停地来回考察,以保证研究对象所说内容的完整性尽可能地被保留。如果研究者成功了,其他人从原始资料到最终表格追踪整个分析进程就应该是可能的,这被称为独立核查(Smith and Osborn,2003)。在这个过程中也是这样的,分析变得更具解释性,因为研究者逐渐获得了研究对象体验更为完整的意义诠释。随着分析的继续,研究者看起来是依据其心理建构来促进意义诠释过程。不过在 IPA 中,研究对象的陈述总是被谨慎地对待,总是被保持在最显著位置,任何心理学理论被作为分析的借鉴都是因为其是被研究对象的陈述所触发的,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更多关于 IPA 中解释层次的信息,可参考史密斯(Smith,2004)的著作)。只有在我们觉得对每一个研究对象都已经获得了某种格式塔式测量时,才实施交叉个案分析,以及把代表了整个资料集的高阶主题放在一起形成最终表格。更多关于交叉个案分析的详细内容,可参考史密斯和奥斯本的著作(Smith and Osborn,2003)。因为 IPA 具有的个人记述式立场,研究者应该(即使是呈现来自于一系列研究对象的分析结果)尽力传递研究对象个体体验的某些详细内容。

专栏 3.4 主题的最终表格

攻击的形式	
身体攻击	我只是把她按在墙上
言语攻击	我们曾经有过口头的争执
愤怒体验	
朝向愤怒的快速情绪转换	我一下子就发了脾气
嚎哭	我放声大哭
自相矛盾的/多重的情绪	一次这么多情绪
自我与他人的关系	
动力驱动机制	我只是和她做了个角色转换
自我感觉的投射	她得到了报应

分析持续下去即进入撰写叙事性说明的正式过程,即形成一个关于研究者的解释活动与研究对象以其自身话语的体验陈述之间相互作用的叙事性说明。其目标是提供一个关于研究对象叙述的严密的文本解读,介于描述和解释(interpretation)的不同层次之间,在任何时间都在叙述与解释之间做出清楚地的区分。此外,应该展示给读者足够的资料,以评价解释的效用。专栏 3.5 显示了最终成文的一个非常短的片段,这些片段取自黛比的摘录内容,且促进了生成专栏 3.4 所展示的一个主题。这些摘录内容来自于最终文本的中间部分,在转向黛比之前,开头部分是对另一个研究对象安琪拉的考察。关于如何撰写分析结果的更为完整示例,请参考本书附录 2 中的报告 1。

49

专栏3.5 来自最终文本的简短节选

当感受到强烈的情绪(诸如极端的愤怒和悲痛)时,她们会觉得不可忍受:

我当时正在考虑我想要摆脱这种愤怒,我在考虑我该怎么做到这一点,我只是躺在床上并且我感觉到愤怒在逐渐变大,我的心正在杀死我。

安琪拉的愤怒与其失去孩子的悲痛结合在一起被深刻地感受到。这一体验集中于其心里,而她的表现显得这些体验是真实的肉体痛苦中的一种。一次感受多种情绪本身就是一种混乱的体验,其效果就是一种混乱,当这些情绪相互对立时混乱得到加强。

在我这样做以后我体会到了许多复杂的情绪。我为自己对她如此神气而感到高兴,但我也对自己感到懊恼,因为我伤害了她,接下来我又高兴了,因为她得到了报应并且知道了我的感受。这不可思议极了!一次感受如此多的情绪。我以前从未一次感受到过如此多的情绪。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

在这段摘录中,黛比描述了她在与妹妹冲突后的感受。因为之前的经历,高兴伴随着愤怒,不过同时还夹杂了许多其他的。黛比具有自相矛盾的感受,从懊恼转换到满意,并且看起来存在着的某种形式的内部不协调("不可思议"和"奇怪")进一步使混乱的情绪复杂化。

小 结

本章完成了:

- 呈现IPA的理论基础——现象学、诠释学和个人记述;
- 讨论如何设计一个IPA研究——恰当的研究问题、取样和资料收集;
- 举例说明如何实施一项IPA研究。

本章从对IPA理论支撑的陈述开始,接下来以取自于我们的研究之一的材料为示例,讨论了实践程序。我们希望读者现在感到他/她已知道了一些IPA的具体性质,一种通过与本书中其他方法比较而产生的感受。我们也希望,通过阅读本章、第4章和附录2中IPA研究的经验介绍,某些读者会体验到灵感并且更有自信来亲自实施一个IPA研究。

50

延伸阅读

更多关于IPA理论基础的信息,可参考史密斯(Smith,1996,2004)的著作;此类质性研究的一般知识背景,可参考阿什沃思(Ashworth,2003)的著作;实施IPA实践操作,可参考史密斯和奥斯本(Smith and Osborn,2003)以及史密斯和邓伟世(Smith and Dunworth,2003)的著作。IPA研究的样例,可参考专栏3.1中引用的文献。

4
做解释现象学分析

莱斯利·斯托里

本章展示一个将解释现象学分析原则运用于访谈记录的分析小组成员的体验陈述。该访谈的对象是一名对其从军、退役及后军人生活体验进行回顾的退役士兵。本章描述了 IPA 在不同阶段中的应用，并以资料为参照对此进行了说明，还提供了一些关于分析过程的思考。此外，本章还讨论了一些由 IPA 引发的更广泛话题，诸如分析过程中理论的作用。

关键术语

- 连接(connections)
- 解释框架(interpretative frameworks)
- 笔记(notes)
- 综合主题(overall theme)
- 高阶主题(superordinate themes)
- 主题(themes)
- 透明度(transparency)

在某些研究领域，质性方法在很多方面优于量化方法。正如威利格（Willig，2001:9）指出的那样，这些方法涉及价值观、意义生成和主观体验，而不是“强加的预先设定‘变量’”。质性方法涉及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通常是在个体或团体访谈背景中的面对面互动），避免了需要预先指定研究核心关注的意义。相对而言，研究对象自己可以在资料收集过程中决定（和修改）这些意义，并且，在整个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潜在地影响研究者对那些核心关注点的解释。这种 52 开放性和对话性（当然这并非质性方法的本质，而是取决于研究者的技能）也意味着研究者曲解研究对象所做反应的可能性较低。

在本章中，我会讨论这些优势与 IPA 有关的方面，接着我会关注将 IPA 运用于访谈资料的操作实践。访谈资料来自于一个对其从军、退役及后军人生活体验进行回顾的退役士兵（详见本书附录 1）。本章关注由乔纳森 · A. 史密斯和维吉尼亚 · 伊托夫在第 3 章中所概述的原则是怎么样运用的，并提供来自于研究“工作面（coalface）”的“动手（hands-on）”建议。我是一个由 6 位女性研究者组成的分析小组中的一员，小组成员来自于不同教育机构，年龄不同，在这个持续两天的分析过程之前从未谋面。我们具有层次不同的一般性质性研究经验，对 IPA 也是如此。在这一章中，尽管我叙述的是我们研究小组的工作，但是这只是我对群体分析过程的个人解释，而其他小组成员可能有不同的，但同等有效的解释方式。

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一分析任务的前期，研究小组决定将注意力放在一个访谈转录上，因为我们觉得，在可供我们使用的有限分析时间内，我们若要完成一个以上的笔录的有意义分析将会碰到困难。采用个案研究倾向与 IPA 个人记述立场相符，当 IPA 以团体层次分析为目标时，分析将开始于单个个案，而后转向更多个案的分析。因此，我们觉得本章将为以前未使用过 IPA 的读者（以及考虑将其运用于不止一个访谈记录的非个案研究中的读者）提供一种良好的感受，使其认识到 IPA 研究过程中重要的第一次分析将会是怎样的。

阶段 1：访谈记录的初始阅读

处理质性资料最具挑战性的方面之一，可能是如何开始及从何处开始。研究者通常会面对让其感到不知所措的海量文本内容，并且从这些记录中发现任何类型的连贯意义看起来都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时这可能是由资料的特性造成的，参见专栏 4.1）。在资料中识别出枢要关系（central concerns）是许多种质性分析最为重要的目标（譬如，IPA 中的高阶主题、扎根理论中的核心类目以及叙事分析中的叙事主题）。即便是在话语分析中，因为对资料集范围之内变异性和资料集之间变异性的关注，也需要识别出建构的共通性和显著点，以及能够在分析中构成主题的修 53 辞功能（参见本书第 7 章）。IPA 提供了一系列步骤——尽管不是以开处方的方式，旨在使分析者能在资料中识别出枢要关系。因此，即使他们的资料集看起来让人不知所措，即使他们最初疑惑于究竟能不能从中识别出连贯性的意义并将其作为高阶主题提出，但对分析者来说重要的是相信分析过程，相信最终的意义将会从资料中创建，否则，他们可能永远不敢进行分析！

专栏4.1 处理零碎的访谈资料

有些访谈记录可能会非常的支离破碎,研究对象报告了许多看似无关的话题,并且看起来他/她自己的这些话题之间也是互相矛盾的。这可能来自于聚焦不良的访谈指南或访谈计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研究仍在进行过程中,可以在下次访谈之前修改指南/计划。不过,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于条理分明的指南/计划,尽管访谈者已经尽他/她所能使研究对象专注于研究主题。大多数质性研究者会尝试以轻松的方式做到这一点,设法建立一种平衡,既确保指南/计划上所列议题被访谈所覆盖,又允许访谈对象说明及谈论那些在编制指南/计划时并未涉及的主题。尽管这样,一些研究对象仍可能利用访谈情境来讲述其他与研究主题既无联系也不相关的话题。如果研究对象患有影响其加工和注意容量的生理、神经或心理障碍,这种情况就有可能发生。如果研究主题涉及某个被视为敏感的方面,或者研究对象以前从未或很少有机会与专心的倾听者讨论一般性的主题,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对象可能期望述说其体验的所有内容,却在组织如此巨量的信息方面存在困难。因此,研究者除了在访谈中遵循标准职业道德规程外,还要为后续的访谈修改招募标准(Coyle and Olsen,2005)。接下来,可能不管访谈资料破碎到什么程度,或者遇到更糟糕的个案,研究者都不得不对访谈记录运用分析规程。本章中的被分析的访谈记录转录无此类问题。

IPA开始于以一种获取对访谈的整体"感受"的观念而对访谈转录反复地阅读及再阅读的过程。这可能导致概括了整个访谈的综合性主题(overall theme)的识别,尽管人们复杂的经验能够如此轻易而迅速地被概括是罕见的。在使用对大卫访谈的记录时(事实上我们在分析不是我们收集的资料),通过他在访谈中所提供的陈述,我们对他的情绪反应具有不同的色彩和强度。这些反应有可能是对大卫及其境遇的不同程度识别的结果。识别可能潜在地导致了分析中的问题:访谈者基于分享的过度识别或者类似经验,可能引导分析者迫使资料符合他/她的经验;而访谈对象的负面未识别(a negative disidentification)可能使得与访谈对象之间共情(或者起码达到同情)存在困难,不可能获得被IPA所期望的有关于研究主题的"知情者"视角("insider" perspective)。 54

分析者对访谈记录最具优势的反应,是似乎已经被军队抛弃并已在家多年的大卫的某种悲痛。不过,我们的悲痛被挫败感所抵消,因为看起来大卫就是觉得如果能够重返军队生活,他所有的问题就都将会得到解决。我们就此进行了讨论,事实上这些反应完全是我们对资料的反应,而我们最开始是期望从大卫的角度为访谈记录确认一个清晰的"感觉"。尽管如此,我们觉得确认这些反应以及仔细考察其根源是有用的,因为这提醒了我们使用的对资料发生作用的解释框架(interpretative frameworks)的各个方面。我们可以考察在分析过程中解释框架的某些方面,这对于我们进一步对大卫体验的理解能够如何被证明在分析过程中是有用的,而其他方面可能被证明是有问题的并且必须被密切监控(譬如,导致我们忽略一些大卫对其所描述情境的反应)。置疑和承认研究者运用于资料的解释框架的过程是重要的,因为这有助于提升分析的透明度(transparency),虽然分析者框架的某些方面可能是潜意识的而不易于被他/她所确认。我们很幸运具有一个团体性语境,可以互相仔细地考察这些话题和问题,并且我们也很想了解,如果我们各自单独进行这项工作,能做到什么程度。

继初始阅读之后,分析过程通过对访谈记录的再阅读(re-reading)持续下去,以产生内容宽泛、记录对文本进行反应的笔记(notes)——我们整个小组共同执行这一任务。这些笔记/问题记录在访谈内容的左边空白处。譬如,大卫隐喻式地提到

见鬼的段落（第105—107行）就使用了“死亡”和“丧亲之痛”的标注，尽管我们并不清楚这个阶段有谁让我们觉得已经死亡或者有人已经失去亲人。

在专栏4.1中，曾专门指出资料有时有零碎及自相矛盾的情况。不过，在许多访谈中，没有与材料支离破碎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自相矛盾的现象是可以看出来的。分析小组在初始阅读之后所做的一个评判，与分析者在大卫的陈述中观察到的矛盾情况有关。有好几处大卫识别出了在军队中很有用的一种品质或一种技能，他已经具备这些价值观多年。在他人生中的前、后军队阶段，相同的品质和技能被描绘为一种障碍，有时意识得到而在其他场合可能又不太能意识到。这是一种以某种形式存在于访谈中的悲喜剧式的自我应验——大卫谈到从军生活如何给他一种自信的感受，而他如何带着这种自信参加工作面试却又意识到下面所列的情况：

> 阻碍我的是我喜欢东西有调理。我喜欢整齐包裹的东西，所以当我去——就像我驾驶的卡车，当我来晚上回来时，我将所有的货车停整齐，所有的保险杠在同一水平线。（第238—241行）

这种对细节的关注在军队刻板的世界中无疑是重要的，但在民用环境中就有可能显得不正常，甚至可能被负面评价。在这一阶段，我们简单地记录下这一判断并且将其作为一个可能继续跟进的、可能带来丰富成果的线索。

阶段2：识别并标注主题

分析的下一阶段包括返回访谈记录并使用先前在左边空白处所做的笔记，在右边空白处生成主题（themes）。虽然总存在着一种确保主题与资料之间清晰连接的需要，但这一步需要使用理论概念来使资料的心理学感最大化。在研究对象所陈述的内容中识别出多个主题，使用理论建构来分析研究对象的现象学意义，研究者便使分析超越了对访谈记录日志式摘要的分析过程。

不过，我们花费了一些时间来讨论在我们的分析中使用理论建构可能的不利之处。这是因为一些小组成员担心，如果我们过于强调其解释性要素并以我们喜欢的理论夸大大卫的主体性，就有可能违背IPA的现象学立场。关于如何最好地避免在分析中夸大研究对象的现象学意义，其他在IPA中使用理论的研究者已经碰到过相同的两难情况，（参见专栏4.2）。

专栏4.2　在IPA研究中使用理论的策略

曾经使用过IPA来分析质性资料，并且打算在其分析中公开使用心理学理论却又避免妨碍研究对象意义生成的研究者们，从而以不同的方式对此类两难情况做出反应。标准的反应是，进行讨论时引用相关理论，用于讨论研究对象意义生成分析中出现的发现，并且尽可能地使用自己的表达方式（譬如，Flowers et al.，1997；Senior et al.，2002）。所以，理论并没有以公开、明显的方式影响分析过程，而是以事后非因果式的形式被引用。这种做法的一种变式是，在分析开始之前确认一个资料可从中得以解释的多种理论角度的可能范围，但是要拒绝事先使任何理论具有用于资料的优先权（譬如，Vignoles et al.，2004）。一个更为先验的理论优先分析取向，需要预先选择某个单一的理论，不过是为了指导分析而不是用来支配整个分析过程（所以并不尝试验证这些理论）（譬如，Coyle and Rafalin，2000；Turner and Coyle，2000）。更多地了解质性研究中理论的使用，可参见安菲若和默茨的著作（Anfara and Mertz，2006）。

最终我们决定，因为我们是在为心理学领域内的读者实施心理学研究，使用来自于心理学理论中的概念是必要的，而且恰当的使用不仅使分析是可靠的并且可能对我们的读者是有用的。为了降低妨碍大卫主体性的风险，我们采取了两种策略。首先是在我们的解释中以一种折中的方式来使用理论建构，而不是把我们自己限制在一个具体的理论范围内，这是因为我们觉得对单一理论的过度专注，会使得我们必须对把来自大卫的资料挤压进某个理论中负有责任。“控制点”、“可能自我”、“自我效能”以及心理动力学等理论取向均被提出来，作为可能的使资料具有心理学意义的理论概念和取向。其次，我们决心要确保任何理论解释清晰地源自资料。作为一个结果，在分析过程中，我清晰地记得“不过，这在文本中有吗？”和“在访谈记录中的哪个位置是这样说的？”这些针对可能的相关理论解释的问题被反复提出。

就大卫的访谈来说，有一处特定文本小节被从不同的理论角度解释。这些对资料的讨论所产生的话题之一是，在相对年轻的时候加入到像军队这样的完全组织(total institution)，当涉及处理退役后成年生活的复杂性时，可能会造成士兵们的适应问题。研究者们以“军队如同母亲”，“外部控制点”，“在军队期间的剥夺和阉割”，“自我效能的缺乏”以及“对力量的外部归因”等不同的理论角度解释此情境。追求这样一些解释以及了解这些资料会允许我们合理地“延伸”其意义到何种程度是令人兴奋的，因为我们觉得于此我们会逐渐超越资料的文字性解释而达到更具心理学意义的解释。访谈记录中没有任何一处表明大卫说过他将军队看作是替代性的母亲，但他确实认为军队具有多种不同的养育性质，这些性质(诸如权威和保护的提供、物质性的庇护和舒适)通常与教养行为联系在一起。令人惊讶的是，分析小组确认了“军队如同母亲”而不是“军队如同父母”，尤其是父亲的纪律性刻板印象可能看起来更接近于军队的形象。不过，大卫特别提到母亲的早逝给其带来的缺失，而他那些在军队中获得的实用技能(烹饪、清洁等)，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更多地与传统的母性角色连接在了一起。这使得我们去探究这样一种观点，即离开军队被大卫体验为某种形式的极端分离焦虑甚至是丧亲之痛。 57

在如何使用理论建构方面达成一致之后，我们分别确认了自己觉得在访谈记录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主题，并在接下来以小组的形式对其进行了讨论。我们均使用了不同的方式描述各主题，其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在于以我们所提出的主题标示的分析层次。一些小组成员提出了“丧失(loss)”这种非常普遍的主题，而其他成员则支持围绕着军队退役手续细节这一更为具体的主题。讨论之后，我们就以下五个初始主题达成一致：

- 军队给予了大卫什么。
- 军队从大卫这里夺走了什么。
- 军队生活与平民生活之间的差异性。
- 军队生活与平民生活之间的相似性。
- 正在进行中的/不会结束的身份转换。

我们意识到访谈的目标是考察身份主题，而我们在这一阶段所提出的主题中只

有一个看起来与身份问题直接关联。不过,由于认识到对于部分访谈者来说,一个具有开放性特征的访谈可能会很好地引出一些原本并未考虑到会与研究主题或研究问题有关的有用材料,我们决定将这一关注内容保留下,并且把注意力集中在访谈记录中大卫的意义生成过程(的阅读)上。

阶段3:主题的相互联系及主题类别的识别

在这一阶段,初级主题之间的连接(connections)会被识别。这会使得我们合并某些主题,并且,在合适的地方将那些已经被放弃的主题并入到其他主题中去。譬如,我们决定合并两个涉及军队与平民之间差异和相似的主题,这两个主题涉及生58 活在(或离开)军队的获得和丧失。这是因为我们所抽取的、提供了差异及相似实例的那些要素,确实说明了那些大卫所识别的他因为过着(离开)军队生活所获得和失去的方式。譬如,他感到在离开军队后失去的团队成员感,可能被他所识别的在军队中的"团队"集体感("我是团队的一员并且我是团队的重要一员",第17—18行)与其平民工作中更为狭窄地定义的"团队"感("在学校里你不是团队的一员因为你不是一个教师",第48—49行)之间的差异所说明。我们也觉得与"正在进行中的/不会结束的身份转换"有关的暂定主题,被当作是更宽泛的全局主题"一种关系的结束"之内的次级主题更为合适。我们认为这个更宽泛的主题也使得我们能够去探究一些在访谈记录的初始阅读中就被提出及识别的情绪话题。这样,我们的三个最终高阶主题(superordinate themes)如下:

- 军队给予了大卫什么。
- 军队从大卫这里夺走了什么。
- 一种关系的结束。

我们也有一些担心,前两个主题可能只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所以有人会认为这是多余的或这些主题可能需要被组合起来。不过,当我们在分析过程中确认每个组成主题的次级主题时,我们发现它们均有充分的差异,每一个均与访谈的不同方面有关,因此,值得单独纳入。这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因为这说明我们作为一个小组,在了解一种分析方式是否起效时,"尝试"是如何的重要。如果我们不能够从访谈记录中识别出相关资料来支持一个潜在的主题(或次级主题),我们就会删掉它。

我们发现分析实践操作的经验层面是基础性的。我们尽可能多地从分析的实际操作中,以及在以实例解决分析问题和两难情况时进行学习,并且我们以小组的形式进行讨论而做到这一点。譬如,我们最初将"不会结束"识别为一个全局性主题,但是只能够发现一项被抽取出来的资料指向它。因此,我们觉得尽管这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但作为一个次级主题而不是主要主题应该更有效果。

阶段4:制作一个带有说明性引用的主题汇总表

在分析的最后,我们将高阶主题、次级主题及说明性引用的内容放在一起,组织

为一个表格(见表4.1)。

59

表4.1　高阶主题及其次级主题

高阶主题	次级主题	说明性引用示例
主题1:军队给予了大卫什么	作为一个特别的人的感受使其能规划其生活的结构自信和骄傲	“它给了我更多的自信。当我加入军队时还是个小男孩,开始我根本不自信。”(第4—5行)
	属于并成为团队的一部分	
	养育	
主题2:军队从大卫这里夺走了什么	健康	
	与平民生活有关的能力	
	实用技能	
	未来/目的感	“有时我感觉不到似乎有一个指向目的……我在想‘我在这儿到底做些什么鬼事情?诅咒它’……但我必须继续这样做,日复一日。你想想看,‘这就是我后半生的生活’。”(第218—223行)
主题3:一种关系的结束	(近似的)他的婚姻抛弃和背叛	“一旦你走出那个门,就是这样。我知道我现在甚至不能回到那营地了,尽管几分钟前,我还是一名中士。我不能回去了。你知道,你……就好像他们把你扔出去后锁上了门,你知道的,就是这样——现在一切都只能靠你自己了。这令人感到痛苦。”(第95—99行)
	悲痛/死亡	
	不会停止	

以叙事形式呈现分析结果

下面提供了访谈记录的小组式IPA分析的概要。鉴于我们工作时间的限制,这份概要无论如何不可以被当作一份完整的深度IPA分析来阅读(这样一个更深层次及更具体分析的示例,参见本书附录2中的报告1)。更确切地说,这部分被专门设计以传递我们对大卫访谈记录分析的精华,并且以简化的形式呈现出来。每个部分以一个高阶主题开始,接下来是次级主题以及简短的讨论(参见专栏4.3)。

60

专栏4.3　分析性叙事的结构

在我们的分析性叙事中，不同的主题及其相关的引用内容并没有按照访谈进行的时间顺序来呈现。来自访谈记录各部分的资料内容被用作任何一个单独主题的示例。这就好像访谈被重构以形成一个条理清楚的分析性叙事，这一被完全接受的叙事提供了资料内容节录的意义且没有被曲解和扭曲。这需要保持非常的谨慎，因为可能存在着引用语境以外的资料以曲解的方式极大化某些迹象从而支持某个重要的或受到偏爱的主题。因为在分析小组中对此进行了反思，所以我们认识到，如果质性访谈分析的评审者可获得核心的研究访谈记录，他们起码能够很好地核查那些被用来说明主题的引用内容，从而确保它们被恰当地使用而不是取自于相关主题的语境之外。

主题1：军队给予了大卫一些什么

我们认为大卫觉得军队给予了他许多，并且识别出这些要素很容易，因为它们是被明确且毫不含糊地说出来的。军队给了他：

次级主题：作为一个特别的人的感受

"我是团队的一员，我是一个团队的重要成员，而且我认识到我就是要为我的国家做一点事。"（第17—18行）

次级主题：使其能够规划其生活的结构

"这像，我们训练几周后会有几天时间自己安排。到了那时你可以计划你的生活。你知道你是要去锻炼而你想，嗯，你知道52个周末中的18个……你知道你要去干掉一些啤酒，你知道你将会有一段美好的时光。"（第313—317行）

次级主题：自信与骄傲

"它给了我更多的自信。当我加入军队时还是个小男孩，开始我根本不自信。"（第4—5行）

"所以我们很重要，我为此而感到自豪。"（第29—30行）

在加入军队之前曾经缺乏自信的那段引文看起来应该尤其贴切，因为其表明了在构建平民生活中的新身份时，大卫没有一个可依据的由参军之前的生活所形成的先在的积极自我概念。

61

次级主题：属于并成为团队一部分的感受

"这就像，正如我所说的，我有一种身份，我属于某个地方。"（第22—23行）

"我是团队的一员，我是一个团队的重要成员。"（第17行）

大卫比较了其在集体性的陆军部队的较高身份地位和作为学校管理员的当前职位。在军队中他曾是一名中士和运输连的一员，而现在他是他所认为的学校员工

中较低级的一员：

"你不是学校团队的成员，因为你不是一名教师。"（第48行）

"好像在说，'啊，这仅仅是一个管理员和他同事的事——他们会做的'。这让我很烦，因为作为一个团队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像我们在军队中那样，你知道，我们从头到尾都有从上面得到帮助的权利。"（第54—57行）

不过，让人猜疑的是他对军队中团队精神的记忆有点像玫瑰色的梦，后来他就军官和普通士兵在军人职业结束时被如何对待的方式做了一个区分：

"你知道，我认为上层的部分人员不知道出去有多艰难，因为我知道当他们结束时，其实并没有真正结束。"（第188—190行）

在此我们发现不仅仅团队成员身份对他是很重要的，他所属的是哪一个团队以及他在这个团队的层级结构中的位置也有一定的关系。

次级主题：教养

"是的，我想我在军队获得了它们的大部分。啊，我不会说我能在家里学到它们，因为我妈妈去世时我还小。我小时候，你知道，嗯，所以我是被祖母带大的。是的，我不认为她有大量的时间，因此——因此是的，我想我是从军队中获得了它们中的大部分。"（第69—74行）

这种养育还包括了本来其可以从母亲那里学到的实用技能的训练。在列举各种实用技能时，他孩子式地包括了一些内容，这些内容被他反复地使用"我会"加以强调：

"我会做我的早餐，我会做我的正餐，我会缝纫，我会熨衣物，我会洗衣服。"（第208—210行）

主题2：军队从大卫这里夺走了什么

尽管我们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军队夺走的和其给予大卫的一样多，但这些丧失并不是那么明显地被说出来，需要从访谈记录文本中分解出来。 62

次级主题：健康

"我得到的是坏了的膝盖以及其他地方，我的身体垮了。"（第122—123行）

次级主题：和平民生活有关的能力

"哦，原因之一是我认为我是一个夜间活动者，我想知道平民的一面，以及想了解他们如何思考、如何工作以及如何运作。"（第368—370行）

大卫如此表达就仿佛他是一个正在探究外星文明的人类学家。随后他以强烈的措辞表达了他在此方面的观点，并且通过使用比喻——其中他把加入一个民用机

构的尝试(这次是作为一个货车司机)比作黑人试图加入种族主义组织——来强调其被排斥感。

> “我怎样描述它呢,有点像一个黑人试图加入三 K 党[sic],你知道的。”(第 375—376 行)

次级主题:实用技能

尽管我们在上面了解到军队向他提供了年轻人需要的,并且不可能在其他地方学到的技能,但因为早年就失去母亲,在这之后变得很清楚的是,军队并没有给予其实用技能以使得其承担一个军队以外的更为成人的角色。他在买房子时以戏剧化的方式发现了这一点。

> “你只是不得不走出去,去尝试适应新的环境并犯了许多错误——那是昂贵的。”(第 261—263 行)
>
> “你在纸上所看到的和实际发生的是两回事。嗯,我们买了房子,而后它倒塌了,我们失去了一切。”(第 271—273 行)

次级主题:未来/目的感

> “有时我感觉不到似乎有一个指向它的目的。你知道,像,去学校[作为学校的看守]时一边走一边想,‘我在这儿到底做些什么鬼事情?诅咒它’……但我必须继续这样做,日复一日。你想想看,‘这就是我后半生的生活’。”(第 218—223 行)

在访谈前面的部分,大卫描述了当还在军中时,他曾经如何确切地明白摆在面前的是些什么,这使他能够进行规划并以积极的话语进行评价。不过,他对于当前的工作会有何种预期是负面的。这说明对他很重要的不仅只是规划的能力,规划的内容也同等重要。

次级主题:(近似的)他的婚姻

> “我退伍后的大约几个月有点发狂倾向。谁不这样!嗯,那一阶段婚姻几乎破裂。”(第 135—137 行)

63

我们的研究小组全都是女性,就大卫所提供的其妻子和孩子信息的贫乏,我们都很震惊:他们在其访谈记录中简直是无形的。在对离开军队以后所经历的困难危害了其婚姻的事实,他仅使用了一句话来陈述——无法让我们喜欢的一点。我不太确信是否仅是性别引发了这一反应,尽管小组成员做出了诸如“典型的男人”之类的评论,但在这之后我们的确不得不努力寻求有力的理由来与大卫达到共情。这再一次提供了一个实例:资料材料所引发的反应需要被监控,以及如果这些反应被认为对分析有不利影响如何处理的实例。在此,我们的反应有助于提醒我们资料中几乎没有大卫的妻子和孩子的信息。

主题 3:一种关系的结束

前面已经讨论过军队给了他在母亲过早地去世后被养育的感受,对于大卫还有

一种感受:比起简单地与职业生涯的终结关联,离开军队更多地具有情绪性意义。在此讨论的这些次级主题,通常均与在某种深刻的重要个人关系结束时感受到的情绪有关。理论化军队对他有慈母般的影响,所以被迫离开军队(我们推断是因为整编)看起来违背了其意愿,导致了他这样一种感受:还未平静下来即出现第二次丧亲之痛。

次级主题:抛弃和背叛

"然后就是这样——你走了,没有人为此帮你准备。我只是……一旦你走出那扇门,就是这样。我知道我现在甚至不能回到那营地了,尽管几分钟前,我还是一名中士。我不能回去了。你知道,你……就好像他们把你扔出去后锁上了门,你知道,就是这样——现在一切都只能靠你自己了。这令人感到痛苦。"(第94—99行)

"你知道,他们不知道你把你生命中最宝贵的时间给了他们,我就是这样做的。我在那阶段付出了百分之一百五十。"(第120—122行)

在访谈中并没有显示,大卫离开军队是出于自愿。他指出其退役是基于"应变缩编计划(Options for change)",但具有非常强烈的被抛弃感意味他实际上是被军队所背叛。被锁在门外以及在人身上被排除于军队设施之外的非常强烈的视觉形象说明了,分离已经被结晶化并且变得不可改变的这一刻是如何来到的,尽管其试图跳过从军队到平民的生活转换。

次级主题:悲痛/死亡

"就像我们说过的,你走到另一个地方,你走在街上,你看到鬼。你知道,你要像一个现役军人沿着街道走,你就可以看到所有这些鬼。"(第104—107行)

64

大卫并没有使用"死亡"和"丧亲之痛"之类的词汇来描述其感情,不过他的确两次提及见到鬼魂。我们将之解释为其过往生活的鬼魂,但这也在死的世界与生的世界之间建立起了一个隐喻式的分隔,并且我们觉得大卫感觉自己是死去多过活着。

次级主题:没有结束

"我认为我们仍在军队之中。"(第461—462行)

这句话出现在非常接近访谈结尾的地方,非常清晰地表明,忽略他对其情境的明确有力的描述方式,这存在着一个还没有被解决的情况,被他用现在时加以强调。在本书的第3章,乔纳森·A.史密斯和维吉尼亚·伊托夫说:"详细的IPA分析也可能由研究对象的位置后退一小点并对其做出的陈述提出一些细致的和批判性的问题——譬如,'此人如此努力想要达到是什么','此处透露出来的内容并非故意的','我是不是觉察到了有事正在发生而他/她们自己没有注意到'。"总的来说,我们态度谨慎以不过分解读被访谈者的话语,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大卫关于仍在军中的话,可能表明了其对一种心理性终结的需要。我们觉得可能是这样,因

为在访谈过程中他专注于离开军队后的生存问题，所以他还没有获得所需要的用以处理退役的情绪性遗留问题的一个机会或相关支持。

关于我们所进行分析的概述至此结束。通常在IPA研究中，分析完第一个访谈记录之后，研究者应该继续分析来自于其他访谈对象的记录，实施交叉个案比较并编制一个最终的小组层次上的高阶主题表格。不过，在此我们选择了只专注于一个个案，并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即使是在我们进行资料分析的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对于他的描述也达到了一种真实的熟悉感和带入感。我希望我对我们的分析过程所进行的反思，能够为那些考虑将来要在研究中使用IPA的研究者提供指引、消除疑虑。

小　结

本章专注于提供一些关于在小组的背景下及一个限时框架内，将IPA的原理运用于一个访谈记录的过程所进行的反思。将读者带入分析的不同阶段，以便使其能够明白最终高阶主题，反映了访谈核心关注(以及分析者解释框架)的主题是如何被确认的。此外，也探究了一些在分析过程中出现的一般性话题(零碎资料问题、理论的使用以及分析性叙事的结构等)。这些话题的实质已经超出了IPA语境，希望研究者们在使用其他质性方法时，能够发现这些话题是有用的。

5

扎根理论

希拉·佩恩

本章以对扎根理论的哲学背景及其历史发展的介绍作为开始，其中强调了由格拉泽和斯特劳斯（Glaser and Strauss，1967）所建立的方法的不同版本。本章的主体部分讨论扎根理论分析的原理与实践操作，其中包括最适用此方法的各类研究问题、所使用的资料类型和取样方式、资料收集的时程安排及其独特的分析过程。最后，本章以对新理论的发展和验证、研究质量评估以及如何报告一项扎根理论研究作为结束。贯穿于整个章节的，是为了说明分析过程中的不同决策而从一个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中选取的多个实例。

关键术语

主轴编码（axial coding）
类目（categories）
编码（coding）
持续比较（constant comparison）
核心类目（core category）
定义（definitions）
突现理论（emergent theory）
拟合优度（goodness of fit）
访谈（intervews）
备忘录（memos）
开放式编码（open coding）
自反性（reflexivity）
研究问题（research questions）
信息饱和（saturation）
实质编码（substantive coding）
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
理论编码（theoretical coding）
理论取样（theoretical sampling）
理论灵敏度（theoretical sensitivity）
转录（transcription）

扎根理论的起源

扎根理论的发展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美国医院中临终病人体验进行探究的一个研究项目(Glaser and Strauss,1965)。在当时,医疗实践是绝对权威式的,并且诊断信息和临终预后通常不会与病人们分享。虽然其实际存在于临床病人的死亡过程中,但如何对一种并不被公开承认的现象进行研究,却使此研究项目团队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大"理论的缺乏和不适宜的调查方法(指当时流行于社会学中的方法)为质性研究新道路的发展提供了推动作用。

66

格拉泽和斯特劳斯(Glaser and Strauss,1967)的著作《扎根理论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对当时研究实践的一系列特性提出了批评,包括使用假设—演绎方法以验证现存理论的研究。与此相对,他们基于对资料的严格审查归纳性地提出了一种发展性或"发现性"理论(discovering theory)的方法。格拉泽和斯特劳斯也因不满于质性研究被看作仅是描述性的研究方式,而寻求说明质性研究的分析和解释能力。

扎根理论的哲学根基在于实用主义和符号互动论被广泛的认可(Bartlett and Payne,1997)。杜威、库利、詹姆斯和米德的观点,尤其是由米德(Mead,1934)阐释的个体是自我觉知的,以及交互主观性影响行为等观点,为扎根理论提供了哲学基础。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采取的立场是,社会互动是有意义的,并且这种共享的意义在社会中具有重要影响力。根据雷尼(Rennie,2000:492)的观点,"实用主义认为知识的产生过程是一个视角的问题,而真实性的保证则在于研究者群体成员之间的一致意见"。斯特劳斯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背景在深度个案研究和民族志方法的使用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力。

扎根理论的早期表达曾被视为是基于实证主义的认识论立场,这一观点假定世界中的客体与我们对其进行的知觉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参见本书第2章)。基于此观点,描述什么是"可解之未解(out there)"和终极"真理"的存在被视为可能。格拉泽和斯特劳斯(Glaser and Strauss,1967)指出源于扎根理论的假设可被实证检验,而检验的方法应该依赖于外部的客观研究过程。扎根理论后来的观点则更强调解释性的立场(Strauss and Corbin,1990)。亨伍德和皮吉昂(Henwood and Pidgeon,1994)强调了扎根理论中现实主义认识论立场与建构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前者要归纳性地反映研究对象的陈述,而后者是研究者创造并解释资料以发展新理论。

扎根理论的不同版本:同一主题的不同变式

扎根理论被广泛接受是花了一段时间的(Turner,1981),不过在过去的15~20年里,它成了最为流行的质性研究方法。扎根理论现在遍布于一系列学科之中(譬如,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工作和护理学),并以一系列不同的方式获得发展。下面的小节将简要地概括扎根理论的多样性。

67

格拉泽和斯特劳斯(Glaser and Strauss,1967)的合著被视为扎根理论的最初版本,对于某些人来说,其属于此方法的"经典"叙述。然而,此书对方法的研究程序

表述不清,并且对于研究者如何实施分析也模棱两可。此后格拉泽和斯特劳斯(Glaser and Strauss,1990)对是什么构成了分析的"正确"取向,显示出了观点的分歧。分析过程的另一个较详尽的版本由斯特劳斯和科尔宾(Strauss and Corbin,1990)所提出,它在某些方面背离了最初的版本,该版本受到了自认为其分析取向已非常约定俗成化的格拉泽的强烈批评。我并不打算为这个冲突的历史提供一个完整陈述,因为其他人已经就关键争议点进行过概括(如 Willig,2001)。观念的主要差异围绕着归纳过程的作用、理论从资料中"突现(emerges)"出来或"迫现(be forced from)"出来的程度,以及分析程序的不同形式(参见专栏 5.1,一些此处所使用术语的含义在本章的后续部分将变得清晰)等几个方面。这些差异对分析过程有影响的地方,我在本章中已经强调。还有多个对扎根理论方法的发展作出贡献的其他人,譬如,卡麦兹(Charmaz,1990,2006)的社会建构者版本,雷尼(Rennie,2000)的方法论诠释学版本,以及克拉克(Clarke,2003)的后现代版本。

专栏 5.1 扎根理论分析的概念与实施中的关键性差异

由格拉泽及其追随者倡导的版本:

- 赋予使理论得以显现的单纯系统分析程序以巨大价值;
- 主张理论生成直接而严格地源于资料(格拉泽不满于斯特劳斯依据先验观念进行"强制"编码,他将其描述为对资料完全的概念化描述而不是突现理论);
- 主张通过回到资料对理论进行验证;
- 反对解释主义(即存在着现象的多重实体且在不同时间和场合可能各有不同,并且行动的意义能够以行动者视角被理解);
- 十分强调最终阶段的理论编码;
- 高度重视备忘录的写作;
- 提倡单纯版本的理论取样。

由斯特劳斯及其追随者倡导的版本:

- 提出相当复杂的分析程序;
- 提倡在理论发展过程中直接提问;
- 说明了一系列技巧以利于持续性比较;
- 为了理论比较提出了多种复杂工具;
- 对选择性编码最终阶段强调得较少;
- 提出包括编码笔记、理论笔记和逻辑笔记等多种类型的备忘录;
- 提出较为复杂的理论取样类型。

68

方法和方法论观点

考虑到扎根理论的哲学基础以及就其开创以来如何发展的一些争论,本章后面的内容将提供如何实施扎根理论的实用建议。和其他质性方法的某些作者一样(尤其参见米歇尔·克罗斯利在本书第9章中关于叙事分析的介绍内容),在我看

来,把扎根理论看成一种固定方法(其中仅有唯一一种"正确"途径实施分析)是无益的。与此相反,我为研究者如何实施分析提供建议,当然,前提是他们打算将其使用的方法标记为"扎根理论"。开始的时候,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本章当中,我将会描述以旨在建立新理论为特征的研究过程(完整版本参见 Willig,2001),而非仅修改使用初始开放式编码的版本。后者通常也会被描述为分析的扎根理论取向(参见 Foster et al. ,2004,一个不错的示例)。

以下各小节以线性顺序呈现。按顺序实施需要一些前期的决定和步骤作为指导,不过扎根理论分析的独特标志之一就是资料收集与分析的动态性相互作用。为了说明这些话题中的一些内容,我将会使用从一项探究定居英国的老年华人对癌症和临终关怀认识的研究项目中提取的相关资料(Payne et al. ,2004)。这项研究的设计描述见专栏 5.2。

专栏 5.2 探究和解释老年华人关于癌症和临终关怀的观点(Payne et al. ,2004)

研究的理由

少数民族群体构成了英国百分之六的人口,其中华人构成了所有少数民族人口中的大约百分之五。研究者关注黑人和少数民族群体在获取癌症及保守疗法护理服务方面的公平性。英语语言能力、社会—经济的剥夺、对老年人由来已久的制度性歧视,以及文化不敏感性等问题,可能意味着老年华人在获取癌症和临终关怀服务的多重劣势。他们对癌症和临终关怀的认识鲜为人知。

69

研究问题

老年华人关于癌症及其治疗的信念和看法,以及他们关于临终关怀(如果有的话)的偏好是什么?

研究设计

使用扎根理论分析的质性研究。

阶段 1

以现有社区群体形成焦点小组,以引出对癌症的认识理解进而建立文化包容性生活描述片段。

阶段 2

个体访谈将使用上述描述片段作为提示以探究相关的认识理解及偏好。焦点组和个体访谈均以研究对象偏好的汉语方言(广东话、客家话及普通话)实施。

研究设计

研究问题的类型

所有的研究都应该寻求设置一个或多个具体的研究问题(research questions)。基于注重实效的原因,通过聚焦于具体的客体,研究更可能在时间、金钱和精力等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得出结果。学生和研究新手会发现这是研究设计中最难满足的方面之一,不过在着手收集资料之前设定一个明确的主题范围是必不可少的。由于扎根理论适合于探索性研究,研究问题可能会在资料收集和分析的过程中变得更为精致和具体,因为在这期间研究者获得了对关键问题更多的体会。研究问题和研究

目标的措词将使得被研究的“何事、何人、何时、如何”变得更为明确。通常，寻求探究过程和/或意义的研究问题适合于扎根理论分析（参见专栏5.3）。如果研究问题主要关注于“有多少”和“多长时间一次”，那使用量化研究方法来回答可能更好。 70

专栏5.3 使用扎根理论研究的研究问题示例

- 慢性疾病如何影响对自我的知觉？（Charmaz,1990）
- 患有晚期乳腺癌或卵巢癌的女性如何应对保守化疗？（Payne,1992）
- 丧亲家庭是如何决定是否捐赠其所爱之人的器官用于移植的？（Sque and Payne,1996；更多细节参见本书附录2中的报告2）
- 病人和理疗师关于中风后的康复过程所持的预期是什么？（Ashburn et al. ,2004）

何时使用扎根理论

当碰到以下情况时，研究者可以考虑使用扎根理论：

- 对研究主题范围所知相对较少；
- 没有“大”理论充分地说明被研究的具体心理建构或行为；
- 研究者打算挑战现存理论；
- 研究者对引出研究对象对世界的理解、知觉和体验感兴趣；
- 研究指向于发展新的理论。

扎根理论分析的目的是建立严格的来源于资料的归纳式理论，而不是由假设检验支持的演绎式理论。所以扎根理论是一种适合于探索型研究和解释型研究的方法，除此之外其应该不限于描述。如果你的研究意图仅仅是描述一系列行为、知觉或体验，那么主题分析（Joffe and Yardley,2004）可能是个更好的选择。参照专栏5.2中所描述的研究，我们选择扎根理论分析，不但是因为我们对描述老年华人的观点感兴趣，而且更打算发展一个关于他们为什么具有这些观点，以及这些观点如何影响其行为（诸如为癌症寻求检查和治疗）的解释理论。譬如，我们打算解释西医和中医对于癌症所起作用的偏好。 71

何时进行文献回顾

在许多范式中，通常在收集资料之前进行文献回顾并且计划研究的所有阶段，不过在扎根理论中，在着手资料收集之前，关于文献回顾的程度与类型，存在着可取性和恰当性的讨论。有人认为，研究者应该较早开始资料收集并且延后文献回顾，以加强其对突现于资料中话题的纯洁性和敏感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如果打算确认的研究主题尚未在理论上很好地被理解和发展成熟，对现存文献以及相关理论的关注就是必需的（Willig,2001）。研究者应该充分地体会文献以确保他们的研究能够贡献出新知识。在分析的后期阶段，对实证和理论文献的体会是必不可少的，以确保新的理论建构与当前的研究工作连接。在我看来，研究新手需要花一些时间做一个预备文献搜索，并且也需要意识到个人带入到资料收集和分析中的学科背景概

念和预设(后面有更多对此的反思及相关的信息)。另一个做文献回顾的实用原因是,学生们提交研究选题报告时通常需要它,而且文献回顾也是所有研究者的研究在学术伦理审查通过时的要求内容。如果为研究项目寻求外部资金支持,文献综述也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对于老年华人的研究,在进行研究基金申请过程中,以及作为获取学术研究伦理审查通过的必要程序之一,我们实施了一个预备性的文献回顾。不过,我们延后了完整文献回顾的撰写,以便在阶段 1 的初始焦点小组期间与资料收集同时进行。我们认为这一策略可使我们在遵循外部限制(譬如基金机构和伦理立场)的同时,在初始资料收集和分析中保持对新观念和新概念的开放性。通过在阶段 1 同时着手资料收集与文献回顾,我们能够同时使用突现分析见解和已有的理论及实证信息来构造阶段 2 的访谈。

资料收集

资料的类型

存在着四种常见的质性资料类型:

- 书面文本和口头话语形式的语言;
- 对行为的观察(包括交谈和非言语互动);
- 影像——可能是动态的(数字化捕捉的视频或电影、照片、图画或绘画);
- 雕塑之类的艺术品。

72

扎根理论需要(或能够)被转录为文本的资料,所以前两类资料最为常用。重要的是认识到具体要求的、由研究者搜集以回答研究问题为目标的引发资料(elicited data)与自发资料(spontaneously occurring data 或 naturally occurring data)之间的区别。扎根理论分析所使用的资料,大多数是为了研究项目的目标通过访谈或焦点小组中的交谈而引发的。不过,也可以实施基于对话记录、咨询记录或其他自发资料的扎根理论分析:对政府政策文件、日记和检验报告等印刷材料的扎根理论分析,会带来新的见解。

怎样收集恰当的资料

访谈 多种原因使访谈成为扎根理论收集引发资料的一种恰当方法。首先,它们依赖于对话的日常经验,并且人们通常乐于有机会在面对面情境中与一个关注自己的人交谈。访谈中的研究对象需要交谈和理解问题的能力。语言和理解上的困难会把存在学习困难/缺陷(Finlay and Lyons,2001,2002)或教育成就较低的人以及不理解访谈者所使用语言或口音的人排除在外。通常,面对面访谈流行于研究者之间,是因为它能比其他方法获得更高的回应比率,并且与问卷相比不易缺失资料,不过实施起来可能非常耗费金钱和时间。因此,由史密斯和伊托夫所描述的半结构式访谈(参见本书第 3 章)的原理就适合于扎根理论研究。

在西方文化中,访谈的安排通过电视访谈节目、专业咨询活动或其他相逢方式,因

而为人所熟悉。在对老年华人的研究中,我们发现通过将阶段2的资料收集描述为“对话”而不是访谈,我们可以获得更好的人员招募和改善的资料。起初老年华人将“访谈”视为威胁性的,并且因为怕出错及害怕挑战访谈者而不情愿表露其观点。

小组讨论 小组访谈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他访谈类似,因为研究者要直接提问且对访谈者做出反应。他们与焦点组访谈不同,因为小组讨论不鼓励参与者通过挑战主题、讨论和辩解来建立与他人的联系。它们通常使用于群体情境中(比如学校)这是一种成本效益较好的从众多研究对象中收集资料的途径。

焦点组 在焦点组中,目标是鼓励研究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以便能够引发一定范围内的观点,以及创设讨论。焦点组开始时,必须决定研究对象们是否该相似、相互陌生或彼此认识——这可能与研究问题、研究主题范围及取样策略有关,并且应该考虑到文化规范、性别和权力关系等。譬如,在某些文化中,如果在混合性别小组中讨论性健康问题女性会感觉不舒服。焦点组通常由一个促进者掌管,其作用是介绍主题、鼓励研究对象以及为研究对象设置信任、舒适和安全的话题,还有一名观察者逐个记录小组成员的特性和类型。研究对象的数目可以在六到十二人之间变化,这取决于主题和小组。此外,获取一定范围内观点表达的愿望,管理较大规模小组及因此而产生的音频记录的解读困难之间还需达到平衡。若主题倾向于非常个人化或引发强烈情绪,则规模较小的小组更为可取,譬如对丧亲之人的访谈。更多关于焦点组访谈的资料,请参考科尔宾(Corbin,2001)和米尔沃德(Millward,2006)的著作。 73

在老年华人的研究中,我们的焦点组人员为华人社区团体成员,并且他们之间已经相互认识。这样具有接近老年华人(一个通常很“神秘”的人群)的优势,因为他们熟悉社团环境和其他成员,所以显得很放松,一般会愿意参与并能自如地交谈。不过,因为他们在过去的健康教育谈话背景下的小组会议经验,尽管研究人员对此研究的目标进行了仔细的解释(同时使用书面和口头方式),一些成员仍期望被告知癌症治疗服务而非主动提供他们的观点。在阶段2中,我们选择了促进访谈过程的片段化方法,包括向研究对象展示与研究主题/问题有关的虚构(或真实)的“事例”或场景说明,比如让人们去讨论与第三人有关的癌症及垂死等敏感话题,这也有利于比较以及展现如何表达选择和偏好。在实践中,许多研究对象喜欢说他们自己的故事,以及描述朋友和家庭成员的癌症经历。

资料收集的步调

在扎根理论研究中,资料收集和分析是同时进行的活动。通常情况下,最初的收集资料之后跟着的是初步的开放式编码(后面解释),如此这般精炼研究焦点并且改进研究问题。这相应地要求改变资料收集方案和取样。不同于正规的线性实验设计,扎根理论研究包括资料收集、分析、反思、理论建立和理论检验等能动的螺旋型上升交叉进行的阶段。因此,很难做到像本章一样:以书面陈述的方式把握扎根理论,并且向通常更熟悉较为结构化线性方法的研究伦理审查机构提交申请。 74

取 样

与质性研究的其他类型一样,扎根理论不依赖于统计学上的典型性来主张

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和可靠性。其样本通常有目的地选取的，因为人们相信这能够对所研究的主题作出贡献。这不同于由非常容易获得及自愿参加的人员组成的“便利”样本。目的性样本应该基于在报告结果时必须明确交待出来的标准进行选取。在最开始时，重要的是对那些假定可提供与研究主题相关的资料的样本特征进行定义。在资料收集过程中，因为研究问题变得更为精炼，取样策略可以被修改以纳入可能贡献不同视角和经验的其他人。在分析和理论检验的过程中，一个被称为“理论取样（theoretical sampling）”的过程，可以明确地被用来寻求对分析中出现新建构进行质疑和说明的“负面”个案。作一个统计类比，招募“极端值”对检验突现理论是有益的。理论取样被定义成一个为了生成理论的目的而不断推进的资料收集过程，在其中，先前的分析会影响后续资料收集的决策。这是理论性的，因为其受突现理论模型的引导并且为其作出贡献。理论取样是一个完整的扎根理论研究的本质特征。

譬如，在老年华人研究中，我们打算在英国的两个地区招募老年（定义为超过50岁）华人居民，其中一个城市有较大的“中国城”而另一个没有，因为我们相信这些社会性差异能够反映文化认同和文化支持。虽然我们从华人社区团体的人开始，但在访谈阶段却把资料收集扩展到了不属于华人社区团体的人当中。研究团队也就是否纳入“出生在英国”的第二代华人进行过讨论，因为第二代更倾向于较为完整地融入西方文化并且使用英语。我们有意识地寻找在性别、出生地（如中国香港、内地，以及马来西亚）和社会经济地位方面各不相同的老年华人样本。

75

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和资料的立场

该把研究对象的反应、研究对象谈话中隐含的意思放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以及从不同角度对谈话进行分析的目的，均是研究者需考虑的重要因素。我将从辨析质性方法中两种主要的概念取向开始：

- 关注从资料中推论意义（meaning）并且得出关于人们思考什么、感受什么和做什么的推论的方法。这些方法可以被定性为“体验式（experiential）”取向。其中包括诸如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框架分析（framework analysis）、扎根理论分析、解释现象学分析和叙事分析（narrative analysis）之类的分析方法。
- 关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谈话如何被使用（used）并且不对人们如何感受和思考进行推论的方法。这些方法可以被定性为“推论式（discursive）”取向。其中包括诸如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对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和制度互动分析（analysis of institutional interaction）之类的分析方法。

传统上而言，访谈资料被赋予了如下的地位：以运用扎根理论为例，研究对象的反应被看作是了解他们的想法、感受、对世界的看法的证据。这些见解被假定为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并且被推断为个体的特征。扎根理论者认为能够在谈话基础上得到个体思想状况的判定。他们对于探究先前的经验以及个人见解对谈话中的情绪与认知反应的影响兴趣十足。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谈话被看作是人们心理的表现，并且提供了直接获取思维和情绪的途径。其中的描述被当作是表现了经验的

"真实"陈述,并且被看作是当时的(at the time)对经验的感受,尽管访谈清楚地提供的是对经验的回溯式陈述。访谈的社会性环境特性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相比之下,"推论式"方法视访谈反应为一种关于人们如何在特定时间使用语言来构造特定情境的证明(尽管这些方法对访谈资料很谨慎并且喜欢自发资料)(参见本书第7章)。"推论式"方法并未假设反应在其他情境中的一贯性,不会推论人们思考和感觉的方式,并且也不会把交谈解释为人们在不同社会情境中处理问题的途径——如同在研究性访谈中那样。在老年华人的研究中,我们认为研究对象的话语指示了他们关于癌症和临终话题的知识、态度和信念。

资料准备:资料的转录

是否转录资料? 转录的类型

无论在着手何种质性分析之前,口头形式表达的原始资料都需要被转换到文本格式,所以通常要做的是把音频记录转录成书面文本。这是分析的第一阶段,并且在这一步要就使用的转录风格做出至关重要的决定(O'Connell and Kowal,1995)。76 在扎根理论分析中,常见的是同时誊写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言谈,不过对音韵、副语言(paralinguistic)①及超语言(extralinguistic)②等要素进行誊写(如同一些话语分析和所有会话分析的使用者做的那样)就不常见也不必要了。研究新手可能会打算至少亲手进行一些转录工作,因为这能使他们发展一种对资料紧密的熟悉感,发现一些进行探究的潜在分析路线。如果转录誊写的大部分是由从事文书工作的人完成的,就有必要重听所有的录音,并且从头检查转录中的错误和遗漏。雷尼(Rennie,2000)强调,在资料收集和分析过程中应该具有连续性。他指出实施访谈的人应该已经具有了一种对文本的理解,因为对访谈的整体理解及其社会背景会影响其对文本要素的分析。在老年华人研究中,访谈首先被转录为汉语,然后翻译为英语。研究小组不仅使用原始录音对转录内容进行了仔细的核查来实施,还讨论了译文中有疑问的措词。专栏5.4提供了对某个访谈的节录以演示转录的类型。

扎根理论中的另外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分析应该直接以口头言语实施而不是以转录内容来实施,因为这样才可能获取资料的音韵、副语言及超语言特性。譬如,在书面转录中反话就难以"捕捉",因为声音语调或伴随的咯咯笑声能显示出单独使用文字不能直接显现的说话者意图。关于转录中如何使用标点符号以及如何呈现文本也存在着分歧。科菲和阿特金森(Coffey and Attkinson,1996)指出,把文本分解为子句形式将保持更多对口头语言的情感共鸣。这种类型的转录使得书面文本呈现为一种诗歌样式。总之,从口头言语到书面言语的转换是解释过程中的第一个阶段。

---

① 指口语表达中经常出现的手势、叹息、口头禅之类直接参与人类认知过程及交际过程的要素或者现象——译者注

② 指语言使用本身之外的诸如使用者的文化背景及语景等要素或现象——译者注

专栏5.4　访谈的及可能的开放编码

访谈誊抄	开放式编码
（以普通话实施，译为英语）	
成先生：	
这……这种粥，我认为当病人很虚弱时更易吸收。	“食物的性质”
访谈者：	
是的，的确更容易。	
成先生：	
对，更容易吸收。所以对病人来说，药是很重要，但食物疗法也很重要。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应该让她吃任何食物。在中国文化中我们有大量的食物疗法，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优势之一。同时，我先前曾说我提到过建立一个社区中心以及当前的一个难题，人们服用太多药物啦。这些药物是化学制剂，留在肚子里，不知道会造成什么影响。	“关于消化的信念” “食物疗法” “中国文化” “太多的药物” “药物—难题” “对药物使用的检查”
所以如果你参加了这个社区中心，医生和护士会给你进行一个定期的检查，并且监测你的用药。如果你长期使用某种药物，他们将了解你是否真的需要。或者你可能需要换一种产生副作用较小的药物。	“药物难题”
访谈者：	
对，对，这是很重要的。	
成先生：	
对，但有很多老年人不明白他们吃的是什么药，并且他们只是胡乱把它们吞下去。	“药物—老年人”

77

附注：

- 用姓氏是对老年华人尊敬的标志，我们在此使用了化名。
- 清粥（Congee）是一种大米粥。

使用计算机软件来辅助分析

扎根理论分析要求研究者管理大批量的文本资料，所以不管资料是以电子形式还是以纸质形式储存和加工，建立连贯而可靠的系统来处理资料是必不可少的。这就保证了，在资料分析中，能够在需要时检索资料，也能提供核查记录（这个过程的一部分是确立分析质量）。因此，如果他们获取了大量的资料，并且/或者有不止一个人将被包括在分析过程中，研究新手应该考虑使用质性资料分析软件。有许多种软件具有一些特别设计，以使扎根理论分析便利化。这些软件具有使操作、索引和检索资料便利化的优势，还勿需改变在编码和解释的思考过程中密切接触的资料。而其中某些软件的缺点，则是学会使用它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其输入和编码方面也是如此，并且一不小心就会以惯常的方式来进行结构化资料分析（譬如，以层次模型或线性模型）。

78

资料分析

正如先前强调过的，扎根理论分析存在多个版本，关于什么构成了“正确”分析程序也存在众多热烈讨论。以下重点陈述的是由巴特利特和佩恩（Bartlett and Payne，1997）描述的源自斯特劳斯和科尔宾（Strauss and Corbin，1990，1998）的分析程序。专栏5.5中对此做了概括，并提供一种实施资料分析的可能途径。不过，有一些分析的关键特性属于扎根理论的典型特征，这在后面的陈述中将会着重强调。

专栏5.5 扎根理论分析的过程（基于 Bartlett and Payne，1997）

活动	注释
搜集资料	任何来源的文本资料均可使用，半结构式访谈和观察法最为常用。
转录资料	访谈者和被访者谈话的完全转录。
建立初始类目—开放编码	通过对转录内容的开放编码从资料中建立起多个类目。“开放编码”意味着识别和标记文本中的有意义单元，其可能是一个词语、短语、句子或更长的文本小节。
饱和类目	“饱和”意味着收集更多有意义单元的实例贯穿转录阶段中的一个过程，直到没有特定类目的新实例出现为止。
定义类目	一旦类目达到饱和，依据每个类目的属性和维度生成其正式定义。
理论取样	基于第一次资料取样中突现的类目，选取理论相关样本来帮助检验和建立更多类目。
轴编码—类目间关系的建立和检验	在轴编码过程中，记录下类目间的可能关系，在持续的理论取样当中依据资料进行假设和实际检验。
理论整合	识别一个核心类目（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存在多个主要类目）并与其他所有次级类目关联，判定其解释效力，并最终与现有理论连接。
使理论扎根	通过返回到资料使理论实现扎根，并且依据实际文本片段对其进行校验。对异常个案的搜寻可以被用于检验突现理论。
弥补不足	最后，通过进一步收集相关资料弥补任何缺失的细节。

79

初始编码和持续比较技术

在仔细、反复地阅读原始材料之后，就可以对文本进行初始编码（coding）了，即辨别、强调和标记类目（categories）有意义的单元。这些单元可能是词语、短语或更长的文本片段。斯特劳斯和科尔宾（Strauss and Corbin，1990，1998）将其描述为开放式编码（open coding），并建议在此阶段对资料问重复的问题。格拉泽（Glaser，1992）将其描述为实质性编码（substantive coding），并且推荐严格地依据资料进行标记，如果适当的话，甚至可以使用研究对象的措词（在活跃类目中，in vivo categories）。对研究者来说，存在着概念上如何具体或抽象地进行其初始编码的两难问题。非常具

体的初始编码，会导致对众多较小文本单元的编码，这会非常接近于资料并且差不多在是在重复文本，这是一种危险（Rennie, 2000）。与此相对的是，斯特劳斯和科尔宾（Strauss and Corbin ,1990,1998）提出的严格询问法，可能意味着非常漫长的分析，并且会使分析中较早引入概念性类目从而使分析依据研究者的理论影响，而不是忠实于资料。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初始编码的目的都是捕捉源资料的细节、变异和复杂性（Henwood and Pidgeon,1994）。

随着更多资料的积累，在每一次转录中都会有相同的或新出现的有意义单元的更多实例编码。这将产出大量的类目和次级类目。不同于内容分析的是，相同的资料可能被归属于不止一个类目之中。在分析过程中对类目的初始描述使其更具分析性是正常的做法。研究者必须意识到频繁出现在资料中的某种类目，并且对新资料的编码实例越来越少直到不再出现为止。这被描述为信息饱和（saturation），可作为初始编码和资料收集停止的指示。格拉泽和斯特劳斯（Glaser and Strauss,1967：1）在扎根理论的原始版本中强调，“一种比较性分析的普遍方法”的运用。这通常被描述为持续比较（constant comparison）技术，在其中，依据先前的类目考察文本片 80 段的相似性及差异性。这个过程意味着可能需要被修订编码、重新标记类目及采取新角度合并或分离类目。这可能要求校订和重新编码先前已编码转录的内容。这被亨伍德和皮吉昂（Henwood and Pidgeon,1994）定性为资料与概念化之间的“双态触发器（flip-flop）”。

研究新手需要以一种系统的方式来给类目编索引，并提供这些类目的文本片段实例。这个过程传统上通过对转录文字块的剪切和粘贴实现，不过现在更常见的是使用文字处理软件或专门设计的质性资料分析软件以电子化的方式管理。一旦类目呈现饱和，每个类目的属性和维度的简明而有意义的定义（definitions）就应该被写下来。在专栏5.6中给出了一个例子：如何对已经进行了开放编码的转录内容（见专栏5.4）按照其他资料进一步校订，产生更为概念化精练的编码。

专栏5.6　持续比较过程的一个示例

摘录	开放编码	修订编码
对，更容易吸收。所以对病人来说，药是很重要，但食物疗法也很重要。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应该让她吃任何食物。	“对于消化的信念” “食物疗法”	“食物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治疗途径”
在中国文化中我们有大量的食物疗法。	“中国文化”	
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优势之一。同时，我先前曾说我提到过建立一个社区中心以及当前的一个难题，人们服用太多药物啦。这些药物是化学制剂，留在肚子里，不知道会造成什么影响。	“太多的药物” “药放—难题”	“对西医的矛盾心理”

理论取样和主轴编码

在分析中期,要收集更多的资料。在此阶段通常运用理论取样,将取样转向那些被假定用于说明检验突现理论的研究对象。斯特劳斯和科尔宾(Strauss and Corbin ,1990,1998)描述了一个称为主轴编码(axial coding)的过程,于其中精练和简化诸多生成于初始编码期间的类目。主轴编码过程中需要进行的分析工作包括发现连接、关系、冗余以及新的模式。他们倡导使用一种设计,就是使研究者对诸如"过程"这类高阶特性更为敏感的编码范式。这就可能需要某些类目重构以达到更深入的了解,更多地从资料的描述性陈述中获取概念抽象至不同类目中去。这称为理论编码(theoretical coding)。斯特劳斯和科尔宾将假设检验纳入到扎根理论的做法中(譬如,通过反复提出研究成果的陈述来考察其能否得到资料的支持),而格拉泽则在最后阶段更为强调这一点。通过发生在后期阶段较为抽象的分析,格拉泽(Glaser,1978,1992)的版本显得更关注突现于资料的编码。 81

资料合成

在整个分析过程中,扎根理论都鼓励研究者写研究备忘录(memos)(相关示例可参见专栏5.7)。这是捕捉研究者思考过程的方式。在研究团队中,这也是分享见解以及做出分析决策的有益途径。备忘录书写的作用在于,它可作为一种审核线索有助于跟踪分析过程。书写备忘录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并且许多专门的质性分析软件具有在类目旁边显示备忘的功能。在理论建立的后期阶段,备忘录的书写、资料分析和资料质疑之间存在着积极的相互作用。研究者积极地分析资料,并以初始类目和后续类目,更为稳步地获得分析的洞察力。这可能也会影响到研究问题的进一步改善。

专栏5.7 分析备忘录的一个示例

食物在健康与疾病中的作用

当谈到在疾病中食物的效用时,研究对象似乎将他们的讨论分为预防癌症的食物、应避免的食物及防癌的"治疗性"的食物。资料表明,我们样本中的老年华人相信生病是身体失去了平衡,并且一般归因于毒素的存在。所以在疾病中,食物的作用似乎在于去除毒素,并且补充身体缺乏的成分以恢复身体平衡进而强健身体。

新理论的建立

在分析的最后阶段,对类目的仔细核查将会获得具有主要解释效力的一个核心类目(core category)的识别。此阶段的目的在于以概念性的、有意义的方式对尚存的类目进行组织和整合(相关示例可参见专栏5.8)。实际上,使用视觉影像化的类目可能是有帮助的,这样,类目可以被整理再整理,以便认识到突现出来的用于形成理论的模式。斯特劳斯和科尔宾(Strauss and Corbin,1990,1998)将此过程描述为选择性编码,而格拉泽(Glaser,1992)称之为理论编码。在此过程中,与有可能更进一步地使突现理论(emergent theory)得到发展的现有理论建立连接。这被称之为理论 82

敏感性(theoretical sensitivity)。扎根理论倾向于具体到其所起源的上下文语境,此外,还应该具有解释的潜力,而非纯粹地对资料进行描述。在格拉泽和斯特劳斯观点当中,关于是什么构成了一个好的理论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斯特劳斯和科尔宾(Strauss and Corbin,1990,1998)强调需要复杂、详尽的陈述,而格拉泽(Glaser,1992)则强调简约及所呈现理论的潜在可修改性。在我看来,扎根理论应该给被研究的主题提供一个连贯的解释说明。这些叙述可以围绕一个中心范畴簇集在一起,也可以是一些互相关联的主题,但这些叙述不应该是毫无联系的有趣的主题的集合。

专栏 5.8 显示现有理论与编码之间联接的示例

与癌症诊断相关的现有理论和政策

当前在癌症护理中的交流惯例,是强调和患者一起以符合其意愿的步调与风格就诊断和预后进行充分而公开的讨论(英国国家临床质量管理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linical Excellence,2004)。不过,实际的交流常规可能更像是"条件性"的而不是完全"公开"的(Field and Copp,1999)。在英国,当前的趋势是突出强调患者在健康护理决策方面的自主性(Fallowfield,2001)。文献中假定华人支持对家庭成员,而不是患者本人批露癌症诊断的结果(Rowlands,2005)。我们的研究表明,关于癌症诊断结果的披露存在着多种偏好方式。部分研究对象表达了被告知以诊断结果的愿望,而有小部分研究对象不愿意被告知以诊断结果,有相当多的研究对象对此不置可否。尽管非常重视家庭生活和责任,但人们仍然存在着一种意识,希望自己被充分地告知相关信息。总之,存在着一种将诊断结果同时告知患者及其家庭成员的偏好。

83

连接资料与编码

主要类目:对诊断披露方式的偏好

通过询问研究对象对癌症诊断披露方式的偏好得知,他们中差不多三分之二的人希望被告知诊断结果。下面是初始开放编码中次级类目的示例:

需要安排后事

"还有一些人害怕想到死亡,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因为癌症的原因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能够把事情安排妥当对于患者来说是件好事。"(女性,访谈 27)

思想上的准备

"如果是我,我会想知道,这样我自己就会做思想上的准备。"(女性,访谈 16)

了解死亡的原因

"所以你应该知道你为何而死"。(男性,访谈 23)

实现理论的测试

一旦建立起了新理论,研究者就需要对照着文本的片段回顾资料以验证其有效性。这个比较过程是前面所描述过的严格的持续比较过程的延伸。恰当的做法是回顾相同的研究对象或特意选取新的对象,也可专门小规模地收集新资料以检验理论的不同方面。此外,异常个案的收集将有助于评价理论的局限性(Willig,2001)。

按照格拉泽和斯特劳斯(Glaser and Strauss,1967:6)的说法,"从资料中生成理论意味着多数假设和概念不仅来自于资料,也是在研究过程中在与资料有关的情况下系统地推演出来的"。早期扎根理论方法强调要从新理论中提出假设,引发更进一步的质性和量化研究。

如何评估扎根理论分析的质量

通常,评判质性研究的质量存在一系列的标准(譬如,Elliott et al.,1999;Henwood and Pidgeon,1992;Silverman,1993;Yardley,2000;以及本书第2章)。没有哪一种标准是完美的,其中的一些曾经是激烈争论的焦点(参见 Reicher,2000)。使用哪一种标准更多地取决于研究者所信奉的扎根理论版本以及他/他的哲学认识论立场。不过,下面还是提供了一些建议。 84

拟合优度

在最初的版本中,格拉泽和斯特劳斯(Glaser and Strauss,1967)强调了"拟合优度(goodness of fit)"和"起作用了(work)"。从"拟合优度"来看,他们的意思是类目必须适用于资料且并非"强迫的(forced)",而所谓的"起作用了"指的是突现理论必须能够解释被研究的行为。后来格拉泽批评斯特劳斯,很大程度上就是他所认为的使用不再容许理论突现或被"发现"的编码范式,导致了"强制"分析。此外,扎根理论应该是可得的(accessible)。按照格拉泽和斯特劳斯(Glaser and Strauss,1967:3)的说法,"对于持有任何观点的社会学家、学生及明显的外行,这种理论都必须是可以容易地理解的"。当然,在心理学领域内实施扎根理论分析,我们就应该用"心理学家"来替换"社会学家"。

大多数的扎根理论分析过程需要设计以保证其稳健性。按照雷尼(Rennie,2000)所说的,在格拉泽的版本中,验证和效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理论的效化涉及的是方法内的程序,而验证是从理论产生假设继而使用量化方法检验。相比之下,斯特劳斯和科尔宾(Strauss and Corbin,1990)主张的是分析方法之内的假设检验。

外部效度

可以使用一系列的策略,从参考他人观点的角度来确认分析的质量。为支持所做出的主张,福斯和艾弗森提出了三角模型(Foss and Ellefsen,2002),即从不同的出发点对相同的现象进行探究,每一个视角结果的相似显示了研究有效状况。三角模型可能会采取方法学式三角(methddological triangulation)、理论式三角(theoretical triangulation)或反应效化(respondent validation)等一系列形式,但其不应该被看作是万灵丹。反应效化需要将突现理论返回给研究对象,以获得其关于理论可靠性的看法。在我看来,这种做法通常会从不同的视角生成更多的资料,而不是仅获得某一个视角的校验结果。并且,三角模型认为通过从一个以上的来源收集资料以获得理论的校验是合理的,要么使用不止两种的资料收集技术,要么组合不同的理论立场。希思和考利(Heath and Cowley,2004)就曾小心地在一个单一的研究中对照着组合

了格拉泽和斯特劳斯的扎根理论版本。团队式分析可以为研究新手提供支持,不过85 存在尝试建立一致意见而丢失个人见解的风险。雷尼(Rennie,2000)不满于所有效化方法,因为他认为这些方法本质上实证主义的,提供了一种伪造的"客观",而且它依赖于单一的现实,而这有违于欲评价的突现理论。

在老年华人的研究中,研究团队成员独立对来自前五个焦点小组的转录内容进行初始的开放式编码,通过这种做法,大家就类目达成了一致意见。然后搜集资料的研究者对转录的内容编码。对未定类目的反复讨论和修订,存在于整个分析过程之中。

反身特性

自反性(reflexivity)使研究者认识到其在创作分析性叙述中的作用。诸如持续性比较和备忘录写作这些对扎根理论方法极为重要的方法程序,促进了对研究者角色及其认知过程的至关重要的觉知。在实施资料收集前,应该尝试认识研究者的理论和学科背景,以保证研究进程对研究对象的新见解保持开放性。同样,用于研究对象自身的措词的类目标记的开放编码技术有助于防止理论建立过程过早结束。跟在现象学中的不同,扎根理论者们并不主张"类别"式的预设前提;相反,研究者一般被公认为是资料的共同生产者,譬如在访谈过程中、在资料的解释过程中以及在理论建立过程中。

写作和呈现

正如本书中克罗斯利在对叙事分析的讨论中所强调的(参见第9章),在质性研究的写作中构建论证过程的表达能力是必需的。一般来说,与实验报告相比,质性研究呈现结果的公式化程度非常低,不过需要让读者明了所使用的方法。科菲和阿特金森(Coffey and Atkinson,1996)提议使用一些新颖的方式来呈现分析,譬如诗意的叙述。在呈现一个扎根理论时,解释分析的过程(如同任何方法论说明中一样)以及演示核心类目和次级类目如何从资料中被导出是很重要的(Elliott,1999)。接着,呈现新理论——以充足的核心类目构成细节以使其可以理解——以及核心类86 目与其他类目的关系。图解概念及它们之间的连接对读者可能是有益的。此外,研究报告应该提供资料的节录,如文本、影像、田野笔记或作为分析基础的转录内容。研究新手应该表明他们是如何选择支持性的文本的,以防止被批评为只是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引用内容(juicy quotations)"。在引用单个以上研究对象的观点支持相关论断时,应该用标识符清晰地标注节录内容,以使得读者明了。在质性研究写作中,"为读者提供充足的资料以引出替代性结论"、"使得他们了解如何获得这种解释"与"一个超长的说明"之间必须是协调的。威利格(Willig,2001)在本书附录2中提供了一个如何写作扎根理论研究的帮助说明,以及一个有用的扎根理论研究写作示例。

小 结

本章展示和讨论了扎根理论的起源、原理和实践，并利用了一个研究作为分析过程的示范。做扎根理论分析可能是有挑战性的、令人激动的、令人沮丧的或令人愉快的。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中，准备充分、装备良好、资金充足，谨慎地设计你的研究，使用现实的时间框架来设定终点和目标，这都是很重要的。当然，你在适应意外情况时同样需要保持灵活，对新经验、发现和观察世界的方式保持开放。最后，好的研究是被严格实施和精确记录的。扎根理论以智力的参与、创新性、理论敏感性、自反性及写作能力为必要条件。希望本章可以启迪你，引导你的研究。

延伸阅读

对于研究新手来说，梅森（Mason，2002）的《质性研究》一书是一个不错的出发点，其中包括有关质性研究方法中的疑难问题的指引。此书旨在为争取较高级学位者提供基本原理和实践过程方面的建议。默里和张伯伦（Murray and Chamberlain，1999）主编的《质性健康心理学：理论与方法》一书关注特定质性方法的应用（包括扎根理论），并提供了在有关健康研究项目研究中如何使用它们的示例。卡麦兹（Charmaz，2006）的《建构扎根理论：质性分析实践指南》①是一本具有吸引力的书，它以一种简洁明了的风格展示了扎根理论的一个版本。此书对新手和专家都有价值。

① 其中文版由重庆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6月出版。

6

实施扎根理论

希拉·霍克 & 克瑞斯丁·科尔

本章展示了对来自两名退役士兵退伍体验资料的扎根理论分析，其中描述了研究者如何通过详尽地熟悉背景及访谈内容而沉浸于资料之中。在这个练习中，通过开放编码和类目整合了两份转录，这促进了对单个叙述内容和两个叙述内容之间的模式、关系、相似性及差异性的识别。随着概念的突现，各个类目被汇聚在一起，并以这两份转录做进一步的审核。生成和概述了一个操作性假设，以备额外的访谈检验。提出了进一步使用更多研究对象的建议，描述了理论取样的过程。最后，讨论了扎根理论方法使用的优点和缺点。

关键术语

主轴编码(axial coding)
类目(categories)
编码(coding)
持续比较(constant comparison)
核心类目(core category)
突现理论(emerging theory)
拟合优度(goodness of fit)
迭代过程(iterative process)
备忘录(memos)
开放式编码(open coding)
信息饱和(saturation)
选择性编码(selective coding)
软件(software packages)
理论取样(theoretical sampling)
理论敏感性(theoretical sensitivity)

扎根理论是一种分析资料和建立理论的系统方法，持续比较（constant comparison）是此方法的关键组成部分。系统地考察访谈转录形式的文本资料，通常还会伴随着田野笔记和观察记录，以便于通过严密的详细阅读而揭示研究对象的主观现实。扎根理论的目的在于识别出产生被研究现象的社会过程。简单地说：考察结果相同的事件以了解其共同的条件，因而展现出可能的原因。也可比较在许多变量上相似却具有不同结果的各种事件，以了解其差异的主要原因处。 88

为了在本章中展示分析练习的目的，在此将扎根理论方法简化并呈现为一系列的步骤（参见图6.1）。不过，必须强调的是，扎根理论分析是一个迭代和递归的过程：每个步骤都在影响着下一个步骤，所有的步骤在研究项目进程中都会被重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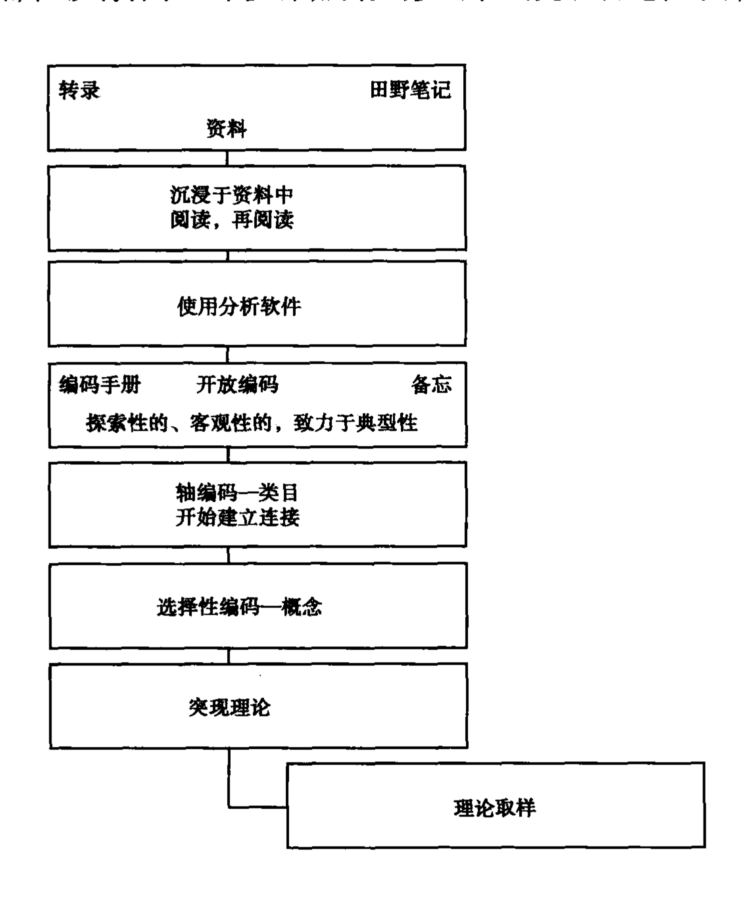


图6.1 扎根理论分析的步骤

在理论突现之时，研究者需要回顾资料并且选取新的研究对象以对其进行检验（一个称为“理论抽样（theoretical sampling）”的过程）。本书第5章较为详细地叙述了扎根理论分析的原理和实践，在此我们将专注于这些步骤和原理如何被运用于两份访谈转录中——它们是一项关于退役士兵退伍及后军队生活体验的质性研究的一部分。 89

很多研究者在分析质性资料时使用专门的软件（software packages）。此类软件在管理资料、记录编码和概念、构建编码手册、搜索和筛选编码，以及将其归组于不同类目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本次练习即使用质性分析软件 NVivo（Gibbs，2002）。不过，在任何资料输入这一分析软件之前，两个作者花费了一定的时间来对两份转录进行阅读和再阅读以便熟悉资料。在真实的研究中，资料收集和分析中应该具有

连贯性:我们应亲自实施访谈,至少要了解记录和田野笔记,以便让自己同时熟悉资料的内容和语境(Rennie,2000)。与此相似,尽管仅有对研究项目关注点的一般性描述对我们本次练习是可用的(参见附录1的前言),但在开始资料分析之前,研究者通常应该熟悉具体研究项目的特定研究问题。

文献回顾是否应该提前于扎根理论的实施是有争议的,不过本次练习中的两位作者均不熟悉关于退伍人员的学术文献。在这个程度上,我们真正属于研究"新手"。在此所使用的两个访谈是半结构式的,这种类型的访谈通常较适合于扎根理论分析后期的各个阶段。在分析被进一步提炼之前,较为常见的是以结构性较弱的访谈对研究主题进行探索。

一个研究者必须对自己在资料收集和分析中的角色作用保持反身性。此处值得注意的是,访谈者自身就是一个退役人员,这点反应在了访谈过程中对措词的选择上(例如,"平民街(civvie street)"),并且访谈对象也了解其服役背景——应该特别指出这一因素,因为它可能提示并鼓励访谈者与其对象共享对军队和退役生活的认识,进而影响到访谈内容。在扎根理论分析中,虽然对转录内容的编码(coding)乍看起来属于最主要的活动,但应该认识到,分析从研究项目启动就开始了。熟悉研究问题、访谈语境、访谈资料及反思研究者的影响作用,都是一项扎根理论分析不可或缺的部分。

如同前面所解释的,与我们在此练习中得到的相比,在正常情况下研究者应该具有更多的背景资料,也应该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探索这些资料。假如这是个真实的研究,我们可能会花几周时间来分析最初的一批资料,而编码通常只会随着研究的进程变得更快速和更有效。在这短短的一个章节的限制下,以直接而容易理解的方式概述扎根理论的迭代过程(iterative process)是困难的。为了对抗这个难题,我们将只关注编码和分析的一小部分,并且对其进行深度的解释。

90

由于读者可能对本章中讨论的资料非常陌生,我们建议,在开始之前,要让自己非常熟悉这两份转录,要在阅读时思考自己注意到了什么,并且考虑能够使用什么样的措词作为"速记方式"来表达自己可能具有的任何想法。这个实验性的工作步骤是练习的重要部分,因为没有熟悉资料而解释扎根理论的实践操作,就有点像没有水而解释如何游泳。

样本的特征

随着样本的变化而记录下其特征是重要的。这使得研究者能够考察来自不同人群的反应,并且记录下其相似性与差异性;这也影响到研究对象更进一步的招募。必须强调的是,类目化并非旨在发现有代表性的样本或者进行某种形式的内容分析。其目的在于深入地探究围绕着研究现象的相关经验范围。通过记录这些细节,样本中的任何强烈偏见都会被突出。分析软件的优势在于可以方便地将这些特性安排于每份转录内容,便于资料能够以不同的名目细分和保存。通过使用我们得到的关于退役士兵布莱恩和大卫的信息,我们起草了这一练习的初步表格(参见表6.1)。在研究进程中通常会有额外变量加入,这会影响未来的取样,以这种方式记录信息将有助于熟悉资料以及最终研究论文的撰写。

开放式编码

当彻底地熟悉了早期的资料，就到了对第一份访谈转录进行开放式编码（open coding）的时候了。第5章很好地描述了这种编码过程。编码工作的宗旨是系统性地维持"注意（noticing）"过程。编码措词在资料各部分的使用——它们是单个的词语、句子的部分或全句，或者是完整的段落——构成了促进与资料有关的收集、分类和思考等现象命名的工作。

91

表6.1 样本的特性

变 量	大 卫	布莱恩
性别	男性	男性
年龄	未知	未知
婚姻状况	已婚	已婚
孩子	有孩子	有孩子
服役年限	未知	未知
退役年数	未知	"好几年"
入役军衔	未知	未知
退役军衔	中士	中士
军中工作	驾驶	未知
现在工作	门房	"训练"
从军原因	"为了避免我没有谋生手段"	未知
退役原因	"应变缩编计划"	健康

每个编码结果充当一个标记以突出强调陈述中被注意到的内容项目，有的编码是客观的或是具体的，用于反映文本当中包含了什么；而其他的编码则是更为抽象的或更具推断性，用于反映分析者的观念——与研究问题有关的信息资料的每一行都要被研究。编码结果的实际名称由单个研究者决定。为了在不同的编码工作期之间保持一致性，以及有助于与其他人对相同资料片段的编码结果的比较，研究者要记录下其所指定的编码措词的含义。有一些编码结果是生动的（in vivo），由访谈对象自己所使用的词语和短语所组成，并因此反映了研究对象的现实。例如，我们所做编码中的两个生动编码是"被利用完了（used up）"、（大卫，第119行）以及"锁上了门（locked the gate）"、（大卫，第98行）。这些表达是直接从转录中得到的。完整的编码措词列表及其指定含义组成了研究项目的编码手册，其他的任务通过使用分析软件而大大简化。

当第一次编码布莱恩和大卫的陈述时，我们使用了大量的编码措词及其指定含义，编码丰富多彩，从非常客观的"年龄"（"参与访谈的研究对象的年龄"）到更具推断性的"军队作为照料者"（"作为军队整体的一部分对士兵全面照顾——譬如住房，保健"）。我们注意到两份陈述之间的许多相似之处：两位研究对象都是男性，已婚并且已经有孩子（编码包括"性别"、"婚姻状况"和"孩子"）；两位研究对象均

强调军队所给予他们的价值(编码包括"责任"、"自尊"、"教育"和"社会生活");两人都表达了离开时的失落感(编码包括"抛弃"、"丧失"和"关在外面");两人都表达了对其退役时军队对待他们的方式的愤恨(编码包括"苦涩"、"靠自己"、"被利用完了"和"最宝贵的时间"),不过也都保留了一些与军队的联系(编码包括"连接"、"转换"、"社会生活"和"退役士兵")。在一个正常的研究中,所有这些我们识别的话题,将通过对我们运用于文本的编码进行对照、比较、筛选和分类而被更进一步地审核。基于练习的目的,我们打算只专注于与军队标准有关的一个编码分类,以及报告的影响平民生活的方式。

92

这个练习原本的那个研究关注的是离开军队以后自我身份的重构。考虑到这一焦点,我们以下列措词"专门用语"、"我们和他们"、"军队教育"和"标准"对下面的摘录文本进行了编码。看起来布莱恩认为服役人员和平民差别很大,并且相信军队训练给他灌输了更多的承诺、对责任的感受及比平民更高的标准。有趣的是,他所使用的专门用语("我们"、"他们")可能在暗示着他仍然视自己为军队的一部分而不是平民。

4 布莱恩:我想我在军队中学到了许多,在部队学到的
5 东西是你很长时间意识不到的,这样,当你从军队
6 中出来后,开始与和你一起工作的人比较,你会发现
7 自己已经有了一种更强的紧迫感。你会更加注重细节,
8 你根本不会被时间所困扰,你不必计算开始时间和
9 结束时间。如果工作需要的时间超过了其所需要的 2 倍
10 以上,你就只是做必要的工作。我们似乎更灵活,更
11 适应形势,我在部队已经学到了这一切而我的经验
12 是,那里的局势可能发生变化,你必须适应。你已经
13 学会适应新的情况——并且一直奏效。当我环顾四周,
14 我一直看到,缺乏对细节的关注——他们如何只是敷衍
15 了事,态度冷漠。你知道,我们在所有的时间都全力
16 以赴。

当我们将大卫的叙述与布莱恩作对比时,我们能够发现存在着相似之处。像布莱恩一样,大卫宣称,作为一个退役士兵,他具有高于平民的标准,准备着花费额外的时间以及高效地工作。所以,对下面的文本摘录的编码与用于布莱恩摘录的很相似,包括"标准"、"纪律"、"专门用语"和"我们和他们"。

240 当我来晚上回来时,我将所有的货车停整齐,
241 所有的保险杠在同一水平线。可能看起来可笑,
242 他们将车泊在停车场的各处。这会使它难以出来。
243 他们无法看到一个事实,即把它们都排成队很容易
244 把车开出来。嗯,这有点像你文书工作中的其他小
245 事情。让你的文书工作有条理——使它更容易。我
246 认为生活的这个侧面会妨碍我,因为我做这些就要
247 多花 10 分钟。他们想要做的一切就是进来、出去、走。

不过，我们注意到两个研究对象所使用的专门用语略微有点差异。尽管大卫在提到平民时也说“他们”，但在比较他工作的表现方式时他使用了“我”而不是“我们”。这可能意味着他比布莱恩更为远离军队，在此我们就这一效应添加了一项备忘内容——使用备忘录（memos）是扎根理论的关键要素。备忘录记录整个分析过程，并行于资料收集、过程熟悉、过程记录和编码过程。实质上备忘是关于某种观念、某种编码或属性，关于编码间关系的观察，关于将来可能问题的思考或研究对象的注释或提示。在研究项目的所有步骤均做备忘记录——从研究设计到最后的分析，赋予理论的逐渐形成以活力，以及促进理论敏感性（theoretical sensitivity），指引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考察资料而不是仅关注直接明显的方面。在这一研究中，我们的备忘录会含有关于为什么大卫会比布莱恩更为远离军队的推测。是因为布莱恩在军队中待的时间比大卫长？还是大卫离开军队的时间比布莱恩长？

93

表格 6.2 显示了围绕着军队和平民标准问题生成的一些开放编码或自由编码，并且显示了在分析过程中，它们如何被压缩到分组中或包含有相似品质的编码类目中。类目倾向于比开放编码更为抽象，并且再次记录由研究者指定的含义。

在此步骤，类目是随心所欲的，并且开放编码可以编组于不止一个类目中。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当观点和连接突现，编码和类目将会被改变和修改，并且贯穿于整个分析过程。

表 6.2 编码分组

编码词语	类 目	轴编码	突现理论
教育	军队化标准		
社会化			
责任			
纪律			
标准			
自尊	身份		
地位			
专门用语			
差异			
退役士兵		军队附加价值	一旦曾为士兵，永不再为平民
连接			
准备	转换时期		
调整			
寻找工作			
退役士兵			
外部环境			
连接			
平民街的难题	我们和他们		
连接用语			

94

重要的是维持对这些过程的追踪，在备忘录中记录下想法和突现观念。如果见解和观念要发展为扎根于资料的理论，对分析过程的系统追踪就成为扎根理论研究

者必须具备的理论敏感性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不能够过度强调这样做的重要性。要记住评估任何扎根理论的关键标准是"拟合优度(goodness of fit)"——也就是说,理论与生成理论的资料的一致程度——所以,研究者需要能够准确地辨别出其理论的任何方面是如何从资料中产生的。分析过程的完整记录因此是必要的。

所以开放编码并非一个线性过程——它涉及被拼在一起的谜题碎片的创设,而是被分解和重新组合为不同的画面。下面我们对分析过程的叙述进入到继续在叙述中寻求类型、系列、过程、模式及关系的下一步骤。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axial coding)是指这样一种方式,通过审查、比较,以及将每个类目与其他类目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类目在此被进一步精练。在此步骤,已建立的类目被重新组合成为主要类目或轴编码,它们是分析者经由系统性审查及置疑资料所主张的操作性假设或命题的。

返回到练习中来,表6.2中的类目("军队标准"、"身份"、"转换时期"以及"我们和他们")被再次考察并且重新与每个研究对象联系了起来。两份转录内容表明,两个退役士兵都相信在某种意义上军队使他们在工作实践方面不同于平民。事实上,他们更进一步认为他们比许多平民更忠诚、更有效率和组织性。他们声称他们的方式是优越的,而这可能在平民生活中给他们带来问题,因为其他人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工作。所以在这一步,已经分组的编码和类目可以在新的主要类目"军队附加价值"之下联系在一起。我们接着需要问是什么构成了"附加价值"。这些陈述表明,关注细节、组织性、承诺和纪律是一些贡献性的因素。

可以依照资料检验主要类目,以便于对其确认或驳斥。为了检验突现的轴编码"军队附加值",我们返回到转录内容以寻找此现象更多的实例和任何反例,并且对其进行相应的编码(更多示例参见大卫转录内容的第49—60行以及布莱恩转录内容的第70—78行和第259—262行)。不过,很明确的是,在某些例子中研究对象的军队训练和军队标准并没有被看作是提供了价值,并且给这两个人引发了一些问题:其他(平民)工作人员对他们的工作方式要么愤恨,要么觉得不舒服。从下面的示例中体会一下:

95

230 布莱恩:……我的许多工作——
231 我培养了人…… 我的工作是训练,而我已经适应了
232 我的训练作风,对待平民比在军队里友好,
233 因为它是……人们常说,"好吧,我们来找你,你不教
234 我们——你却朝我们吼",这是——我所做的是要突出
235 自己的声音,以使后面的人们能听到,但我必须适应
236 这种方式,人们更喜欢那种比我在部队松散的方式——
237 多一点随便。

本研究试图去了解与离开军队有关的身份重构过程。从转录内容来看,我们了解到军队社会化过程意味着退伍士兵可能被给予了在平民生活中有点多余的技能

和行为举止方式，或者以他们还在军队时的方式被尊重。不过，从这两份转录内容来看，退伍人员似乎仍然坚持这些方式的价值并且不愿放弃。

在此，我们可以增加更多的因素和内容到分析中去。经由对编码和类目的审查，对轴编码的思考以及对资料更多的置疑，在获得更多见解的同时出现了更多的问题。退役人员如何处理这些冲突？是设法进行改变吗？上面的摘录显示布莱恩不得不改变他的行为举止方式以变得更能被平民所接受。在他的陈述中也很清楚，他和其他退役人员一起度过了许多工作时间。这有没有让他的转换过程更容易实现？这有没有让他的转换过程比大卫更容易实现？这两个人都不情愿离开军队，这有没有对解释造成差别？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selective coding)是分析的最后步骤，其目的在于把编码和类目结合在一起，从而创设一个能够运用于所有的陈述并且也可以解释冲突性资料的全局性理论或解释。当某一类目以较高频率被提及并且很好地与其他类目连接起来时，采用这一类目作为核心类目(core category)就是恰当的了。核心类目接下来将充当研究的思路线索或提纲叙述从而整合突现理论(emerging theory)的所有方面。那些曾经被研究对象作为象征及标志展现出来的观点，将会在这个解释性的核心概念范围内重新清晰地展现出来。

考虑到本练习中有限的可用资料，对于我们来说为这一研究得出任何结论，或者报告其研究结果，或者确实地采用某个核心类目明显是不可能的。不过，出于练习的目的，我们主张是否可以考虑把“一旦曾为士兵，永不再为平民”作为具有发展为突现理论潜在可能的“操作性假设(working hypothesis)”。从资料出发，看起来明显如此，尽管这些研究对象已经离开了军队并且从技术上讲已经是平民身份，但他们曾经被社会化为军队的生存和思维方式，已经不能够完全地回归平民生活。他们认为自己不同于平民、不复为士兵，但他们此时是退役士兵而非平民。正如早先所说明的，我们仅关注和选取一个编码类别，所以这必然只是一个早期的和尝试性质的推测，并且其也应该被如此对待。 96

接下来是什么

为了检验操作性假设或主张，我们需要将其运用于更多的资料。这是理论取样的步骤。在此步骤，按照为我们的研究问题提供线索的能力选取研究对象，从而了解我们正在建立的理论在额外的陈述内容范围内对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行解释的作用大小。

潜在的核心类目“一旦曾为士兵，永不再为平民”在此时应该以其他的退役人员进行检验，以了解他们是否如同布莱恩和大卫一样的感受。对更多研究对象的访谈，将会使得我们考察向平民生活的转换过程是否在方式上有所不同。在工作实践方面，其他退役士兵相比较而言是否更为顺利？不同性别、军衔、比前两名研究对象或长或短的服务期限的研究对象是否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服役期的长度有没有在

向平民生活转换的便利方面造成差异？是否所有的退役人员都怀念布莱恩和大卫报告的作为军队生活一部分的社会生活？对此，他们是如何应对的？他们有没有全都在维持着与军队的某些连接？在此步骤，我们所要寻求的是确证性尤其是反证性个案，以便于检验正在建立的理论的局限性。

应该以新资料检验突现理论，直到达到“信息饱和”。这时，我们并不是让那些已经确定的问题或话题重复被提出。当已经突现的理论能够完全解释资料所有的变化形式时，信息饱和也就达到了。什么时候会发生信息饱和是不可预测的，因为每个扎根理论在这一过程上，在突现理论的识别以及足以使这种情况发生所要求的研究对象数目等方面，都是独特的。

扎根理论的优势和弱势

扎根理论是资料驱动的，这赋予研究者自由，使其可以经过对实证材料完全而系统的考察来建立他们的理论。经由对产生复杂社会行为的社会过程的探究，这种方法有助于认识复杂的社会行为及其意义。这使扎根理论尤其适用于那些情况——对主题所知甚少或较熟悉但需要新方法的领域等(Holloway,1997)。重要的是，扎根理论有其自身严谨的来源。对突现理论的反证证据的持续搜寻会一直存在。由资料所驱动的方式，最后形成的理论能与提供情境良好地“拟合(fit)”，也对研究所涉及的对象是有意义的。

不过扎根理论并不是质性研究中最直接的方法，也不应该轻易采用。因为从编码到类目化资料都是零碎的，研究者可能会冒对研究对象所表达内容失去整体性认识的风险。这是一种要求其中各过程重复和系统记录的方法，也要求一定的想象力和领悟(Silverman,1993;Strauss and Corbin,1990)。最重要的是，扎根理论的迭代特性使其成为一种没有可预测终止点的、时间消耗性研究方法。在这学术研究的竞争性环境中，撰写成功的研究计划书并且及时地完成研究项目是至关重要的。扎根理论在事先提供样本突出细节、估算成本、获取伦理审批及预估研究持续时间等方面，可能会出现疑难问题。

小结

这个练习性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我们可用资料和信息的限制，而且也受时间和篇幅的限制。我们试图演示的是观念突现方式——通过沉浸于资料的内容及其语境、经过编码和类目化，以及经过反复检验。扎根理论的关键是持续性比较。资料与资料比较直到理论突现，并且正是这种理论突现决定了后续研究对象的选取和招募。扎根理论是一种系统性探究的方法。我们强调记录下所有观念、编码、意义、类目和不一致的重要性，以此来保证贯穿于始于研究启动、结束于最终理论的“决策路线”的严谨性和有效性。

7

话语分析*

阿德里安·考利

本章对话语分析法进行了说明，既介绍了该方法的实用性，也介绍了该方法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我们注意了介绍话语分析法的多样性，讲解了该方法适用的资料类型及其可以处理什么样的资料。本章以小组访谈所获得的一个摘录片断为例，分析了如何采用话语分析法处理资料。

关键术语

行为指向(action orientation)
福柯式话语分析(Foucauldian discourse analysis)
批判性话语心理学(critical discursive psychology)
定位(positioning)
话语心理学(discursive psychology)
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t)
多样性(variability)
编码(coding)
功能(functions)
文本(texts)
话语(discourses)
认识论(epistemology)

* 本研究得到了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的资助(资助编号:L145251005)。

话语分析自20世纪80年代末正式引入到英国社会心理学中以来，在理论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它不仅对社会心理学，甚至对整个心理学学科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采用话语分析法进行的研究也出现在健康心理学、咨询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等诸类内容的杂志上。然而，尽管话语分析受到了心理学界的欢迎，但其使用方法却缺乏明确的规定。其实，这个问题的出现不足为怪，因为话语分析之所以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的影响。后结构主义者认为事物的意义是动态的、临时性的、由具体情景所决定的，而不是静态的，这种思想不仅影响到如何采用话语分析对质性资料进行处理，也对如何理解话语分析的意义本身产生着影响。一些基于不同假设、不同研究目的的研究也在使用“话语分析”一词，这使我们在概括话语分析的共同点时遇到了困难。除非我们从最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话语分析，否则的话，难以对不同领域中所使用的话语分析进行面面俱到的讲解。

波特和韦瑟雷尔（Potter and Wetherell）于1987年出版的《话语与社会心理学：超越态度与行为》一书，将话语分析法介绍到了英国心理学界，并敦促运用话语分析法对社会心理学界传统的研究问题进行重新整理。长期以来，社会心理学家的工作是与言语材料、文本材料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言语、文本材料是从访谈中获得的口头回答，或者根据问卷题项作出的书面回答。这样一来，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研究中，这些言语和书面材料应该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通常情况下，大家都假定语言是一种中性的、直接的媒介，能够或多或少以一种直接的、准确的方式对事件进行描述，或对内隐的心理过程进行揭示。当然，由于这些言语或书面材料是采用自我陈述方式获得的，可能存在一些回答偏向，但研究者通常假定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精致化获取资料的方式加以消除，至少可以减少。采用话语分析法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了解言语和文本资料的本质及其功能的方式。

研究假设、方法和应用

在心理学中运用话语分析法时，通常认为语言不仅能对心理和社会现实进行反映，而且也能够对现实进行建构。只有采用适当的科学方法，我们才能够发现现实中存在的真相。以话语（discourses）形式出现的语言，被看作是建构“社会现实”的砖块。话语分析侧重的是分析语言如何建构社会现实，以更好地了解社会生活及社会互动（Potter and Wetherell，1987：7）。

从对话语分析的上述介绍可以看出，话语分析可以归类到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t）方法中（尽管在不同的话语研究方法中，其具体含义可能有所差异）。社会建构主义代表了话语分析法的哲学认识论（epistemology）——对于知识的基础或可能性的核心假设（要想更多地了解认识论，请参见本书第2章）。广义上而言，对于那些我们想当然的认识世界和了解自我的方式，社会建构主义采取了一种批判的姿态。例如，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我们用于揭示周围世界的范畴观念与客观世界中的真实实体是相对应的（Burr，2003）。这种认识事物的方式是通过社会化过程，特别是通过语言的交互作用发展起来的，因此，这种认识方式是具有文化和历史情境性的（实例见专栏7.1）。

专栏7.1 语言对性别取向分类的建构

在谈论性别取向时,我们会想当然地认为性别取向包括"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同性恋"等范畴。我们很容易忘记,其实直到18世纪,人们才开始将那些对同性个体表现出性爱偏好的个体界定为同性恋。在这以前,尽管也出现了一些词语描述同性别个体之间的性行为,但这些词语并没有细致到对具体某个个体的性取向进行归类。并且,社会对这些性行为进行归类的方式是受到当时文化环境制约的,也是对文化的一种反映。例如,直到19世纪中期,受当时采用医学模式看待男女同性问题的影响,"同性恋"一词才开始出现。而另外的一些词语(如"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则分别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受当时同性恋解放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影响,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出现的(欲详细了解"男女同性恋"社会建构方面的知识,请参见Plummer,1981)。随着"同性恋理论(queer theory)"中后现代潮流的出现,"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概念又受到了批判(Sedgwick,1990;Simpson,1996)。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那些看似平常的表征世界的词汇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受到所处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

话语分析核心的理论之一,就是强调语言是建构社会现实的工具。该理论假定,通过运用语言,个体对事件进行建构,尽管这种建构事件的方式有时是以一种无意的方式进行的。语言使用者本人可能无法表达出他建构事件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对事件进行建构。话语分析强调语言的建构功能是社会生活中基本的、显而易见的一个方面。

话语分析并不是将语言作为理解个体心理世界和社会世界的一种手段。正如伯曼和帕克(Burman and Parker,1993a:1)所提出的:"心理现象具有公共的、共同的现实性,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这种共同性的话,我们就错了。"话语分析关注的是这种通过语言建构起来的"公共的、共同的现实性"。话语分析考察的是人们运用语言建构其世界的方式,以及从这些建构起来的事实中我们能够发现什么。

要明确界定何为话语有些困难,这是因为,尽管话语在总体上被认为是存在于口语或书面材料中的、语言运用的一系列模式,但它的定义却存在多样性。要了解这些定义的共性,就有必要对有关话语的各种定义和相关概念加以考察。帕克(Parker ,1992:5)将话语定义为"建构某一事物的陈述系统",强调话语具有潜在的建构功能。在波特和韦瑟雷尔(Potter and Wetherell,1987)的经典著作中,他们更倾向于将相关概念称作是"解释语库(interpretative repertires)",而不是话语,因为在他们看来,"语库"更能反映出言语成分整合在一起的灵活性。他们将这些"解释语库"看作是一种语言现象:它们在内容和类型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能够组合成一个或几个反映中心内容的隐喻结构。同样,伯尔(Burr,2003:202)将话语定义为"一系列有系统性的、一致性的、以某种方式对事物进行建构的比喻"。我们难以罗列所有的定义,但是,结合这几个定义和相关概念,我们可以将话语定义为:在内容和组织上具有一定一致性的、能够在宽泛的社会背景下发挥建构功能的一系列言语材料。个体可能会运用不同的话语、以不同的方式来建构任何客体、人物、事件或是情境。

101

通过对文本(texts)进行分析,可以确定话语分析的内容。所有以口语或书面形式呈现的材料(以及其他有意义的实践活动的产物)都可以被概念化为文本,都可

以进行话语分析，这类似于在传统科学范式下，几乎所有事物都可以被当作数据进行分析。的确，后建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Derrida,1976:58）提出："任何事物都可以被包括在文本中。"他认为每个事物都是某个有意义情境的构成成分。这样，我们就要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话语分析家是否认为在文本之外存在一个真实的世界？我们将对这个问题作简要的探讨。

话语分析假设语言材料具有一种行为指向（action orientation），认为语言可以执行一些社会功能，如对某个事件进行证实、提出质疑以及对某个问题进行责难等功能。语言的这些功能可以通过运用一些修辞策略来完成。话语分析的主要任务就是辨别语言在文本中所发挥的具体功能：考察语言是如何完成这些功能的，分析完成这些功能需要哪些资源，等等。这就要求话语分析者必须对文本进行仔细的检查。在检查过程中，话语分析者关心的是访谈的细节内容，他们倾向于采用会话分析法（conversation analysis）（Atkinson and Heritage,1984）对文本进行微观层面的分析，考察文本的修辞功能。尽管如此，总体而言，话语分析关注的更多的是谈话在社会组织方面的功能，而不是谈话的语言组织功能。此时，研究者要分析文本中包含 102 了哪些具有共性的话语，文本中的语言材料对哪些事件进行了建构，而不是注意谈话中言语者说话的方式及这种说话方式所发挥的功能等细节内容。

进一步对上述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一种是从微观层面注意文本中的修辞细节，一种是关注文本中话语的社会功能）加以考察，回顾我们在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我们应该会注意到，在英国心理学界，话语分析法存在两种取向，其中一种被称作话语心理学（discursive psychology）研究法，该方法将语言看作是社会指向的一种形式，强调谈话所具有的社会性功能以及完成这种社会性功能的方式。这种方法尤其注意说话者如何对事实进行陈述和描述，也有研究者将这种叙述或描述解释为是对内部心理现实或外部社会现实的直接表征。最近，该方法也开始关注日常情境（例如，Wiggins,2004）及某些体制背景（例如，Hepburn and Wiggins,2005）下语言之间的相互作用。话语心理学与乔纳森·波特和德雷克·爱德华兹（例如，Edwards and Potter,1992;Potter,1996）的作品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采用该研究方法的研究者完全站在社会建构主义的立场上，他们不必否认某一材料事实的存在，但也不认为这种材料事实可以通过语言反映出来，同时他们也质疑可否通过直接的方式来获得这种材料事实。

持不同研究取向的研究者认为，上述话语心理学研究方法受到了政治性因素的影响。这些研究者更关心的问题是身份、自我、意识形态、权力关系和社会变化。这些研究者的研究取向被称作福柯式话语分析（Foucauldian discourse analysis）法，之所以如此称呼，是由于该研究方法受到了哲学家福柯作品的影响。采用福柯式话语分析法的研究者将世界看作是一个结构层次的现实体，他们常从权力关系的角度来描述世界，这种权力关系是我们认识和谈论世界的基础（Burr,2003）。福柯式话语分析法认为话语能够"促进和限制、帮助和阻碍说话的内容、说话的人、说话的地点和说话的时间"（Willig,2001:107）。因此，那些与现存社会结构及其相关权力关系具有一致性（或是有助于维持这种现存社会结构及相关权力关系）的社会现实，成了话语分析研究的主体内容。话语分析者会研究某一文化下话语资源的可及性，并发掘其对生活于其中的个体所带来的影响。这种话语分析形式与帕克、伯曼和霍洛

韦的著作有着最为紧密的联系(例如,Burman,1992,1995;Burman and Parker,1993b;Hollway,1989;Parker,1992;Parker et al,1995)。

我们可以看出,尽管福柯式话语分析也像话语心理学研究法一样,强调语言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作用,但两者也存在区别。福柯式话语分析法认为,语言能够表征独立于语言之外的一些事物。帕克(Parker,1992)认为语言对客观事物的表征与客观事物本身在地位上是不同的。有些客观事物可以独立于思维和语言而存在,这些客观事物是思维产生的基础(如我们的大脑和身体),个体可以围绕这些客观事物而组织自己的思维(如环境中的物理的和组织的属性)。但是,我们并没有有关这些客观事物的直接知识,因为思维是一个建构和解释的过程。其他一些客体是通过语言来建构的,但是语言对这些客体的表征却被当作具有持久性的实体来看待。

103

福柯式话语分析与话语分析研究存在联系的一个特征就是定位(positioning)。定位的概念来自布朗温·戴维斯和罗马·哈雷(Bronwyn Davies and Rom Harré,1990)的作品,指的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身份概念进行解释。当我们通过话语对某个人进行建构时,这个人在话语中会处在某个具体的主体位置上,他在谈话中的回答和反应是与该位置相一致的。例如,在一个医疗谈话中,生病的人会被置身于病人的主体位置上,他要被动地接受处在"医疗专家"位置上的个体的治疗。个体会对他所处的位置作出反应——个体可以接受他所被赋予的位置(履行身处此位置应尽的义务),也可以对被赋予的某个位置作出拒绝。当然,说话者也可以将自己置身于某个位置上,而作为听众的个体也可以拒绝接受该说话者对自己的定位。在谈话中,个体对自己的定位可以是持久的,也可以是暂时性的。正如戴维斯和哈雷(Davies and Harré,1999:35)提出的:"一个人是谁……,这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答案要依赖于谈话者自身所处的实际情境,因此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有的福柯式话语分析者应用某些心理分析理论,在分析中引入"被动机驱动的、具有主动性的个人"这样一个观念——该个体可以对自己的环境产生影响(Frosh et al.,2003;Parker,1997)。至于是否有必要在话语分析中运用心理分析理论来对自我和主观性进行分析,目前仍然存在争议。

我们上面讲述了话语分析法中存在的两种研究取向,如今又有研究者提出了第三种研究取向,称为批判话语心理学(critical discursive psychology)。该研究取向试图将话语心理学和福柯式话语分析法加以整合。玛格利特·韦瑟雷尔(Margaret Wetherell)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中对此研究方法的使用原则进行了详细说明,他同奈杰尔·伊德理合作的一项有关男性特征的研究中也运用了该方法(Edley and Wetherell,1999)。本书附录2中的分析报告就是采用批判话语心理学研究方法进行的。

现在我们看看话语分析法适用于何种类型的研究。尽管在很多研究中大家都在运用话语分析法,但话语分析法只适合于解释某些特定的问题。话语分析法更适合研究构念、修辞、意识形态和行为方面的问题(见专栏7.2),而心理学中的很多研究则更多地是考察某个心理结构的影响因素和后果变量,这些类型的问题并不适合采用话语分析研究法。由于话语分析法所具有的批判性和分析性,那些想要赋予心理学激进性、政治性特征的研究者更热衷于采用话语分析研究法。一些研究者运用话语分析法研究统治和压迫的社会关系,或一些经常受到忽视的、与压迫相关的问题。话语分析也可用于说明同样的事件可以用替代性话语作出建构。但是,我们必

104

须承认代替压迫话语(oppressive discourses)是一个复杂、长期的过程,我们无法充满自信地预测话语变化可能带来的社会启示。

话语分析所具有的批判性、分析性可以抵消一些研究者对它的批判。有些研究者认为话语分析脱离真实生活,难以对实际生活产生真正的影响(Abraham and Hampson,1996)。考虑到语言(被组织成话语)对个体的经历和行为方式产生的巨大影响(Bruman and Parker,1993a,1:初始的强调),话语分析确实对实践的潜在影响很大。卡拉·威利格(Carla Willig,1999)的作品《应用话语分析》中指出,话语分析法可以为一些心理和社会问题(如吸烟、性教育和心理治疗等方面的一些问题)提供干预措施。

专栏7.2 话语分析研究的问题

波特(Potter,2003)指出了话语分析研究关注的四类问题:

- 在某一特定情景下,如何运用语言对特定行为和实践活动进行描述。例如,巴恩斯等(Barnes et al.,2004)分析了人们就旅行者踩踏田园等问题写给参议会官员的信件,通过这些信件研究者考察了人们是如何维护自己权力的,同时也对该事件的结果进行了叙述。
- 如何对某些事件进行建构,以使这些事件看上去更真实、客观;或者那些看上去真实的叙述是如何被改变的。例如,沃尔沃克和狄克逊(Wallwork and Dixon,2004)考察了英国那些对打猎持赞成意见的报纸和刊物是如何将猎狐活动建构为一个全国性事件的。
- 心理学的实践:包括运用话语分析的术语对心理学概念进行重塑。例如,哈珀(Harper,1984)考察了心理健康专家利用某些资源对偏执狂概念进行建构和辨别的问题。
- 宣传、偏见和意识形态:包括考察对种族偏见、性别偏见、憎恶同性恋及其他压制性问题是以何种方式表达、开释或支持的。例如,韦瑟雷尔和波特(Wetherell and Potter,1992)研究了新西兰的种族主义语言及其在实际中的使用,弗贝特(Forbat,2005)研究了非正式照顾关系中的照顾和虐待问题。

105

话语的取样

要进行话语分析,必须获得包含话语的文本。这些文本的形式多样化,话语心理学中最受欢迎的,是自然情况下形成的文本。针对研究问题进行的访谈转录文本(最好是小组聚焦访谈),或是在某一话题上的摘录在其他话语研究取向中也是可以接受的。准确的转录是一个费时的过程,尤其是转录者想把说话者的停顿语(如"嗯"、"呃")也包括进来且考虑停顿时间的长短时更是如此。罗宾·伍菲特(Wooffitt,2001:38)认为:"尽可能地将转录内容细致化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尽管如此,这种细致化的分析取向在话语分析中仍较为少见,但会话分析中则会相对多些。

传统的心理学研究范式强调样本的代表性。在话语分析中,如果分析的资料来源于访谈,就没有必要对大量个体进行取样访谈;如果资料来源于报纸对某个事件的报道,那么在资料分析时,也没有必要把所有该事件的相关报道全部收集。相对

于结构化的资料而言，质性资料的分析工作更花时间，因此研究者必须认识到，如果取样很大，那么得到的可能是一大堆缺乏结构的、难以进行分析的资料，倘若如此，研究者只有对资料进行筛选，减少资料量。那么研究者到底应该获取多大量的文本呢？答案是，只要能从这些样本中辨别出那些常用的、与研究问题相关的话语形式即可。因此，研究者只需对相对较少的访谈进行分析转录即可完成这项工作，特别是在有些情况下，研究者已经考虑到了某些话语形式，此时如果再进行大样本的资料搜集工作，对分析结果而言并无多大帮助。只有在研究者进行的是纯粹探索性研究，事先对研究问题了解不多，无法知晓分析重点的情况下，才会进行大样本资料分析。

话语分析的技术

话语分析的基本原则较为容易阐述，但若要清晰地说明如何具体地进行话语分析，则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因为没有一套严格的规则来对话语分析工作进行指导。研究者认为，进行话语分析最重要的是具备话语分析的相关知识，具备对问题进行分析的能力(Billig,1988)。话语分析的重点是对文本进行仔细阅读，并以文本中的语言为依据对文本作出解释。进行话语分析时，首先需要注意的就是避免对文本中的语言作出想当然的解释(Potter and Wetherell,1987)，这就要求话语分析者不能将语言看作是对潜在心理和社会现实的简单反映，研究者应该认识到语言的功能是对事件进行建构并证明其合理性。由于这种观点不同于与我们平时对语言的看法，因此要记住这一点并不容易。任何一位初次进行话语分析的人都要做好在这方面犯错的心理准备，初学者很容易认为文本中的语言是对现实的直接反映，并据此对文本作出解释。因此，初学者需要有一位经验丰富的话语分析专家对其可能的错误作出辨别、监督，直到他能够以社会建构的观点来解释文本中的语言为止。

106

一些话语分析家不愿为话语分析法制订太多规则和程序，但我们必须承认，对一个话语分析的新手而言，由于他缺乏进行话语分析工作的信心，所以为他提供详细的分析步骤和技术规则是有帮助的。鉴于此，波特和韦瑟雷尔(Ptter and Wetherell,1987)尝试性地提出了一些进行话语分析的建议，称为十阶段法，其中的第二个阶段涉及的就是分析过程；威利格(Willig,2001)为福柯式话语分析法提出了一个六阶段分析法。在波特和韦瑟雷尔提出的十阶段分析法中，首先要对文本进行编码(coding)，此时要对文本进行仔细考察。当资料量较大时，可以采用适当的软件对文本进行组织和编码(如 Nvivo 软件)(Richards,2000)。如果对研究的焦点问题事先有所了解，要将那些内隐的、同研究焦点问题可能存在相关的语言找出来，保证编码范围的广泛性，防止丢失那些看起来不明显但实际上有研究价值的资料。波特和韦瑟雷尔提出的编码阶段类似于威利格六阶段法中的“话语建构阶段”。在话语建构阶段，研究者要识别出说话者对话语客体(即研究问题的焦点)进行建构的方式。如果研究者事先没有确定好研究问题的焦点，编码过程会变得更为复杂。此时，需要对文本进行反复阅读，分析文本中反复出现的话语模式，这就是威利格(Willig,2001)六阶段法中的第二个阶段，称为话语阶段。在话语阶段，研究者要找

出话语建构出现在哪些话语中。威利格(Willig,2001:110)以一位丈夫患有癌症的妇女的访谈为例,对该阶段的工作进行了说明。在谈论病情的诊断和治疗时,这位妇女可能会采用生物医学话语;当试图了解病情的进展状况时,她可能会应用心理话语;当谈论如何与丈夫共同与疾病做斗争时,她可能会应用带有浪漫色彩的话语。在这个分析阶段,分析者就哪些话语可能出现在文本中不断地形成假设,如果作出的假设在文本中找不到依据,分析者则要不断对自己的假设作出修正、摈弃,因此这是一个令人头疼的过程。研究者必须对文本的分析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对那些文本不支持的假设要予以拒绝。

107

无论是在波特和韦瑟雷尔(Potter and Wetherell,1987)提出的十阶段分析法中,还是在威利格(Willig,2001)提出的六阶段分析法中,在完成上述阶段的工作后,下一个阶段都要对文本进行阅读,同时思考文本可能发挥的功能。任何一个文本都有自己的行为指向,都是用于执行某个特定功能(functions)的。所以,在此阶段中,分析者要搞清楚文本在执行何种功能以及是如何完成这种功能的。话语分析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对语言的目的及语言可能起到的作用进行假设。然而,认识话语分析中语言的功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语言的功能并不是以外显的形式来呈现的。例如,当某个人要求你做一件事情时,他可能并不是以命令的口吻来要求你("弄点马铃薯饼加炒鸡蛋当早餐"),而是以另外的一种口吻来要求你("你有没有说过弄点马铃薯饼加炒鸡蛋当早餐?"),当然他所期望的回答是"是"。

研究者要想发现语言的功能,可以在阅读文本时注意思考这些语言是支持事件的哪个观点的。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可以有多种描述方式或多种观点。要说服别人认同某个观点,说话者必须通过语言,运用有利于支撑其观点的方式来对事件进行描述。这种事情在很多情况下都会发生。例如,在法庭上,被告方和控告方会就某个事件提出各自的观点,并通过对事件采取不同的描述方式来说服陪审团接受自己的观点,使自己对事件的论述战胜对方的论述。说话者对某个事件所持的观点有时在文本中是以外显的方式出现的,但在有些情况下却是内隐在文本当中的。如果分析者对事件的不同版本比较敏感的话,他们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分析出文本语言所扮演的功能和角色。

在分析语言的功能时,一个有效的方法是对以往话语分析和会话分析的文献进行阅读,熟悉里面所描述的话语所具有的各种不同特征——语言的这些不同特征通常在文本中起到某个特定的修辞功能。因此,如果分析者能够辨别出这些特征,他们就可以在分析文本时认清这些具有不同特征的语言所起到的作用。例如,使用词语"总是"、"从不"、"没人"、"每个人"时,可能代表了一种极端情况(Pomerantz,1986):说话者为了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于是对自己所持的观点表现出一种极端的态度。读者如果想对话语分析的这些语言特点加以熟悉的话,可以参考波特(Potter,1996)的作品,他在其中概括了大量的话语分析中的语言特点,但是最为有效的方法,则是对那些使用话语分析和会话分析的研究进行分析。

根据波特和韦瑟雷尔(Potter and Wetherell,1987)的建议,阐明话语功能的方法之一是对话语中出现的各种变化性进行研究。话语的易变性是一个常识性的事实。如果我们对不同人针对同一事物所描述的话语进行分析,可能就会想到,不同的个体由于对事物的评价不同,有些是正性评价,有些是负性评价,那么他们对同一事物

108

进行描述的话语也会有所差异。即使是对同一个人的话语进行分析,我们也会发现,同一个人对同一事物的描述也会出现变化,这要取决于说话者想通过语言来表达什么目的。目的不同,阐述该事物的话语就不同。确实,哈珀(Harper,1994)的研究发现,心理健康专家在谈论"偏执狂"的诊断时,就出现了上述的话语变化性(见专栏7.2)。研究者认为,为了寻求个体内部的一致性,现代心理学的主流研究方法都注重减少个体内部的差异性,或是在出现差异时能够提供相应的解释(Potter and Wetherell,1987)。而话语分析研究方法恰好与这种主流心理学的研究取向相反,它所要寻求的是个体内部出现的差异性。由于话语要实现的功能不同,话语的差异性就出现了,因此这种差异可以为我们认清话语的功能提供线索。因而,话语分析的过程既包括寻求一致性,也包括寻求隐含在话语之中的变异性。

在威利格(Willig,2001)提出的六阶段福柯式话语分析法中,她认为,在对话语的行为指向进行分析后,接下来要进行另外三个阶段的工作。其中首先进行的是对话语中出现的主观立场(subjective position)进行分析。当然,对话语中主观立场的分析也可以是文本的行为指向分析的一部分,因为文本具有分配(assign)或抵制某个主观立场的功能。威利格话语分析的"实践"阶段最能体现福柯式话语分析法的特点。在这个阶段中,分析者要探索话语建构和与之相关的主观立场如何开始或拒绝各种行为的可能性。不同的话语和主观立场预示了说话者可能要说什么或可能要做什么。例如,威利格(Willig,1995)发现不采取保护措施的性活动是与婚姻话题联系在一起的:在婚姻话题中,婚姻生活和平等关系(如"长久关系")被认为是与使用避孕套存在矛盾的。同样的现象也可以在弗劳尔等(Flowers et. al.,1997)关于同性恋男性之间无保护性活动(尽管这不是一个话语分析研究)的研究中找到,在该研究中,研究对象从分享亲密和隐私的话题角度来建构无保护措施的性活动,因此这种话语是在试图说明无保护性活动的合理性。威利格阐述的福柯式话语分析法的最后一个阶段被称作"主体性"阶段,分析者在该阶段要考虑在接纳了各种主观立场后可能会给个体的主观感受——个体的想法和感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然而,严格的社会建构观点认为"想法"和"感受"是在文化内部生成的一些观念,它们用于调节个体的人际关系,让个体能够参与到社会生活当中。这样一来,一些话语分析家就会对"主体性"阶段的前提提出质疑。在本书第8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何应用威利格的阶段分析法对附录1中的资料进行分析。

在完成对话语分析法分析策略的叙述前,我们应该注意话语分析法在处理一些非言语或非书面形式的资料时,所存在的一个难以克服的局限。由于图片或其他可视的图像可以被当作文本来看待并加以分析——特别是如果在一个分析中要融入被访谈者的手势、面部表情及类似的非言语资料,所以要将其同言语资料放在同样的地位上来进行分析,这就变得更加困难了。在过去,由于考虑到将这些资料进行转换以及将这些非言语资料的细微差距印刷在期刊杂志或书本上所存在的困难,研究者可能缺乏足够的动机去发展分析此种资料的策略。随着在线杂志的发展和数码技术的提高,现在已经可以将这些从访谈或实际生活情境中获得的资料附在研究中。我们希望这种技术上的发展,可以促使研究者发展出更为高级的分析这些资料的方法,在需要时,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些非言语资料的分析来辅佐我们对言语资料所作出的解释。

109

资料的处理

在本部分中,我们将探讨如何在实践中使用话语分析法。这里我列举了一个我与沃尔顿(第8章的作者)在资料收集和分析方面共同参与过的一项研究。该研究是探讨公众对一项新基因技术观点的研究的一部分,我们的目的在于了解公众对一项名为"基因移植诊断"(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PGD)的技术及与其相关的"拯救同胞"现象所持的观点,考察公众是如何谈论这项技术的可接受性的,以及他们是如何理解相关问题的。根据波特(Potter,2003)罗列的研究问题类型,我们的研究问题应该属于考察某一特定事件的建构方式类问题(见专栏7.2)。

PGD技术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应那些可能将自己存在的严重基因缺陷遗传给下一代人的要求而发展起来的。在这项技术中,采用试管婴儿技术培植出一些胚胎,然后对每个胚胎中的一个细胞进行检测,以确定该胚胎是否存在基因缺陷,之后那些健康的胚胎会被植入子宫中。在征询公众意见的一篇文章上,英国人类基因委员会(UK Human Genetics Commission,2004:13)谈到"PGD技术的使用不是不存在争议"。他们认为该技术可能存在的争议包括:采用PGD技术对存在某个生物组织类型的胚胎进行鉴别,选择胚胎细胞进行"拯救同胞"工作。"拯救同胞"指的是将这些选中的胚胎细胞植入子宫内产生出一个婴儿,这个婴儿能够提供匹配的生物组织,以治疗一个患有某种严重疾病(这种疾病不一定具有遗传性)的同胞兄妹的生命。这些细胞组织通过该新生婴儿的脐带或骨髓的血液获得。当然,在这个例子中,选择胚胎细胞的目的也在于找出那些不会对患病同胞兄妹产生影响的胚胎(如果这种基因缺陷不是遗传的)。在拯救同胞伦理问题相关的文献中,拯救同胞的想法受到了挑战,因为通过这项技术生成的婴儿会对其自身存在的价值产生质疑,认为他存在的价值更多是为了他们同胞的需要:他们变成了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Spriggs,2004)。

110

为考察公众对该问题的看法,我们在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6个地方进行了8次焦点小组访谈,接受访谈的公众人数为80人,这些研究对象都没有涉及与染色体相关问题的活动或是与资助相关的活动。我们在把小组访谈的结果进行转录后进行话语分析(使用NVivo软件进行了编码)发现,那些明显与PGD技术相关的资料被包含在公众对一些哲学性的问题和更为广泛的伦理问题的讨论之中。这些范围更为广泛的问题涉及"事物顺序"的存在,疾病和死亡在这个顺序中的位置,欲望满足和动机在决定某个行为是否可接受中所起的作用,等等。这个过程代表了初步的编码过程,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前面提到的"话语"阶段。

下面呈现的是我们对一段话所进行的话语分析,这段话能够体现出我们所获得的关于PGD技术和"拯救同胞"话题资料的几个主题。我们将这段话进行了复制(对这段以一种基本的方式进行了转录——唯一用到的符号是六个点,表示谈话中的短暂停顿)。

538 加比(Gabi):我思考过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事情,我从报纸上看到过相关的事情,

539 你知道,能够培植器官用来……救孩子,或者,你知道

540 不能要小孩的父母或不能生育的母亲,以及……寻求一些办法

541 来提取他们的 DNA,然后……然后生育出自己的孩子。我想我当时对这个事情感到很

542 高兴,直到他们谈到这种优先基因成型技术或是

543 从某些东西中能够,你知道,选择你将来的婴儿头发的颜色,

544 你知道的,能够选择将来的婴儿有多少根脚趾,你知道的,眼睛的颜色

545 能够选取基因的某些部分,当我认为"你选取了一些确实很好的东西培植出了婴

546 儿,你知道的,太可怕了"。

547 **乔斯林**(Jocelyn):这件事同时看上去也有点残忍,生另外一个孩子的目的仅仅是因为

548 这能够拯救前面出生的一个孩子。

549 **康纳**(Connor):当他长到 18、19、20 岁的时候,会对他产生什么样的心理影响呢?

550 **夕巴斯汀**(Sebastian):你的道德感会让你说"不",但作为父母,你会说"我不得不这样做……

551 我不得不救自己的孩子。"

552 **乔斯林**:是的。

553 **阿奇**(Archie):的确如此。法庭实际上……实际上会允许

554 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并且,是的,我能够看到你来自哪里,

555 那个将要被孕育的孩子……我的意思是,他们不会取下

556(被孕育的孩子)身体某一部分的器官或是任何……类似的东西。然而,是的,他

557 们会取出一些细胞,我是这样理解的。这些细胞,是的,是从胎盘中提取的,会被

558 用来……用来培植或用来……为他的哥哥提供移植的骨髓

559 此外,是的,这个年纪小些的孩子可能会在 20 年后从报纸上看到这些, 111

560 然后想:"天哪,他们实际上不想要我,他们只是,你知道的……"

561 **乔斯林**:……用了(我身体的)一点东西。

562 **阿奇**: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他可能会想,"好的……"。

563 **康纳**:"我救了我的哥哥"。

564 **阿奇**:……"我救了我哥哥的生命"。

565 **乔斯林**:是的,是的。

566 **阿奇**:最后这个问题是一个个人问题,我认为很难

567 推论到其他人身上。

568 **乔尔**(Joel):已经出生的……已经出生的同胞会那样做。互相帮助,如果

569 基因能够匹配的话。

570 **阿奇**:是的。

571 **乔尔**:但是,我认为,这正是得寸进尺的开端,不是吗?

在这段摘录中，我们可以从两个地方看到谈话者对 PGD 技术和拯救同胞这个事件进行了建构。在第 541—545 行中，加比在读到基因技术的进展时，将自己建构为对这个事情“感到很高兴”，直到“他们”开始讲到对基因进行优先选择。她对整个事情的描述可能与拯救同胞过程无关（“选取基因的某些部分”），但她对 PGD 的描述涉及对那些可能看上去比较微小的遗传特征的选择（如头发或眼睛的颜色），因此引发了一个关于“被设计出的婴儿”的话语或相关的阐释。在当时的关于 PGD 技术的报道中，这种话语或阐释是经常被提到的。这段话语建构了这样一个过程：允许父母选择那些具备某些特征的胚胎进行移植，产生出“高质量的”、专门定制的、被设计出的婴儿。在加比对她的想法进行建构时，转折点出现在当她了解到运用对胚胎的选择，可以设计出想要的一些微小的遗传特征时，她说“你选取了一些确实很好的东西培植出了婴儿，你知道的，太可怕了”。“确实很好”（当时认为很好）和“太可怕”（现在觉得可怕）之间的对比产生出了一种道德上的堕落感，而且采用一些具有强烈色彩的词语来建构这种前后的变化，并采用“太可怕”这个词来引发了弗兰肯斯泰因（指的是创造出毁灭创造者自身的事物）式的联想。

我们这里列举了一个“急剧下滑”式意见——这种修辞特点出现在本研究中所有与新基因技术相关的资料中。这个意见最初建构了一项新技术或一项被提议的技术，将在后来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有时没有具体说明该后果）。加比的“急剧下滑”的论证方式稍微不同于标准的“急剧下滑”式论点，因为她将这些有益的技术被引入歧途一事建构为已经发生的事情。将这项技术引入歧途的主体虽然没有具体指明，但可能包括那些设计 PGD 技术的、允许这件事情发生的研究团体。

在第 555—559 行中，阿奇对拯救同胞的建构不同于“官方正式的”介绍，因为她将其看作是“从胎盘中”提取细胞并把这些细胞“培植或用来……提供移植的骨髓”。这是对 PGD 技术和拯救同胞现象比较典型的看法，在对其他组所进行的访谈中也是如此，只是有些人建构的描述更为远离这件事的“官方正式的”描述。如果我们采用公众理解缺陷模型（该模型假设公众对科学和技术产生怀疑是由公众科学知识的缺乏造成的——见怀恩（Wynne，2006）的综述）来解释我们访谈所获得的资料的话，我们可能会认为公众对 PGD 技术和拯救同胞过程缺乏准确的理解。然而，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认为公众对此缺乏准确理解），我们就会忽视公众对 PGD 技术及拯救同胞过程的理解。在其他小组进行的访谈中，谈话者利用了部分医学和社会道德话语来谈论基因技术，对 PGD 技术和拯救同胞过程进行了复杂的建构。

112

我们看谈话者是如何谈论这些技术的可接受性的。乔斯林和康纳对拯救同胞这件事的反应（第 547—548 行，第 549 行）也体现了被访小组其他成员对这件事的评价——认为是否接受这项技术，要考虑到父母的要求和动机（因此孩子的父母变成了道德质询的对象），要考虑到这会给将要孕育的孩子所带来的潜在心理影响。对于后者的考虑，在第 559—565 行中再次出现，这里第一次明确地提到这个扮演拯救者的孩子的心理感受——感到父母不是为了要他而生下他，而是因为他能够提供某些东西。这种假设性的谈话使得这个观点看上去更具有“真实性”，因为他们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没有使用抽象的词语，而是通过假设一个扮演拯救者角色的孩子在 20 年以后的思考来说明这个问题（行为指向分析更适合应用到讲话模式中）。注

意，阿奇在第560行中这句想象出来的讲话并没有结束，而是变成了一个短暂的停顿，留给乔斯林在第561行中结束了这段话。这一点可以试探性地这样理解：阿奇的观点是，为了拯救自己的胞兄而被生出来，这一事件对于这位“拯救者”而言在价值感上所产生的影响实在是太可怕了。然而，在第562—564行中，阿奇和康纳又提出了一个有关积极影响的看法，并且又建构了一段假设性的语言，这个看法在第565行中也得到了乔斯林的赞同，即这位“拯救者”可能会感到他/她拯救了自己胞兄/姐的生命。考虑一下上述两个不同的看法和行为指向，阿奇提出了两种相反的可能性，我们可以认为阿奇在这次讨论中将自己放在了一个均衡贡献者(balanced contributor)的位置上，而不是只支持其中的某一个观点。这样做可以为他后面的话语增加可信性。

回到第550—551行，我们可以认为夕巴斯汀进行了两种观点的对比，一种观点是处在道德位置上(“你的道德感会让你说‘不’”)，一种观点是内隐的非道德角度的观点，因为第550行中的“但是”让后面的观点与前面外显的道德角度的观点形成了对比(“但作为父母你会说‘我不得不……我不得不救我的孩子’”)。但是，他对父母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的建构以及他所说的一段想象出来的话语，实际上把道德放在了首要位置——通过那段想象的话语，他给予了道德更多的重视。这里他将父母的主体性与普通公众的主体性建构为不同的两个概念，这些主体性成为衡量这项新技术是否可以被接受的基础——这一看法也是乔斯林和阿奇在第552—553行中所赞同的。因此，这些谈话者在对PGD技术和拯救同胞事件的评价上提出的观点带有内隐性和相对性。 113

回到资料摘录的结尾处，谈话者所提出的两难观点并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整个摘录游离在不同层面的争论上，没人能提出一个能够达成共识的观点。在摘录结尾的第566—567行，阿奇说：“最后这个问题是一个个人问题，我认为很难推论到其他人身上。”他承认他们的讨论不能够达成共识，因而将这项技术的可接受性降低到了个人层面。乔尔在第568—569行中，通过这项技术与目前已经存在的、潜在的为公众所接受的技术——也就是如果基因匹配时，个体可以向自己的同胞捐献自己身体的某部分(如骨髓)——进行了类推，降低了大家对于PGD技术的争论。在其他小组中也出现了各式各样类似的类推，建构了很多与拯救同胞类似的事件，认为利用这些技术可以最大限度地拯救生命。然而，在最后一行，乔尔提出了一个“急剧下滑”式的争论(“这正是得寸进尺的开端，不是吗?”)，于是又开始了新的争论。

在这篇简短的分析中，我想向读者说明的是一项基因技术在我们的资料中是如何被建构的，从而展示我们前面谈到的话语分析的一些技术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尤其是辨别语言发挥的功能)。若要了解其他话语分析技术的应用，读者应该参考话语分析期刊上的文章。类似这种针对单个摘录的分析，可以作为一部分出现在话语分析文章中。有些文章会呈现很多简短的资料摘录，对范围较广的一类事件作出阐释；另外有些文章可能会呈现较长篇幅的资料摘录，进行细致的分析，对分析的话题逐步展开分析叙述；有些文章是将上述两种方式加以结合。本书附录2中的报告3提供了一个如何详细撰写话语分析报告的例子。

对话语分析成果的评价

话语分析家经常被批判为“教访谈者如何说话”，将明显的、直观的言语行为进行不必要的复杂化。尽管如此，后建构主义学者认为语言的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他们注意到语言的使用方式会产生一些说话者自身都没有料想到的结果。例如，在波特和柯利（Potter and Collie，1989）对一段关于社区照顾政策谈话所进行的分析中，他们提出，采用“社区照顾（community care）”这一概念，可以引发出一段让人感到安心的社区生活方面的叙述，这段叙述会集中体现出邻里之间相互照顾、紧密联系和互相提供社会性支持的情境。对社区照顾政策持批评意见的人，会对这一分析结果产生怀疑，他们本想对社区照顾问题提出批评，却由于访谈者使用“社区照顾”一词而导致他们产生了一些同社区生活相关的积极联想，从而削弱了自己的主张。由于个体可能不会意识到他们的语言会产生这种影响，在涉及要求谈话者对分析结果作出评价时，研究者有时所主张的质性分析方法并不适合于话语分析。在我们所进行的这些分析中，有些聚焦访谈小组内的被访者可能会抗议“我的意思不是这样的”，但这并不会使分析变得无效。分析者专注于详细描述语言所造成的、出乎本意的一些结果，探索在不同的话语中语言的不同意义。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分析家可以随意对资料作出解释。为了保持话语分析的严谨性，必须有一套相应的标准对话语分析的结果进行评价。心理学研究的评价通常集中于是否对实验假设进行了验证，其关注的是研究的信度和效度。但是这种评价框架并不适合于对话语分析结果进行评价，因为话语分析是在处于传统的心理学研究方法之外的。采用信度和效度作为评价标准是建立在科学客观性的假设基础之上的，这种理论假设反过来又假定研究者和研究对象是相互独立的。但在话语分析中却不是这样一种情况。研究者在展示他人话语的随机性、社会建构性和修辞性本质时，其本人是不能游离于被分析的话语之外的。与那些话语受到分析的被访者一样，研究者要利用他们已有的、得到公认的语言资源，在自身意识形态框架的基础上，对分析文本进行有目的的阐释。在本章提供的分析中，一些因素如我作为心理学家所受到过的训练、我对研究话题有关知识的熟悉性、我“个人”对 PGD 技术的一些观点（当然，这些观点是通过社会化方式建构的，而非单纯个人的认识）都会对我分析所依赖的意识形态框架产生影响。承认这一点不会降低分析的价值，因为没有人能够做到无偏颇的、完全站在客观的位置上分析问题。这应当被看作是我们的研究不断前进过程中的一部分，通过这一过程我们的研究更加具有解释力、更加透明化、更易于被评价。

传统心理学研究方法使得心理学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产生了一道鸿沟，而话语分析的上述灵活性在这道鸿沟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这也使得话语分析不可能采用传统心理学的评价方法对其作出评判。亚德利（Yardley，2000）建议可以采用四项标准对质性研究进行评价，这四项标准分别是对情境的敏感性、承诺和严谨性、透明性和一致性、冲击力和重要性（详细介绍请参见第 2 章）。对这些评价标准稍作修改，可以用于帮助我们对话语分析成果作出评价。尽管如此，话语分析研究的报告方式潜在地为我们提供了最有力的评价手段。在对话语分析进行解释的同时，分析

者应该尽量呈现相关的话语文本，向读者展示自己作为研究者是如何根据文本对资料作出分析的。然后，由读者自己来判断这些解释是否具有可信性。分析者还可以提供其他版本的文本，通过辩论，可以使达成的解释更具说服力，更具一致性。这里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多数学术期刊要求投稿的研究报告中不能呈现大量的原始资料。然而，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话语分析研究者（及其他质性分析研究者）应该在他们的文章中提供一个可供读者获得原始资料的网址，以供读者进行检查，这应该成为一种标准的研究惯例。

小结

本章以对一部分资料摘录进行分析的过程为例，介绍了话语分析的相关原则以及话语分析在实践中的应用。我们希望读者了解如何应用话语分析，同时也希望读者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话语分析不能够仅仅被作为一种分析技术来看待。研究者应用话语分析技术进行研究时，要在研究中运用与社会相关的一些假设（尽管这些假设的本质会由于采用不同类型的话语分析技术而出现变化），并应确保这些研究假设与研究所处的背景（如，在文献分析中）、研究的问题、对问题进行的分析以及对问题的讨论一致起来。总之，我们可以这样说，话语分析对于那些在研究中缺乏决断力的研究者而言，可能不是一种好方法，但是对于那些能够对研究文本进行持续细致的分析、对社会生活不轻易持想当然看法的研究者而言，却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读者如果希望练习话语分析的技能，可以按照话语分析法中研究者提出的一个理念来进行：我们可以将话语分析报告看作是企图对某种社会现实进行描述的文本，我们对该文本本身也可以进行话语分析。这就意味着本章中我所呈现的资料摘录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文本，可以进行分析，甚至整个章节的内容都可以用来进行话语分析。

116

延伸阅读

波特和韦瑟雷尔所著的《话语和社会心理学：超越态度与行为》（Potter and Wetherell，1987）可读性强，内容广泛，非常适合对话语分析感兴趣的初学者。波特的《呈现现实：话语、修辞和社会建构》（Potter，1996）详细而全面地介绍了话语分析研究方法的历史、认识论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并穿插了一些具体的例子。若要了解英国其他主要的话语分析原则，可以阅读帕克所著的《话语动力学：社会心理学和个人心理学中的批判性分析》（Parker，1992）。韦瑟雷尔等合著的《话语理论、实践和资料分析》（Wetherell et. al.，2001a，2001b），对于话语分析法初学者而言也具有重要价值，该书详细介绍了不同心理学传统下的话语分析过程，提供了广泛的例子。威利格的《话语分析的应用：社会和心理干预》（Willig，1999）举例介绍了如何通过话语分析来为一系列广泛的实际问题提供干预措施，展示了话语分析法对于解决实际问题所起到的作用。

8

进行话语分析

克里斯·沃尔顿

本章介绍了如何运用福柯式话语分析法的原则对两名退伍军人关于服役时和退役后的生活进行访谈分析。本章在开始时首先辨别出话语分析的对象,然后讲述了如何进行话语分析,以及各个分析过程中得出的结果。我们同时考虑到,也可以通过向研究对象询问其他的问题,获得本研究需要的资料;另外在资料的转录上也可以运用其他的形式。我们同其他形式的话语分析进行了对比,并提出了与福柯式话语分析法相关的一些问题。

关键术语

行为指向(action orientation)
话语(discourses)
话语对象(discursive objects)
话语资源(discursive resources)
极端例子陈述(extreme case formulation)
定位(positioning)
实践(practice)
灵活性(reflexivity)
主体性(subjectivities)
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s)
排比(three-part list)

对军人的退役生活进行话语分析后，我们的研究团队认为，话语分析与其说是按照某种方法、步骤来对资料进行分析，不如说是研究者在对分析概念的应用上增强自己的信心，从理论一致性和认识论一致性两方面对分析结果进行报告。换句话说，进行话语分析对我们而言，增加了我们分析各种相关概念的熟悉程度和运用该方法的自如程度。最后，进行话语分析似乎与研究结果中相关分析概念（analytic conception）的适当呈现存在密切关系，正如我们在自己的分析工作中所做的那样。 118

读者看了我们前面介绍的话语分析方法后，可能想寻求一种按步骤进行的方式来进行话语分析。但是，在我们刚才对话语分析所做的反思性叙述中，体现出话语分析具有超越具体步骤的复杂性，这可能会让读者感到有些不安。不过，我们可以让心存顾虑的读者放心的是，本章我们会将向读者提供我们逐步进行话语分析的过程，同我们前面章节呈现的内容一致起来。本章开头我们所呈现的对话语分析方法的一些思考，主要是想向读者提供我们进行话语分析后最重要的心理感受，那就是反思性（reflexivity）在话语分析中是处在中心地位的。鉴于此，本章中我们在逐步讲述自己分析工作的同时，也向读者呈现我们在每个步骤中所产生的一些反思。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在这里呈现的是我们整个分析小组的分析工作以及所产生的反思，但同时这也是我本人对该事件的分析和反思，小组中的其他分析人员可能会以其他不同的方式来呈现分析过程，同时反思的侧重点可能也会存在差异。

下面我们以 12 位研究者在两天时间里（总共约 16 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对退役军人进行的访谈转录作为材料，进行话语分析（见本书附录 1）。为使本次话语分析在研究的焦点问题上能够与产生本资料的研究具有一致性，我们注意采取了一种能够直接将分析结果应用到实际生活中的分析形式，这种分析结果能够解决退役军人在向平民生活转变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考虑到福柯式话语分析可以让我们对主体性和在实践中的可能性进行讨论，我们最终选择了福柯式话语分析法（Willig，2001）。我们承认，在涉及实践和主体性时，我们必须对资料进行多层次的分析。无论是采用福柯式话语分析法，还是采用其他形式的话语分析法，我们都会遇到这个问题。例如，无论采用哪种形式的话语分析法，我们都必须要辨别出某些特定的话语对象被建构的方式，尽管在话语心理学方法（Edwards and Potter，1992）当中，集中考察谈话的行为指向是其主要特征，但在采用批判性话语心理学方法（Wetherell，1998）及其他形式的话语分析时（见 Burman and Parker，1993b；本书第 7 章），我们同样要对“话语”进行识别。因此，我们在对各个阶段的分析进行描述时，仍然考虑到了福柯式分析法之外的话语分析形式。尽管如此，我们是否真正做到了运用福柯式话语分析法对访谈转录进行分析仍是可争辩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本章的结尾我们会再次谈到。

研究的问题

在阅读两名退役军人访谈的转录资料前，作为一个研究团队，我们尽量会罗列出研究的兴趣点。我们试图使我们研究的兴趣点对后面的阅读和分析有所帮助。 119
鉴于我们要研究的是退役军人离开部队后的身份适应问题，我们从福柯式话语分析法的角度将问题界定为：

- 大卫和布莱恩是如何建构离开军队后的体验的？

● 他们是如何建构离开军队前和离开军队后的身份的?

我们认为,这两个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三个话语对象(discursive objects),而我们在初次对转录材料进行阅读时,应该注意这三个话语对象。这三个话语对象分别是"离开军队后的体验"、"军队身份"和"离开军队后的身份"。通过关注这三个话语对象,我们希望能够按照福柯式话语分析法的步骤来逐步进行分析。

专栏 8.1　其他可能的研究问题

研究者思考不同的分析问题时,可能会形成不同于上述两个问题的研究问题。例如,如果研究者更多地是对性别问题感兴趣,那么他的研究问题则可能是:

- 男性是如何建构离开军队后的生活的?
- 离开军队后的经历会如何影响到他的男子气概身份?

同样,如果研究者对组织方面的问题感兴趣,那么他可能会形成如下的研究问题:

- 个体是如何建构军队的组织文化的?
- 已经建构起来的军队组织文化会对个体离开军队后的经历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们在对材料进行了最初的阅读后发现,布莱恩和大卫谈话的主旨存在差异,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谈论自己离开军队后的体验。这种差异能够对我们最终的分析结果提供一些暗示——我们在本章将对分析结果加以呈现。在注意到他们之间存在的差异后,我们决定将布莱恩和大卫的访谈当作个案研究来处理。因此,我们在后面分析的各个阶段上,都会在两个被访谈者之间来回移动。对于只是分析两个文本而言,这种采用个案进行分析的方法无疑是一种有效的分析策略。小组内的其他研究者也认为,如果资料量较大的话,这种方法可能就难以奏效,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分析目标更有可能是资料整体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而不是单个个体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见附录 2 中报告 3 所提供的话语分析例子。同时读者也要注意,我们所呈现的仅仅是每个阶段上的部分分析内容,本章的目的只是为读者提供一个例子,而不是对整个访谈进行详细的分析。

120

专栏 8.2　转录的层次和分析的类型

我们获得的材料是已经转录过的访谈资料,因此我们无需解决转录材料的层次问题。同样,对于以文本材料(如杂志、报纸文章)作为分析材料的研究者而言,也不需要再进行转录。然而,对于相互作用式的资料(如访谈、聚集小组录音和自然情境录音)而言,转录的层次问题则非常重要。研究者是要进行详细层次上的转录,还是进行粗略水平上的转录,取决于研究者是对谈话的组织结构感兴趣,还是仅仅对谈话的内容感兴趣——转录的层次主要取决于要在哪个层面上进行分析。

例如,对分析会话的分析者而言,由于谈话的组织和层次是很重要的,因此他们在转录时大多会采用杰弗逊(Jefferson)开发的转录符号系统(Atkinson and Heritage,1984)。应用这种转录符号系统,研究者可以在转录的内容中包含音调的起伏、谈话者转换话题开始的具体位置和结束位置以及所有能够有助于理解说话者含意的内容,并在随后的分析中对上述内容进行分析。采用更为详细的符号系统,研究者不仅可以分析说话的内容,而且可以分析说话的方式及时间。但是,如果研究者

想采用福柯式话语分析法，他们就不用如此关注谈话微观层面的细节内容（像谈话中出现的暂停、话语的重叠），而是更关注宏观层面的特征（如话语），这些宏观特征在不是十分详细的转录中也可以得到辨认。无论你采取哪种水平的转录，一定要尽可能保持资料原有的内容。

然而，运用杰弗逊的符号系统对交互式材料进行转录，是非常耗时的：对一个小时的录音进行转录时，所要花费的时间在10~20个小时。这样一来，一些很实际的问题，如资料的数量、研究者能够支配的时间等，都会影响到转录的层次。

话语建构

在准备分析两位访谈者如何建构话语对象前，我们先将这些话语对象从分析材料中识别出来，并将研究团队分成两个小组来对材料进行分析，每个小组负责检查一项转录后的资料。完成这些工作后，我们要辨别三个话语对象被建构的方式。我们的研究兴趣不是将布莱恩和大卫作为个体来看待，也不是他们在现实中的经历。我们所关注的是他们在谈论或建构自己在服役中和退役后的身份时，所用到的词语或措词。他们对于自己退役后生活经历的建构，以及这些建构所扮演的功能将会在“行为指向”这一部分内容中得到分析处理。我们此时的任务是识别出这些话语资源（discursive resources），并尝试着去理解这些话语资源是如何被结合起来的。考虑到我们在分析中引用了“身份”这一术语，在对资料进行分析前，有必要搞清在话语分析方法中“身份”这一术语的概念，了解“身份”在话语分析中的概念内涵与传统心理学理论中的“身份”概念有何不同。例如，在社会身份理论中（Tajfel and Turner，1986），个人的身份，他/她进行思考、感知和行动的方式，是建立在他/她在某个社会群体中所处的相对稳定的位置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对一个人身份的认识可能来自于对他/她的一些了解，如他/她的性别、年龄、种族或性特征。相反，在话语分析法中，身份是具有高度动态性的，它既是一种社会建构，也是说话者在互动式谈话中进行思考的基础上所操纵和达成的一种社会化产物。在话语分析中，身份既被定位为谈话的主题（社会化建构），也被定位为谈话的效果（社会化成就）。在话语分析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讲话者利用话语资源（如讲话者自称所归属的群体、话语所提供的主体位置等）来建构“身份”。

121

军队身份

大卫　在大卫谈到他在部队的身份时，他用到了一系列范围广泛的话语建构，其中最明显的，是他从“团队的一员”（在第17—18行中重复出现）的角度来建构自己的军人身份。团队中的一员在道德上隐含着“对你的队友忠诚”（在第66—68中重复出现），同时从“我是一个司机，没有我们司机，就没人能得到他们的物资”（第28—29行），我们也可以潜在地推论，大卫认为不仅要对“队友”忠诚，而且对整个军队也是如此。大卫的军人身份，也通过运用某些群体分类来建构，如“司机”（第28行）、“中士”（第93行）和“士兵”（第321行）。这些群体分类处在后勤部及部队的层级结构中，拥有不同的权力和责任。

大卫在建构自己的军人身份时，也用到了其他一些话语建构，尽管这些话语建

构不是很明显，如强调具备自理的能力、强调整洁的重要性："我会做我的早餐，我会做我的正餐，我会缝纫，我会熨衣物，我会洗衣服"（第 208—210 行），"我喜欢东西有条理，我喜欢整齐包裹的东西"（第 238—239 行）以及"让你的文书工作有条
122 理"（第 245 行）。

布莱恩 在谈话中，布莱恩一直在以一种较为内隐的方式谈论自己的军人身份，以一种内隐的方式建构自己退役后与普通公众在工作上的不同。在这些对比之外，我们可以发现，布莱恩对自己认同的典型军人身份进行了建构。我们从他使用第一人称复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们似乎更灵活"（第 10 行），"我们在所有的时间都全力以赴"（第 15—16 行）。作为话语分析的初次使用者，我们发现上面引用的第二句话（第 15—16 行）中包含了"极端例子陈述（extreme case formulation）"（Pomerantz，1986）——这是一个增强叙述内容说服力的修辞方式，在这一例子中，该修辞法强调了军人或退役军人与普通公众个体在工作上的对比。

同大卫一样，我们注意到在布莱恩的谈话中，军队的等级结构看上去也在个体身份中处于中心位置，对评价个体的身份价值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通过这种等级结构来建构自己相关的社会身份："你在那里（军队）有一种身份，你的自我感觉良好"（第 287—288 行），"你有一个更为明确的身份"（第 324 行），"我想是因为我有一个明确的标签[中士]"（第 339 行）。军服的外观和穿戴再次成为建构军人身份的组成部分："在军队中，你可以从一个人的外表看出他们在军队中所处的级别，这样你就可以知道该对他们说什么，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说"（第 184—186 行）。[①]

退役后身份

大卫 我们发现，从大卫对自己退役后的身份所进行的话语建构中，团队成员在大卫军人身份中的中心地位凸显了出来。大卫在接受访谈时正从事学校管理员的工作，他在访谈中提到，"你不是学校团队的成员，因为你不是一名教师"（第 48 行）。在离开部队成为普通公众后所体验到的团队成员感的缺失似乎成为大卫退役后身份的中心内容。的确，大卫明确地将普通公民建构为"在团队中有不同的想法"（第 58 行），这是引起大卫对生活不满的另一个根源："这是困难的部分，我觉得"（第 60 行）。这种对军队和普通公众中团队概念的不同理解，以及这种理解上的不同对大卫的身份所造成的影响，似乎在第 42—43 行中得到了总结："好吧，就这样。大卫，你干得不错。我们想念他，好的，找其他人来。"与他的军队身份形成对比的是，大卫对退役后身份的建构是从"真正"团队成员资格的缺失和他在被归属的"团队（学校）"中价值没有得到重视的角度来进行的。

在大卫对退役身份的建构中，一些其他值得注意的话语建构包括他对外表的重视和外表在军队和平民生活中作用的对比："现在，我穿着工作服出门，我想，'好
123 吧，是的，就是这样'。你想给人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印象，但这是不一样的，它是不一样的。你不可能在任何地方有同样的效果"（第 321—324 行）。我们引用的这句话，在我们看来似乎强调了军队中外表的重要性，特别是制服穿戴的重要性，以及

---

① 在引用中，方形空括号表示省略了该处的材料。六个点表示说话者的停顿。

制服作为军队中具有标志性的事物所起到的作用(制服能够传达重要的信息,如穿戴者在军队等级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简单地说,在大卫对他的退役后身份所进行的描述中,他认为自己作为平民不能通过外表来构筑自己的社会身份。

布莱恩 布莱恩的叙述不同于大卫,因为他所建构的退役后的身份和退役前的身份没什么不一样,至少在身份对自我价值感所产生的影响方面是一样的:"当我出来后,这几乎是相同的,我认为——真的没有太大的改变"(第288—289行)。这里并不是说布莱恩将他的退役后身份和军队身份进行了相同的建构。的确,布莱恩在军队中身份的一些特性成为他在平民生活中产生紧张和冲突的潜在原因:"我给人的印象是有攻击性、暴躁、傲慢……但我只是表现真实的自己,而在军队环境中这是……它甚至不被注意"(第220—223行)。我们发现这句引用语中包含一个排比(three-part list)(Jefferson,1990),这是另外一个加强所述内容说服力的修辞手段。然而,布莱恩并没有将这种在平民生活中遇到的紧张冲突建构为难以处理的事情,或是认为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对自己的军人身份作出改变。相反,在我们看来,布莱恩将他退役后的身份建构为军人身份的"平民化"形式:"我已经适应了我的训练作风,对待平民比在军队里友好"(第231—232行)。正是这种对自己的两种身份进行建构时所具有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使得我们认为对布莱恩的访谈不同于对大卫的访谈。

话 语

在话语分析的"话语"阶段,我们必须将那些与话语对象——军队身份、退役后身份和离开军队后的体验——相关的各个话语建构进行组织和归类。进行归类后我们会将转录文本中的话语(discourses)识别出来。使用"单个话语"或"话语群"这两个概念是会话分析和话语心理学的主要区别(Edwards and Potter,1992),话语心理学的分析仍然是处在微观文本层面的(同文本紧密联系在一起,不会偏离文本内容之外),其他形式的话语分析(如福柯式话语分析(Willig,2001))的目的在于识别语言使用中的宏观文本模式,它的分析可能就会超出文本内容。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在进行分析时要注意这些话语建构之间存在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124

我们分析的第一个话语是集体主义话语。在大卫的访谈中,集体主义话语似乎占据主要地位。我们认为在集体主义话语中,可以发现大卫建构的团队工作在军队中的重要性和价值,以及军队生活和平民生活在团队工作方面所形成的对比。此外,我们还感到,集体主义话语对集体目标所给予的重视,导致了大卫离开部队后感到工作目标缺乏。

第二个要分析的话语是个人主义话语。尽管大卫和布莱恩都使用了集体主义话语(布莱恩的使用程度要小些)来建构自己的军人身份。但是同时,他们也都利用了一些强调个人能力、主动性、个人贡献、适应能力和个人业绩的话语建构,特别是这些话语建构强调了军队等级结构中个人的地位和承认。正如在大卫的访谈中集体主义话语占据着主导地位一样,我们认为在布莱恩的访谈中,个人主义话语也占据着主要地位。

大卫和布莱恩对军队身份和退役后身份所进行的话语建构,大多数可以归为集体主义话语和个人主义话语两类,但同时,也有一些建构是不能归入这两类的。当

我们再次提醒自己应该还存在一些其他的话语时，我们意识到，有些话语不能完全归入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话语并不是一个问题。大卫、布莱恩和访谈者安尼尔对平民这一类别的使用，以及将平民建构成一个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一个群体，这些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军人话语，因为在此处军人这个概念是建立在它与平民群体的差异、军队中的成员与平民中的成员差异的基础上的。最后，我们认为这种“平民化”的话语建构可能存在于同化主义话语中。

作为一个团体，我们对我们的一些分类感到更为满意。我们承认，如果有更多的事件、更多的资料，我们会对话语建构进行不同于此的组织，选定的话语也会不同。同样，我们也承认，其他的读者也可能会从我们的资料中辨认出不同的话语建构，并将这些话语建构做出不同于我们的分类。然而，我们所发现的话语建构以及作出的归类在我们所进行的讨论和考虑中是最具有说服力的。在一个阅读资料无限的世界中，我们认为说服力和与资料联系的紧密性是有重要价值的。

在进行分析时，我们承认，在将某些话语建构归入集体主义话语，将其他一些话语归入个人主义话语中时，我们是在利用社会心理学中已经存在自身意义的一些概念和术语。作为概念而言，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更多的是在文化层面上使用的概念，沿着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两个维度，可以对文化的差异性作出理解（Triandis，1996）。在个体层面上应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时，将其作为人格的两个维度，可以概念化为自我中心主义和非自我中心主义（Triandis et al.，1985）。我们在分析和讨论中涉及的布莱恩和大卫所运用的集体主义话语和个人主义话语，可以看作是自我中心主义和非自我中心主义在实践中可能的一种表现形式。然而，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自我中心主义与非自我中心主义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在话语分析法中，集体主义话语和个人主义话语的使用不应该看作是由某些潜在的人格倾向所造成的——大卫和布莱恩（使用较少）都在使用集体主义话语和个人主义话语这一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运用特里安迪斯等（Triandis et al.，1985）提出的非话语的、以人格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对本材料进行分析时，布莱恩和大卫会被看作是同时具有自我中心主义和非自我中心主义。

125

行为指向

行为指向阶段的分析以及后面所要进行的定位分析，是最让我们感到头疼的两难问题。当我们理解了两个阶段概念上的差异后，我们所面临的这一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我们认为两个阶段的差异主要在于两者是在不同的层面上对功能进行理论界定。在话语心理学（Edwards and Potter，1992）中进行行为指向（action orientation）分析时，研究者应该紧紧围绕谈话的细节，在微观文本层面上进行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它遵循了会话分析的传统，尽量去识别某个具体话语建构中局部的、相互影响的功能或行为指向。定位（positioning）分析所关心的是主体地位所发挥的功能（Davies and Harre，1999；Hollway，1989），此时主体地位是话语所给予的，这限定了说话者的权利和义务（Davies and Harre，1999：35）。这样，我们可以从前面已经识别出的话语中得出定位和主体地位。

考虑到安尼尔在访谈中广泛地使用了一些相似的问题，同时也考虑到我们的分析主要集中在被访者离开军队后的生活体验上，我们认为，在安尼尔访谈大卫和布

莱恩离开军队转变为平民生活后的经历和感觉时(第76—78行对大卫的访谈和第54—58行对布莱恩的访谈),大卫和布莱恩对访谈作出的反应应是我们分析的重点。我们应该再次提醒,下面呈现的分析并不是非常详尽的,我们呈现的目的只是为了例证福柯式话语分析中的这个阶段。

大卫　在第89—114行中,大卫将离开军队建构为与自己具有直接的关系性、身体方面的、社会方面的和情感方面的影响。离开军队后所产生的直接性关系的影响可以通过他所叙述的一些言语及言语中所包含的称谓体现出来:"身份证——谢谢你,琼斯先生。这会打击你,你知道。有人确实叫你'先生'。没有人再叫我'中士'了"(第91—93行)。大卫认为,随着一些称谓的变化,自己在军队中通过等级结构构成的相关身份立即消失了。这种军队身份的消失所带来的结果,大卫运用了一个"排比"反应(three-part list of responses)进行了说明:"这真是滑稽。这是一个震动。这时候你知道"(第93行)。 126

在我们看来,这个排比构成了一个"现实化(realization)"的过程,该过程从最初认为使用"先生"是一个奇怪的称谓("滑稽"),然后对这个称谓产生了情感反应("震惊"),到最后转化为理解了使用"先生"这个称谓所隐含的意义("你知道")。而且,这个排比和它所建构起来的"现实化"过程逐步增强了大卫关于离开部队对个人的影响和重要性叙述的说服力。

离开军队对大卫在身体上和社会性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大卫通过叙述自己原来能够进入某些空间、使用某些资源的权力消失来进行建构:"就好像他们把你扔出去后锁上了门"(第97—98行),"你不能拿起电话找到旧房主帮忙"(第101页)。大卫将这种不能进入某些空间、得到某些服务的经历建构为一种强烈的情感反应:"这令人感到痛苦"(第99行)和"它是一种奇怪的感觉"(第102—103行)。此处对离开部队后的情感和影响所进行的建构,使我们感到离开部队是一个从相互依靠过渡到独立,从"包含"过渡到"排除",从集体成员过渡到孤立个体的过程。

布莱恩　大卫的叙述侧重于自己离开军队后发生的一些事件,而布莱恩在叙述中则只侧重从军队生活转向平民生活的一个方面,即寻找工作的问题:"首先占据我整个脑海的想法完全是找工作,找到事做"(第60—61行)。从布莱恩集中于对自己找工作的事情进行建构来看,我们可以将布莱恩的叙述解释为,布莱恩将离开军队所带来的唯一影响界定为不得不寻找一份工作。布莱恩的这一做法可以解释为,其行为倾向性在于忽略或否认离开军队产生了其他的个人方面的影响。

第60—69行中,布莱恩叙述了自己在找工作以及在平民街工作期间如何处理遇到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责任归因,这是第60—69行语言的行为指向所在。第60—70行处理的是找工作的问题。这一部分有两个确定特征:正常化和极端化。正常化从第62—64行使用到的排比修辞中可以明显得看得出来:"我寄出了无数的申请表,参加了数不清的面试。我是去面试,过五关斩六将杀到只剩下两三个人。"从这几行中"无数"的反复出现来看,极端化表现得很明显。这两个叙述特征的结合所起到的功能在于形成这样一种感觉,即通过反复运用"我"表明布莱恩在这一系列事情中处于主体地位,他曾经近乎找到了许多工作。这些话语的行为指向也可以解释为:布莱恩认为没有能够保住这些工作的原因在于自己。 127

定 位

根据定位理论,话语分析的任务之一就是为话语使用者提供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s)。话语不仅构成了谈话的目标或客体,同时也构成了谈话的主体,即谈话者。在构成谈话主体时,话语也可以为谈话主体提供相应的位置,表明谈话者的权利和责任。由于福柯式话语分析理论中的主体定位是一个来自话语分析的概念,我们必须在对话语进行识别并作出解释的基础上,再对布莱恩和大卫进行主体定位分析。因此,我们对这些主体定位及其作用的分析是否具有说服力,就要依靠我们话语分析小组中的个人及整个团队理解话语的能力了。对于分析小组中的一些成员而言,这是话语分析中很复杂的一步,我们感觉这项工作使我们从具体的文本分析,转向了更依靠主观感觉和文化理解能力来进行的分析。幸好我们小组中的其他成员可以对我们的解释及说服力进行检查,使得这一步工作中存在的不确定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

在前面对话语进行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在大卫的谈话中,集体主义话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在布莱恩的谈话中,个人主义话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决定尝试着推测这些话语可能分别赋予了大卫和布莱恩什么样的主体位置,尝试着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分析。辨别出集体主义话语和个人主义话语分别在大卫和布莱恩的访谈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后,分析他们应用这些话语的情境对于我们是有帮助的。强调集体主义对于大卫而言有什么作用?强调个人主义对于布莱恩而言有什么作用?

通过运用集体主义话语,大卫对自己进行了定位,从他所处的位置上,他能够将军队中的生活和离开部队后的生活形成一个对比,并以此表现出他对目前平民生活的不满。进而,两种生活之间所形成的这种对比,又为大卫后面提到的描述由军队生活向平民生活转换过程的同化话语提供了基础。他认为自己还没有完成平民化过程。并且,大卫的集体主义话语所构成的主体定位表现出了大卫对于平民生活所感到的无目的性:在缺乏集体目标的情况下,处在这种位置的主体可能会在生活上没有个人目标。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布莱恩在谈话中运用的是强调个人主义的话语,布莱恩的话语所构成的主体位置,更多的是体现了军队生活和平民生活之间的连续性。因此,在对布莱恩的访谈记录中,我们会发现他很少将离开军队描述为一种消极的生活事件。确实,布莱恩运用个人主义话语让自己处于这样一个立场,即认为他的平民生活比他的部队生活更有价值感。

128

实践和主体性

福柯式话语分析法让我们感到吃惊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耗时性(尽管我知道运用其他形式的话语分析法同样也耗时很长)。因此,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实践阶段和主体性阶段的分析,所以有关这两个阶段的分析讨论是靠我们的推理得出来的。

威利格(Willig,2001:111)认为,福柯式话语分析法在实践(practice)阶段的指导思想是:"话语建构和主体定位为行为的发生或结束提供了可能性,通过对世界进行某种具体形式的建构,通过某种具体的方式来定位主体在其中所处的位置,话

语限定了事件的可能性。"上述思想让我们遇到了一个理论上的难题，而作为话语分析法的初次使用者，我们难以解决这个理论难题。这个难题集中在我们应该赋予"实践"或"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样的地位。在话语方法中，谈话和文本并没有被认为能够准确反映"实践"或反映出"什么是可以做的"，对于"实践"或"什么是可以做的"的谈论，其功能局限于这些谈话发生的具体交互情境中，我们的担忧是源于这个问题而提出的。我们努力寻求的是，通过某种方式将访谈和存在于访谈之中的话语联系起来，以及寻找这些话语所建构的行为和实践。经过讨论后，我们认可了谈话即是行为的看法，认为布莱恩和大卫在访谈中的行为可以从理论上当作是实践来看待，布莱恩和大卫在访谈中利用的话语构成了这些行为并对这些行为进行了限制。然而，这种观点又会限制我们对布莱恩和大卫访谈的讨论。最终，我们认为，尽管我们知道话语作为一种与文化相关的资源，其在文本中的功能可以得到识别，但由于我们在资料、分析工作和经验方面的有限性，我们难以很有把握地判断这些话语可以预测实践中哪些可能的行为。

在我们考虑福柯式话语分析的最后一个阶段——主体性(subjectivities)阶段时，类似的顾虑和窘境也出现了。威利格(Willig,2001:111)认为："话语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某种认识世界的方式，提供了某种如何形成这个世界的方式。"他认为对主体性的关注，应包括对处于不同位置的主体所拥有的感觉、想法和体验加以考虑。我们在根据大卫和布莱恩所提供的集体主义话语和个人主义话语，从理论上推断两人可能的感觉、想法和体验时，同样遇到了困难，它类似于我们在实践阶段所遇到的认识论上的两难境地。当然，大卫的集体主义话语可以看作是表达了大卫的一种被抛弃、被排除在外、被隔离甚至是一种悲痛的感觉。但是，作为分析者，由于这些情绪只是出现在谈话中，我们不能就此认为这些情绪反映了他在现实中的情绪和想法，那么我们应该将这些情绪做何种归因？大卫在谈话中以一种外显的方式描述了这种情绪，这些情绪的行为指向我们在前面也做了分析。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大卫在运用集体主义话语建构自我身份时所体验到的这种被抛弃感，是否会导致他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到类似的感觉？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主要取决于我们这些分析者在分析问题时是否站在社会建构主义或是批判现实主义认识论的立场上。我们至多能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们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大卫和布莱恩在访谈中所表达的内容，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大卫和布莱恩在主体性上的建构问题。

129

反　思

从上面我们对实践阶段和主体性阶段所进行的推论性分析来看，我们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我们能够对资料作出何种程度的分析。作为使用该方法的新手，我们可能缺乏相应的专业理论知识，我们对大卫和布莱恩就有关退役男军人和女军人所面临的生活体验话题进行了访谈，但是却缺乏足够的信心在两人的访谈分析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

我们关心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是否以足够负责的态度对布莱恩和大卫的访谈文本进行了话语分析。我们关注他们叙述事件的方式，辨别了他们在访谈中所使用到的建构他们各自体验的话语，我们是否以某种方式足够严肃地对待了这些体验的

现实性？在关注他们描述体验所使用的语言时，我们是否也在关注他们体验的真实性？同时我们还关心的是，我们在进行话语分析时，采用了一种模糊的、难以辨认的方式来呈现两人对各自生活体验所作的叙述，这是否符合社会学研究者所默认的，认为应该以一种可辨认的方式来呈现访谈者的体验这一规定？

第三，尽管我们尽量想在我们的话语分析和已有的社会心理学文献之间，就一些概念如身份、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和非自我中心主义能达成共识，但我们仍然不确定如何做才能够更为有效地使两者之间达成共识，或者是通过何种方式才能够使我们对这些概念的认识同社会建构主义者或批评现实主义者的立场一致起来。我们认为，如果话语分析要想融入到社会心理学的主流中去，那么，在我们的话语分析和已有社会心理学文献之间建立起这种对话就是有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尽管如此，由于我们整个分析小组的成员都不能够准确地判定我们对资料进行的分析到底处在什么样的认识论位置上，导致我们不能确定我们所尝试建立的这种对话是否有效。

130

要解决上述顾虑，我们认为，必须要具备更多的有关各种话语分析方法发展历史和蕴含于其中的哲学知识，更多的话语分析经验，更多的应对挑战（或外部效度）的信心。我们能否成功运用福柯式话语分析法，能否将自己看作话语分析专家要取决于我们是否至少能够有信心撰写并发表话语分析的文章，邀请同行提出自己的见解，正如我们在本章中所做的一样。

小　结

本章介绍了如何应用福柯式话语分析法对资料进行分析，讲解了该分析法在几个阶段上对实际资料的分析。在叙述福柯式话语分析法时，涉及了几个对分析者而言更具挑战性的分析阶段，这些挑战不仅仅来自于分析的文本本身，而且是因为在这几个阶段中分析者不仅要对一些研究者认为可靠的证据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而且还要据此对“真实的世界”作出推论。我希望本章的叙述能够对那些新手有所帮助，并希望他们能够对本章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然而，我也强调一点，要想提高话语分析的技能，你必须亲历而为，不断地尝试运用话语分析的原则进行分析，并从有经验的分析者那里获得反馈。另外，同第7章一样，我想提醒读者的是，同任何文本一样，本章本身就可以作为话语分析的对象，因此，你可以应用本章内容作为初次运用话语分析的资料，或是利用本章作为分析材料进一步提高你的分析技能。

9

叙事分析

米歇尔·克罗斯利

本章概括了叙事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并描述了其与心理学中其他社会建构主义取向的关系。我们重点介绍了叙事心理学与身份和自我探索问题存在的重要关系,探讨了支撑叙事心理学研究方法的一些核心概念。同时,本章强调了一些可能与叙事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关的、潜在的资料资源,并初步总结出了一种个人叙事探索方法。之后我们介绍了一些常规的分析步骤。有人认为要将叙事心理学分析概括成具体的方法步骤,并强调叙事分析应该是一种创造性的人文学科,而并非自然科学程序。对于这种观点,我们在持保留意见的同时进行了一些反思。

关键术语

连贯的故事(coherent story)	阅读(reading)
意象(imagery)	现实主义认识论(realist epistemology)
人际对话(interpersonal dialogue)	自我与身份(self and identity)
叙事语调(narrative tone)	故事(stories)
现象学(phenomenology)	主题(themes)

引 言

社会建构主义取向与自我/身份研究

社会建构研究方法在应用于自我与身份研究中时,有时被称作是"基于言语"的研究取向。在过去的20年左右,社会建构主义取向由于对传统社会与人格心理学中的一些研究假设(如行为主义、人本主义以及精神分析或心理动力学取向(见Potter Wetherell,1987))提出挑战而获得了自身的巨大发展。心理学中最常见的社会建构主义取向可能包括话语分析(Edwards and Potter,1992;Parker,1992;Potter and Wetherell,1987;亦参见本书的第7章)、女性主义心理学取向(见Henriques et al.,1998;Wikinson,1997)、后构造主义取向或后现代主义取向(见Gergen,1991)以及基于修辞的取向(见Billig,1991;Shotter,1993,1997)。

132

尽管上文所提到的各种社会建构取向不尽相同,但它们都对传统心理学中存在的"现实主义者"研究假设(realist assumption)持批判观点。在自我和身份研究中,传统心理学的"现实主义者"研究假设认为,"自我"是一个实体,如同自然界或物质世界中的物体一样,是可以被发现和描述的。从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来看,传统心理学中的这种假设是存在问题的。社会建构主义认为,自我概念不能独立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用到的语言或言语行为而存在,因为我们要通过语言或言语行为来对自己和他人作出理解。通过语言或言语行为,我们不断地调整对于自己或他人的理解。因此,"现实主义者"研究假设中将自我脱离日常的语言或言语行为,而将其描述为一种"先在(pre-existent)"实物的看法是不妥的。

社会建构主义对解构自我的研究兴趣源于语言结构与自我概念之间存在着不可分离的关系。这使得人们将自我理解为一种具有解释性、可变性、相对性、流动性和相异性特征的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对于人类自我的本质和个人经验不可能形成一致的看法,因为这种自我和经验不同于其与历史的、文化的和实际的背景的关系,它是源自一种缺乏统一性和连续性、后现代主义者称之为"学科末日"的理论认知(见Heartfield,2002)。如果根本不存在一个可被描述的"自我"存在的话,那么一些概念,如"一个"自我、"拥有"自我等提法就应该被摈弃。类似地,话语分析者和修辞分析者由于认识到了谈论自我的可变性与功能性质,反对传统心理学中关于存在"一种"核心自我和整体自我的看法(例如,参见本书的第7章)。

社会建构主义取向存在的问题:"丢失主题"

正如之前由研究者帕克所指出的那样,尽管社会建构主义在建构和解构自我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但社会建构主义研究方法中也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当人们使用话语的时候,其内心深处正经历着什么变化呢?"(Parker,1992:83)帕克认为反省能力(对自己的思考,在内心的反思)是人类主观性和理解世界的核心,反省能力将"个体与社会连接在一起"(Parker,1992:105)。不幸的是,许多社会建构取向在叙述个体的主观性时,往往忽视个体的反省能力这样一个重要因素。

133

上述问题又使我们想起了奥古斯蒂诺和沃克针对社会建构主义研究取向所提

出的批判:在社会建构主义研究取向所进行的叙述中,"个体的目的—主观性"被严重忽视,在这种叙述中,研究者在尽量避免人类对于自我有基本的或内在的认识这样一个问题(Augoustinos and Walker,1995:276)。社会建构主义在研究自我时,只考虑一些个人化、散漫的行为,这些行为扮演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如呈现出自我的某种意象、进行谅解和责备。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的自我概念里,"主观性经验……过度依赖于具体的情景,过度不稳定和具有变化性,过度强调自我概念的个体性"(Augoustinos and Walker,1995:276)。如果对语言及其背景的重视到了这种程度,那么自我"不会被毁灭,也会受到影响"(Dunne,1995:140)。从这种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和话语分析取向是以"逃避对核心问题的调查"为特征的(Abraham and Hampson,1996:226)。因此,在现代心理学中,有必要在理论和方法学上寻求一种新的研究取向,该取向要求在重视语言对自我重要性的同时,还要能够重视个体的主观性。叙事心理学所求的就是这种研究取向。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叙事心理学类似于史密斯(Smith,1996)的解释现象学分析法(见本书第3章)。史密斯等人(Smith et al.,1997)认为,将解释现象学分析与社会建构主义研究取向(如话语分析)进行区分是很重要的(正如波特和韦瑟雷尔所呈现的(Potter and Wetherell,1987))。能够说明为何两者存在区别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种区分同样也适用于分析叙事心理学和话语分析研究方法之间的差异。

史密斯等人(Smith,et al.,1997)认为,尽管解释现象分析(类似于叙事心理学)和话语分析取向都重视语言和质性分析,但这两种方法对自我的主观性和个体经验所给予的重视程度是不同的。话语分析通常对把人们的"叙述"与潜在的主观经验联系起来表示怀疑。它更倾向于把人们的口头或书面叙述当作他们自己的行为来对待,并且应该在具体的情景下分析这些行为的功能。相反,解释现象分析取向(同样类似于叙事心理学)关心的是个体的主观性和个体经验,关注一个人如何看待和感觉他/她自己身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解释现象分析法假定一个人所说的话或所写的文字,是与他们如何看待、感知、反省自己、自己的身体、他人和周围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解释现象分析取向是基于"现实主义者"的假设,这种假设类似于那些存在于传统社会心理学方法中的假设,比如,社会认知(Smith et al.,1997)。换言之,它是依据"现实主义认识论(realist epistemology)"进行的。"现实主义认识论"假设存在一个关于人类经验和意识的真实的知识领域,而这种意识是能够通过某种方法的应用被发现的(Augoustinos and Walker,1995)。这种现象学的立场以及这种语言与经验"自我"之间的一连串联系的假设受到了话语分析的质疑,话语分析认为在研究现象中自我的"现实"假设,很难告诉我们一个人如何主观地思考和感受(亦参见 Abraham and Hampson,1996;Smith,1996)。这种"现实主义认识论"也构成了一种叙事心理学取向的基础。 134

叙事心理学与自我/身份研究

叙事心理学方法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有关自我与身份的问题,如:"自我是什么?""我是谁?"刘易斯曾经评论说:"在整个宇宙中,有且仅有一个事物是我们知道的最多的,而且远远多于通过外部观察而了解的其他事物,那就是我们自己。可以说,我们拥有内部信息,我们处于被了解当中。"(Lewis,1952:3)但是,这个观点在多

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呢？我们对自己的了解又达到了什么程度呢？我们该如何看待在“发现”和“建构”自我方面的一些问题呢？

叙事心理学在理解自我这个问题上，是基于现象学(phenomenology)的一些概念的(见 Crossley,2000a)。其中的核心概念包括：从现象学角度理解个体过去的时间(lived time)(Polkinghorne,1988)，把自我看作是相互作用的一个过程(Crossley,1996)，暂时性、交互作用与品行之间的内在联系(Taylor,1989)，等等。从叙事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自我概念和道德概念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我们对自我的了解必须与具体的、与我们相关的事件联系起来。正如泰勒(Taylor,1989)所说的：作为自我的我是什么，我的身份，在本质上是由那些对我而言有着重要意义的事物所决定的。对自我进行抽象的解释是没有意义的。并且，对自我的解释只能在相对于他人的基础上进行，是说话者之间的一个“相互交流”。只有我自己的话，我就不是自我，自我是相对于某个谈话者提出的，这个谈话者对于理解自我具有重要作用。这样看来，自我是通过“一定区域”中的一个“对话网”构成的(Taylor,1989；亦参见 Crossley,1996)。我们的道德意识和自我意识之间的这种联系说明，我们寻求满足的一个基本动力就是我们需要在我们认为好的或重要的事物与我们的群体之间形成一种联系。我们所拥有的一些基本的价值观促使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些基本问题：“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有价值的？”“什么是富有、有意义的生活？相反，什么是空虚、135 毫无意义的生活？”(Taylor,1989:42)因此，那些反映“好的事物”的概念、对自我的理解、我们用于了解自己生活的故事与叙事的种类以及各种社会概念之间存在着联系，它们之间的这种联系仿佛在一个“松散的包裹”中共同发展、变化着。这又将我们引入了叙事心理学中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故事”。

语言与故事的核心作用

故事(story)对身份建构的过程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正如克赖茨(Crites,1986:152)写到的：“缺乏故事的自我仅仅是一个关系代词而已。”此外，如梅尔(Mair,1989:2)所说：“故事是人格的发源地。故事建构我们也解构我们。故事能够为处于困境中的我们提供支持，鼓励我们走向原先没有考虑到的目标。我们讲述自己故事的方式越是具有局限性、越是僵化，我们就会变得越迟钝、越感到匮乏。”

事发并非偶然，当我在进行一些精神创伤课题研究的时候(比如艾滋病传播和儿童性虐待)，我感到急需形成一种叙事心理学方法(Crossley,2000a)。这些精神创伤事件发生后，人们经常会体验到精神崩溃和瓦解，不得不依靠“故事”或是“叙事”的方式来对事件作出理解。同样，当人们经历生活中的重要转折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正如布洛雅(Broyard,1992:21)所说：“由于经常处于紧急状况中，我们创造了叙事……我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描述，仿佛就是为了限制灾难的发生。”

研究问题与潜在的资料源

现在，我们应该阐明叙事心理学中所用到的术语与话语分析中所用术语的区别。话语分析者们经常涉及“叙述(accounts)”一词。叙事心理学家们所关注的“叙事(narrative)”或“故事(story)”与话语分析者们所说的“叙述”是一样的吗？从最

基本的层面上而言,“叙事”在长度上不同于“叙述”。“叙事”构成了叙事心理学家们探究问题的焦点,“叙事”的长度通常长于话语分析研究者所提及的“叙述”。话语分析研究者可以对任何长度的一段文本进行分析,很显然,这不同于叙事心理学,叙事心理学更关注对自我和身份(self and identity)的探索。叙事心理学会花较多的时间来对这些问题作出思考,这样有助于获得更多潜在的资料。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为宽泛的问题,即“叙事”与“叙述”各自的认识论地位。刚才我们已经讲清楚了,叙事心理学对它研究的问题持现实主义立场。尽管叙事心理学与话语分析法一样,也对某些语言行为所具有的话语功能感兴趣,但是,叙事心理学还关注其他的一些事物。叙事心理学更加关注叙事的实际话语内容,在这点上它不同于话语分析法。叙事分析是对某些事、对某个人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创伤或挫折进行分析,这些事件或是创伤是促使个体进行叙事的动力(见专栏9.1叙事分析的例子)。 136

专栏9.1 叙事心理学分析的例子

- 对男同性恋者在性行为方面虚构的或自传式的叙事进行分析,探究他们与当代文化之间的关系(Crossley,2004)。
- 对一位患有口腔癌的男性如何适应生活、如何面对死亡的事件进行自传体式的考察(Crossley,2003—见本书附录2报告4)。
- 对精神病人的“意愿(voice)”以及这些意愿的变化进行历史性的分析(Crossley and Crossley,2001)
- 对病人(癌症)如何面对生命不确定性的挑战进行自传体式的分析(Frank,1995)。
- 一个对久患艾滋病男人的采访研究(Davies,1997)。

例如,叙事心理学研究方法可能会对心理疾病或生理疾病、儿童性虐待、堕胎、怀孕等事件进行分析,其重点在于考察这些事件对个体生活的重要性。这一点明显不同于话语分析,这些问题不属于话语分析研究的焦点。

上述叙事心理学与话语分析法的差异,已经暗含了叙事心理学所要分析的资料内容。叙事心理学家热衷于考察同自我和身份建构相关的问题,因此其具有广泛的潜在资料资源。半结构式访谈、日记、自传、传记、小说以及与具体事件(例如,艾滋病患者或HIV病毒携带者)有关的网络聊天室都可以为叙事心理学家提供资料。当然,除上述列出的一些潜在资料来源外,还有一些其他潜在的资料来源,我们鼓励任何一位对叙事心理学研究方法感兴趣的同学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探索可能的潜在资料源。要运用这种方法,大家首先要做的就是以自己为对象进行叙事分析。

进行个人化叙事分析的方法

在当代生活中,用于进行个人化叙事分析方法中最常见的,是心理咨询和自传式回顾。除了这两种方法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可以用来增加对自我的了解和进行个人化叙事分析。这些方法包括一些对“个人隐私”的探究,如写日记、记录你的梦、同你的许多“自我”或内心进行对话等。尽管这些方法很有用,但由麦克亚当 137

(McAdam,1993)开创的自传法尤其有意思,因为它能够为自传式研究提供一些有用的资料。此外,在探究自我和身份时,该方法强调人际对话(interpersonal dialogue)的重要性。就叙事心理学中提出的自我和身份是一种交互式概念而言,这点显得很重要。

进行个人化分析的第一步,就是寻求一位访谈者来对你进行自传式访谈(见Crossley,2000a)。麦克亚当(McAdam,1993)提出了一个可以借鉴的半结构式访谈方案——这一点将在下面有更详细的描述。我们应对访谈的内容进行记录和转录,以将这些转录的内容作为资料来进行叙事分析。

自传访谈方案

问题1:生活篇 首先,将你的生活想象成一本书。你生命中的每一部分构成了书中的每一章节。当然,这本书还会继续写下去。这本书中包含了一些有趣的、主题非常明确的章节。你自己决定这本书章节的数目,但根据麦克亚当的建议,这本书最少要分为2~3章,最多分为7~8章。给每章取个名字作为这本书的目录,描述每章的大体内容。简要地论述章节之间的过渡。访谈的第一部分可能会花较长时间,但尽量让它简短些——即30~45分钟。不要(也不可能)讲出"故事的全部",只是对"故事"的梗概、对生活的主要章节加以描述即可。

问题2:重要事件 询问曾经发生过的八个重要事件。此处的重要事件指的是过去发生的、对你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或是关键意义的具体事件。将这些事件看作是构成你生活中某一具体时刻的成分。例如,12岁时母亲同你的一次特别的谈话,或是去年夏天的一天下午你做出的某个特别的决定,这都可以成为构筑你生活故事的重要事件。这是一些特别的时刻,发生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具有特定的人物、特定的行为、特定的想法和感受。对每个事件,都要详细地描述它的内容、发生的地点、涉及的人物、你当时做了什么以及你当时对这些事件的思考和感想。尽量表达出这些事件对你生活的影响,这些事件说明了你过去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些事件是否对你产生了影响?如果是,那么这些影响是什么?要具体地回答上述问题。当人们在谈论自己生活中某个特定的、具体的片段时,往往最富有表达力和洞察力。因此,你应该花一些时间和精力对这些事件进行回忆,越详细越好。

138

列举八件上述提到的重要事件:

1. 颠峰体验:你生活中体验到的最高点,你生命中最精彩的时刻。
2. 糟糕的体验:你生活中体验到的低谷,你生命中最糟糕的时刻。
3. 转折点:在这段时期,你对自己的了解经历了一个重要的改变。当这件事发生时你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转折点,只是后来回想的时候你才发现这是一次转折。
4. 最早的记忆:你最早记住的一些事情,包含具体的场景、人物、感想和当时的想法。这个回忆不一定特别重要,关键在于它是你的早期回忆。
5. 一段重要的童年记忆:童年时期的任何一次特殊的回忆,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6. 一段重要的青少年时期的记忆:发生在青少年时期的、在今天看来具有特殊意义的任何一次回忆,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7. 一段重要的成年时期的记忆:21 岁以后的一段具有特殊意义的回忆,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8. 其他的重要记忆:一次你最近或很久以前发生的具有特殊性的回忆,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问题 3:重要他人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由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他人构成的,例如,父母、孩子、兄妹、配偶、情人、朋友、老师、同事和导师。描述你生命中对你影响最大的四个人。详细说明你过去或现在同他们当中每个人的关系,详细描述他/她对你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然后,描述你是否在生活中崇拜过某个特定的人。

问题 4:未来的脚本 前面你已经谈论了自己的过去和当前生活,那么将来呢?你对将来的生活可能有哪些打算或规划? 对你的整体打算或是梦想作一个描述。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计划或梦想,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未来生活的目标、兴趣、希望、激情和愿望。这些计划可能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它们反映了我们的成长,改变着我们对生活的体验。描述一下你现在的梦想、计划或是对未来的大体规划吧!如果这些计划能够对你产生一点影响,那么它们是如何让你(a)在未来生活中具有创造力(b)为他人作出贡献的?

问题 5:压力与困难 任何人的生平事迹中都包括一些重大的冲突、未解决的问题和待解决的问题,以及在某段时间内面临巨大的压力。仔细考虑一下上述提到的这些压力或困难。描述一下你生命中的两个领域,在这两个领域中你至少经历了下面的一个事件:重大的压力、重要冲突、困难问题或必须面对的挑战。分别对这两个领域中所发生的压力、难题或是冲突的性质进行详细的描述,概述这些问题的来源,简要地描述事件的发展状况,以及如果你有一个规划的话,打算在未来如何处理这些事件。

问题 6:个人的意识形态 这是一个关于你的基本信念和价值观的问题。

139

1. 你相信上帝、神、一种统治或操纵、影响宇宙的力量的存在吗? 并作解释。
2. 如果你有宗教信念,作简要的描述。
3. 如果你的信念不同于你认识的大多数人,那这些差异体现在哪里?
4. 你的宗教信念是如何随着时间而改变的? 你是否在个人信念方面经历过迅速的变化? 并作解释。
5. 你具有某种特定的政治取向吗? 并作解释。
6. 在人类生活中,你认为哪种观念是最重要的? 并作解释。
7. 你还可以告诉我哪些内容,以便帮助我了解你对生活和世界所抱有的最基本的信念和价值观?

问题 7:生命主题 回顾你的一生,将其看作是一本包含着章节、片段和人物的书。你能分辨出贯穿该书的中心主题、主题思想或是中心思想吗? 你生命中的主题是什么?

分析叙事

叙事心理学分析假定我们对了解自己和他人的个人叙事感兴趣,反过来,也对

叙事在了解心理和社会现实方面所提供的见解感兴趣。因此,了解叙事赖以产生意义的内容和复杂性就显得很重要。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因为这些意义隐含在访谈、转录资料和自传体笔记中。要真正理解这些意义,必须对文本进行解释。在进行个人化叙事分析时,应遵循一些具体的分析步骤。这些步骤见专栏 9.2(各个步骤的细节将在后面进行详细介绍)。(更多细节见 Crossley,2000a)

专栏9.2 叙事分析的六个步骤

1. 阅读并熟悉文本;
2. 辨别出要寻找的重要概念(尤其是语调、意象和主题);
3. 识别“叙事语调”;
4. 找出叙事的主题和意象;
5. 将以上内容编成一个连贯的故事;
6. 写成一个详细的研究报告。

步骤1:阅读并熟悉文本

叙事分析的第一步就是对通篇文本(或其他的资料来源)反复阅读 5 ~6 次,让自己熟悉这些材料,对材料中浮现的重要主题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和把握。

140

步骤2:识别要寻找的重要概念

第二步,要逐步掌握你要识别的关于“个人叙事”的要素。根据麦克亚当(McAdams,1993)的观点,这些要素包括叙事语调、意象、主题。接下来,就这三点作进一步介绍。

(1)**叙事语调** 叙事语调(narrative tone)可能是成年人个人化叙事中最广泛的特征,通过叙事的内容和叙事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叙事的语调可以在整体上是乐观的或悲观的。语调是乐观的,可能是由于发生了令人高兴的事情,也可能是尽管发生了坏事,但个人保留着事情会出现转机的希望。同样,悲观的语调可能是由于发生了一系列坏事,也可能是尽管发生了好事,但个人却从负面的角度来认识它(见 McAdams,1993)。根据发展心理学的研究,麦克亚当(McAdams,1993)认为:对叙事语调的最大影响源自儿童早期是否形成了安全型依恋。以你自己的经历来探究这个假设似乎很有意思。

(2)**意象** 每个个人化叙事都包含并表达了一系列具有自己特征的人物形象。为了理解我们自己的叙事,我们必须寻求一种独特的方式,借助叙事中包含的意象(imagery)获得对我们是谁这个问题的理解。在对你生活中的篇章和重要事件进行描述时,要注意语言的运用。这些语言可以为你理解具有个人化意义的意象、象征或是隐语提供一些线索。意象同我们的身份一样,我们也可以发现它、加工它。我们可以加工自己的形象,但是这种加工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原始材料的(比如语言和故事)。当你找出你自己所用到的一系列意象的时候,尽可能找出这些意象来自何方。它是怎么形成的?是否与你的家庭背景有关?——一些心理学家认为,成年人的个人意象很大程度上是在三四岁的时候与家庭成员的复杂互动中

形成的——这些意象可否在你所生活的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中找到(包括道德、价值观和信念体系)?

(3)**主题** 在你的个人化叙事中,占优势地位的主题(themes)是什么?在你所叙述的许多事件中,你能否发现,你的行为动机或对你最重要的事情中是否存在某种模式?麦克亚当(McAdams,1993)再次引用心理学中的一些理论,提出故事中最重要的主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力量(要求自主和独立的愿望),二是爱(对亲密关系和依恋的渴望),因为这两个方面与人类生活的两种中心动机相对应(有时也存在冲突)(想了解对 McAdams 的评论,见 McLeod,1997)。在对自传体式的叙述作解释的时候,你应该仔细思考它能够对你的动机说明什么?你的动机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爱或力量的驱动?更重要的是,在你的叙事中,对力量和爱的需要是以何种特殊方式表达出来的?当我们的身份处于"危机"中时(例如,青少年时期经历疾病的折磨或是体验到丧亲的悲伤),我们对力量或爱的需求尤其明显。我们发现曾经的自己与现在的自己存在差别。这种差别可能是巨大的,以至于我们会提出一些我们以前从来不会问的问题,比如"谁才是真正的我?""我是谁?"。我们也许开始认真考虑以前没有考虑过的一些生活方式。这种生活中的"片段"可为我们了解自己的动机提供线索,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哪些才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 141

步骤3:找出"叙事语调"

为了找出叙事语调,你需要注意有关过去生活经验的报告内容,同时也要注意你叙述的方式。

步骤4:找出"意象"与"主题"

同时寻找意象和主题是有益的。这是因为它们会相互叠加在一起:某种意象通常是指向、象征着某一具体的主题。我发现,寻找意象和主题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对转录资料进行系统的研究,首先研究"生活章节"方面的问题,然后分别研究每一个访谈的问题。意象和主题的寻找应该是相对于每一个问题。在这个分析阶段上,你只是能尝试着对资料作出大致的了解。本阶段分析的目的在于从访谈中构思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步骤5:将上述内容编成一个连贯的故事

通过上述步骤,你已经对访谈中出现的各种意象和主题勾勒出了大致轮廓,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将这些大致的轮廓编成一个连贯的故事(coherent story)。

步骤6:写成研究报告

在这一步中,你要做的已经不是辨认意象和主题,也不是进行分析并将其建构成一个具有连贯性的个人化叙述,这时你应该进入了撰写研究报告的阶段。这种研究报告在形式上可能类似于课程作业报告。在这种质性研究中,分析过程和撰写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严格的区别,因为在实际撰写报告的过程中,仍然需要继续进行分析工作(Smith,1996)。那么,如何将叙事分析转化为研究报告呢?一份研究报告由不同的部分构成,这些组成部分按顺序分别为:引言、方法、结果、分析/讨论 142

（在讨论部分对结果部分呈现的研究结果，要从更为宽广的角度进行理论阐释）、反思、参考文献。尽管如此，我们也可以发展并创造性地采用其他的形式对叙事研究加以报告（以附录2 研究报告4 为例）。

对分析过程的反思

提供大致的分析步骤可能有助于研究的进行，但是，我越来越意识到，叙事类型的分析不能够也不应该简化为按照某一原则一步一步进行的步骤，就像量化类型研究范式那样。我认为，如果真要这样一步一步来做的话，会损害叙事心理学。就我而言，叙事研究方法的本质，在于研究者能够理解那些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呈现的文本所表达出来的个人的和文化方面的意义，并对此过程中所应用到的社会文化资源加以解释。这里需要做的是解释，需要的是有能力将你的解释和论证条理清晰地、令人信服地以质性叙事研究的形式呈现出来。这里一个必需的能力，就是能够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地建构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叙事故事。这听起来容易，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困难的过程。我想说的是，这个过程更多的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因为这个过程无法分解成一个一个的、具有逻辑性的研究步骤。在我看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受过传统心理学训练的心理学家在运用这种方法时会感到很困难，因为他们受到了太多的科学思想和还原论思想的影响。然而，我坚信，坚持叙事心理学研究方法不可拆分的原则是很重要的。应该给具有创造性的、富有想象力的学生和研究者更多的在心理学中的思考空间，让他们的分析不再局限于原有的预定方法模式。

方法学思考

然而，这种对方法创新性的要求，的确引出了有关效度方面的问题。正如其他质性研究方法和话语取向的研究方法一样，叙事法也假定任何一种分析所用到的资料都会严重受到研究者的影响。这与很多更偏重“科学”的方法相反，这些方法旨在达到一种客观的、中立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分析材料可以独立于研究者而存在并被解释。叙事心理学研究者不是在收集“中性”的资料，而是提出问题、挑选研究对象（研究对象可能包括他们自己）并与他们互动，并且对这种互动中产生的资料进行分析。进一步的选择和解释都会影响研究的结论和分析结果的呈现。因此，叙事分析法不能尝试着“将研究的材料或发现进行客观的记录”（Yardley，1997：35-36）。

143

同叙事分析相关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研究的“代表性”和“普遍化”问题。量化方法通常假设他们的资料来源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够代表某一个特定的群体，这样研究得出的结论才能够推广到该群体中去。然而，叙事心理学研究同其他质性研究方法一样，并不认同研究的“代表性”这个概念。相反，质性研究方法通常采取的是个案研究取向，目的“在于对某个问题进行详细的、可能是独特的叙述，而不是对不同个体之间存在的共性进行推论。这种方法的基本原理是充分利用质性方法的主要优点之一，结合具体情境对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Yardley，1997：36）。因此，其目的就是对个体的历史进行深入的分析和了解，了解个体和社会之间所存

在的复杂的、不确定的交互关系。

这些涉及选择、解释和代表性的问题，对于质性研究者论证他们分析结果的有效性具有一定的启示。如果我们放弃“客观”事实这样一个概念，这个客观事实就会孤立于我们的分析、解释工作之外，那我们凭什么说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我们如何使得我们的叙述更有权威性？在叙事研究中，效度通常意味着研究要“言之有据”（Polkinghorne，1988：175）。因此，研究者为了使研究结论更具有说服力，就必须从他/她面前的资料中建立论据并提出证据。这种论据不是形成确定性，而是产生可能性。所以，大部分研究者都通过“坚持一种有限度的局部权威来证明自己的叙述的正确性，这种权威是基于周全认真的探索与报告、知识水准、观点共识和富有效用的结合”（Yardley，1997：40）。例如，在证明一个解释的正确性时，研究者可能会根据“该解释具有综合性、连贯性，与资料具有一致性，理论上具有复杂性，对于研究对象和同行而言都具有意义”（40）。要不，就是被认为是可信的或有说服力的。所有的这些考虑对构筑叙事心理学研究的有效性都是很重要的。我想重申一个对于研究者而言非常重要的问题，即研究者要具备完成这个过程所需要的创造性和简明写出能力。

144

小　结

本章概括了叙事心理学的理论基础，突出了叙事分析所包含的一些核心问题，并简要地概括了进行叙事分析时所需的方法和分析步骤。总结而言，叙事心理学分析是：

- 关注建构和探索身份的过程；
- 关注什么是自我建构和怎样建构自我的问题；
- 关注人们怎样利用个人和文化方面的资源，去理解一些创伤事件和生活中的转折事件；
- 叙事更多的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个可以简化为具体方法步骤的科学程序。

本人未能对最后一点作足够强调。叙事心理学适合那些感觉有必要突破以往学术界限的学生和老师，适合在没有具体方法步骤的限制性指令下进行探索。本章所概括的方法学仅仅是作为鼓励学生或研究者思考其生命和自传探索过程的最初一步。为了能使叙事心理学在今后的研究中出现一些结果，我们鼓励学生和研究者们仅把这些初级的步骤当作松散的支架，突破并超越它们！

延伸阅读

要想了解更多的叙事心理学的理论基础，见凯尔（Carr，1986）、克罗斯利（Crossley，1996）、克罗斯利（Crossley，2000a，b & c）、鲍金霍恩（Polkinghorne，1988）、史密斯和斯帕克斯（Smith and Sparkes，2006）和泰勒（Taylor，1989）的著作。就叙事心理学取向来说，见弗兰克（Frank，1995）、克来曼（Kleinmann，1988）、麦克亚当斯（McAdams，1993）和萨宾（Sarbin，1986）的著作。要了解叙事分析的事例，见本章专栏9.1、附录2中的报告4和麦克亚当斯等人（McAdams et al.，2001）的著作。

10

进行叙事分析

尼尔·哈比森

本章主要考察一个研究团队进行叙事分析的尝试。分析的材料是对一个退役军人就其离开军队回到平民生活后的体验所进行的采访记录。在是否应该遵循克罗斯利(见本书第9章)所提出的粗略分析步骤对资料进行分析这个问题上,研究者中出现了两组不同的意见。于是研究者分为两组分别对访谈记录进行分析,在分析过程中所采用的评价标准也不同。在呈现我们的研究结果时,我们注意突出了两个研究小组所存在的分歧和未得到解决的矛盾,这些分歧和矛盾可能正是"质性心理学"本身所固有的。

关键术语

历史性叙事(historical narratives)
相互作用动力学(interactional dynamics)
表演分析(performative analysis)
语调、主题和意象(tone,themes and imagery)
效化(validate)

试想,当一批刚接触叙事心理学的研究者们聚集到一起,对一段有趣的采访记录进行叙事分析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我认为,本章所报告的发生在我们叙事分析团队中的事件并不具有代表性、一般性,甚至从整体上而言并不具有典型的叙事分析所具有的一些特点。然而,我这里回顾了我们在进行叙事分析时,是如何在叙事心理学的框架内对资料进行分析的。我希望这些回顾能够有助于说明叙述分析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分歧,希望对于那些初次尝试运用该方法的研究者而言,我的回顾能够引发他们一些有价值的思考。

我们的分析过程——包括它最终的结果——涉及了质性心理学从研究趋向到方法传统方面长期存在的矛盾性问题。在阅读后面的内容时,读者需要思考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方法论能否从书本和老师那里学到(如统计方法那样),或者说,方法论是否可以是一些具体的技能(类似于弹小提琴的能力)?第二,方法论是应该用于发展某种分析调查,还是应该用来说明什么样的解释才是"有效的"?第三,如果叙事分析作为一种心理学方法继续获得其合法性,但该方法却假设所有人都自发地以叙事的方式进行交流,那么谁能说明那些叙述可作为专家分析,依据又是什么?第四,克罗斯利所说的"叙事分析"(Crosslry,2000a;同样见本书第9章)是一种方法还是一个分析步骤?最后,这种方法是通过遵循它的准则得以改进,还是通过摆脱其准则而取得发展?当我们认真审阅退役军人访谈记录中关于他们离开部队的经验时——这段经验正是我们叙事分析的资料(见附录1),我们开始在一些棘手的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立场,这也导致了我们的研究群体分裂为两个小组。然而,我们最终形成了一种分析的形式,这种分析形式突出了我们在分析中所遇到的困惑。这些困惑代表了我们追随不同的解释方式。

146

在本次叙事分析中,很多时候,我们都对分析的结果感到不确定。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都乐意为这个过程而努力。我很乐意将分析过程中自己的一些情感写进本章:我要特别感谢研究团队中的三位成员,他们在我们的分析工作完成后,立即记录了我们研究团队对整个分析过程所作的思考。另外,我还写下了我所能记起的共同度过的时光。这些笔记(它们自身也构成了一种叙事)连同我们的分析记录,帮助我在对事物进行建构时,避免将自己的观点同事实相混淆。当然,在分析过程中同我意见直接相左的研究者也通过他们记录的反思给予了我很多启发。

叙事分析

研究者们在一起花了近四天的时间尝试着运用叙事分析法的原则对资料进行分析(其中两天用于分析,一天用于对克罗斯利提出的叙事分析原则加以熟悉,另外一天用于组织我们的分析结果)。我们从事叙事分析的时候,每个人对叙事分析的熟悉水平不同,并且对于这种熟悉性在有效叙事分析中所起的作用有着不同的理解。以下所引用的是研究成员对分析过程的一些反思。

> 开始的时候……我对叙事分析一无所知。
>
> 当我来时……我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获得一些运用叙事分析的实际经验,提高运用这种方法收集和分析博士论文资料的信心。

147 在(来参加会议的)列车上,我开始了我的分析,在旅途中我阅读了下载的转录资料,并浏览了米歇尔·克罗斯利的书(Michele Crossley,2000a)。

在第一段时间,我们回顾了克罗斯利对叙事分析的概述(见本书第9章),并分析出叙事分析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分析者应当了解心理学方面的文献资料,并且要充分考虑怎样将“个人叙事”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历史性叙事(historical narratives)”联系起来。正如克罗斯利在第9章中所说的:“在我看来,叙事研究方法的本质在于能够理解和领会口头或书面记录所传达的个体和文化方面的意义,能够详细解释在这个过程中用到的社会文化资源。”然而,有些人认为我们难以通过“口述或书面文本”去了解历史。他们认为这会不会将那些有文化、受过教育和有特权的人的看法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混为一谈?例如,在许多时期,我们对记录的依赖会导致我们将男性的经验与全体个体的“经验”等同起来。因为在大多数的人类社会中,男性占据着统治地位。在所有有历史记录的社会中,具备读写能力是权力的一种标志,这样一来,我们会不会将那些权势个体的观点同历史的客观事实混淆?(更多的讨论见专栏10.1)?

专栏10.1 历史学家们使用“叙事法”吗?

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87)认为,历史专业是运用叙事法来捍卫历史学的学术地位的,从而将“历史”和其他对过去的报告(例如编年史)区分开来。怀特提醒我们,历史并不是以叙事的方式发生的,但是不断的学科压力使得历史学家们要将历史建构成叙事:具有叙事的开端、发展、结果以及对未来所给予的道德上的启示。要以一种非叙事的形式来书写历史是很难的,但通过叙述法,从对象及其代理者的方面(而不是根据个人和传记来叙述历史)来叙述其历史,我们也许就可以打破心理学中存在的人本主义和个人主义(如同罗夏墨迹测验中所做的一样,例如,见Hegarty,2003)。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如何效化(validate)叙事分析。一个有效的叙事应该可以从资料中找到坚实的依据,能够得到事例的支持。有效的叙事是在分析范畴和原始资料之间的不断循环过程中形成的。我们研究小组中一位运用过叙事分析的成员提出,在叙事分析的过程中,我们不可能获得一个确定的结论。她讲述了她所研究的群体和学术界,对她的分析所产生的共鸣是不同的。最后,我们仔细考虑了采访 148 过程中产生的相互作用动力学(interactional dynamics),强调了这些互动过程会对个体的叙事产生影响。

对于那些以前阅读过叙事分析或通过其他渠道已经对这种方法有些了解的小组成员而言,我们对克罗斯利所提建议的讨论似乎给了他们一丝宽慰,他们已经对叙事方法有了一定的了解。正如一位小组成员所说的:

值得宽慰的是……我对叙事工作的理解没有产生偏差。让我感到兴奋的是,这种方法不是很死板,我们可以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以适应研究主题的需要。

然而,其他因研究的不确定性而感到气馁的人却说:

在团体中,要想对文本的含义达成某个结论是很困难的,甚至即使单纯按

照(克罗斯利的)建议也难以找出最佳的分析方式,对此我感到很受打击。

这些评论反映了不同研究者对于叙事分析中不可避免的解释性所感受到的不同舒适水平。我们两个小组的分歧首先集中体现在如何才能够对访谈资料进行最佳的叙事分析,是遵循米歇尔·克罗斯利的准则还是违背其准则。其次,我们担心的是资料本身。克罗斯利(Crossley,2000a;同样见本书第9章)概述了一种可以依赖具体的提问方式获得叙事的方法。该方法要求被访者将他们的人生想象成一部小说,并将这部小说划分为不同的篇章,然后叙述每章的故事情节。很明显,我们用来分析的采访记录不是依靠这些方式得到的。我们的分析是从对大卫的采访记录开始的,整个团队的分析过程开始变得复杂(下文将作进一步阐述)。我们的分析变得主要集中在单个访谈上,但这样做却没有坚实的方法依据。最终,我们遇到了麻烦:克罗斯利介绍了如何"撰写"叙事分析,却没有说明如何以口头的形式来呈现叙事分析。一些小组成员开始较为冒昧地认为,叙事分析的结果可能不适合采用克罗斯利界定的标准的学术形式来呈现口头报告。考虑到克罗斯利的叙事法十分依赖对自我进行文学上的理解,因此她在自己的论述中强调"书写"并不足为怪。尽管如此,由于我们在研究之初决定将自己的分析结果在分析结束时,以口头的方式呈现给学生和研究者,并以此来鉴定我们分析的有效性,因此缺乏口述报告的指导成为困惑我们的一个问题。

总之,我们对介绍叙事分析的首次体验留给了我们三种来源的焦虑。首先,如果在没有对某种意见给予特殊考虑,或没有作出非公开政治承诺的情况下,进行叙事分析是否可能?我们会对大卫的访谈记录作出负责任的解释吗?其次,假如一个叙事分析没能抓住事件的真实情况,那我们以什么标准来分辨"好的"分析和"坏的"分析呢?最后,在没有明确的方法学适用于该模式的条件下,我们如何设计口头报告呢? 149

群体加工的缝线和缝合

考虑到研究团队中成员较多,且在如何分析资料上存在分歧,于是我们分为两个小组。我们开始对转录后的大卫的访谈进行分析,找出采访记录中的语调、主题和意象(tone,themes and imagery)。访谈的资料来自安尼尔对大卫的访谈。起初的分析工作是大家单独进行的,然后对小组中各个成员的分析加以合并。起初我对这种非限定性采访方式感到有些困惑:对于这种以开放式访谈获得的资料,如何才能找到大家比较认可的范畴、分析标准呢?尽管如此,我还是开始了下面的工作,制作了一个细目表(见表10.1)。

表10.1 我对大卫采访记录最初的叙事分析

语调	主题	意象
归属(第17—23行)	工作就是生活(第4—13行)	"狗屋"
不安全感(第4—13行)	配合(第17—43行)	"黑暗和肮脏的东西"
不满意(第48—60行)	平民(第48—60行)	"乱扯一通"

当我们回到小组中时，我发现我的分析是在更为“微观”的层面上进行的（因此，我只对采访的一小部分进行了分析）。在我们的小组里，有人建议将其中的一个主题命名为“社会”，这引起了大家富有成效的争论。有人则建议将这个主题改为“平民街”更好些，被访者大卫在第156行以及后面用这个词语来描述平民生活。毕竟，以其自身的因素，军队也是一种“社会”形式，它们构成了英国“社会”的一部分。大卫对于“平民街”的评论指向发生在军队社会“以外”的事情。“平民街”这个词语不仅属于大卫，也属于我们，而且它比我们原来所使用的任何一个词都准确。这个具体的解释事件使我们想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对访谈资料的分类应该是建立在大卫自己所用措词的基础上的。另一个人则提到了，大卫所报告的许多案例叙述的都是他自己与社会的互动过程，这些案例可以将“社会”这个概念同大卫的个人访谈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重新建构大卫叙事中的语调、意象和主题的话，哪有比从这里开始更好的呢？

尽管这种方法偏离了我们之前所设定的任务，但它确实提出了一种解决我们先前怎样口述报告叙事分析的方式。我们可以再次进行这样的内部对话，使大卫对那些在从部队生活到平民生活的旅途中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谈话的叙述更有意思。除了在大卫的转变叙事中简单地描述“有意义的人”，我们还可以采用表演分析（performative analysis）的形式来展现他们在报告中所用到的语言。这样的话，我们将脱离克罗斯利所建议的叙述研究方式，同时这也反映出了一种信念，那就是普通人的谈话是富有信息的、吸引人的，对这种谈话进行分析时是没有质性分析的标准化方法的。在我们的小组中，这种对准则的违背既加深了人们对采用“正确”方式进行分析的焦虑，也激发了人们采用不同方式兴趣。正如一个人所说的：

150

> 起初，我感到有点不安，我觉得，别人可能认为采用一种新颖的方式来呈现我们的结果不太合适，并且担心别人把我们对大卫的描述误认为我们以某种方式贬低大卫。

在另外一个研究分组中，分析工作更多的是按照标准化步骤进行的。在这里，克罗斯利提出的叙事方法减轻了研究者的焦虑，为分析工作提供了有效的研究框架。尽管我不是这个小组中的一员，但这个小组的成员和我一起分享了他们的记录，足够使我了解到他们把采访的语调确定为“压抑的”、“生气的”、“敌意的”、“失望的”、“痛苦的”、“消极的”、“绝望的”、“顺从的”和“气愤的”。他们列举了一系列复杂的意象并对其进行了分类，如“以动物做比喻”组的（如“醉得像黄鼠狼”（第109行），“在狗窝里”（第68行），“玩得很开心（whale of a time）”（第336行））。他们同时也列举了很长的主题（我们将在下文中对其中的一个主题进行描述）。该团体发现在工作中使用挂图有助于将各种不同的语调、意象和主题区分开来。除此以外，他们还轮流做笔记以使每个人的观点都能得到表达。

因此，当两个研究小组在第一天结束再次坐到一起时，我们已针对标准的叙事研究采纳了非常不同的观点，所遵从的研究方式也完全不同。面对质性心理学研究的巨大动态性，“演示组”的一些人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打破原有的方法准则对我们如此重要。当我们将这一做法告诉另外一组研究人员时，他们说“你的故事可能是在酒吧里闲聊得到的”。提倡采用传统规范方式进行研究的小组成员，仍然渴望

通过现有的叙事研究法来对资料作出解释。此时,我只能将他们对演示组的保守,归因为方法上的保守主义。然而,后来我却了解到他们小组中的一些成员,对在资料分析中使用表演比我更有经验。

在第二天所进行的三部分分析中,我们仍分为两个小组独立工作,很少进行沟通。侧重规范叙事分析的研究小组,主要集中于记录个人与文化之间关系的分析,效化叙事心理学研究,描述采访过程中发生的相互作用动态。他们也开始着手对布莱恩的采访记录加以处理(见附录 1),在布莱恩的采访记录中,意象和主题比大卫的访谈记录更难区分。在演示组中,我们依然用笑剧表现大卫的叙述,这些叙述是构成我们脚本的基础。期间我们的心情依然时而忧虑、时而兴奋,正如一位成员在日志中写道:

151

> 这种准备工作似乎让我们游离于两种状态之间,一会儿是完全缺乏活力的痛苦,一会儿则是我们中的一员突然想到好点子,他人的激情又重新被调动起来。

需要记住的是,演示小组的成员对于最后如何呈现研究成果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对于我们能否通过集体的创造力,将大卫的故事中所表现的辛酸与迷人之处传递给大家,我们所怀的自信程度是不一样的。我们去了另外一个工作室开始正式撰写我们的脚本,去描述"平民街"的画面,这些我们都将在话剧的第二场中加以呈现。

专栏 10.2 质性法必须是基于文本的方法吗?

我们此处文章中存在的一个缺陷反映出了质性心理学特别是叙事心理学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有研究者宣称文本是主要的交流媒介,或认为文本是人类社会属性充分的隐喻,那么他们这种说法是怎样在那些有着不同的言语能力和言语资源的人群中形成层次体系的呢?"对语言的依赖"是否蒙蔽了我们对一些其他重要交流形式的认识,如视觉审美观和性感(见 Brown,2001;Hegarty,2007)?我们可以运用质性心理学中的哪些研究方法转录一些普遍的、有意义的交流方式(如微笑、接吻或是一个会意的眼神)呢?规范的学术交流是以书面文字或口头语言的方式来进行的。是不是我们所处的这种基于文本的学界地位,或是人类社会所具有的实际特征,导致了我们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对文本的依赖"?

在第二天的分析结束时,两个小组将各自准备的分析的初步版本呈现给对方,两个小组的成员开始看到对方小组所作的贡献。令人鼓舞的是,即使那些之前批评我们的分析像"酒吧谈话"的成员,也鼓励我们不要受限或者因我们所做的而致歉。

在第三天所进行的最后一次分析中,我们的时间主要用于为演示做准备并做进一步的改进工作。由于我们正在做的事具有戏剧方面的特征,所以在我们对组织筹划、确保道具安全等事情进行协作的过程中,时间也很快过去了。我们当前更多地忙于人物、物体和空间方面的工作,而不是文字工作,因此没有使用挂图。在这部分分析工作中,我们都没有进行详细的笔记记录,因此我们将直接跨到演示本身。当天晚些时候,我们向一些感兴趣的学生和研究者进行了这部分的演示。

152

演 出

第一场：安尼尔和大卫

场景是英国大学标准的教室。约40把供观众坐的椅子呈横向排列，使之面向讲台左上方的投影仪，并且在右边安置了一块大白板和四把椅子，其中的一把椅子由男演员A(大卫)使用。一把拖把斜靠在右墙边。用一条白胶纸带沿中线将教室分为两块，分别为观众区和演示区。

演员B用投影仪开始按照标准的方式进行叙事分析的演示。第一张幻灯片题为“大卫的故事：平民街的邂逅”。分析的目的是：①概括进行叙事分析的关键步骤；②呈现我们对大卫的采访所进行的分析和解释；③分享分析过程中的一些反思。

第二张幻灯片被命名为“叙事分析：按步骤分析指南”，并且列举了五个步骤。它们分别是：①阅读与倾听；②辨别出所要寻找的重要概念(叙事语调、意象和主题)；③反思(即，个人与文化关系的分析、效化叙事心理学研究和采访中的相互作用动态)；④将所有这些编成一个连贯的故事；⑤写出研究报告。

呈现第三张幻灯片时，演讲者详细阐述了“语调”的概念。演讲者描述了几种在采访中明显出现的语调(包括“压抑的”、“生气的”、“敌意的”、“失望的”、“痛苦的”、“消极的”、“绝望的”、“顺从的”和“气愤的”)。第四张幻灯片关注于意象性的语言(通过采访的行编号来进行识别)与具体主题之间的联系。最普遍的主题就是“边界”，该主题通过下列词语表现出来：“门关上”(第452行)、“滑出来而不是掉下来”(第418—419行)、“走出那扇门”(第95行)、“围墙的另一边”(第403行)、“喝的G和T”(第191行)、“平民化”、“平民街”(第139和第156行)和“有点像黑人试图加入三K党”(第375—376行)。第五张幻灯片列举“我们思考过的理论概念”。它们分别是：①丧亲模式；②身份理论；③精神动力学的观点；④心理契约；⑤文化分析；⑥疏离感。

第六张幻灯片被命名为“将所有内容组合成一个连贯的故事”和“撰写研究报告”。正在演员B演示材料时，身穿军队衬衫的演员C突然从观众席上跳了起来，抓住投影机上正在放映的幻灯片，将它揉搓后抛在地上。起初演员B对此提出抗议，但演员C并不理他，还让演员B离开讲台。演员C穿过教室中间的那条线，脱下他的军衬衫并穿上一件平民衬衫，然后转向坐在讲台另一边的演员A。

153

> 演员C(对演员A)说：“你觉得，你的自我感觉是否受到了军队生活的影响？如果是的话，是如何影响的？”

演员B和演员C离开。

第二场：鬼城和平民街

演员A(大卫)将那块白板反转过来，展现出一幅巨大的手绘图画。画中呈现的是，孤零零的街道上有一排房屋，街道的尽头是一个封闭的墓地，天空中悬挂着一轮月牙。图画上的签名是“大卫”。

演员 A：你沿着这条街到处转悠并看到了鬼魂。你知道，你沿着走的这条街道，你在服役期间也走过，你现在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鬼魂，看到你曾经遇到过的人，你认识的人。或者，你从这家店出来之后，你料想到所有的小伙子都醉得像黄鼠狼，或是其他类似的东西，晃晃悠悠地走过来。即使他们今天没有如你想象的那样，我也能看见他们，这是你所知道的。我可以在这个镇上坐下来，思绪回到从前。然后你想，"是的，但是那里再也没有人了"，并且你知道……你想："上帝啊！你从未料想到会是这个样子。"你原以为还有某个人可以说说话，但是没有。

第三场：大卫的心声

讲台上有演员 A(大卫)、演员 C 和演员 D。

演员 C：(向演员 A 招手示意)嘿！小子，如果你想要份工作的话，那就过来吧……

演员 D：是啊！大卫，科威特受到了袭击。

演员 A：(面对着观众)你知道的，我已经准备好去了。

(暂停)

演员 C：你知道，你本不应该在这的。你已经得到了一份工作——为霸占他人的工作你做了些什么？外面有很多失业的人想得到这份工作。

演员 A：哦，他们为什么不来做这份工作呢？

(暂停)

演员 C：噢，因为我们是真的为曾拥有你而高兴。(走过去握演员 A 的手)

演员 A：(接受了握手并转向观众)你这个说谎的饭桶。

演员 C：身份证——谢谢，琼斯先生。

演员 A：噢，天呐！我做了些什么？

演员 C：哦，就是这样了，他没有其他东西可提供了，新鲜劲没有了。

(暂停)

演员 A：是的，这就是我。这就是你要找的人。录用我我将是一名出色的团队成员。

演员 C：噢，没有管理员这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你知道所有东西的位置——而我们不知道。

演员 A：(看着演员 D)好的，我们会把乱丢的杂物整理好。

演员 D：嗯……那是管理员的工作。

演员 C：好的，就这样吧，大卫，你干得不错，我们想念他。

(暂停)

演员 C：好的，让其他人来。

(暂停)

154

演员 A (对演员 C)说："你看，我要买房子了，我刚刚从军队退役——有机会请来并给我几点建议吗？"

(演员 C 转身走开了)

(暂停)

演员 A:“真见鬼,我已经不得不做这件事了。上帝啊!你从没有料想到会是这个样子。我都做了些什么?这就是我以后的生活。为什么不能像在军队中那样呢?这是什么?我是在哪里啊?”

第四场:妻子

演员 A(大卫)和演员 D(大卫的妻子)就坐。演员 A 用手捂住演员 D 的嘴巴,不让演员 D 说话。

演员 A: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妻子,我想我已经做了一些完全疯狂的事。我不认为我今天会绕过来——坦诚地说如果不是因为我太太。她——她很支持我,嗯,我退伍后的大约几个月有点发狂倾向,哪一个没有。嗯,那一阶段婚姻几乎破裂。但她坚持与我们在一起而后我们就这样了。

第五场:安尼尔与大卫

演员 A(大卫)和演员 C(安尼尔)就坐。

演员 C(安尼尔):好了,谢谢参加这次采访。

演出之后的解释

从当时的反应来看,表演是成功的。一位在场的有经验的社会心理学家建议,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可以再对访谈进行重新分析。另一位观众表示这次表演真的让她很有感触。这次表演也让表演者对资料有了令人吃惊的新认识。例如,演员 A 写到:

> 表演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其本身就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已经看了大卫的台词很多遍了,但不管怎样,在很多事先对表演不知情的人(因为观众事先不知道我们会以这种形式来呈现分析结果)面前把这些台词大声地说出来,确实让大卫的话有了生命力。我不敢说我在任何一个表演的环节都对大卫的经历有了切身的体验,但是我的确感受到了那种仅仅在采访记录中所感受不到的强烈情感。

由此产生的情感,通过表演将分析的资料带回到“现实生活”中,这种真实生活是那些正统的、规范的呈现形式所难以展示的。这使我反思我们的研究小组在质性心理学和大卫的伤心平民街之旅这个问题上所反复出现的不同见解。当我们开始分析的时候,几位小组成员很快就将大卫对军队纪律的渴望看作是一个需要心理学化的问题。这确实使我感觉非常尴尬。在我的笔记中,对第一节有如下的反思:

155

> 虽然在桌面上进行的谈话是相对的,但对大卫的内心状态推断得太快了。例如,有很多的讨论都是针对他的纪律性,认为那是对其他心理事件的抗拒或补偿。

无论是对我们还是对大卫而言,脱离纪律、规则都会产生焦虑。面对这种焦虑,我们可以遵循叙事心理学文本中提供的规则,或者是进行创造性的解释。但是,我们没有及时意识到,我们在研究方法上由于缺乏方向性所产生的焦虑,实际上与大卫离开军队后纪律性的丧失所导致的焦虑感是有共同之处的。

专栏 10.3 军队生活与社会科学的规则

军队纪律与心理学规则之间存在的相似性并非是偶然的。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77)的著作将社会科学的起源归于19世纪的政府项目,比如,军队"纪律"的研究——士兵们身体的控制。最早的系统的生理计量资料也是在军队中收集的(Hacking,1990)。同时,部队也为IQ和人格测量工具的大规模测试提供了场所(Kevles,1968)。量化心理学和统计学的历史完全和军队的历史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在质性心理学家们不愿意承认大卫对规则的渴望中,并非仅有巧合的滑稽之处。因为他们自己也想超出量化心理学家强加于学术研究上的各种规则和对人类经验的解释。

正如我们的演示所强调的,"边界"在采访录中是一个很关键的主题。然而,边界这个主题也构成了使我们的工作成体系"恰当"解释的焦虑。我们试图以一个舞台表演在这两种形式的分界线之间创造一些产生共鸣的可能性。在演示当中,物质空间以一条将那个教室划分为两半的胶纸带为界。讲台上,学术展示与大卫的军队生活中出现的情境在胶纸带的左边进行(从观众的角度来看)。平民街的所有事情都在右边进行,那幅许多演示要用的平民街画也悬挂在右边。学术演示中的粗暴打断行为刚好在对没有详细写出的评价进行讨论的时候出现。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帮助我们在学术性的谈话中(academic discourse),了解他人心理中内在的暴力性。 156

这并不代表我们赞同大卫所说的一切。第四场("妻子")的上演就强调了这一点:尽管大卫说他很依赖他的妻子,但他的话里却没有对妻子原话的引用。这一场使我们在早期对男性享有政治特权的担心成为了现实。当仅能够得到男性叙事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将这种实际上可能存有偏见的材料当作中性材料来处理。在第四场中,我们故意安排都是男性的演员A和演员C,为的是突出大卫妻子没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大卫的妻子并没有受到采访,即使大卫是在重复她的话,那些话也不再属于她。这一场中两个男性之间的身体接触也是故意安排的。抚摸某人的头部是一种非常亲密的行为。我们希望这能促使观众们思考婚姻制度的异性恋规范,思考大卫所描述的在军队中所感受到的支持。

专栏 10.4 回到叙事心理学上来

尽管质性心理学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但人类学家自19世纪以来就已开始运用参与式观察和民族志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了。正如玛丽·路易斯·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1986)所讲明的:人类学家在描述"土著"时尽量避免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影响,并弱化人类学家殖民主义代理人这一概念。叙事心理学家们怎样才能以一种可信的方式来建构他们的资料呢?这样做,是有益于还是有损于他们公正无偏的研究者的合法地位?当那些"被分析者"对研究者的资料提出质疑时,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正如在20世纪下半叶,殖民地人民对人类学家的研究越来越多地提出过的这种质疑,而且在今天,同性恋研究专家也对叙事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同样的质疑(见Barker et al.,in press;Crossley,2004)。

结束语

在本章开始，我们就回顾了质性心理学领域中存在的五种争论，它们分别是：叙事研究方法在多大程度上是经验型知识或非经验型知识，“方法论”对批判性研究的实用性，“专家”叙事分析的合法性，当前“叙事心理学”叙述的完整性，遵从和违背既定研究准则的有效性。在本文结束时，我想说的是：这些矛盾在一段时间内可能还会继续存在，但质性心理学家不应该被这种矛盾所困住而停止对普通人所述生活故事的关注。毫无疑问，对于那些宣称自己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新的、有效的或是易懂的质性方法的人而言，对于那些宣称自己已经完全逾越了正统心理学方法限制的人而言，他们都会在这种矛盾的争论中获得可观的回报。尽管如此，我参与此次团体研究的经验告诉我，在面对矛盾、焦虑时仍坚持自己的立场，可以让人学到很多东西。同时，人们也有必要沿着不同的方向思考问题，并与观点相左者展开开放式的交流，以便通过交流的开放性言语保持开放的思想。在类似的情况下，我们更有可能去相互学习，而不是由于盲目自信而带来苦果。

157

当然，这些开放式的互动关系不仅适用于研究者之间，也适用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我们作为社会科学家所接受的一些训练，是如何阻碍我们更好地倾听被访者的话语，而不是帮助我们成为一名好的听众的？发生在平民街的叙事，在很多方面不同于发生在军队中的叙事，前者（在表面上）更强调人的个性、独创性和创造力，而后者（在表面上）更重视命令、纪律和规章制度。当我们面对一份访谈资料进行分析时，有时难免会产生误解。但是，这并不是说某个群体内得到认可的价值观，在另一个群体中却可以成为中性的判断标准。大卫所说的对生活中的规律性、纪律性和可预见性的渴望并非等同于研究者对于新方法的追求。考虑到这点，我想请读者们能够在叙事心理学的发展中贡献自己的才智。

小　结

本章主要内容：

- 描述了一组人员进行叙事分析的尝试过程；
- 突出了在对研究内容进行不同体裁的展现时可做的理论选择（学术的、戏剧的等）；
- 提出了关于遵从与突破心理学质性研究准则之间的对立问题；
- 请读者考虑学术身份可能如何促使那些以不加反思的方式书写的人们边缘化。

11

质性资料分析：比较反思

伊凡希雅·莱昂斯

本章对序言和第二单元中呈现的四种资料分析取向进行了比较与反思，集中于分析的焦点、认识论问题及研究结果的“价值”，突出了四种方法的主要相似点和不同点。

本章还着重阐述了在质性研究过程中，每种方法如何概念化，研究者运用现有的知识、其个人经验以及处理言说立场的方式。本章也讨论了心理学探究的目标，以及什么是评价各取向研究的最佳标准问题。

关键术语

实际应用(application)
社会批判(social critique)
滥用/权势批判(abuse/power critique)
批判现实主义(critical realism)
情境建构主义(contextual constructionist)
呈现“他者”(representing the ‘Other’)
激进的建构主义(radical constructionist)
天真的现实主义(naïve realist)
研究的有用性(usefulness of research)
解释(explanation)
研究的品质与严谨性(rigour and quality of research)
应用批判的意识形态(ideology of application critique)

如我在第1章中所讨论的，当我们萌生本书的概念时，阿德里安·考利和我有两个主要目标。首先，我们想让读者感受质性研究各取向的理论和认识论立场如何影响研究的过程，以及给（相对的）研究新手提供将“专家”描述的分析过程应用于一套共用资料的尝试经验。我们相信这将使质性研究者明了他们在质性研究中经常面临的不确定与左右为难的困境。同时，我们也提供了在实践中如何处理此种问题的例子。其次，我们期望给读者提供一个比较的情境，以便使采择某种方法而非其他方法的原因和含义变得更清晰。

本章通过突出本书所关注的四种分析取向之间的某些异同点来展开这次讨论，这四种分析取向分别是：解释现象学分析（IPA）、扎根理论、话语分析和叙事分析。本章特地总结了每种方法的基本认识论假设，并讨论了这些差异对质性研究中某些核心关切问题的影响，也即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的角色、心理学探究的适当目标是什么，以及什么是评价质性研究的最佳标准。这些问题中的一部分已经在本书的其他章或多或少明确地提出了。我想首先通过总结、比较每种方法对这些问题的立场，以及援用研究者分析那些共同资料的经验来扩展这种讨论。同时，我将顾及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所作出选择的政治意义，特别是我们作为研究者如何概念化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

本章先从总结比较每种取向的认识论开始，因为这些假设影响每种取向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接下来转向各种方法如何看待研究者角色的问题。在质性研究中，研究者是知识形成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研究者将他们自己的理解、概念定向及文化知识的储备带到研究中。因此，在研究过程的所有阶段，质性研究者们都期望反思他们自己的行为和反应。这些反思可作为资料的一部分并且在资料解释中占有一席之地。我将讨论聚焦于研究者所扮演角色的两个特定方面：首先，研究者在研究的分析和/或解释阶段应当如何使用自己的传记经验及现存的理论知识？其次，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相互的话语立场的政治意义是什么？

此后我考察了四种方法中每种方法所表达的心理学探究的目标，并讨论了每种方法在何种程度上力求形成描述（description）、预测和/或解释（explanation），或者试图提供一种对现状的社会批判（social critique）。最后，我从与技术进步、理论发展和应用（application）的关系方面，讨论了最适合每种方法框架下所进行研究的评价标准问题。

四种分析取向的认识论基础比较

对研究可采用的认识论立场的主要差异，阿德里安·考利在其所写的第2章中已有描述。我们希望你在一个计划中选用的研究取向所蕴含的认识论的重要性，已在本书的“理论”和“分析”章节中做出了说明，事实也的确如此。每种方法的认识论基础会影响你给予你的资料的地位、你作为一个研究者的角色以及你可以从该资料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概念化质性资料不同取向的认识论立场有许多不同的方式。亨伍德和皮吉昂（Henwood and Pidgeon，1994）提出了心理学探究的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是基于经验主义认识论立场，主要的方法原则就是通过使用归纳推理而发现有效的说明方

式,并通过应用类似于信度和效度的标准来评价质性研究。第二部分是基于情境主义,涉及的主要原则就是主体间意义的建构,质性研究的有用性依赖于生成新理论的主张,且新理论稳固地扎根于特定情境中研究对象自己的意义。第三部分以建构主义为基础,它的主要方法原则是解释分析。这部分研究关注"语言的反身功能,它建构了世界上'对象'的表征,并且有着重要的话语效应"(Henwood,1996: 31)。

赖歇尔(Reicher,2000)对经验取向和话语取向进行了区分。前一种取向指的是关注了解人们如何经验并理解他们的世界,而后者则关注语言如何被用来建构出特定现实的看法。马迪尔等(Madill et al. ,2000)以一种连续体的概念来概念化质性研究中认识论立场的差异:在连续体的一端是被他们称之为天真的现实主义(naïve realist)立场,另一端则是激进的建构主义(radical constructionist)立场。

在这两种立场之间的某点存在着情境建构主义(contextual constructionist)立场。天真的现实主义缘于其极其简化地假定可通过适当的方法来发现现实。然而,其他形式的现实主义,如批判现实主义(critical realism),则认识到知识不是客观的,因此,更接近于情境建构主义的立场,情境建构主义假设所有的知识都是情境特定的,并且会受到接受者观点的影响。激进建构主义的认识论反对资料反映了现实的观念,并主要关注现实是如何通过语言而建构的。

任何将本书所关注的四种取向——根据它们理论上的描述,而后由分析章节中的研究者将它们付诸实践——划分到这些分类系统中去的努力,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些分类有点过于简单化了。例如,照这样分类的话,人们就会认为解释现象学分析、扎根理论和叙事分析应归入经验认识论类别,而话语分析也将被划分到话语类别。如果我们采用马迪尔等(Madill et al. ,2000)的认识论连续体,扎根理论将最接近于连续体中的现实主义一端,解释现象学分析和叙事分析将接近于情境建构主义,而话语分析将接近于连续体中激进建构主义的位置。但是,如果我们更仔细地查看这些方法所依据的假设,以及它们是如何被应用于现实中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中的一些明显不会隶属于此类或彼类。

161

例如,希拉·佩恩在第5章中所讨论的扎根理论的版本是以现实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的,因为它追随了格拉泽和斯特劳斯(Glaser and Strauss,1967),该理论假设研究对象对一件事或一种社会情况的认识能直接反映现实。同时,它也强调了需要理解研究对象与特定事件相联系的意义,并且强调最终的理论与知识应当被置于特定的情景中。因此,从这一方面讲,第5章中所提到的扎根理论版本与现实主义和情境建构主义取向拥有某些共同的认识论假设。

解释现象学分析和叙事分析以某种现象学取向(见第3章和第9章)或"情境建构主义"认识论为基础(Madill et al. ,2000)。它假设语言反映了研究对象的经验,研究对象与特定事件、社会情境相联系的意义,尽管史密斯(Smith,1993)认为要了解到研究对象的经验及意义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它需要研究者解释资料。话语分析被认为是以激进的建构主义认识论为基础,这种认识论质疑我们认为理所应当的分类方式及我们理解周围世界的方式。这种认识论将语言视为范畴和事件的建构,而不是"现实"的反映。但是在本书的第8章,克里斯·沃尔顿对福柯式话语分析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这种话语分析不仅强调了语言的建构角色,而且认为话语揭示了谈话者如何被他/她所在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所塑造。

研究者的角色

将研究者的理论知识和传记经验考虑在内

各取向认识论的主要影响之一便是其选用者，作为一个研究者，你在研究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你怎样使用你卷入研究过程中的理论知识和传记经验。在分析章，所有的研究者都讨论在他们不安于一种解释优于另一种时，来自不同背景的团体成员强调资料的其他方面，或使用不同的理论概念来理解他们所获得的资料，已说明了研究者的理论和传记背景怎样被应用到研究中。

162

在本书呈现的以一种现实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的扎根理论中，人们期望研究者能形成一种对资料尽可能精确叙述的理论。然而，注意到其他版本的扎根理论会承认分析过程的解释和社会建构主义层面是重要的（Charmaz，2006；Rennie，2000）。不顾研究者的社会地位和/或之前的相关经验和/或他（她）的特定观点，人们都期待一个娴熟的研究者能够发现并展示特定背景下行为者的意图，理解其所研究的现象。在第6章分析退役军人访谈誊本的时候，希拉·霍克和克瑞斯丁·科尔指出编码过程就是“注意”的过程。他们希望突出对资料进行系统思考的重要性，以及资料编码、编码中的联系被注意（被发现）的重要性。他们也提醒我们评价扎根理论研究的关键标准之一就是资料与新产生的理论之间的“拟合度”。第2章中所概要提出的评价标准对每种方法的相对恰当性，将在本章的后半部分进行讨论。这里的重点是强调要注意在研究的分析阶段研究者与资料之间的距离。

解释现象学分析采用现象学（Giorgi and Giorgi，2003）和诠释哲学（Palmer，1969；Ricoeur，1970）的认识论。解释现象学分析承认，在试图探究研究对象意义和经验的时候，研究者涉入了一种解释活动。研究者试图理解研究对象为认识自己的世界所进行的努力。在研究者力图描述和解释研究对象经验的过程中，他们先前所持有的知识和观念便积极卷入到了分析过程中。研究者扮演的角色是双重的：首先，他们要尽量使自己站在研究对象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其次，因为认识到人们所表述的东西与其所经历的东西之间没有简单的和/或直接的联系（见第3章），他们要针对研究对象的言语问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对该过程肤浅的了解，可能会导致一个人怀疑这里所说的解释现象学分析是否与激进建构主义取向拥有相同的假设，即在微观对话背景或在宏观意识形态背景下，谈话者建构了他们的现实、经验了特定功能的实现。然而，解释现象学分析（IPA）与话语法是不同的，因为解释现象学分析假定研究者能了解到研究对象不能意识到或很难表达的动机与理解；但话语取向则没有将动机归于研究对象，也不会用他们的话来反映他们可能或不可能意识到的经验。该方法是考察人们所提供的经验叙述，考察通过这些叙述表达了什么特殊对话和/或意识形态功能。

163

叙事分析同样也以现象哲学为基础，并且认为研究者的任务包括两部分：描述资料和解释资料（见第9章）。该方法假设研究者能够理解研究对象以书面或口头报告形式描述的自我经验的个人和文化意义。此外，为了解释资料以形成一个条理清楚、有说服力的叙事，研究者采用了一种积极的和创造性的角色。

话语分析法认为研究者的职能就是构造或编写一份对资料的叙述（见第7章）。基于这样的假设，话语分析法认为语言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是现实的组成部分。话语分析取向确实没有给理论或分析叙述以特殊的地位。后者被看作是特殊事件的建构，是调查取得的资料。因此，人们期望研究者能够反身思考。

尽管它们对于怎样处理这种问题有不同的认识，但以上的概括表明了所有取向都认同的一点，那就是，研究者的心理学知识和经验是与研究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扎根理论方法早期版本的倡导者认为：在开始进行研究的时候，这种"看法"应当被置于一旁（Glaser and Strauss，1967）。然而，人们会质疑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可能会意识到自己的信念和背景知识与执行一项研究的方式相关。如果能够了解这些信念和背景知识的话，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将他们置于脑后？即使我们这样做了，又怎样对我们正在调查的现象设定规范呢？（和/或）我们应当问一些什么领域/范畴的问题呢？要该领域的其他研究者接受这样一种方法是空想，他们认为研究者该做的，就是在课题开始的时候搞清楚任何可能影响他们执行研究的信念和经验（见本书第5章；Pidgeon，1996）。例如，卡麦兹（Charmaz，1990）建议质性研究者必须要有一种视角，从这种视角他们能积极地寻求建立自己的分析，而并不仅仅是将它应用于新资料中。这样的视角包括了能够引导问题被提出的实质性兴趣、研究者的哲学立场、能够提供一堆灵敏概念的思想流派以及研究者的个人经验、优先顺序和价值观。

解释现象学分析鼓励研究者忽略他们自己的经验以便能进入研究对象的世界，与此同时，也要积极使用他们的背景经验以便解释研究对象表述的经验。类似地，叙事分析假设研究者能够了解到研究对象叙事中的文化意义，并能应用这些意义来分析资料及提供研究者的叙述。尽管将研究者自己的理解和知识在研究中所起的作用加以概念化似乎比较有道理，但两种方法都没能在理论上令人满意地说明研究者的"看法"如何应用于研究中。它们没能告诉我们如何将我们自己的看法组合进对资料的最终叙述中（Willig，2001）。 164

从话语分析的另一方面来说，研究者仅能够提供他们自己对研究资料的建构，而不能发现"事实"或目睹研究对象的"经验"。因此，研究者需要问一些关于这些特殊的叙述和物质情境可能含有的问题，这些特殊的叙述是他/她为话语提供的，而资料和研究受众处于物质情境之中。

呈现"他者"

研究者们经常焦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呈现研究对象。此忧虑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这个问题关系到探索的本真性：研究者希望确保他/她没有"歪曲"研究对象的叙述与经验。其次，这是个可能有着政治含义的问题，尤其是当研究对象有着不同于研究者的经验，并且属于没有机会表达经验和主张其权力的群体时（Kitzinger and Wilkingson，1996）。

希拉·霍克和克瑞斯丁·科尔在第6章中使用扎根理论对退役军人的采访记录（见附录2）进行分析时指出：他们所担心一点就是他们没有足够的知识脉络来指导其如何收集资料，同时也没能获得研究对象足够的背景资料。因此，他们急于强

调他们对资料的解释不是很自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担心新出现的主题和理论可能不是扎根于研究对象话语的"恰当"解释。换言之,他们担心他们的解释和结论可能曲解了研究对象的叙述。

在第4章中,当解释现象学分析小组分析退役军人大卫的叙述后报告的时候,莱斯利·斯托里评论该组的焦虑时说:使用特殊理论建构来了解大卫的内心世界将使他们远离"曲解"大卫的经验。她也讨论了在分析过程中,由于与研究对象过于接近而可能带来麻烦。她觉得这将导致研究者迫使"资料遵从于他们自己的经验"。同样,如果研究者反过来不认同被访者,她认为"会很难重视(或至少同情)被访者,并因此很难达到解释现象学分析所追求的对研究主题的那种'知情者'视角"。研究者们渴望通过自己的眼睛去理解被访者的内心世界,而不是以不认可或不赞同的方式去判断或展示他/她。

165 相比之下,在将福柯式话语分析应用于采访记录而建构一个叙述时,克里斯·沃尔顿认为,分析小组的关注点不在于理解大卫和布莱恩的经验(见第8章)。相反,他们的分析关注于"当他们谈及或建构他们服役和退役身份时所使用的词汇和短语"。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该组发现,由大卫和布莱恩用来建构他们身份的话语,以特殊方式参与到了描写与重构它们的过程中。

尼尔·哈比森在第10章论述叙事分析小组讨论资料分析时,提出了类似的关切。哈比森置疑那种认为我们使用口头或书面叙述能接近过去文化意义的观念,并且认为这些来源的信息给予受过教育和有特权的群体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地点以更多的发言权,因为这些群体更可能以权势形成一些主导的历史描述,并因此而忽略相对劣势群体的经验。因此,在"没有特别照顾某种观点,也没有作出一些未确认的政治承诺"的情况下,哈比森质疑对记录进行叙事分析的可能性。此外,哈比森关注研究者生活的社会界——它重视创新和创造,它会在何种程度上干扰我们对退役军人的秩序与纪律环境作出的判断。换言之,哈比森质疑我们作出的叙事分析,能否对研究对象对一段时期生活的反思以及可能影响这个过程的因素作出解释。他向我们展示了以一种反映研究对象内心世界的方式去描述资料并顾及研究者叙事形式的政治含义时的两难。

在所有的这四个分析章节中,我们很容易发现研究者一直被一个问题纠缠着,那就是他们最后的分析报告将会怎样影响他们的对研究对象的描述。首先,无论所采用的资料分析方法是什么,作者们都很强调"扎根"于原始资料进行叙述的重要性。在这方面,他们均表明研究者的叙述是以经验资料为基础而不是随意作出的,力求以此来建立起他们对大卫和/或布莱恩叙述的可靠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本书所提到的任何分析方法都把对经验证据的解释看作是一个中立的或客观的过程。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四种方法都承认研究者参与了对资料的解释或建构(解构、重构),并认为每种方法的概念化存在某种程度的主观性和政治倾向。他们都承认最终的分析叙述将构成大卫和布莱恩世界的特定描述,这将以特殊的方式来呈现/建166 构大卫和布莱恩。此外,这种承认是否会引起不同的忧虑将取决于每种方法的认识论基础。

影响此过程的主要因素可能有两个:第一,现有的理论和心理学术语的使用;第

二,研究者建构自己的方式。因此,根据一种现实主义认识论,第5章中所展示的扎根理论版本提出了问题:研究者在何种程度上理解了研究对象身处的特定事件情境的意义,以及浮现的理论能在何种程度上以研究对象理解自己的方式描述研究对象。

依据现象学取向的解释现象学分析提出的问题是,研究者能在何种程度上进入研究对象的内心世界并以一种引发研究对象"真实经验"的方式来解释资料。同样,这里所担心是要确保对研究对象叙述的切题并保证其可辨识性。在第9章所描述的叙事分析版本中,所提出的问题是关于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所进行的叙事较原叙事的有效性与优化。最后,基于激进的社会建构主义认识论,话语分析关心的问题是研究者的话语立场如何通过他/她的分析影响对研究对象的建构。

当我们的研究对象是特定文化中的"另类"群体的成员时,我们如何对其他人进行描写就显得特别重要了。例如,女性主义研究者认为女性在传统上就被建构为"另类"群体(Kitzinger and Wilkinson,1996;Ussher,1991)。精神病患者、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者、经济上的弱势群体、HIV病毒携带者或艾滋病患者、非白色人种及残疾人都被视为"另类"群体:他们被认为是与"心理健康"模式、异性恋、有特权的中产阶层、白种人及健全人对立的群体(例如,Coyle,1996;Fowler and Hardesty,1994;Marks,1996)。

这里的问题是,我们在为这类群体代言以增加他们的自主权、通过我们的报告表达他们的声音以形成一种社会变革的希望,还是会显得冒昧地使这些尝试强化否定这些"另类"群体的声音。这种困境可用以下两句引文加以概括:"我们应该接纳整个世界,我们不能承担'禁区'的想象,我们不能拒绝对任何主题的意见。"(Livia,1996:36)"没有人应该'充当代言人'或臆测他人的心声……它会变成一种形式的殖民。"(Sinister Wisdom Collective,1990:4)

基辛格和威尔金森(Kitzinger and Wilkinson,1996)确定了女性主义者提出的研究者处置"他者化"问题的四种不同的方式①:第一,有人认为我们仅能代表我们自己讲话,即我们仅能对与我们拥有共同经验的群体进行研究;第二,有人主张我们应该讲差异性,而不仅仅是颂扬它,然而,这也有将"另类"群体理想化的风险;第三,另一种思考认为我们应当颠覆自己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来处理这种另类性问题。这可能意味着权力弱势群体成员(例如黑人研究者)去研究权力优势群体(例如白人),以图逆转已经建立起来的权力关系。

167

在研究"另类"含义的争论中,其中的假设之一是存在一种简单的方式可将人们分组或安置到特定的社会类别中。例如,我与来自少数民族社区的年轻人一起工作的时候,经常不得不写有关出生于南亚地区的女性的经验。她们构成了一种"另类"群体吗?我和我的研究对象属于不同的种族和年龄群体,但我们都可归类于女性和移民(因为我来自塞浦路斯)。我经常会发现我采访的都是社会经济地位比我低的女性,但我们都能细述被歧视的经历,哪一种身份定义了我们,决定了我与我的研究对象对彼此是异类还是来自同一个群体?人们的群体隶属是多重的,如果我们仅能研究与我们具有共同点的群体成员并为之代言的话,那就显得既不切实际,也

---

① 作者在这里叙述有四种,后文只陈述了三种——译者。

太过简化了。此外,作为研究者,由于研究对象属于某个特定的群体,在假设他们必定以这些成员的隶属来定义或建构他们的身份时,我们要做到小心谨慎(Camp et al. ,2002;Finlay and Lyons,2000;Lyons et al. ,2006)。

专栏 11.1 谁是“另类”?

R.奥岗吐昆(Ranti Oguntokun,1998)讨论了一个并不总是被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反映出来的明显“相似”。奥岗吐昆研究在英国的非洲黑人难民的经历,因为她自己是位非洲黑人女性,她和她的研究对象将不会彼此视对方为“另类”。她描述了自己是如何开始的她的研究假设。她说:

> “我以为共有的肤色、共同的大陆起源和共享的移民地位,将使我有权作为一个“知情人”对这些女性的经历进行合法、准确的描述,避免因研究者的文化和种族不同而可能犯的错误。”(526)

168

然而,她接着讨论了她是如何很快就认识到,她不能继续认为自己与研究对象的取代感和思乡病是相似的,因为她的研究对象们大多都逃离了饱受战乱的地区,也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此外,她的研究对象也不接受她的这种主张。一个来自索马里的女性难民对她说:

> “我没有和其他人说起过索马里,因为它包含的东西太多了。你不会明白的。在你的国家没有战争,不是吗?真的太糟糕了,你将会为索马里流泪的。”(527)

奥岗吐昆的反思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该事例中,在同一群体成员的经验不同的背景下,表面的“相似性”达到什么程度会成为虚幻,以及那些想要描述不同于研究者的人所要面对的困境。在回应这一点时,奥岗吐昆承认了她与她的研究对象之间的不同,并将自己定位为知情者而非团体内成员,同时竭力形成一个有见地的、同情非洲黑人女性难民经历的叙述。

从一个批判的、激进的社会建构主义角度来说,注意到呈现“他者(representing the ‘Other’)”群体很重要,它不仅仅是一个描写过程。我们描述“他者”群体的方式不仅反映“他者”的经历,它同时也以特定的方式构成了我们和“他者”。奥尔克芙(Alcoff,1994)认为我们有必要通过问一些问题来评估为他人代言的立场:我们为什么想谈论他人,我们是谁和我们自身为其他人代言经验的相关性,以及我们叙说对话语和物质情境的影响。

专栏 11.2 对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进行批判性了解的策略

采用批判的和反省的方式来为“另类”他者代言有许多不同的策略。例如:

- 请你的研究对象评价你描述的有效性。
- 倾听你的研究对象怎样描述“你的群体”,以便你自己的观点被问题化并展示它的相对性。
- 倾听权力群体(你所在的群体)中的其他成员如何谈论研究对象所属群体(另类)中的成员。
- 尽量在你和你的研究对象之间创设对话的机会,以避免有的叙述享有特权。

169

这些策略中的一些较另外一些容易做到。重点在于使用策略来切断权力群体优先叙述的过程,而我们作为社会科学家通常隶属于这样的群体。要想了解更完整的讨论,可参看费恩(Fine,1994)、基辛格和威尔金森(Kitzinger and Wilkinson,1996)的著作。

我已经决定留出一些篇幅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提出一些关于我们研究

的政治和社会影响的问题很重要。在类似本书的书中,我们关注如何进行研究的知识与技术的讨论,所以很容易就会把研究过程想象为在社会和政治上是中立的,并且过分关注我们方法技巧的严密,而这有意无意地损害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希望这次讨论能使你意识到需要对我们所致力的研究的政治与社会影响保持警觉。

评价四种分析取向

在本部分,我想讨论各种评价方式,它们用来评价本书所描述的四种方法中每一种进行研究的可能性。阿德里安·考利在第2章中指出,某些评价标准重复出现在一些质性研究方法文献中,包括要保证研究对象所处的情境得到足够的描述,分析过程要以明了和细致的方式来呈现,要反身叙述研究者的"言说立场"在研究的各个阶段可能的影响,以及解释要扎根于研究资料。他同时也关注研究的实践意义,在这一点上他认为研究者应该尽量去做好。他还考察了质性研究者已经提出的评价标准(例如,Elliott et al.,1999;Yardley,2000),发现它们似乎与研究活动的严谨性和质量(rigour and quality of the research activity)有关,或者与研究结果的有用性(usefulness of the research)相关。研究的有用性通常被看作是对理论发展的潜在贡献和/或对现实生活情境的适用性。

考利认为关于质性研究最适合的评价标准,在多数质性研究者那里并没有一致的意见,并且认为相对于质性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这种意见上的不一致也不足为怪。我想通过关注适合我们推崇的四种方法中的每一种的评价标准来扩展这个讨论。一个恰当的标准由什么构成取决于方法要达到的效果,但也可从各种特定方法基于的认识论视角差异来评价。因此,在考虑我们可以用来评价用四种方法进行的研究的评价维度之前,再次讨论每种方法宣称的心理学探究的目标是有益的,它们源于它们所持有的认识论立场。 170

在扎根理论中,其目标是要形成密切源自资料的归纳理论。这种浮现的理论必须能够解释从所有研究对象中得到的资料,甚至包括那些提供了矛盾性资料的案例。目的就是要产生一种能解释正在研究的社会和心理过程的理论,理解可导致特殊事件因果关系的本地网络,以及研究对象又是如何理解它们的。扎根理论研究者要寻求事件/变量引发另一事件的可能的和有说服力的机制,并且考察在具体情景下行为和过程网络的复杂性。

当扎根理论旨在获得基于资料的解释性理论时,解释现象学分析则主要对提供研究对象生活经历的详尽描述感兴趣。为何研究对象们以特殊方式经验他们的世界,这对解释现象学分析研究者来说只是次要的事。类似地,与解释分析相比,叙事分析对详细描述更感兴趣。此外,其关注点在于分析个人的经验和内在的意义,而非寻求不同人之间的共性。

在话语分析中,心理学研究的目的是通过颠覆已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对世界进行分类的方式,来提供一种对现状的严格审问。话语心理学考察会谈和文本中特定话语资源所执行的社会功能。福柯式的话语分析有时会更进一步,即试图理论化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它们提供了特定的话语资源,并影响使用它们的人。从这种意义上说,福柯式话语分析可提供一种理论来说明一些话语在历史上如何形成了它们自己的样

子，或它们是如何扎根于特定的结构与制度情境之中的（例如，见 Parker，1992）。

考虑到所关注的各种研究方法力图实现的目标不同，适当的做法是用不同的标准去评价不同的研究方法（尽管一些标准与所有的研究方法都相关，例如，须通过援引相关的资料去佐证所作出的阐释）。例如，对以形成一种理论为目的的现实主义认识论框架下的扎根理论研究，最好通过展示资料收集方式和分析过程捕捉到的研究对象的"真实"经验和意义来评价。这一点可以通过将分析过程透明化，以及为核查研究者分析的有效性时常回到研究对象加以证明（尽管这将出现问题，即研究者的解释与研究对象解释之间的不同该如何处理的问题）。此外，也可用三角互证对一种解释进行评价（参见 Moran-Ellis et al.，2006）——也就是，分析的有效性可以通过两个或更多研究者得出相同结论的程度来加以证明。

171 另一方面，诸如解释现象学分析和叙事分析这样的方法，通常对详尽描述而不是解释感兴趣，因此它们也更适合通过表现研究行为的严谨性和自反性加以评价，而非通过接近研究对象真实经验的相对充分性加以评价。类似地，用没有对发展解释性理论作出贡献来批评这些方法也是不合适的。

在话语分析中，话语心理学主要关心语言怎样建构特定的对象和现象，并且其在大多数时候是挑战现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建构世界的方式，而不是解释某些行为会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相反，福柯式话语分析主要关注社会结构、制度和权力关系对特定话语可用性的影响，以及特定话语提供的行动可能性。在这方面，福柯式话语分析更关注于解释某些话语在什么条件下会被采用。然而，考虑到两种取向都是以激进的社会建构主义认识论为基础，就不适合以精确化描述"真实性"的程度来评价它们，而应以分析的严谨性和质量来评判它们。例如，安塔基等（Antaki et al.，2003）分析了许多话语分析研究者在处理会话和文本资料中的六项不足：①通过总结的分析；②通过偏袒的分析；③通过过度或孤立引证的分析；④话语和心理结构的循环论证；⑤虚假的调查；⑥仅找出存在于文本中特征的分析。

但是，心理学是应当关注理论的发展，还是仅仅关注社会与心理现象的描述，这是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之一会是，心理学知识是这样的，我们不能主张但可以力争解释，因为我们对目标现象描述得还不够。答案之二会是，如果心理学家参与到了发现真实生活问题的解决办法或引发社会变革之中，那么，他们的目标就应指向发展解释性的理论。

最后提到的这个争论与一个评价研究的关键问题有关，即我们认为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是有用的。考虑到这个评价标准会引出的一系列问题（例如，研究应对什么是有用的，以及它对谁是应该有用的）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研究是应该为理论的发展服务，还是应该着眼于实际生活情境中的应用，让研究看起来更为有用？研究者应当将有用信息提供给谁？研究者是否应当将所执行研究的有用性瞄准研究对象、研究的资助者，抑或其他研究发现的潜在使用者？我们提出这些问题，就是为了使研究者认识到它们是很有用的。

172 许多研究者，尤其是那些拥护社会建构主义取向的研究者，已经将批评瞄准了那种认为心理学知识可以并应当易于应用于现实生活情境中的观念。威利格（Willig，1999）发现有三种针对试图将心理学知识应用于真实生活情境中的评论。第一种，通过宣称特定的应用必须以"科学"和"客观"的知识为基础，认为特定的应

用将利害相关者的活动合法化,并因此阻止其他人提出关于为什么、怎么样、以及应用心理学理论对谁有利的问题。她将此称为“应用批判的意识形态(ideology of application critique)”。第二种,威利格谈到了由克罗姆比和斯坦登(Cromby and Standen,1996)所给的评论,他们认为那些诸如政府官员之类拥有权力的人,使用心理学的研究发现是为特定政策辩护,这些政策是他们为了政治和经济原因而采取的。这通常被称为“滥用/权力批判(abuse/power critique)”。第三种,她引用了威迪孔贝(Widdicombe,1995)的观点来反对一些批判心理学家提出的干预建议,因为这些建议倾向于通过具体化特定的意义及与它们相联系的话语,来剥夺受压制群体的权力,而非授权给他们。不过,威利格(Willig,1999)令人信服地提出,话语分析可通过提供对现状的社会批判、授权给受压制的群体及引导变革,对社会和政治实践作出贡献。

我们竭力进行的研究可否处理真实的生活问题?我们能否提供一种对社会或心理现象丰富而有趣的描述?什么标准应当应用于评价我们的研究?所有的这些问题和困境都只能在具体的项目情境下才能得以解决。重要的是我们作为研究者,需花时间去思考所从事研究的潜在实用性或其他方面。

小　结

在本书中,我们的目标是以一些心理学质性研究的概念与方法工具武装读者,以使其能在质性心理学研究的不确定领域航行。质性研究为深入探究我们情绪、社会和内心世界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冲突性,提供了令人兴奋的机会。我们希望我们已经唤起了你的热情,并激发了你着手研究那些在社会上和政治上都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对你重要的问题。

我们已竭力为你解答了一些你可能在做质性研究时遇到的问题,或是在从事质性研究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希望我们已经提出的问题和我们已经回答的问题一样多。衷心地希望你能抓住这些问题中的一些并形成你自己的答案,这将有助于质性研究方法的进一步发展。毕竟创造新知识应当是协同努力完成的!

173

延伸阅读

对于那些有兴趣进一步探究认识论与方法之间关系复杂性的人来说,米歇尔・史密斯的《社会科学中的哲学与方法》对这些问题给出了精彩的讨论(Smith,2005)。对于研究与真实生活应用之间关系的争论(特别是话语分析的应用性)感兴趣的人来说,威利格的《应用话语分析:社会与心理的干预》提供了有用的阅读材料(Willig,2001)。最后,那些对我们如何描写“另类”的政治含义的深入反思感兴趣的人来说,苏・威尔金森和科里亚・基辛格编辑的《描写他者》提供了一些研究者与不同研究对象群体合作时,如何处理此类问题的深刻见解和实例(Wilkinson and Kitzinger,1996)。

资料集

附录1

本书各分析小组使用的资料，取自一个针对退伍军人离开军队后重新建构自己身份的质性研究，它是我在萨里大学接受心理辅导博士项目培训研究的一部分。这项研究与我自己的经历密切相关。因此，概述有关推动我进行此项研究的个人经历，可能有益于研究的情境化。

作为一个服役26年的老兵，军队是个我熟悉的环境。但是，在要退伍的时候，我对于离开的过程一点也不了解，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从一个岗位转到另一个岗位，获得的只有军人的经验，而与此同时，平民生活变得离我越来越遥远。退伍后，我得尝试适应平民生活。我试图将自己沉浸在这种新的、有时奇怪的生活环境中，并"使它奏效"。在这样做的时候，我试图与自己的军队经验保持距离——不要再成为一名士兵而是要成为一名平民。然而，结果很快就表明，将你26年的士兵生活放置一旁根本不是一个容易的或直截了当的过程——奇怪的是我可能想过它可能的样子。

正值我报名萨里大学心理辅导博士项目的时候，这个不断增长的念头达到了顶点。在这里，我有机会对单个主题研究三年，从不同的理论和方法探讨它。虽然我考虑了几个研究方案，但我觉得我会不可避免地被我最熟悉的东西所吸引，即军队。而与此矛盾的是，我对此知之甚少，除了我自己孤立的经验，即离开军队的过程。在研究中，通过与其他退伍军人联系而"重新进入"军队的想法，既令我兴奋也充满挑战。其他士兵退伍后是如何应对的？如果重提我仍然怀念的军营生活，我会作何感受？会唤醒我自己间或的困难和消极情绪吗？如何表现其他士兵离开军队的经验？他们会与我分享这些经验吗？

我首先做的是质性研究，然后是一个量化研究，探讨退伍士兵如何经历和谈论他们从军队到平民生活的转变。我的特别关注点是他们对这段经历的自我意识，这使我用布里克威尔(Breakwell,1986,1996)的身份过程理论来启发我的质性研究、架构我的量化研究。然而，这个理论在我的质性研究中只是稍有触及而已：在拟订访谈日程表的过程中，它没有发挥明显的作用，也从未驱动分析，它只是对分析有所启发而已，资料分析在启动后，便尽可能地以自身的逻辑进行。

在这个质性研究中我招募了10名退伍军人。首先是通过英格兰东南部一个驻军镇的本地报纸做广告招募人，然后通过最初招募样本"滚雪球"（即研究对象提名可能愿意参加的人）。他们的年龄介于40岁到48岁之间，平均年龄43.5岁。他们全部是白人，已婚。他们在军队10~24年，平均服役时间为20.5年。研究访问前，他们已离开了军队1~10年，平均5.6年。退伍时，1人是少校，4人是准尉，3人为

中士,2人为下士。访谈时他们的职业情况为,2人有专业职位,3人是技术员或专业辅助人员,2人为技术工人,3人为非技术工人。

我使用半结构式访谈程序采访了每个人。我对访谈过程进行了录音,并在进行质性分析前做了转录(改变了研究对象的名字,修改所有的身份信息,以做到保密;在转录中的六个点表示研究对象的暂停)。这是一个有趣的过程,特别有挑战的是,有时我要设法将我自己的经验放置于括号之中,以免它们过度影响我的解释,与此同时,还要搞清楚如何更好地运用我的个人经验来丰富分析。很明显,我自己的经验与研究对象的经验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一些研究对象比他人在经历军人到平民生活的转变中,遭遇到的困难要多,而有些人显然很少遇到困难或没有遇到。尽管我曾担忧这个群体可能不愿意参与此项研究,但从结果看来——也许是因为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或"我们中的一个"——多数人真的很想谈论他们转型中和转型后的经历与感受。尽管我曾对进行这项研究抱有怀疑和忧虑,但整个过程对我来说是积极和有益的,有助于验证和顺应我自己的经验。此外,被允许进入这一特殊人群的世界,并分享他们的丰富经验,使我感到荣幸和谦卑——对此,我将永远感激。

178 我很高兴许可本书各分析小组使用我的部分质性资料;并且非常期待看到他们用解释现象学分析、扎根理论、话语分析和叙事分析对誊本的资料进行分析,比较不同方法的结果。虽然我已决定不向外界透露我在自己的研究中所使用的具体分析方法,在这篇序言我所进行的反思中,读者可能已经清楚我没有用话语分析方法。

时间已经冲淡了我试图理解这些资料时的挑战、挫折和焦虑记忆(该研究是在2000年进行的),所以,现在,我最清楚记得的都是那些激动人心的突破和思维清晰的时刻。我希望,决定使用这些誊本来练习和完善自己的质性分析技巧的读者,也能体验到我那些难忘的感受。

——安尼尔·里德

参考文献

Breakwell, G. M. (1986) *Coping with Threatened Identities*. London: Methuen.

Breakwell, G. M. (1996) 'Identity processes and social changes', in G. M. Breakwell and E. Lyons (eds), *Changing European Identitie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alyses of Social Change*. Oxford: Butterworth Heinemann. pp. 13-27.

大卫采访录

1 **安尼尔**:在哪些方面,如果有的话,你觉得军队
2 影响了你对自己的认识呢?
3
4 **大卫**:它给了我更多的自信。当我加入军队时还是个小男孩,
5 开始我根本不自信。我想我加入军队是为了了解我会如何
6 做一件事。排名第二的是——我加入了逃脱的行列,
7 因为我没有技能。我没有或只有很少的教育。我的教育
8 不能使我胜任,所以我需要一份工作,在那里我能开始工作
9 并且让我的口袋里有点钱。而且,正如你所知道的,在那些日子里,
10 他们会说“嘿,如果你想找一份工作,我的孩子,到这里来吧”,
11 然后就是这样了。但是它绝对给了我信心——走出去的信心。
12 正如我们所说的,一旦我离开军队,我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一份
13 工作——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14
15 **安尼尔**:如果有,作为一个士兵哪些方面对你是重要的呢?
16
17 **大卫**:我是团队的一员,我是一个团队的重要成员,而且
18 我认识到我就是要为我的国家做一点事。是的,
19 我准备好了,如果他们说,“对,大卫,
20 科威特受到攻击了,你知道的,我已经准备好了去”。
21 嗯,它并不是“哇,那是他们的国家,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22 如果老板想让我去,我马上就去。这对我很重要。这就像,
23 正如我所说的,我有一种身份,我属于某个地方。
24
25 **安尼尔**:你说你有一种身份感,你能多谈谈这个
26 方面吗?
27
28 **大卫**:是的,我是,我是一个团队的一部分。我是一个司机,
29 没有我们司机,就没有人能得到他们的物资,所以我们很重要,
30 我为此而感到自豪。嗯,这样的身份对我很重要,你知道——
31 我们在所做的工作中是重要的。
32

33 **安尼尔**:那你现在还拥有它吗?
35 **大卫**:[叹息]人们喜欢告诉我,我拥有它,但我知道,
36 我现在没有它了。你知道,我在学校[做管理员工作],
37 他们会说,“噢,没有管理员这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38 不会发生。你知道所有东西的位置——而我们
39 不知道”。正确。是啊,你知道,如果我休息一周,
40 就开始变糟了,因为人们不知道东西都放在哪。但
41 同样,如果我碰巧离开了那儿,或如果我被一个巴士
42 辗过,你知道,事情会将是:“好吧,就这样。大卫,
43 你干得不错。我们想念他。好,找其他人来。”
44
45 **安尼尔**:看起来做一名学校的成员和做一名
180
46 军队的成员似乎有些不同。
47
48 **大卫**:你不是学校团队的成员,因为你不是一名教师。
49 所有老师都是避开的那种……我有时想,为什么当前孩子
50 的行为就像他们,而且我可以以某些教师的标准理解。
51 他们不做简单的事。比如,在一天结束放学之前,
52 老师会说“好的,我们会把乱丢的杂物整理好”。可他们
54 根本没有这样做。他们只是离开,您知道,好像在说,“啊,
55 这仅仅是一个管理员和他同事的事——他们会做的”。这让我
56 很烦,因为作为一个团队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像我们
57 在军队中那样,你知道,我们从头到尾都有从上面得到帮助的权利。
58 平民在团队中有不同的想法。他们会尽可能做有益于自己的事
59 然后“对,就是这样”,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团队的一部分。
60 这是困难的部分,我觉得。
61
62 **安尼尔**:你可以想一想并告诉我,你的价值观
63 和个人信念与你的军人训练或者军队生活
64 有关吗?
65
66 **大卫**:我认为它们占了很大的比例,是的。正如,
67 对你的队友诚实——啊——这,你知道……如果你
68 对你的队友不诚实,那么上帝啊,你就在狗屋里了,
69 黑暗和肮脏的东西一直会到你的脖子。嗯,纪律。是的,
70 我想我在军队获得了它们的大部分。啊,我不会说我能
71 在家里学到它们,因为我妈妈去世时我还小。我
72 小时候,你知道,嗯,所以我是被祖母带大的。
73 是的,我不认为她有大量的时间,因此——因此是的,
74 我想我是从军队中获得了它们中的大部分。

75
76 **安尼尔**:人们往往以独特的方式经历这种
77 到平民生活的转变。我想听听您的经历
78 和感想。
79
80 **大卫**:关于离开？那有点虎头蛇尾。这是一个……我不知道
81 我的预期,但我没想到只……你那样站在
82 废话连篇的长官面前,你知道,我站在
83 一个根本不喜欢我的军官前面。从我到那里的第一天起
84 我们就从未面对面交流过,因为他知道我在那儿
85 约 18 个月只是因为“应变缩编计划(Options for Change)”[因
86 “冷战”结束而减少军队规模的计划]。我所在的部队
87 解散了,使他们不得不把我送到某个地方。嗯,你知道,
88 所以他走出他的办公室,乱扯一通“噢,我们
89 真的为曾拥有你而高兴”之类的……我想,“你个说谎的饭桶”。
90 然后我刚走出他的办公室,接下来你知道,
91 有人在说“身份证——谢谢你,琼斯先生”。这会打击你,
92 你知道。有人确实叫你“先生”。没有人再叫我
93 “中士”了。这真是滑稽。这是一个震动。这时候你知道。
94 然后就是这样——你走了,没有人为此帮你准备。 181
95 我只是……一旦你走出那扇门,就是这样。我知道我现在
96 甚至不能回到那营地了,尽管几分钟前,我还是一名
97 中士。我不能回去了。你知道,你……就好像他们把你
98 扔出去后锁上了门,你知道,就是这样——现在一切都只能
99 靠你自己了。这令人感到痛苦。然后你不得不整理你走过这
100 世界的方式……假如某样东西跌落到你的房子上,
101 你不能拿起电话找到旧房主帮忙——你必须
102 处理它。事实上,没有大问题,因为——但它是
103 一种奇怪的感觉。你知道,“真见鬼,我已经不得不做这件事了”。
104 是啊。嗯,坐立不安,你现在,就像我们说过的,
105 你走到另一个地方,你走在街上,你看到鬼。
106 你知道,你要像一个现役军人沿着街道走,
107 你就可以看到所有这些鬼,你遇到的人,
108 你知道。或者,走出这家商店,你希望所有的
109 伙伴们落魄地走在路上,醉得像黄鼠狼之类的东西,
110 而他们没有,我今天仍然可以看到他们,你知道。
111 我可以坐下来[他曾经驻扎的地方]并——呀,心思
112 又回到了那时,你想,“是的,但是那里再也有
113 没有人了”,你知道……你想,“上帝啊,你从没有料想到会
114 是这个样子”。你认为也许还有人可以说说话,但没有。

115 即使你知道,他们说你可以去 SSAFA [海陆空三军士兵
116 协会(Soldiers,Sailors and Air Force Association),
117 一个帮助退伍军人的慈善组织]之类的,即使他们把你
118 放在次要位置——一旦你是平民,因为他们认为"是的,
119 就是他,你已经被利用完了,你知道你已经得到了
120 回报——你可以走了"。你知道,他们不知道你把
121 你生命中最宝贵的时间给了他们,我就是这样做的。
122 我在那阶段付出了百分之一百五十,我得到的是坏了的
123 膝盖以及其他地方,我的身体垮了。所以当我出来后,
124 我应该享受自我,因为我的孩子都长大了,
125 我应该但我不能,你会想到:"噢,上帝啊,
126 我都做了些什么?"如果我有我的时间,我
127 应该重新做一遍吗? 是的,即使是为了我刚才所说的。
128 你知道,你走了,这里什么也没有了——那儿是空的。
129 就像一个开放的空间,一个真空。
130
131 **安尼尔**:听起来很凄凉。
132
133 **大卫**: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妻子,我想我已经做了一些
134 完全疯狂的事。我不认为我今天会绕过来——坦诚地说
135 如果不是因为我太太。她——她很支持我,嗯,我退伍后
136 的大约几个月有点发狂倾向。谁不这样! 嗯,
137 那一阶段婚姻几乎破裂,但她坚持与我们在一起而后我们
138 就这样了。但是,是的,它的……它是寂寞的。我仍然怀念它,
139 我现在仍然如此。我希望我能很快适应平民化的生活。
140
141 **安尼尔**:你可以告诉我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吗? 离开军队
142 变成一介平民。

182

143
144 **大卫**:当我从[德国小镇的名字]调回,我准备离开军队。
145 因此,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因为我有机会选择我的单位。
146 我心想,卡车司机就好,这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要
147 走的路,成为 RCT[皇家运输部队(Royal Corps of Transport)]
148 的一员。所以我想如果我去[具体的军队单位的名称],
149 至少他们已经到了挂接[挂接车辆]那里,这样我就
150 可以出去。虽然我有一级驾照,我可以从中获得
151 经验并获得行驶[行驶记录表]经验、道路规则和
152 驾龄。嗯,我从此开始了积累。我这样做的目的是
153 先找到工作,然后找到栖身之所。所以我想,当你
154 知道了这些情况介绍[军队安置简报]后,他们会告诉你

155 找到工作有多难,一个方面这是个权利,因为我认为
156 你需要在平民街得到一个工作,所以我做好了所有的
157 准备应付通过。我将爱好放置一旁并为公司加夜班,
158 所以我的手指磨出了很多茧子——嗯,这就是
159 不会让我离开的军队。我开始为在平民街积极
160 准备了。
161
162 **安尼尔**:听起来你在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实质性的
163 准备呢——有没有心理准备? 你是否想过你在平民街时的
164 感觉会是什么样的?
165
166 **大卫**:我可能想过一两回……[听不清楚]……
167 但有一件事是我永远也无法想象的,就是平民街。
168 你知道,对我而言平民百姓就是那种来世间一趟
169 而没有决定权的人。这就是你的感觉,你知道。
170
171 **安尼尔**:回顾过去,你是否认为你为平民生活
172 事先做好了准备? 以及作为一个平民的感觉如何?
173
174 **大卫**:没有。
175
176 **安尼尔**:回顾过去,你觉得军队在帮助您
177 适应平民生活时另外应该做些什么,或者他们做的
178 够吗?
179
180 **大卫**:是的,我觉得军队应该让你获得平民生活的感受。
181 他们应该让你去工作,嗯,例如工作经验。在
182 最后的六个月中,他们应该告诉你去什么地方,
183 并说,"好的,你可以走了,我们会来看你离开……"
184 ——不是让你发狂,至少每星期报告一次什么的,嗯,
185 让你去为什么人工作。因此,我认为这将对我们很有帮助。
186 我不认为你只依靠在这的三周[安置]课程就可以离开。
187 而且你知道,你回来了,他们会认为,哦,
188 他准备好了。你知道,我认为上层的部分人员不知道
189 出去有多艰难,因为我知道当他们结束时,其实
190 并没有真正结束。他们到军官俱乐部所考虑的事情
191 是早餐时他们喝的 G 和 T。
192 他们不会想到你……[听不清楚]……不得不出去寻找工作。
193 他并没有得到他们装在他口袋里的钱,所以开始
194 出去找工作,如果你能明白我的意思。这……你知道,

183

195 这只是我没有准备好。就像我刚才所说,
196 你知道,一分钟前我还在那儿,下一分钟
197 我走出大门——我是一个平民,你知道。
198 根本没有准备好。
199
200 **安尼尔**:有些研究人员认为,当离开像军队这样的
201 一个特殊环境时,有可能影响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对
202 自己的感觉,以及他们的言行举止。我想了解你作为
203 一名士兵的感觉有没有影响到你在平民生活中
204 如何看待自己。
205
206 **大卫**:是的,我想我明白。你接受纪律训练,你被
207 训练的自己照顾自己。我说的"照顾你自己"
208 可不仅仅是作战。我说"照顾你自己"的意思是,我会
209 做我的早餐,我会做我的正餐,我会缝纫,
210 我会熨衣物,我会洗衣服。嗯,我知道在平民那里
211 有很多人做不到。这么多的小伙子不会熨烫衣物、缝纫,或
212 不会做饭让我大吃一惊。我真的不敢相信,你知道。嗯,
213 那么耶,事情就是这样的……那就是我。
214
215 **安尼尔**:你觉得,平民生活与你仍在军队中的生活相比,
216 你对自己的感觉是不同的还是相同的?
217
218 **大卫**:不会感觉一样的……有时——不是所有的时候,有时
219 我感觉不到似乎有一个指向它的目的。你知道,像,
220 去学校[作为学校的看守]时一边走一边想,"我
221 在这儿到底做些什么鬼事情? 诅咒它"。这些孩子是一群讨厌
222 的家伙,你知道的。但我必须续继这样做,日复一日。
223 你想想看,"这就是我后半生的生活"。我去了那里,
224 而我只是觉得"为什么这不像是在军队?",并希望
225 事情会改变,但我会继续做这件事。嗯,因此我觉得
226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有时我觉得心烦但其他时候,
227 你知道,我只是空纳闷。
228
229 **安尼尔**:你能否谈谈关于如何——如果有的话——作为一个
230 退伍军人对你有帮助还是给你造成了麻烦,或者你是否觉得
231 没有区别呢?
232
233 **大卫**:在平民街,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会给你带来自信。
234 嗯,我去面试一个工作。正如我所说的,我从来没有失去

235 工作。我所拥有的就业机会比我想象的多，我认为一个简单的
236 事实是当我去面试时，我说，“是的，这就是我。这就是
237 你要找的人。录用我我将是一名出色的团队成员”，
238 而我就告诉他们这些。阻碍我的是我喜欢东西有调理。 184
239 我喜欢整齐包裹的东西，所以当我去——就像我驾驶的
240 卡车，当我来晚上回来时，我将所有的货车停整齐，
241 所有的保险杠在同一水平线。可能看起来可笑，
242 他们将车泊在停车场的各处。这会使它难以出来。
243 他们无法看到一个事实，即把它们都排成队很容易
244 把车开出来。嗯，这有点像你文书工作中的其他小
245 事情，让你的文书工作有条理——使它更容易。我
246 认为生活的这个侧面会妨碍我，因为我做这些就要
247 多花 10 分钟。他们想要做的一切就是进来、出去、走。
248 嗯，这样啊，在某些方面，沿着一条线在某处就会有一个障碍。
249 我觉得在多数方面无疑是好的一端在我这边。
250
251 **安尼尔**：有时配偶、亲属或朋友能影响我们对
252 自己的感觉，尤其是在重要变化时，例如改变
253 职业或生活方式。我想知道你所做的
254 决定以及你的感受是否受你的爱人、亲属、朋友
255 和同事的影响。关于你是否感受到了你
256 妻子的支持你能谈谈吗？
257
258 **大卫**：受到支持……不，不是那样的。因为当我们住到了
259 平民街时，我们认识的人在[镇名]，北威尔士，
260 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在那里的任何人，所以支持，
261 不，不，我们没有得到任何人的任何支持。你只是
262 不得不走出去，去尝试适应新的环境并犯了许多错误
263 ——那是昂贵的。
264
265 **安尼尔**：你能否谈谈这种缺乏支持是否影响了
266 你对自己的看法？
267
268 **大卫**：没有一个人给我提供意见和指导，诸如买
269 房子的事情。嗯，就像坐在新闻发布会的房间里，
270 有人指着一个图表说“这样那样”。这都很好，
271 但我们知道，你在纸上所看到的和实际发生的
272 是两回事。嗯，我们买了房子，而后它倒塌了，
273 我们失去了一切。我失去了我所有的钱，命运啊，
274 在这个房子上跌了一个大跟头。如果我得到了指导，

275 如果有人在那里曾说,“瞧,这就是你一定要找的吗”,
276 如果我们可以请来曾在那地方的人并对他说:“你看,
277 我要买房子了,我刚刚从军队退役——有机会能来
278 并给我几点建议吗?”我觉得这会有帮助。
279 所以至少你已经获得了第一个建议避免这个问题。
280 我不会再买另外的房子了。我再也不想再购买
281 另外的房子。这将非常方便。嗯,没有,我没有
282 得到支持。
283
284 **安尼尔**:我在想,在你成为平民后人们对你的感情和
285 行为是否发生了改变?
185 286
287 **大卫**:是的,我认为他们确实变了。因为我们认识的人
288 住在[威尔士的镇名],我们周围地方的人知道
289 我是来自英格兰的士兵,他们常常来访,我们
290 常常在周末聊天,等等。但是一旦我离开了[离开了军队],
291 他们中很少的人还坚持来一会儿,然后突然间都
292 离开了。他们一定认为,“哦,就是这样了,他
293 没有其他东西可提供了,新鲜劲没有了”。我认为,
294 人的感情在某些方面是会变的。
295
296 **安尼尔**:这对你有没有影响?
297
298 **大卫**:不,没有,因为我一直在夜间工作,所以
299 无论如何我不会常常见到他们。一旦我出去并
300 开始正常的工作,我压根就不会想它。
301
302 **安尼尔**:军队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跟平民的生活在
303 许多方面不同。我想知道你会怀念军队生活中的哪些
304 方面呢?
305
306 **大卫**:嗯,同平民生活相比吗? 我怀念集体生活,
307 我怀念集体生活,我怀念军队中一切按程序办事的
308 生活。
309
310 **安尼尔**:是集体活动还是……?
311
312 **大卫**:都有,集体的和联队的安排……从我的性格
313 来看。这像,我们训练几周后会有几天时间自己安排。
314 到了那时你可以计划你的生活。你知道你是要去锻炼

315 而你想,嗯,你知道52个周末中的18个……你知道你要
316 去干掉一些啤酒,你知道你将会有一段美好的时光。我想你
318 现在已经完了。现在你知道你不能计划任何一天了。
319 我怀念那种刺激感,让人热血沸腾,肾上腺素上涌。
320 你不会得到更多的了。嗯,我怀念走出大门并确定
321 我仍活着。我很荣幸能够成为士兵。现在,我穿着
322 工作服出门,我想,"好吧,是的,就是这样"。你
323 想给人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印象,但这是不一样的,
324 它是不一样的。你不可能在任何地方有同样的效果。
325
326 **安尼尔**:你觉得你需要找一些其他的事情来代替你
327 对军队的怀念吗?
328
329 **大卫**:嗯,我试着加入协会,但那里全是年纪较大的人——
330 我是说RCT[皇家运输队]协会。我们加入了,但26岁的
331 我成了里面最年轻的一个。你知道吗,嗯,我们去过
332 圣诞节,某人在用风琴演奏"滚啤酒桶"和其他20世纪
333 40年代的音乐,这对我和我们的屁股而言
334 很不好。嗯,我们还没有到达那个阶段。我们返回到 186
335 [威尔士镇名],我们在那里有一些朋友,我们又回到了
336 那里,而且我们在那里玩得很开心——完全发疯了。所以
337 是的,取代了它。
338
339 **安尼尔**:你谈到过居住在[威尔士镇名],现在你
340 住在[驻军镇的名]。是什么让你回来[驻军镇的名]
341 的?
342
343 **大卫**:我们在那里的房子,嗯,已经倒塌了,我们只有
344 请一名律师起诉并请另一名律师起诉其他的律师,这是
345 相当艰巨的任务,你知道的。他们拒绝这样做或不情愿,
346 我应该说,这样做,但我们却发现它,会花费我们
347 很多钱——我们没有钱,所以我们不得不去乞讨、去偷、
348 去借。最后,我们完全失去了房子。嗯,我们不得不
349 将其出售以还清一些债务,而我来做了这个工作,这意味着
350 我得到一个有房子的工作。因此,我回到了这里。就是这样。
351
352 **安尼尔**:你曾与[驻军镇的名]地区联系来
353 了解这里的工作吗?
354
355 **大卫**:噢,是的。我岳父是一所学校的董事,他告诉

356 我这里有一份工作空缺。他实际上没有说
357 什么或推荐我获得这个工作,因为它会贬低我,
358 你知道的。他是一名校董,我来这里因为我们是
359 亲戚——他不得不采取行动,又让我获得这份工作。
360
361 **安尼尔**:在我准备这项研究时,我碰到的材料讨论了
362 从事独特工作的人如何试图减轻离开的影响。
363 我们已经谈到了军队安置方案,但我想从个人的
364 角度多了解一点。如果你还没有脱离
365 军队的生活方式你认为自己会怎么样以及如何——你可能的
366 感觉如何?
367
368 **大卫**:哦,原因之一是我认为我是一个夜间活动者,
369 我想知道平民的一面,以及想了解他们如何思考、
370 如何工作以及如何运作,嗯,但这在某些方面很难。
371 那,嗯,一旦他们发现你是一个二等兵——一个
372 服役的二等兵——在他们的公司工作,一些司机——
373 不是所有的人而是部分司机——就会不跟你说话了,
374 因为你是试图接替他们工作的人。我认为,你知道……
375 我怎样描述它呢,有点像一个黑人试图加入
376 三 K 党[Sic],你知道的。你知道,我们是怎样的未来
377 而我们“办不到”,你知道的。“你本不应该在这的,
378 你知道。你已经得到了一份工作——为什么霸占
379 他人的工作?”,你知道。“还有很多失业的人想得到
380 这份工作”,你知道。我想转身说,“好吧,为什么
381 他们不到这里来做这份工作?”这很难。它让我
382 理解了他们的感受如何。
187 383
384 **安尼尔**:那当你是一个士兵时,这会指向你吗?
385
386 **大卫**:当然。
387
388 **安尼尔**:但是作为一名退役军人这可能会有所不同吗?
389
390 **大卫**:是的,我认为不再是这样了。
391
392 **安尼尔**:嗯,那么,你认为你已经适应了平民生活了吗?
393
394 **大卫**:不,还没有。我认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答案。
395

396 **安尼尔**:回顾过去,你会做些什么不同的事作为
397 转型的一部分?
398
399 **大卫**:是的。我不会去[军队单位的名称]。我会
400 去 TA [本土防卫自卫队]部队,在 TA 要求委派一个
401 PSI [常设指导教师]职位,知道我会有额外的时间去在
402 嗯那里也会,嗯,与平民一起工作你知道,也许
403 我会更多地了解围墙另一边的人们是如何工作、如何
404 做事的。
405
406 **安尼尔**:大卫,我的问题已经问完了,关于
407 这个主题还有没有你想谈而我们没有涉及的
408 部分?
409
410 **大卫**:是的。我认为,现在从长远的观点评判它,
411 对其他复员军人以及其他该出去的人们,那就是
412 在英国某处应该有一个营地或什么地方可以被
413 派往 6 个月,然后出去为平民工作。所以你不必
414 获得回报,但你可以出去可以开始慢慢地工作,
415 慢慢地,慢慢地,然后,在 6 个月结束时,你将有
416 一段时间看到怎样买房子。你已经与平民一起工作了,
417 曾在平民的氛围工作,并且完全是试图让自己平民化,
418 因此当时间来临时,你出来了,而这只是你滑出来
419 而不是掉下来。
420
421 **安尼尔**:更顺利?
422
423 **大卫**:是的,顺利。对女士来说也是如此。
424 妇女和小孩也一样,因为孩子们会经历由依靠
425 到独立的那段时间,因此,显然要给他们时间
426 去解决。而且,不知道大多数人——我不知道
427 实际的比例,但可能是比较少——在他们到教育的
428 关键时刻谁会出来,当你是那种,砰,
429 完蛋了,周围有大量的飞物环绕着你。
430 你知道,你必须自己买房子,你开始得到
431 这,你需要得到那,并且,你知道,孩子们是在
432 它的夹缝里。在那里……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
433 斜坡,你可以让他们解决,让他们参与并且
434 他们可以以他们的教育出色地完成。同样妻子们
435 稳步安全地滑出,得到解决,你知道。

188

436 所以,在一天结束后,你很好地完成了到平民街
437 的转型,而不是这种失落,你四处游荡几个月扳着
438 手指想,“好吧,这是什么”,你知道。“我在哪里?”
439
440 **安尼尔**:我请你简单回想一下现在的访谈经验。
441 你觉得它如何? 此访谈有哪些正面的东西,
442 或者,有哪些负面的东西。
443
444 **大卫**:我认为积极的方面之一是你带来的
445 这一切……你带来的问题,你让我们谈我们的
446 感受,而不是带一大堆问卷——他们让你
447 按他们所提问题的方式回答他们想要的。
448 嗯,至于消极的一面,它,在某些方面它是
449 非常困难……来描述你的感受。我认为,如果
450 我们能够有机会稳定地从军队过渡到平民,我
451 认为它可能会变得更容易。我想是因为就是那种
452 门关上,出去走人,你知道的,你还不知道
453 你是谁。此外,正如我内兄说过的,他用了 11 年
454 变成平民——他的妻子仍然在部队。嗯,但如果
455 行得通的话可能就比较容易了。
456
457 **安尼尔**:这非常有意义,是的。你觉得参加这次
458 采访对感觉自己的方式有没有影响? 或者在以后
459 可能会产生影响吗?
460
461 **大卫**:没有,我认为我们有点过……我认为我们仍在
462 军队之中。如果你打量这个房子……我不会这样叫它……
463 它就像个婚房。所以,你看,我有点稍微离题了,
464 但……
465
466 **安尼尔**:非常感谢你接受采访。

布莱恩采访录

1 **安尼尔**:在哪些方面——如果有的话——你觉得对自己的
2 认识受到了入伍及这段军队经历的影响了呢?
3
4 **布莱恩**:我想我在军队中学到了许多,在部队学到的
5 东西是你很长时间意识不到的,这样,当你从军队
6 中出来后,开始与和你一起工作的人比较,你会发现
7 自己已经有了一种更强的紧迫感。你会更加注重细节,
8 你根本不会被时间所困扰,你不必计算开始时间和
9 结束时间。如果工作需要的时间超过了其所需要的2倍
10 以上,你就只是做必要的工作。我们似乎更灵活,更
11 适应形势,我在部队已经学到了这一切而我的经验
12 是,那里的局势可能发生变化,你必须适应。你已经
13 学会适应新的情况——并且一直奏效。当我环顾四周,
14 我一直看到,缺乏对细节的关注——他们如何只是敷衍
15 了事,态度冷漠。你知道,我们在所有的时间都全力
16 以赴。
17
18 **安尼尔**:哪些方面,如果有的话,对你作为一名士兵
19 是重要的? 当你在军队的时候,什么是重要的?
20
21 **布莱恩**:我想这实际上是真正大的东西的一部分:做
22 有意义的工作并能够通过职衔的提升来证明自己。这
23 对我很重要。能有机会来证明你可以做什么和你能
24 做得多棒。
25
26 **安尼尔**:你觉得你在平民街找到这种机会了吗?
27
28 **布莱恩**:在某些方面但以不同的方式。我现在从事的
29 工作类型中,没有以职衔这种形式来表示进步的,但
30 这并不妨碍你做好你的工作,并真正被人注意。但是
31 没有,像我目前所做的工作中,没有真正的职级结构。
32

33 **安尼尔**:那么,在这些不同中工作你的感觉如何?
34
35 **布莱恩**:这我已经接受,这不成问题。我很享受
36 现在我所做的。其中我喜欢它的一个主要原因我想是
37 因为我得到了某一领域的工作,我接受并从事了它。
38 我没有被严密地监督。我属于一个团队——我们共
39 有 16 个人,当我们需要时,我们会不时在一起相互
40 帮忙,一起工作,但大多数时间,我要面对自己的事,
41 我要自己做决定,而不是一直等待别人告诉你怎么
42 做。
43
44 **安尼尔**:这如何跟军队比较呢?
45
190 46 **布莱恩**:是的,我想在一定程度上,我想——你所有的
47 时间都被指导,但随后,当你晋级,对于你做什么
48 你有更多的发言权。我一直相信,当我在部队时
49 如果有人给了我一个目标,我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就
50 取决于我,这和我现在所做的如出一辙:有人给了我一个
51 目标,而在一天结束时怎样达到它由我决定。实际上
52 没有人提出我须遵从的路线。
53
54 **安尼尔**:人们往往以他们自己独特的方式经历像
55 退伍这样的事。我想听听并了解你是怎么经历
56 它的,你的感觉是什么。因此这方面,在你离开
57 军队进入平民街的整个过程中,你可以从你想要的
58 地方开始吗?
59
60 **布莱恩**:当我出来时,首先占据我整个脑海的
61 想法完全是找工作,找到事做。找工作花了
62 一段时间,我寄出了无数的申请表,参加了
63 数不清的面试。我是去面试,过五关斩六将杀到
64 只剩下两三个人——根本没有问题的——但
65 在面试中很明显,当你去他们那里面试时,
66 面试官关于军人会有先入为主的想法,而他们
67 关于军人的理解是完全过时了的。他们似乎相信,
68 你的管理风格只是对人吼叫,用棍棒打人,仅此
69 而已。他们不相信我们受过训练,能安静地管理人。
70 而且在我退役后,我已经注意到对于员工,退伍军人比普通
71 方式训练的管理人员管理得要好,
72 因为普通管理者管理他们员工的方式,他们

73 看待一项工作——例如，如果他们的工作是建立
74 一个电信网络，他们所做的是，以尽可能便宜、
75 尽可能快的方式招募员工。他们不是把工作当成
76 一个整体来管理——他们不会考虑生活的福利
77 方面，也不会确保其工作人员的快乐。他们不会这样
78 考虑——他们鼠目寸光。当我在部队时，部队会给你
79 一些完成工作的资源而你必须要照看这些资源，以
80 确定它们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但，哦，一旦我
81 找到一份工作，我最终可能坚守自己得到的第一份
82 工作上，这可能不是一个好主意但是我不想
83 失业，后来我发现自己在以不同于其他人的方式做
84 现在这份工作。别人都循规蹈矩地工作，而我每次却
85 用大相径庭的方式，我发现这引起了一大堆
86 麻烦，因为只有我这样做而别人不会。事情是，
87 我当时所做的工作是执法，有大量的时间四处
88 巡查，并告诉人们他们要以某种方式做事，或者
89 不要做他们正在做的什么事，因为兜兜转转做工作是
90 我想我应该做的。所以很多针对我监管
91 方式的抱怨涌到了我的办公室，有几次我被问道
92 "那么，为什么是你引发了这些抱怨?"而我说：
93 "好吧，我只是在做我应该做的事。你叫我做
94 这项工作，实际上我正在做。"当他们研究过
95 它的时候，他们认为，好，那就是我所做的，但其
96 他人，如果他们认为这会产生对抗性，他们
97 就会避开它，他们实际上没有做这一部分
98 工作——他们只是惯于让它驱使，你看，去做
99 别的事。
100
101 **安尼尔**：这听起来就像是与你之前
102 讲过的军队的所有部分重合——
103 正确地做自己的工作和军纪。
104
105 **布莱恩**：而且不回避真的对抗。如果它要
106 成为对抗性的，那么就尝试以某种方式处理它，
107 但如果需要做什么，那就必须要做。
108
109 **安尼尔**：你能告诉我当你考虑离开军队的时候
110 你的感觉如何吗？你已经告诉我你在冗余阶段
111 出来。当你开始想象自己将成为一个普通人，
112 你能记得那感觉如何吗？

191

113
114 **布莱恩**:嗯,坦白地说我并没有真的想离开。虽然这
115 是我的选择,但我觉得我是被迫如此。我真的为一项
116 糟糕的工作做了最大的努力。正如我说过的,我之所
117 以出来,部分是医疗原因,我觉得,如果我留下了,
118 我将无法实现我的全部潜力,所以我决定尽早
119 出来,这样就最好了。但是如果我有选择,我会
120 留下来的。我根本不会提前出来。所以是的,我是
121 有点……但除了这些之外,我没有特别的困扰。在
122 我们决定定居的地方,我们已经有了房子。
123 我的孩子们在学校,我妻子有工作,所以我需要
124 做的就是找到一份工作,而我已经准备好做任何事了——
125 如果有必要,所以我没有设想失业的情况。当我
126 申请工作时,我不只是申请一个职位,我在读就业广告
127 时想,"噢,我能做这个",所以我就申请它。我大概
128 总共申请了 20 至 30 种不同的工作,因为我想,"是的,
129 这个我可以做"。那时我脑海中真的没有想我要做什么。
130 我只是想…… 我出来,我要得到一份工作,并在那里
131 呆下去。我没有想到一直做第一份工作。结果,可能
132 是大约 18 个月至两年时,我换了工作,离开了我的
133 第一份工作。现在这份工作我已经做了四年,而且我很
134 喜欢这份工作,如果我现在要换工作的话,我也许
135 会去另一家公司做一个类似的工作。
136
137 **安尼尔**:你能谈一下关于确定被遣回时的感受吗?
138 你已经讲了一些关于你考虑离开的事。当
139 你真的确定被遣回时感觉是怎样的呢?
192 140 你还记得吗?
141
142 **布莱恩**:不,并非如此。不,不,我不认为……我个人
143 不认为这有多大的作用,除非我对此担心太多,但
144 我可能确实如此,而我的妻子似乎认为,自从退伍
145 后我更快乐了。但是,不,我真的不记得当时有任何
146 特殊的感觉。
147
148 **安尼尔**:我想谈谈军队安置计划——预发布的东西。
149 我知道,军队有一个针对退役军人的安置方案,我
150 想了解它对你有什么用。
151
152

153 **布莱恩**:嗯对,嗯,军队带我到某地,他们给我的
154 训练,就是我现在的训练……是我有用的基础……是得到
155 我现在所做工作的基础。所以,是的,这很好,
156 这就足够了。它把你带入了正确的方向。唯一的是,
157 这个,因为我决定出来比我实际离开早一年,这时间
158 真不够将所有的全部投入……我希望将所有计划付诸——
159 付诸行动。我真的应该提前两三年开始,而不是试图
160 一年就适应它。你不能做到的——有太很多事要做。而
161 问题是你在军队里做的一切,所有你获得的经验,都
162 不很好地运用到平民生活中去,所以,你需要以某种
163 适应的方式,让平民雇主真正
164 重视和理解你所有的技能和资历。而这正是我没有时间做的,你仅在一年
165 之内根本没有时间做。但除此之外,是的,还不错,你
166 知道。
167
168 **安尼尔**:回顾过去,你觉得你为平民生活做好准备了
169 吗? 将要成为一个平民的感觉如何? 你说也许一年
170 时间不够长,你曾希望有两年或三年的时间来准备,但从
171 整体来说你觉得自己准备好了吗——尤其是将成为一个
172 平民的感觉如何?
173
174 **布莱恩**:嗯,当我刚开始出来时,我认为最奇怪
175 的是我的工作,我大约在下午 4 点完成工作。由于
176 开始的很早约 4 点就下班了,我大约 4 点 30 分就到家,
177 我想:“我现在做什么呢?”因为之前,我从来
178 没有这么早回过家,即使我刚刚开始工作时也是。
179 嗯……我所做工作的类型——通常是这样工作一整天,
180 然后你必须把所做的事停下,有时直到大约六
181 七点才回家,所以我发现我有一点时间。我不
182 太清楚该如何处理它。有一件事我觉得困惑,在
183 平民环境中,每个人的衣服样式使大家看起来
184 都是相同的,而在军队中,你可以从一个人的外表
185 看出他们在军队中所处的级别,这样你就可以知道该对
186 他们说些什么,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说。在平民生活中,公司
187 里的每个人穿着都一样,每个人看起来都
188 一样——你不知道你在与谁交谈,是与你在同一个
189 级别还是较高级别的主管。我感到十分不安,
190 除非你能记住他们的脸——真的很奇怪。除此之外,
191 我把我踏入平民生活的第一步,尤其是工作,
192 作为另一个岗位,而这相当奏效,因为我的

193

193 第一个工作……我在一个约10人的小部门工作，
194 其中的6人是退伍军人，他们都来自于我以前
195 所在的团，有几个我以前就认识，这样真的与
196 另一个岗位很相似，只不过是另一份工作。
197
198 **安尼尔**：周围有退伍军人，这有帮助吗？
199
200 **布莱恩**：哦，肯定有帮助，是的。是啊，
201 这些家伙好像出来有几年时间了，嗯，大概
202 10年或12年。因此，我们有一整套的经验：
203 他们在不同的方面学有所长，跟他们交流非常
204 有益，并能知道一切怎样继续。尽管我刚出来，
205 是一个新人——这是一个稍微不同的环境——但是……
206 我觉得，我认为事情会有所不同，如果我一开始
207 没有去找那份工作，而周围是那些退役的人，
208 特别是一些家伙我以前也认识，或如果……甚至
209 那些我不认识的，我们知道我们之间有彼此的
210 朋友，因此一切进行得很好。
211
212 **安尼尔**：你已经触及了我接下来要问的事——
213 还是要问一下。回顾过去，你认为自己已经做好了
214 平民生活的心理准备了吗？
215
216 **布莱恩**：是的。是的，我想是这样。主要是
217 因为我相信军队教会了我如何适应新情况，而
218 这只是另一种需要适应的情况，除此以外，它
219 不是一个特别的问题。起初我觉得很难以这种
220 方式与平民工友相处，因为我给人的印象是有攻击性、
221 暴躁、傲慢……其他人是这样形容我的，
222 这种类型……但我只是表现真实的自己，而在军队环境中
223 这是……它甚至不被注意。事实上，当我在军队服役时，
224 我并不像我的同伴们那样因攻击性而经常被拦下。
225 但我出来了，他们会说，"哦，你咄咄逼人"，
226 这当然令我觉得很奇怪。不过，嗯，我有……
227 出来到现在的这几年我已经成熟了，但即使如此，
228 人们仍然形容我充满攻击性、霸道，但是，嗯，
229 我已经这么成熟了，而我认为你必须……以这样的
230 方式来……你必须改变你的那种风格。我的许多工作——
231 我培养了人……我的工作是训练，而我已经适应了
232 我的训练作风，对待平民比在军队里友好，

233 因为它是……人们常说,“好吧,我们来找你,你不教
234 我们——你却朝我们吼”,这是——我所做的是要突出
235 自己的声音,以使后面的人们能听到,但我必须适应
236 这种方式,人们更喜欢那种比我在部队松散的方式—— 194
237 多一点随便。
238
239 **安尼尔**:更加平民化?
240
241 **布莱恩**:是的。不管怎样,平民对退伍军人是
242 有成见的,它是基于事实的,但很明显,因为以它来
243 说明不同的人,它已经有点夸张、有点扭曲了,因此,
244 如果您对一个普通的平民谈服役的士兵,他们也许
245 会说,“噢,他们呐,嗯,他非常适合,他的好斗、
246 嗓门大”,但他们不都喜欢这种,但同样,所以在
247 真正在开始之前你就输了。每当他们希望有人来
248 领导运动队或类似的事时,他们会说,“哦,布莱恩,
249 你是退伍老兵,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你知道该怎么做”。
250 或者当他们希望有人能控制局势时,“噢,你做过这个的,
251 你可以按照领导培训课程的内容去做。”或者类似的,
252 遇到任何有军事内涵的事时:“噢,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
253 能够做到的”。因此,他们有成见。
254
255 **安尼尔**:嗯。这听起来像他们很欢迎你所带来的
256 一些军事素质,而其他的不是。
257
258 **布莱恩**:事实上,当我开始时很明显。当我加入
259 我的第一家公司,我是…… 我们十个人中有六个是退役
260 军人,所以他们显然很喜欢军人,因为他们从中得到了
261 物有所值的东西。他们知道军队的家伙会努力工作,
262 也不会回避工作,他们做得很好。所以,是的,
263 一旦他们……我发现,即使我做的其他工作,以及,
264 当我第一次——这项我现在所做的工作,
265 把我这个军队上的家伙聘这个部门对于他们是第一次,在某一时段,我们在
266 这部门有 5 个退役军人——显然有些现在已经离开了——
267 而我发现,当你一个人时,如果他做得很好,那么,
268 该公司会相当开放地使同一部门进更多的人。而通常的
269 方式就是你最后与你以前认识的人一起工作,因为当你
270 知道他们将要招聘军队工作过的人时,那么你就会
271 推荐你认识的人,这样嗯,我们部门曾经有的那五个

272 退役军人,其中有三个我以前就认识,因此……
273
274 **安尼尔:**我们再次谈到了其中一些问题,但我
275 想谈谈变成一个平民对你个人的价值观和信念
276 的影响。一些研究者认为,当人们离开了军队
277 这样一个特殊环境时,有可能影响他们如何看待
278 自己、感受自己,甚至影响他们的言行举止。我想了解
279 你作为一名士兵的感觉会不会影响你对自己平民
280 生活的感觉。正如我说,你提到了其中的一些
281 问题,而你可以扩展它们,或转移到其他地方——
282 如果你喜欢。你觉得平民生活与你在军队的
283 生活相比,你对自己的感受是不同的还是
195 284 相同的?
285
286 **布莱恩:**不,并非如此。因为在部队时,
287 你对自己的感觉很好。你在那里有一种身份,你的
288 自我感觉良好。然而当我出来后,这几乎是相同的,
289 我认为——真的没有太大的改变。显然,我现在要
290 做的是不同的,但我不认为我已经改变了很多。我
291 仍然设法维持我以前有的理想和原则,这也许就是
292 为什么,时而不时地,我会造成一点麻烦,因为
293 我仍然试图维持或者可能将我的观念强加于其他人。
294
295 **安尼尔:**其他人的影响——有时爱人、亲属
296 或朋友,可以影响我们如何感受自己,特别
297 是在这样重要的改变中,如改变职业或生活
298 方式。我想着重于您所做的决定以及自我
299 感受是否可能受到了爱人、朋友、同事的影响。
300 是这样的吗?
301
302 **布莱恩:**是的。有,我不认为……我想我一定是
303 受这样一种方式的影响,因为我第一份工作完全
304 是本地的,它设在[镇名]——当时我就住在那里。
305 所以,我想这应该受到了我们房子的影响呵——
306 还有学校——我女儿要去的……所以我没有必要走远。
307 但是,嗯,当我换到了我的第二份工作时,我选择了
308 一份靠近家的工作,所以是的,一定有某些影响,
309 但那时我想我不会承认我可能被影响甚至认识到它。
310
311 **安尼尔:**关于你是否感到了妻子的支持可以谈谈

312 吗?
313
314 **布莱恩**:噢,是的,是的。当我决定退伍后,我的妻子
315 完全支持我,她说:"好吧,如果这就是你想做的事,
316 那就去做它吧。"她没有试图劝说或是阻止我,只要
317 我真的很开心,她就很开心。
318
319 **安尼尔**:你觉得作为一名士兵和一个普通人,人们
320 对你的评价高还是低?还是一般?
321
322 **布莱恩**:真的不知道。嗯,我知道……我认为
323 我在部队比现在我在外头对自己的评价高,
324 因为你有一个更为明确的身份,即使他们对你在
325 做什么有一个扭曲的看法。所以,我个人觉得
326 与我现在相比,服役时有的地位更高,但与我
327 所在公司的人比,我不认为有任何区别。事实
328 上,因为组织的规模,我服务的公司可能比我所在的军队更重视我。
329 我是在一个较小的组织,但在这里
330 我做的是公司的关键工作,是他们需要的人……当我只是一
331 个皇家工兵部队的中士时,在皇家工兵部队还有
332 很多的中士。现在,我是一个小池塘里的大鱼, 196
333 所以我在公司得到的评价比我曾经在部队里的高,
334 是的。
335
336 **安尼尔**:根据声音判断,在军队时你的自尊
337 更高?
338
339 **布莱恩**:我想是因为我有一个明确的标签,
340 我能找准自己的位置。
341
342 **安尼尔**:标签?中士?
343
344 **布莱恩**:显然是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达到那个
345 水平的。还有,你知道,我现在做的,我加入
346 公司的第一天开始,虽然我的工作有很大变化,
347 但我的责任范围更大。与我开始时的第一次相比,我现在
348 有更多的人需要负责和照顾,但我仍然基本上
349 是相同的——我仍然是一个健康和安全顾问,
350 从第一天开始我就是,所以不需要大量的努力
351 就已经达到了。嗯,随着公司的发展,我

352 的责任会越来越大,但我只是一个健康和安全顾问。
353 所以你必须努力工作,而在军队中你必须赢得职衔。
354
355 **安尼尔**:到目前为止,我们谈到影响你怎么
356 看待自己的内容了吗?
357
358 **布莱恩**:没有,但这个,它可能让我更近距离地
359 看我在做什么,我现在做的和我当时与现在想的,
360 以及我曾经做过的。这只是一件你想做就真的做的事,
361 而没有过多的思考。这促使我想回头想想并想通了
362 一些事。
363
364 **安尼尔**:我想集中讨论你怀念的军队生活的任何
365 部分。我想知道是否有军队生活让你怀念。
366
367 **布莱恩**:主要的应该是集体生活吧,但我已经
368 成功地与此保持了联系。我仍然……我是军营一个
369 俱乐部[武装部队成员吃饭或打发空闲时间的地方]
370 的名誉成员,我有时会去,这很方便,因为——
371 特别是作为一个培训机构,你要让人们度过
372 所有的时间,它是会见你已经有很多很多年
373 未谋面的人的一个好方式,因为每个人最终都会去那里。
374 所以这是理想的,所以我已经成功地与那儿而
375 不是其他的保持了联系,这可能是唯一我从未说过
376 我怀念的。然而,想一下我已经说过的这些答案,
377 那么在那里有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我怀念的事,诸如
378 职位和自尊以及其他的一切,但是,嗯,正如
379 我说过的,在其中最重要的一方面是集体生活,我很
197 380 怀念。工作就是工作,虽然我现在正与不同的环境、
381 不同的人一起工作,我已经成功地以一种类型的
382 工作更换为另一类型的工作,我为此感到非常高兴,
383 但是集体生活有很大的不同,嗯,我会与此保持联系。
384 这不完全一样,但是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折中。
385
386 **安尼尔**:因此,你主要是怀念社交方面,而你
387 已经成功地与此保持了联系,你喜欢它。你也谈到了
388 你怀念的其他东西,谈到了自尊和职位,而我想,
389 这是与军队的职位等级联系在一起的,你是在该
390 系统的一个中士。
391

392 **布莱恩**:是的,是那样。
393
394 **安尼尔**:关于这方面你能多谈一下吗? 关于你的
395 感受,现在不在那种环境中你的感想是什么?
396
397 **布莱恩**:嗯,我以前认为那只是,嗯,属于系统的
398 一部分,能够通过该系统以你自己的方式工作,而你
399 也能够获得成就,但现在你只是……这是不一样的。
400 没有真正相同的等级结构。不,我唯一觉得我可能
401 真正怀念的是当我第一次出来时,是……显然是社交
402 方面。我知道我会怀念它,但后来我得到了它,通过……
403 当我走出来,我立即加入了俱乐部。这仅持续了 18 个
404 月,因为工作压力不允许让我去了——以我所希望的
405 定期去俱乐部,因此我一两年都觉得沉闷。不过,嗯,
406 因为能够应付的事情会好一点,所以我现在适应了。
407 而,嗯,我刚开始的时候,我直接去了 TA。同样,
408 这也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我对 TA 的运作方式有点
409 失望。很显然,我有一点想法,而这是切实的现实
410 不能满足的。所以是的,我认为我会有点想念军事
411 生活。我想,"好吧,如果我能够加入 TA,它的……"
412 ——同样这也不是真的军队,但它以类似的方式运行。
413 而我认为这会有助于我和缓地融入平民生活,但
414 这次仍没有持续特别长。一个问题是,适应工作需要
415 很多时间,而第二方面呢,我对它的运作方式有点
416 失望。它不是以与正规军相同的方式在运行,当他们
417 开始感叹我没有得到充分适应是因为我的眼睛时,我
418 说,"好,我不是因为任何麻烦而参加 TA"。我加入
419 更多的是为了……有趣和社交方面,但在 TA 并没有太多的
420 社交面,所以我决定——当他们制造了一点小麻烦——我就
421 决定放弃而离开,因为我还有其他关注的事情。我不得不
422 将精力集中在我的工作及类似的事上,所以我离开了。
423
424 **安尼尔**:听起来它有点像是一块踏脚石。
425
426 **布莱恩**:本来应该是的,但这是在第一个地方设定的目标。
427 我原以为这将有助于我走出来,但是,正如发生过的,
428 我没有在那里待足够长的时间以从中获得任何实际的收获。 198
429
430 **安尼尔**:我可以请你想想你现在是否已经完全适应平民
431 生活了吗?

432
433 **布莱恩**:是的,但是嗯,人们知道我是退伍军人
434 不管有没有人告诉他们。我经常培训来自全公司的人,
435 而在报告的最后,另一位退伍军人会来询问我的
436 军旅生活,但我并没有提到它。他们只是注意到
437 我的行为——我的行为方式以及我的说话方式——
438 他们马上明白,他们知道,所以其他的退伍军人
439 或其他有一些参与的人会直接阻止我——或许,
440 他们的父母或丈夫曾经在部队——他们认识到了
441 马上就明白了。所以,尽管我觉得我已经十分适应平民
442 生活了,嗯,真的,我仍然是一个退伍军人。我
443 不是一个普通的平民。
444
445 **安尼尔**:当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认出你是个退伍军人
456 并接近你时,你感觉如何?
457
448 **布莱恩**:哦,我想这真的让我高兴,因为我觉得我仍然
449 保持着它与我生活一部分的联系,就是这样啊。它不会在任何
450 方面让我不快。这可能是种好处,而不是其他任何的东西。
451
452 **安尼尔**:回顾过去,你做过什么不同的事吗?或者没有?
453
454 **布莱恩**:不,我不这样认为。没有,一切都是按我希望的
455 进行的。是的。
456
457 **安尼尔**:我想问你的问题已经都问完了,关于这一问题
458 你还有什么想谈谈的吗?
459
460 **布莱恩**:我不知道,没有。我觉得一切真的都谈出来了。
461 你来到这里之前,我在想我的经验对于其他听到的人
462 将是非常有用的
463
464 **安尼尔**:你再次自己简略提及了这方面,而我想
465 请您就这次采访的经验回想片刻。你觉得它如何?
466 你的参与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
467 负面的?
468
469 **布莱恩**:嗯,我真的不认为有任何负面的东西。
470 在积极的一面,它或许让我更接近点审视,我的
471 感觉如何或……当我出来,嗯,或许是让我认识到,

472 嗯,也许出来的影响力比我现在认识到的更大。
473 也许我怀念的军旅生活比我以前承认过的更多。
474 但除了这些之外……但实际上
475 现在它的积极的部分之一,嗯,经过这次你的报告全部汇集了起来。
476 我将能够看到大家的感受,而不仅仅是我自己的, 199
477 也能看看跟其他的人如何相似,以及是否我果然
478 跟其他人不同,是否我只是和其他人一样,而且
479 有类似的经验。
480
481 **安尼尔**:所以在这里你想要将你与其他退伍军人、
482 你的经验与其他退伍军人的经验做比较吗?
483
484 **布莱恩**:由于在我现在工作的部门,目前还有
485 另外两个家伙——退役军人,他们两人之前我在
486 服役的时候就认识。其中一个家伙也参加了
487 俱乐部,我们经常一起去那里,另一个人已经
488 彻底切断了与军队的联系,不参加任何这类
489 活动,不……没有兴趣回去。所以很明显这是两种
490 不同的人:一个愿意保留与军队的联系而另外
491 一个想忘掉它。
492
493 **安尼尔**:你认为参加这次采访有什么影响?
494 或者这会不会对你感觉自己的方式有影响?
495 同样这些议题你也提到过了。你说,你
496 认为这使你更多地了解了你刚出来时的真实
497 感受。
498
499 **布莱恩**:不,我不这样认为。显然,是的,它或许让我
500 更多地了解了一点,我也许从中获得了许多东西,但实际上,
501 我不会真的沿着此方面并在此基础上更深入地认识自己,
502 我也不认为这会对我具有持久的影响,不。这就像……
503 它只是提供了一些信息,这是真的。

质性研究报告

附录2

不管研究者进行的是质性研究还是量化研究,直到写出报告并呈现给广泛的受众,研究过程才结束。在学生进行的研究中,读者最初可能是本地的,由导师和答辩委员会评阅该项工作。不过,研究人员最终的目标应该是将他们的研究结果传达到更广泛的受众,这样,如果研究的质量足够高,它就可以增加我们对该研究主题的知识、启发我们讨论,而应用研究则会影响政策和实践。这需要撰写会议报告,并最终在学术期刊和其他有关途径出版。然而,研究写作的过程可能是相当艰巨的,无论是质性研究还是量化研究,研究者可能怀着其工作能否承受公众监督的担忧。他们可能不能确定如何最好地呈现自己所做的事,因为在质性研究方法的文本中,有关如何撰写质性研究的实践指南提供的相对较少(作为一个明显的例外,可参见 Holliday,2002)。 202

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带领读者学习了四种质性研究方法的原则和实用性,如果不引导质性研究的写作过程的话,本书将遗漏某些至关重要的东西。我们已采取行动,邀请各章阐述研究方法原则的作者,以期刊文章的形式分别呈现解释现象学分析、扎根理论、话语分析和叙事分析的研究报告(他们自己的或者与其他研究者合作的)。读者因此可以了解如何呈现各种研究分析的结果,而提供的写作模板可能会有益于那些先前没有出版写作经验的研究者(以及那些不确定如何最佳呈现自己质性研究的学生)。每个报告涉及一个吸引人的主题(一个妇女报告的愤怒经验,器官捐赠者家属的经验,咨询心理专家谈的"精神病理学"和精神困扰的诊断分类,以及一个口腔癌患者生活适应的叙述),在这里作为质性研究的写作模板是有实用价值的。

当然,读者也应翻阅其他杂志上运用这些方法发表的文章,以获取使用这些方法呈现研究的变式意识。铭记这一点很重要,正如在四种方法的介绍章节中,作者们都强调,使用他们所述方法没有确定的方式,所以,质性研究在写作的时候,也没有确定的组织呈现方式。大多数刊载研究报告的心理学学术期刊会期待文章符合可接受的通用结构,即使只是使用了简单的形式:引言、方法部分、呈现发现、一些讨论或结论,接着是参考文献。然而,在这一大框架内是有创造空间的,特别是在呈现和解释研究的发现部分。而一些非学术刊物(如心理学及相关学科应用领域的刊物,主要关注的不是研究,而瞄准专业人员的工作)则给予质性研究报告以更大的 203

创造空间。

然而，我们认为简单模板的价值是有限的，因为它们只是呈现了成品，而没有给出作者在撰写研究报告时必须考虑问题的感受。因此，我们要求作者在“反思专栏”中提供报告，展示研究时所发现的问题并解释其中的某些决策，或者对其他研究人员在研究写作时可能有用的议题。提出的有些问题是所有质性研究面临的一般性议题，有的则是针对特定方法。他们关注的内容包括，在研究报告引言部分与相关文献的接合（维吉尼亚·伊托夫和乔纳森·史密斯在解释现象学分析报告中，麦吉·斯圭厄和希拉·佩恩在扎根理论研究中，以及马克·克雷文和阿德里安·考利在话语分析报告中），取样过程（斯圭厄和佩恩），如何在方法部分描述样本（伊托夫和史密斯、克雷文和考利），资料收集策略（斯圭厄和佩恩、克雷文和考利），决定呈现在分析中的内容——需要的是什么，因为许多质性分析会产生数量巨大的资料，而研究者要撰写的杂志文章篇幅是有限的（伊托夫和史密斯）。与此有关的是，有多少资料、什么样的资料应在研究报告中呈现（伊托夫和史密斯、斯圭厄和佩恩、克雷文和考利），解释风格（伊托夫和史密斯），分析中理论的作用（米歇尔·克罗斯利在他的叙事分析报告中），以及讨论解释最适当的位置（斯圭厄和佩恩、伊托夫和史密斯）。

204 我们希望，在本附录中提供的研究报告将有助于指导读者的质性研究写作过程，通过他们的分析，创造出有吸引力的故事，并期待他们的作品能够吸引那些可能从中获益的读者注意。

——阿德里安·考利 & 伊凡希雅·莱昂斯

参考文献

Holliday, A. (2002) *Doing and Writ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Sage.

报告一

解释现象学分析

对愤怒的诠释：一个使用解释现象学分析的个案研究*

维吉尼亚·伊托夫 & 乔纳森A.史密斯

在本文中，我们展示了关于女性愤怒和攻击研究中的一篇论文的删节版。本文提供了一个女性的个案研究——不同于第3章考察的那一个。我们在编辑这篇论文时，省略了一些与第3章中相关内容非常相似的背景材料，譬如，解释现象学分析(IPA)的主张以及对分析如何实施的描述。因为篇幅的限制，我们也只能呈现论文中结果的前半部分。不过，我们希望我们在此所提供的内容，能给你提供一个关于完成IPA论文写作需要哪些内容的明确指示。完整的论文可参考伊托夫和史密斯2006年的作品(Eatough and Smith，2006a)。

引　言

本文关注的是当某人对其愤怒和相应行为表现的解释开始崩溃时是怎样的感觉。本文的目标在于说明意义生成的体验，以及这样的意义生成可以如何变得模糊、矛盾和混乱。此外，我们主张诠释(或解读，sense-making)始终都是个人和社会的产物(Riessman，1992)，虽然，不可避免地，文化性话语方式影响着个体的意义生成，这个过程也涉及个体对生活中事件的重新体验和重新解释。这个研究报告通过呈现对一个女性研究对象所进行访谈的解释性分析来说明这一双重活动过程。

专栏R1.1　使用文献

在一项IPA研究中，"文献回顾"相比其他方法规模较小。参考文献用来协助研究的方向定位，但其目标并不是对源于现有文献的假设进行检验。人们已经认识到，在分析中可能会出现未被预测的问题以及可能会通过使用恰当文献而从讨论中发现新的问题。在本研究中所发生的是，归因问题突现于分析过程中并且在讨论中被仔细盘算。不过，我们也打算通过在引言中提供一些合理数量的归因文献来帮助读者理解我们的分析过程。

* 本章严格基于2006年发表在《心理学与心理治疗：理论、研究与实践》(由英国心理学会出版)期刊上的一篇研究文章(第79卷第一期第115—135页)。我们感谢英国心理学会授权本书使用这篇文章的修改版。

很少有情绪理论者会怀疑存在于认知和情感之间的关系，而许多“非认知”理论者在其研究和理论纳入了某些认知成分(Strongman,2003)。许多重要的认知与情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关注评价和归因。沙赫特(Schachter,1964:51)的情绪双因素论是一种认知—唤醒理论，认为“情感状态可看作是生理唤醒状态的机能以及对这种唤醒状态的认知评价”。重要的是，按照这个理论的观点，个体在他们所相信引发了生理唤醒的情境影响下解释生理唤醒。譬如，在一个浪漫的背景下，砰然跳动的心脏和颤抖的双手被解释为热烈的爱意(Dutton and Aron,1974)。

韦纳(Weiner,1985)的情感归因理论认为情感是不同认知过程时间序列的结果。首先，个体评价一个结果的成功或失败。其次，如果结果被评价为负面即寻求一个原因。最后一步，按三个维度对原因进行归类：控制点(起因是特质性的还是情境性的)、稳定性(起因是暂时性的还是持续性的)以及可控性(起因是否受意志所控制)。有证据表明特定情绪与这些类型化和维度化的归因相关联。譬如：内部控制点和可控性与内疚相关，而可控性和外部控制点与愤怒相关(Neumann,2000)。不过，在他们思考和解释他们的各种情绪时，归因模式在人们处于其应该怎么做的理想状态下才是合理的，而不是真正在做什么的时候(Fiske,2004)。这样的模式具有一个严格的“解释”概念(Harré,1981)并且人们的真实行为通常被建构为变异和偏差。

最近，归因对情绪发挥因果效应的主张已经被评估理论者所挑战(Smith et al.,1993)。他们认为归因是知识的一种特定形式，它通过对事件原因的知觉进行推理来协助评估过程。因果归因不足以将一种情绪带入现实。相反，为了情绪的出现必须评价和评估一个事件的“事实”。从这个角度来看，情绪是对事件和客体的个人意义及其对幸福感的影响评估的结果(Lazarus,1991)。“评估(appraisal)”是这些评价的心理学术语，通常被理解为在情感反应中达到顶峰的信息加工序列的一个独特阶段(Parkinson,1997)。不过，评估与情绪之间简单因果关系的实证证据是微弱的(评估—情绪连接的详细讨论，参见 Parkinson,1997)。

207

从本文的角度来看，我们关注的是解释性、意义生成的人被局限在假设性因果关系的内部认知活动中。这种关注也被一些情感理论者和话语心理学家所表达。譬如，帕金森和曼斯戴(Parkinson and Manstead,1992)指出情绪体验是我们与其他人、我们自己、其他机构和我们的物理环境，以及认知评价过程的社会互动结果。此外，情感事件具有时间维度并展开于时间过程。这些特性在片断式研究中并不好捕捉，它们经常被用于研究评估过程(Levine,1996)并且依赖于模拟和直接想象式任务(例如，Smith and Lazarus,1993)。本文强调在其不断展开的生活中那些非常具体的情景中，个体如何谈论和解读他们的情绪和情绪化。

方 法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自始至终均被称为玛丽莲(Marilyn)。在研究期间，玛莉莲 30 岁，和他的伴侣约翰(John)以及他们的儿子安德鲁(Andrew)一起生活在英格兰中部地区一个内城区由地方当局建造的简易住宅里。该地区在社会需要方面被列为非常极端，并且

具有相应的高犯罪率。玛丽莲在16岁时离开学校并且工作于各种各样的非熟练工岗位。自从有了安德鲁，她就不再离家工作。所有名字均被改变以保障隐私。

> **专栏 R1.2 "简略描写"**
>
> 提供一些关于研究对象的传记信息，使其对于读者"变得生动"。其目的在于向读者提供文本化于分析材料中研究对象的一些整体知觉。

资料收集

玛丽莲回应了在其居住区域投递的信件，该信件为一项女性如何体验和解决其生活中冲突的研究招募志愿参加者。在最初的电话交谈之后，本文的第一作者在其家中会见了她以商讨参与这项研究。第一次会面主要是试图使玛丽莲感觉到放松，并且尽可能详细地告之研究将涉及的内容以及提出任何她可能有的顾虑。这可以被称为试图在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达到对称（Hollway and Jefferson，2000）。随后，制订出访谈计划表，在三周时间内实施了两个半结构式访谈，获得了四个小时的资料。访谈由本文第一作者在玛丽莲家实施，并且记录于小型的磁盘录音机。有一些具体问题是我们希望涉及的，不过对于玛丽莲主要的目标是使其述说她的故事而不只是简单地做出反应。通过作为一个积极的倾听者，作者允许访谈按玛丽莲开启的大道而不是按访谈计划的限制推进，以捕捉到她意义生成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208

> **专栏 R1.3 采用某种对话风格**
>
> IPA 式访谈是以研究对象为主导的，并且研究者把研究对象看作是研究主题方面的有经验的专家。其目的在于以一种敏感而共情的方式促进表达和获得一个陈述，并且认识到访谈构建了一种人对人（human-to-human）的关系。因此，访谈采取的是叙事风格，不是遵循简单的提问与回答形式。

分 析

资料分析建立了三个包聚玛丽莲愤怒和冲突生活体验的高阶主题。本文呈现了其中之一的一部分，其被描述为一个意义生成主题。这一主题考查意义的个人和文化框架如何相互交织在一起，并且是活生生地被单个个体所经历。

结 果

在此部分呈现了这个诠释性主题的一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分析过程显示了玛丽莲如何使用意义的文化框架来解释她的愤怒和攻击性行为。这些框架中的第一个强烈地强调了生物学的话语方式，也就是激素和酒精的影响。分析过程说明了玛丽莲对这些影响作用做出的一个强烈且有说服力陈述的尝试，是如何被替代性解释削弱的。

209

专栏 R1.4 选择需要报告的分析主题

当为了出版而写作时,实际上,经常是在写作一篇学位论文时,通常不可能完全地报告详细的分析过程,所以研究者要决定哪些内容应该被包括进去。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由你打算达到的被期刊和读者关注的程度所决定。要不,选择可能更多地受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所影响。你想要问的问题可能是你的目标:是为一个特定主题提供仔细阅读,还是一个不太详细却更为广泛的叙述。

"都是荷尔蒙的作用"

借用将行为解释为激素效果的医学话语方式,是解读一个人体验过程文化性的有力手段。将攻击和暴力行为归因于激素的不平衡意味着拙劣的生物学观点,并且忽视了个体的躯体、社会和文化情境如何影响了我们是谁,我们如何处理情绪痛苦,以及我们如何管理生活中的困难。对激素影响作用的叙述是贯穿于玛丽莲整个故事的强有力线索。在第一个摘录中,玛丽莲在她的激素水平和她的攻击性行为之间建立了明确的连接。在那个时候,她大约 17 岁,非常想要一个孩子,她的攻击性行为同时指向于她的伴侣和她自己。

> 就像你知道的,我开始推他或打他,诸如此类。不过后来,事情,事情可以说是变得糟糕起来——当我开始伤害我自己,就像把胳膊砸向镜子以及用刀划,你知道的就是自残但并不伤害自己地用刀划。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是一种呼救,不过我觉得基本上没人回应(笑)。并且我饱受抑郁症之苦,我不得不继续服药。并且因为我患有多囊性卵巢综合症,我有个生育上的困难问题……这很糟糕。不过我觉得所有的激素都可以把我许多的心情和攻击性行为以及其他解释过去。不过我觉得我并不知道我有没有觉得我对我的家庭有许多焦虑,但我想这大多是激素性的,我的攻击性行为以及此类的事情。

所选取的资料材料表明,除了表现出指向其伴侣的攻击性行为之外,玛丽莲进行了故意的自伤行为。对玛丽莲来说,这个叙事片段的现象式体验是一种升级现象。她从相对无害的身体攻击行为转向以自己为目标的、具有潜在危险和伤害的攻击行为。此处令人感兴趣的是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玛丽莲的激素式叙述是如何发展并成为了解释的基础的。首先,玛丽莲将其攻击性行为描述为没有得到回应的呼救。这可能是一种相对较新的解释,并且也是她所接受辅导的一种结果。接下来,

210

玛丽莲引入了她的抑郁症和生育问题,后者为玛丽莲攻击性行为与激素之间的连接设置了场景。"都是激素"这句话显示了玛丽莲如何利用多囊卵巢综合症来强调激素对她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可能的普遍控制。在摘录内容中,她趋向于证明在其激素水平与攻击性行为之间综合性的明确关系。而上述那句话的效力在于其对玛丽莲生活中愤怒和攻击性事件的另外一种替代性解释进行否定的能力,并且其也成为这个摘录中的语言高潮。不过,也存在着她对激素式解释进行置疑的证据,当她说"不过我觉得我并不知道我有没有觉得我对我的家庭有许多焦虑,但我想这大多是激素性的,我的攻击性行为以及此类的事情"的时候。家庭的困难被提到了,随后又很快消失了。"解释得过去"可能是反话,反映了对玛丽莲采取的"一揽子"解释的意识,这种解释歪曲了真实发生事件的复杂性。

专栏 R1.5 解释风格

这个部分说明了 IPA 分析的风格。我们以对玛丽莲措词的密切注意和阅读作为开始。不过，随着我们的深入，我们转而和玛丽莲一起去思考她对自己关于“激素”式解释寄托的不同反应所进行的考察。

“是酒精的作用”

除了推测其愤怒与攻击性的原因是激素性的，玛丽莲还使用了一种同等效力的生理学话语方式：酒精。为了描述一次偶然卷入的与一个名为西蒙（Simon）的伴侣的冲突，玛丽莲说道：

> 这是酒精的作用，我清楚地记得我确实感到愤怒，真正的愤怒，我觉得是狂怒，不过（停顿）更多的是因为出丑、被羞辱，他让我在朋友面前觉得自己很愚蠢。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吧？这不是，我的确不认为你会为此付出代价但确实就是那么回事。我就是不认为我确定考虑到这件事的情绪因素。我只是刚好在考虑你让我难看，就不要想这样走开。我就是让他滚蛋，试图这样推开他，不过我觉得那晚真是古怪，因为我觉得多数是酒精的作用但我却不怎么记得了。就好像是盲目地愤怒，这种情况是真的，并且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被大家喜欢——如果没有酒精在起作用。我真的无法回忆起太多我做过的事，直到我确实看到了伤害。然后坐下来并且看着我做过的事。

这段摘录有几处让人感兴趣的地方。一开始，玛丽莲做了一个清楚的因果陈述，到了最后，这个陈述，被严重地弱化。首先，她将其狂怒描述为“盲目”，并且其结束状态是从很少或没有记忆的愤怒中显示出来的，时间也是被丢失了的。在别的 211 研究中，我们曾经报告过这种没有酒精的强烈情绪，在玛丽莲自己提到的其他因素情况下也会被体验到（Eatough and Smith，2006b）。其次，玛丽莲感受到的愤怒看起来不是由酒精提供动力，而更多的是因为她所体验的公开羞辱——需要报复的那种。因此，不可以简单地按酒醉的效果来对待，而是按诚实与自我价值的问题来对待。第三，“不要想这样走开”可以被看作是宣告式的语句，让人感兴趣的是去推测为什么玛丽莲要对自己说这句话。可能很简单：因为被丢开会增强其被伤害的感受，或者她不再有愤怒与攻击性的目标。不过，自从离家之后，玛丽莲总是处于多个亲密关系之中。存在着争议的是，这些关系为她是一个可以被爱的人提供了证据，也显示了她的潜意识动机可能是回避（重温）其与母亲关系的体验。最后，因为激素式的陈述，各种漏洞开始在摘录内容中显现，削弱了其作为一个叙述的强度。在摘录内容的结尾，在她说“并且看着我所做过的事”的时候，她为她的行为承认了一种特定过失。她还存在着一种顺便得到的认识，即对酒精的关注使她避开了其他（诸如感到被伤害和被羞辱等）有促进作用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是如何让她感受自我感的。

专栏 R1.6 创设一个叙事性陈述

最终的叙事性陈述应该是有说服力的,经过解释性注解和研究对象自身措词的综合来说明研究对象的体验。虽然不可能讨论应该呈现多少来自资料的摘录,但要提供得足够以便于读者能够对已经做出的解释主张进行评价。

"我想我得抑郁症了"

与激素和酒精这样简单的因果陈述相比,下面的摘录提供了对烦恼的玛丽莲的经历及其环境的具体情况的感人描述。

> 在我有点儿暴力倾向的时候,保罗(Paul)是第一个和我有关系的男人。嗯,我记得我在这段关系的开始阶段是开心的,然后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在一个肮脏的一居室里住了很长时间。他当时工作很晚,我想确实很晚,我认为我抑郁了。嗯,我想我们同居了大概一年,一年再加半年,我们俩都打算要个孩子。嗯,我记得我当时在医院进行治疗,但我也变得越来越有攻击性,所以我当时经常打他。我的意思是不打脸而是打胳膊之类的地方。嗯,我变得更加语言刻薄,并且试图比这段关系中的任何东西更加厉害地伤害我自己,所以我想要切开我自己……我想我处在你知道就像一种情绪痛苦之中你知道,就像当你心痛的时候,我觉得因为某些事情心都碎了你知道,可能又是我妈妈并且我当时在想,我认为我再想我伤害自己也没有这些关系伤害得那么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12

再一次,情况升级的叙述被表现出来,并且玛丽莲的情感痛苦被感受为肉体的痛苦。起初,玛丽莲似乎打算为其攻击性行为寻求社会的和社会学式的理由(譬如,居住和工作条件、抑郁症等),但是这些都被更为个人化的理由所替代。一个破碎而疼痛的心的比喻是一种具有文化效力的方式,它标志着一些宝贵事物的丧失,可能是一个人、一个目标或一段关系。这是一个更为多层面的叙述并且不同于先前玛丽莲那些有点像偶然观察的叙述,"我想那是一种呼救"(参见第一段摘录),是对曾经有一段痛苦和烦恼时期的公开承认。玛丽莲的寂寞充满了整个陈述内容:保罗大多数时间不露面,她很难变成孕妇(所以没有怀孩子),以及她痛苦到了打算伤害自己的地步。

因此,在上面显示出来的叙述片断中,存在着一系列竞争性的解释。玛丽莲依据激素和酒精的效用作为叙述手段来解读她的愤怒。这些意义框架是有效的,因为它们满足了对简单因果解释的愿望,与此同时,免除了她的责任。不过,正如我们已经说明的,对"都是激素的作用"和"是酒精的作用"的强调受到了威胁,并且这种强调因为玛丽莲开始认识到意义生成的其他方式而崩溃。

对构成玛丽莲生活世界的物质性和社会性条件的关注是必要的:她在与保罗保持关系的时候16岁,并且在搬到和保罗一起住之前,在他房子外的拖车里睡了几个星期;玛丽莲不与她母亲(并且可能不与家里任何人)接触,保罗工作到很晚并且她的物质性境遇与理想状态相差甚远;此外,她发现她无法怀孕,并且将她当时的精神状态描述为压抑;最后,存在着一个叙事内容的改变,从第一段摘录中对呼救的一般性解释以及"对家庭的焦虑"到一个更为具体的,虽然有点犹豫但涉及了其母亲的陈述。

讨 论

专栏 R1.7 把分析放置在概念性语境中

讨论是一种分析结果和现有心理学文献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可能是批判性的，将注意力放在质性分析如何为我们对人类的认识带来一个新的视角。在这一小节中，我们以一些已经透过理论过程完成的分析性观察结果为基础。我们关注两个玛丽莲所使用的稳定存在的意义框架：激素和酒精。

213

我们认为有一些解释性分析体现了"解释"的传统社会认知视角如何忽视了经验过程，正进行意义生成的个体以及他/她带给生活述说的东西。自相矛盾的是，两种方法的规定性和还原性透过玛丽莲的理解尝试被放在了显著位置。在归因和评估研究中发现的规范性的和单向性的因果序列，在面对个体意义生成的零乱和混乱现实时遭到了破坏。

玛丽莲的意义生成是崩溃性的，这种体验与试图在原因和效应之间建立联系的因果归因模型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在个人生活世界的语境范围内，这些关系通常是难以辨别和推测的。我们由此主张归因方法，因为其对原因和效应匹配的依赖，是不能够简单地解释一个人意义生成的复杂性的。与此相似的是，各种为评估概念提供中心位置的认知情感理论，忽视了意义生成以及情绪的人际交流功能（Parkinson，1997）。毫无疑问，情绪反应具有评估的成分，但简单地将这一功能简化为认知过程，就忽略了主体间的个体经验。譬如，我们曾在其他研究中报告过躯体在围绕着愤怒的女性意义生成中如何扮演了决定性的作用（Eatough and Smith，2006b）。个体的意义生成活动有时包含了理性的评估，但它是需要想象、直觉和意向的。

同样，虽然我们认识到个人的意义生成受现有文化语境和社会习俗、个体的斗争以及对他们在其独特的个人和社会历史背景差异认识的限制。正如罗森沃尔德（Rosenwald，1992：269）所进行的恰当陈述：

> 如果生活不止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只被一种已经知道的情况所控制，那么个人不能够宣称一个环境不能生存或一种生活被破坏。

玛丽莲对其生活经验的陈述说明的是，她如何感受自己，她的故事以及她的情境，她如何通过现代文化性话语方式对其情境同时挑战式和接受式地理解。这个小节的余下部分将讨论意义框架的限制性。我们的观点是，在它们能够充分地为涉及个人意义生成的复杂概念和多层面的归因及评估作出贡献之前，需要详细说明归因理论和理性评估理论。同样地，我们认为个体的意义生成，至少部分地通过文化语境和社会习俗，但不由它们所决定。

214

分析表明玛丽莲将她的不孕症、抑郁症、愤怒及攻击性行为之间连接起来。激素对女性行为的影响是一种否认女性道德机能的文化强力话语方式并不让人意外。在解释女性的愤怒和攻击性行为方面，激素式的解释构成了"疯的或坏的（mad or bad）"二分法的一半。女性愤怒的文化话语方式构建了作为其性别角色的反面与背离的情绪体验。有研究表明，当女性变得愤怒的时候，她们就会觉到自己处于弱势情境中（Campbell and Muncer，1987）。生理上或语言上的过激行为被体验为一种

控制的丧失，并且不符合于女性特质的优势常态（坏的）。不过，如果女性通过哭喊来行使控制和表达愤怒，则常常被看作是“歇斯底里般的（疯的）”。这并不是说起伏的激素水平对玛丽莲愤怒的强烈情感和她的攻击性没有影响。当她还在年轻的时候就存在着生育问题，她可能曾经为抑郁症接受治疗而服用三环类抗抑郁药物，在进行访谈的时期，玛丽莲正深受产后抑郁症之苦。此外，生育问题很可能曾经影响到了玛丽莲的月经周期。

不过，激素是否是玛丽莲愤怒和攻击性行为中一个真正的重要构成因素，并不能从访谈资料中确定。重要的是她相信它们起了这种作用。分析结果清晰地说明了激素是如何成为玛丽莲意义生成的关键成分的，并且说明了为什么这个情况会被她当作问题提出来。援用激素解释因果是医学话语方式的一部分，其说明存在着一种治疗形式的解决方法用来纠正表面的不平衡。它们通过否认个体道德机能而发挥作用。

玛丽莲对激素式陈述的坚持，构建了其愤怒和攻击性行为的体验，反映了她在面对超出其可控制压力时的消极状态。同样，酒精在玛丽莲的愤怒和攻击性行为故事中发挥某种作用也并不意外。如同激素式解释一般，存在着丰富的实证证据可以推断酒精消耗通常会提高攻击性行为的水平（Bushman and Cooper，1990）。酒精瓦解了个人如何处理信息的过程，研究者称之为“酒精近视”（Steele and Josephs，1990）。不过，除了这个证据，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主流的一般大众的和心理的框架内被过度简单化和夸大化了。当玛丽莲说“都是酒精的作用”的时候，她使用了一个忽略其行为发生的宽泛人际背景的简单归因方式。这种类型的过度简单化鼓励个人把自己看作是被动的或者是无法行使控制的，因为让酒精来负责是一种更容易的选项。尽管这并没有让该行为在社会上被接受，但这已经是一种社会上公认且能够被理解的说法，它往往不被质疑。尽管事实如此，这样的因果归因在心灵水平或人际水平上均从未具有完全的说服力。

215 上面的分析强调玛丽莲叙述中的矛盾，她苦苦挣扎于针对其激素和酒精解释的内部和外部挑战。譬如，在玛丽莲为自己与西蒙打架提供解释的摘录中，当她的愤怒更多地与对需要报复的当众羞辱有关时，事情变得很清楚，酒精的作用就被弱化了。在这一事件中，玛丽莲的攻击性行为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酒醉的结果，同时也与其个人的价值和诚实有关。研究者已经证明攻击性行为是自我被威胁的一种结果（Baumeister et al.，1999）。关注当众侮辱或拒绝恐怖的解释需要有意识的、内部自反式考察，并且指向于一种脆弱和破裂体验的自我感。通过强调酒精的作用，任何真正针对超出即时先行事件之外发生了什么的理解尝试都被有效地中止了。

小 结

本文提供了可以如何呈现一个 IPA 分析的实例，同时也提供了对分析过程持续性的反思。虽然只用于一个个案研究分析，但当对来自更大样本的资料进行分析时相同的基本原则也可运用。我们希望此报告（结合关于 IPA 原理和程序的章节），能够帮助对 IPA 感兴趣的读者使用这种方法去实施和写作自己的分析。

参考文献

Baumeister, R. F. , Smart, L. and Boden, J. M. (1999) 'Relation of threatened egotism to violence and aggression: The dark side of high self-esteem', in R. F. Baumeister (ed.), *The Self in Social Psychology*. Hove: Psychology Press. pp. 240-279.

Bushman, B. J. and Cooper, H. M. (1990) 'Effects of alcohol on human aggression: An integrative research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7: 341-354.

Campbell, A. and Muncer, S. (1987) 'Models of anger and aggression in the social talk of women and men',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17: 490-511.

Dutton, D. G. and Aron, A. (1974) 'Some evidence for heightened sexual attraction under conditions of high anxie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0: 510-517.

Eatough, V. and Smith, J. A. (2006a) 'I feel like a scrambled egg in my head: An idiographic case study of meaning making and anger using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79: 115-135.

Eatough, V. and Smith, J. A. (2006b) 'I was like a wild wild person: Understanding feelings of anger using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97: 483-498.

Fiske, S. (2004) *Social Beings. A Core Motives Approach to Social Psychology*. Hoboken, NJ: John Wiley and Sons. 216

Harré, R. (1981) 'Expressive aspects of descriptions of others', in C. Antaki (ed.), *The Psychology of Ordinary Explanations of Social Behaviour*. London: Academic Press. pp. 139-156.

Hollway, W. and Jefferson, T. (2000) *Do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Differently: Free Association, Narrative and the Interview Method*. London: Sage.

Lazarus, R. S. (1991) 'Progress on a cognitive-motivational-relational theory of emo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46: 819-834.

Levine, L. J. (1996) 'The anatomy of disappointment: A naturalistic test of appraisal models of sadness, anger and hope', *Cognition and Emotion*, 10: 337-359.

Neumann, R. (2000) 'The causal influences of attributions on emotions. A procedural priming approach', *Psychological Science*, 11: 179-182.

Parkinson, B. (1997) 'Untangling the appraisal-emotion connec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 62-79.

Parkinson, B. and Manstead, A. S. R. (1992) 'Appraisal as a cause of emotion', in M. S. Clark (ed.), *Review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13: Emotion*. Newbury Park, CA: Sage. pp. 122-149.

Riessman, C. K. (1992) 'Making sense of marital violence: One woman's narrative', in G. C. Rosenwald and R. C. Ochberg (eds), *Storied Liv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Self-Understanding*.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 231-249.

Rosenwald, G. C. (1992) 'Conclusion: Reflections on narrative self-understanding', in G. C. Rosenwald and R. C. Ochberg (eds), *Storied Liv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Self-Understanding*.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 265-289.

Schachter, S. (1964) 'The interaction of cognitive and physi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emotional state', in L. Berkowitz (ed.) *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1.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p. 49-80.

Smith, C. A. and Lazarus, R. S. (1993) 'Appraisal components, core relational themes, and the emotions', *Cognition and Emotion*, 7: 233-269.

Smith, C. A. , Haynes, K. N. , Lazarus, R. S. and Pope, L. K. (1993) 'In search of the "hot" cognitions: Attributions, appraisals and their relation to emo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5: 916-929.

Steele, C. M. and Josephs, R. A. (1990) 'Alcohol myopia: Its prized and dangerous effect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5: 921-933.

Strongman, K. T. (2003) *The Psychology of Emotion. From Everyday Life to Theory* (5th edi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Weiner, B. (1985) 'An attributional theory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emo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2: 548-573.

报告二

扎根理论

器官捐赠者家属的关键的护理经验和丧亲之痛：扎根理论分析的反思性叙述*

麦吉·斯圭厄 & 希拉·佩恩

本报告的目的在于使读者清晰地感受扎根理论研究结果的样子，了解如何将研究结果呈现在期刊论文或学位论文中。此报告中的研究焦点是探究器官捐赠者亲属的经历。在报告中，为了强调撰写扎根理论期刊报告中重要的主题和一些扎根理论过程的特殊主题，在相关衔接之处使用了文本专栏。该报告的完整版本，可看斯圭厄和佩恩1996年发表的期刊文章（Sque and Payne，1996）。

导 言

> **专栏 R2.1　研究的导言或背景**
>
> 扎根理论家对其所探索领域需要了解多少，是有颇多争议的。由于我们对捐献亡故亲属器官者的丧亲之痛了解甚少，所以在研究中考虑采用扎根理论方法。本来不该把文献综述写得这么详细，而应将它放在研究发现的讨论部分，但本导言使本研究成为好的实例是必要的，详细的导言展示该主题中文献与知识基础之间的突出差距，也是必要的。我们也需考虑到研究报告所投期刊的特殊风格，是否需要详细的导言或背景。

英国每年大约有70万人死亡，但很少有人成为“心脏捐献者”（即主要器官捐献者）。尽管潜在捐献者的亲属是捐献过程的重要群体（在对捐献器官进行了摘取之前，需要他们的同意），但对他们的经纶却所知甚少，（Pelletier，1992）。

对捐献者亲属经历的实证研究在范围和设计上都是有局限的：首先，捐献家庭数量很少，他们的匿名性及地理位置的分散使接近捐献者亲属变得很难，更不用讲调查方法在描述捐献者亲属经验方面的限制（如 Bartucci，1987；Perez-San-Gregorio et al.，1992）；其次，研究会激起强烈的情感和理论上围绕访谈丧亲群体的伦理争议（de Raeve，1994），这都会使研究成为问题。

---

* 本报告是作者一篇文章的剪辑，原文题名为“丧失失调：捐献者亲属的经历”，刊登在《社会科学和医学》杂志43卷1359-1370页（经 Elsevier 允许而在此出版）。作者感谢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和沃克（Jan Walker）博士对本文早期草稿周到的评论。本文所报告的研究，由英国卫生署护理（British Department of Health Nursing）研究生助学金资助。

拉斯皮纳等人(La Spina et al. ,1993)通过对20个捐献家庭历时6~12个月的调查,探讨了家属做出捐献决定的心理学机制。结果显示,捐献的主要原因是希望死去的亲人通过接受者的接受继续活下去。这被认为是一种抵抗死亡带来的极度痛苦的防卫机制。无论什么原因,如果这种投射突然崩溃,会使亲属感到内疚,他们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死者。这些事件会使他们陷入沮丧、焦虑和丧亲之痛中。

在提出器官捐献的议题时,库佩(Coupe,1991)确定了给予17个家庭的支持主题和信息知觉。此研究出现了六个主题:通知家属、处理脑死亡、器官捐献、悲痛、家属的需要、设备和护理医疗参谋。器官捐献被视为有难度的主题,然而,捐献的请求却很少触怒死者的亲属,经常被他们认为是"应该做的事"而接受。一些家属感到他们接收到有关摘取的信息不足,尤其是身体在摘取后最终会如何。研究指出,当提出捐献的请求时,捐献者家属作为当事人,要建立对他们的个体评估。

佩尔蒂埃(Pelletier,1992)使用半结构式方法对9位器官捐献者家属做了访谈,以找出他们认为捐献过程中最有压力的方面。她得出了最有压力的几种情况:失去所爱的威胁、脑干死亡的诊断报告、健康专家得出不能进行器官捐献的结论、应对丧失有关的诸多变化。佩尔蒂埃(Pelletier,1993)进一步使用此捐献者家属样本来推断他们在此压力情境中的情感经历和所使用的应对策略。"危及生命"的时段内,他们报告了一系列的情感,如无助、悲伤、麻木和恐慌。而应对策略则涉及寻求信息、寻求情感支持、保持联系(与亲属保持近距离)、逃避和回避、有计划的问题解决及使用情感控制。伴随着脑死亡确证的情感经历是不相信、震惊、麻木、发怒和悲痛。器官捐献就是在此种情况下所使用的应对策略,因为它提供了使死亡变成为积极事情的一种途径。 219

在本研究之前,使用质性方法对捐献者亲属经验的调查是有限的、零零碎碎的,并不完整。过去没有调查试图描述家属器官捐献的全部经验,或者提出能对此做出解释的归纳性理论,而这却是当前研究的目标。期待这样一个理论能通过识别可变因素和建立假设,为将来的研究提供一个框架。它也能提出专业健康教育中所需要的恰当要素,以确保给予捐献者家属以适当的护理。

方 法

专栏 R2.2 对取样和资料搜集的反思

由于对特定期刊文章里的文字限制一直牢记在心,所以需要解释的最重要部分之一就是取样。在扎根理论中,正如下面第一段中所指出的,我们希望能抓住我们能抓住的研究对象的最丰富的经验。所以告诉读者我们不止在一个地方做出了大量努力是很重要的,这些地方可能有不同的支持服务、不同年龄组的捐献者、捐献迄今的时间以及死亡时间的不同。其中的部分因素放在表R2.1中。在第5章里,希拉·佩恩曾写到此领域的研究者过于敏感,我们可以选择不进行初步研究,但觉得由于本研究和研究对象群体的敏感本质,加上访谈者(麦吉·斯圭厄)可能被问到的问题,以及她是研究新手,因此恰当的是做个探索研究。结果证实此策略非常有用,因为在访谈中很多有难度的主题经常被提及,斯圭厄能够帮助研究对象消除恐惧,或给研究对象提出建议用来找到他们问题的答案或解决问题。于是我们提议使用扎根理论取向而非传统的扎根理论,因为在传统的扎根理论中,研究者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还所知甚少就进入研究现场。在这种敏感的研究中,知道访谈对研究对象的影响同样很重要,所以,要评估我们的访谈。简短地报告了资料的有效性和分析过程。在扎根理论中会涉及资料分析与研究对象进行检核分析的争论,这通常是人们必须做出的选择之一,所以,在这里我们只是简单地依照扎根理论资料分析的一般原则提到了效化过程,这在结果的报告中很明显。

通过信件邀请了42个捐献家庭的亲属来参加访谈研究。由于地域分布可能的重要性(取决于各地不同的做法),通过英格兰三个地区移植协调中心来招募这些家庭。选择的亲属要有一系列的经验,比如捐献迄今的时间、他们与捐献者的关系。16个家庭(24位亲属)同意参加本研究。在表R2.1中,提供了样本特征详细的描述。

220

所有参加本研究的家庭都曾同意捐献多个器官。当请求12个家庭表态时,有四个家庭很自然地做了捐献决定。访谈在研究对象的家里进行,持续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表R2.1 研究样本的家庭关系、捐献者年龄、主要受伤处、捐献迄今月数

被访谈亲属	捐献者年龄(岁)	主要受伤处	捐献至今的时间(月)
父母	27	大脑大出血	5
父母	25	由心肺复苏器导致的大脑缺氧	7
父母	20	骑车导致的脑部受伤	36
父母	22	道路交通事故导致的脑部受伤	8
父母	26	蜘蛛指(趾)综合征(Marphan)	18
父母	10	病毒性脑膜炎	16
母亲	22	哮喘突发导致的脑缺氧	11
母亲	0*	窒息导致的脑缺氧	11
父亲	26	道路交通事故导致的脑部受伤	4
丈夫	44	大脑大出血	7
丈夫	56	大脑大出血	8
丈夫	48	大脑大出血	17
妻子	47	大脑大出血	4
妻子	47	大脑大出血	18
妻子和母亲	22	道路交通事故导致的脑部受伤	7
妻子和儿媳	50	大脑大出血	4

* 十个星期大的婴儿

在处理敏感问题时,重要的是研究者要全面了解其所探索的主题。同样,通过探索研究,为确立访谈者的角色做了特别的准备。此探索研究的对象是两个数年前做过捐献的家庭,这些家庭都曾公开谈论过他们的经历。这样做的目的是探索重要的主题,以及获得做这样一类访谈的自信。

所有的访谈都由第一作者(麦吉·斯圭厄)实施。在介绍访谈程序之后,要求研究对象讲述自己的经历。只有在经历叙述完之后,研究者才可以运用访谈指南——从预备访谈和相关文献中提出的——来深入探询。这个访谈指南在资料搜集过程中一直在修正,以吸收新的概念。之后请研究对象就访谈经验提供评估性反馈。 221

用扎根理论取向(Strauss and Corbin,1990)进行资料分析。转录的内容以主题编码,这些主题聚集而形成命名的类目。这些类目与资料十分匹配,因为它们是从调查中产生的。要求九位研究对象检阅了他们访谈的内容梗概,以确证研究者的解释。

结 果

专栏 R2.3 报告发现

有很多种方法报告扎根理论研究,如果我们重新写作此部分,我们将用"发现(findings)"而非"结果(results)"(这是原期刊论文中的描述)作为标题。"发现"这个术语能更好地描述质性研究的结果,它不是那种来自量化研究的测量"结果"。我们选择用三部分报告研究发现:先从报告类目和核心变量的数量开始,其标题和图 R2.1 展示了其概貌;第二部分对类目进行了描述,其中交织着报告扎根理论的各种解释性文献;第三部分关注建立理论及支持建立理论的文献。

在描述类目时,我们引用访谈转录中的一些内容作为解释性证据。选择引述对研究者来说通常都是个问题,因为对一个特殊的主题或类目来说,哪些引文更具有代表性是很难确定的。使用最"令人吃惊"、易于记住的引文,还是使用那些真正包含类目内容的引文,两者经常发生冲突。还有就是决定使用多少引文:经常有很多好的描述性引文,筛选的过程让人"痛苦",因为你有很多想要与读者分享。在扎根理论报告中,选择不同于主流模式主题的对立观点同样是很重要的,正如本章所展示的。然而必须记住,期刊论文主要依靠作者对事件的解释,这个解释应该是调查结果的主体部分,引文的作用是佐证这种解释。这就是我们在这里力图报告类目的实质。

资料分析获得 11 种类目,这些类目将研究对象的经验概念化。它们安排在研究的中心主题——"捐献者亲属经历"的周围,而形成对经历分析的叙述版本,如图 R2.1 所示。 2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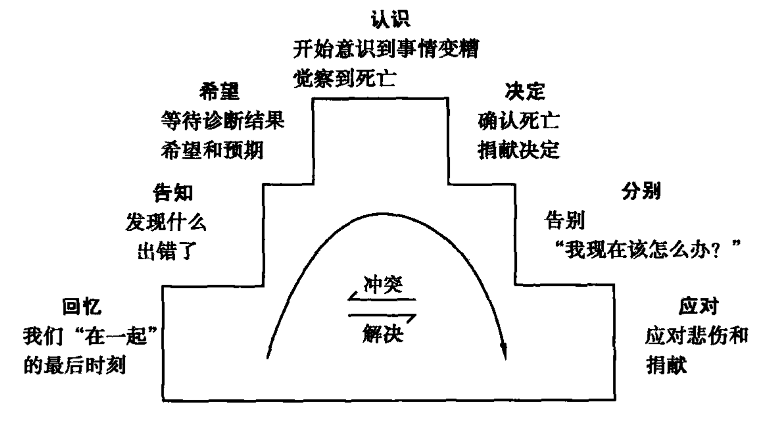


图 R2.1 捐献者亲属经验的模型

图 R2.1 的模型展示了类目的相继关系，这些类目——“我们‘在一起’的最后时刻”、“发现什么出错了”、“等待诊断结果”、“希望和预期”、“开始意识到事情变糟”、“察觉到死亡”、“确认(脑)死亡”、“捐献决定”、“告别”、“我现在该怎么办”、“应对悲伤和捐献”——描述了研究对象捐献经验的现实建构。

研究对象在每个阶段都会展示出特定的行为。这些行为是：“回忆”，此时研究对象谈论亲属的特点以及他们在一起的最后时刻；“告知”，当他们第一次被告知有些东西出错了；“希望”，描述的是在医院时的经验；“认识”，是指意识到他们的亲属不能复活；“决定”，是指捐献的决定；“分别”，指离开亲人；“应对”，是应对痛苦和捐献。通过一系列的冲突和决定来解释这些行为，这些冲突和决定遍及类目之中，形成研究对象经验的核心变量。用这些核心变量建立了“丧失失调(dissonant loss)”理论，来解释研究对象在捐献中的心理关切。这个冲突和解决的过程将通过关于捐献及其结果的类目得到检查。

决定——捐献决定

在亲属住院期间，大多数研究对象是第一次做出捐献决定。到此刻为止，研究对象寻求理解发生在周围的事，并且接受这种情况。捐献决定使研究对象产生更深的冲突，例如，是否捐献及捐献什么。

223 在亲属生病的不同阶段，都对研究对象提出了捐献请求。尽管如此，他们都在咨询后认同脑干死亡。捐献请求通常是在医生与有其他亲属支持陪同的患者近亲的晤谈中提出的。研究对象对捐献请求者表示同情，因为他们对此敏感的任务产生了移情。捐献决定在主要家庭成员中进行讨论，主要是协商一致的决定。决策过程的仲裁人和主捐赠人是死者的父母或配偶，最终的决定取决于他们。当亲属的愿望有明确证据时，如签署过器官捐献卡，人们更容易同意捐献。在这些情况下，主捐赠人决定支持亲人的愿望或他们自己的喜好。这确实能导致家庭成员间的相互怨恨：有时决定捐献会给主捐赠人带来冲突，因为捐献可能不是他们自己的意愿，但他们又觉得应该实现亲属的愿望。有的捐献者很可能从没想过器官捐献，然而对捐献请求却感到高兴。他们觉得如果不能执行亲属的临终愿望会很痛苦。

捐献的动机 有四个主要因素可能会促进做出捐献决定：亲人的愿望、亲人的特性、对亲人死亡的认识、脑干死亡的确诊。不过，亲人的愿望是最主要的，因为捐献被视为他们的礼物。例如，一个研究对象回想起她如何从十岁儿子身上拿到了捐献卡，说到：“别犯傻了，你不希望那样。”这个片段使她相信她现已 22 岁的儿子，曾有意在死后帮助别人，她支持儿媳妇摘取儿子器官的决定。

在某些情况下，在没有明确理解死者愿望的情况下，要研究对象做出决定是很难的。“回忆”的类目——“我们在一起的最后时刻”非常重要，因为亲人的特性有助于做出决定：

> 我们说，好的，我认为 G 愿意这样，因为她确实曾经提到有一张卡片，只是她从未去拥有一张，而她自己是个照顾人、乐于分享的人，我们说好我们会这么做的……她一定会对我们确实做了而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

关于捐献动机更多的内容，请看斯圭厄和佩恩在 1996 年发表的文章(Sque and

Payne,1996:1363-1364)。

捐献的关注点 研究对象主要关注捐献的两个方面:身体的损毁和亲人可能因为手术而遭遇的痛苦。尊敬而得体地取出器官对研究对象来说是很重要的。令研究对象欣慰的是器官通过一个常规的外科手术过程取出: 224

> 我还以为G将会被切成块或其他,但并非如此,这在医院里进行,我以为这不会公开说明……它就像做了个外科手术,不必担心病人外形或体型受到伤害。

还有另一种类型的折磨受到研究对象的关注:他们感到亲人已经遭受很多的痛苦了,通过允许移植他们的器官,使他们受到新的侮辱,这公平吗?一位父亲关心他的孩子器官摘取时的损害:

> 我想给她更多的保护,我的意思是她很脆弱,不是吗?不管什么意图或目的,她死了,我不想让她再被乱砍。我不想让她受到伤害。你能理解的,在我眼里,她没有受伤,因为身上没有伤痕。所以在此之后的任何作为将是一个手术,在那个特殊时刻,我太无法理解了。所以那是我的保留态度——我不想让她受到伤害。

对研究对象来说,关于捐献的矛盾来自实现亲人死前愿望与设想的死后捐献导致的痛苦之间的冲突。可以想象,因为对脑干死亡缺乏了解或受伤害死者观念的影响,而加剧了这些关切。卡拉汉(Callahan,1987)突出强调了情绪,即有可能对死者"感到对不起",我们确实认为死者如他们生前一样。所以,可能会对逝者悲悯,对打破尊重死者的逝前承诺感到发自内心良知的愤慨。尽管已讨论过死后伤害的问题,卡拉汉(Callahan,1987)认为我们对死者的移情反应,部分是因为我们不能与死者产生同感——我们只能与其生前状态产生同感。范伯格(Feinberg,1985)详述了这些观点,因为尸身是活人的自然标志,一个尸体被肢解非常像一个活人被伤害——仅仅提议这样的行为就使人感到恐惧。通过这种方式想象死者,从他们的利益考虑,感到悲痛和义愤是合乎情理的。

然而,卡拉汉(Callahan,1987)指出死者的愿望应该得到尊重,这是他们自己的权利。这可以解释当家庭成员得知可以捐献,使亲人的愿望得以实现时的感激。下一步的问题自然就是当愿望不能实现时,我们是否感到道义上的责任。在接到捐献请求时,如果所爱的人曾明确反对时,这对亲属来说是痛苦的两难。同样,本研究的亲属若不知道死者的愿望,做出捐献决定也是痛苦的。

关于捐献的知识 对于器官摘取的过程,有些捐献者看起来十分了解,而另外的人则感到不能获得足够的信息,以支持他们做出捐献决定。更多这方面的内容,请参考斯圭厄和佩恩1996年发表的文章(Sque and Payne,1996:1365)。 225

离别——告别

一旦同意捐献,研究对象就要做出离开亲人的决定,进行"告别"。这使研究对象产生了更大的冲突和难题,因为当下决心离开时,他们得将死亡和亲人的外表画上等号:

> 采访者:事实上你是如何下决心离开并告别的?

研究对象:嗯,那非常困难。我不停地想的是我不停地对小叔子说:"你怎么能与一个还能呼吸的人告别?"我是说,哦,天哪,我不停地说:"他有体温,他仍在流汗,他有体温。"因为对我来说,他并没有真的死去……因为他还在呼吸。我知道这是机器的原因,而他太热了。

只有一种情况除外,本研究中的所有研究对象得知第二次脑干测试报告并确信脑死亡后,都选择立即离开医院。没有哪家医院给研究对象提供一系列的选择来观看取出器官后的亲人(例如,回到病房),这可能适用于一些人。这也确实会导致研究对象的遗憾,因为他们感到亲眼见到刚刚死亡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要比日后在殡仪馆见到好得多。

在一些例子中,在器官取出手术完成后护士会告知研究对象。有的研究对象发现等待这个电话并得知亲属心脏停止跳动是很艰难的。它的确标志着一种结束,而这对亲属来说是所有存在的希望的结束:

我们在圣诞节前夕的四点半接到了这个电话,他们说已经关闭了呼吸机。等待这个电话是可怕的。我们害怕铃声响起。我是说,那一刻我们知道他已经去世了。

回想起来,对于各种选择、告别的时间与方式选取的可能结果,研究对象曾期望得到医院工作人员更多的指导。

离别——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现在该怎么办?"这是一位即将离开医院的父亲问重症特护人员的话。离开医院、处理随即的亲属住院治疗及其结果的忧虑,这是个令人困惑的阶段。家人通常会感到,一旦他们离开特护病房,"一扇门在我们背后关闭"。他们很少得到有关捐献的任何人的支持,有位研究对象说到:

我们那种感觉就好像他们得到了器官,并且我们一离开就能得到。

226

医院一般不针对他们的悲痛提供任何建议,不对他们的丧亲之痛提供支持性联系或实施随访。只在两个事例中,会诊医生和移植协调者建议研究对象,如果有未解的疑问要与自己保持联系。在这里,一些亲属需要得到解释:

我们从医院回来,没有任何支持,什么也没有——只有装他随身物品的塑料袋,如果你需要一些建议,没有地方、没有任何人可与他们保持联系……这就像你两手空空地走了,你看……要是他们能找到一种更好的处理方式,而不是仅仅开具个死亡证明,给你一个塑料袋就打发你走。

应对——应对悲痛和捐献

对于悲痛和捐献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捐献看起来并不能减轻悲痛,它只不过转移了对死亡的关注,转到关注捐献者的成就,关注他们的仁慈和关爱将继续存在。这里一位父亲描述了爱子死后和捐献之后的感觉:

这不是你得到的报答——这是亲人希望把他们的器官给其他人而所发生的事情。他们把自己的器官捐给其他人,这样其他人就得到了生命的赐予,而给予我们

> 的不是普通的悲痛,而是要以别样的方式走过悲伤——更少残酷、未到彻底死亡,因为这种逝去充满了不同的情感。这其中有得知他死后带来益处的喜悦,这与我们已知的相反——哪,哦,死亡没有任何价值,只有痛苦、遗憾和悲伤,而同时也知道这不仅仅是接收者的事,而是他们的家人,他们的朋友……这是件了不起的事,它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几乎是仅赠与了不再需要的东西,就带来了无尽的宽慰和痛苦的消解。

研究对象报告的对缓解悲痛最重要的是,在需要时有能力向别人倾诉丧亲之痛。研究对象倾向于寻找自己的社会支持,但悲痛却主要是在家庭内部消除的。少数没有这种家庭支持的研究对象寻求丧亲组织的帮助,但在此特殊情况下这些组织看起来没有做好帮助的准备。使用丧亲服务的家庭觉得此服务没有什么特殊帮助:在一个个案中,辅导人员竟表达了她反对器官捐献。

研究对象收到移植协调机构的信,信上提供了器官分配的信息。研究对象发现这个最初的消息是有帮助的,但希望得到更多接纳者的信息,因为他们正面临着亲属的部分还活着的矛盾。这种对信息的渴望,并非必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退。在一些事例中,研究对象不愿知道移植是否失败的消息;其他人则认为这不重要,因为至少他们提供过了帮助。研究对象认为亲人继续存活的观点很重要:

> 她并不是死去或消失了,你知道的。她仍然在那里走来走去,知道这些真让人高兴……她的生命仍在继续,在那种环境下,生命真的仍在继续。她生活在广阔的天地之中,同一时刻在四个不同的地方(大笑),这真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227

在访谈时,尽管一些研究对象曾经历了丧亲带来的某些方面的困难,但依然支持他们的捐献决定:

> 在那一天的晚些时候,是的,这是个正确的决定,我十分高兴,我非常满意,我没有悔恨,没有遗憾或怀疑,因为有个人就得到了新生。

捐献决定的可能后果是其会影响捐献者亲属的生活。遗憾的是,这仅仅是推断,因为没有针对捐献者亲属的纵向研究。不过,本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继续推移,在渴望继续得到器官接收者信息方面,捐献的影响依然延续。

鲍尔比(Bowlby,1980)认为,居丧通常会经验到与死者保持关系的强烈需要。这种关系在研究对象的生活中可能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对接受者信息经常的强烈而持续的渴望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依恋旧感情的研究对象感到捐献者的某部分依然活着。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对信息的需要受原先亲属间关系亲密程度的影响。

丧失失调理论:捐献中的冲突及解决

专栏 R2.4 报告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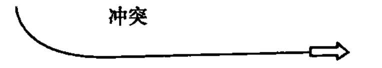
我们在理论上从界定理论和核心变量开始这一部分。然后,我们将文献融入支持家庭成员做决定方式的讨论之中。在这部分,我们以图 R2.2 展示了研究对象的冲突和解决过程(核心变量)。

对事情变糟开始警觉

觉察到死亡

229

冲突



解决

确认死亡

知道恢复是不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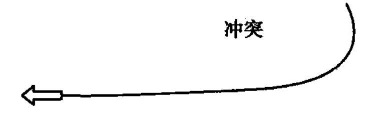
个人认识到死亡

不知道该怎么做

等待死亡确认

死亡确认

冲突



解决

对脑干测试法的信心

死亡确认后未见亲属

器官摘除后身体的样子

难以将亲人的外表等同于死亡

缺乏脑干测试确证死亡的知识

捐献决定

冲突

解决

对捐献者愿望的了解

捐献者的特质

个人对死亡的认识

确认死亡

摘取的知识

将做出捐献的决定

告别

冲突

“我现在该怎么办?”

解决

关于“告别”的选择和建议

摘取后的电话

留下似乎尚没死的亲人

身体的外表美化

应对悲痛和捐献

冲突

解决

关注捐献的成果

关于接受者的信息

作贡献的感觉

了解某些部分已经走出死亡

捐献被确认、受到尊重、不被遗忘

对丧亲之痛的专家支持

终结与亲属存活器官的情感

捐献决定

缺乏丧亲之痛的支持

图 R2.2　丧失失调理论

本研究表明，器官捐献的经历可以由丧失失调理论解释。丧失失调的定义是“丧亲或丧失，其特征是不确定感和心理矛盾。这种丧失是确定的，但关于丧失带来的影响还不清楚”。当丧失包含一系列复杂的决定时，就会产生不一致。冲突和解决因素似乎无处不在，使做出这些决定不可避免（请看图 R2.2）。 228

持有冲突和不协调信念的人倾向于体验到失调和痛苦，这种观点在心理学中有很长的历史（Higgins，1987）。所以，冲突解决概念对这些家庭在捐献期间体验到的心理影响提供了恰当的解释。冲突在此的意义是“个体或环境中同时具有的对立倾向，引起不一致、冲突或失调”。本研究中，研究对象描述了一些解决他们冲突的因素，这些因素帮助他们度过了捐献过程的各阶段（请看图 R2.2）。

冲突产生于住院期的约定和情绪紧张（已由斯圭厄和佩恩所描述，这里不再报告，Sque and Payne，1996：1361-1363）。在这段时间，研究对象似乎失去了对专家的约束，好像他们在所设想的世界之外运作，这个设想世界包括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我们对过去的解释和对未来的期望（Parkes，1993）。希金斯（Higgins，1987）描述了对于特定的情景，建构的可用性和我们存储的经验将怎样影响持有人的反应。希金斯主张对于情境的个性化反应，是源于建构的可用性，它是指现有建构处理新信息时的准备度。

由于捐献者一般都相对年轻，其近亲都是年轻的父母或配偶，他们对致命的伤害、死亡、医院协议都没有经验，也没有相应的生活经历或信息来支持他们的选择。研究对象所经验的冲突和不确定程度，会因缺乏器官捐献经历与知识而加重。在这种环境下，要求研究对象做出复杂的捐献决定，会影响他们自己的情绪健康，以及应对丧亲之痛的能力。

研究对象的捐献经验冲突主要以两种形式存在：一方面，冲突以一系列他们无法控制的外在事件显露，如认识到他们亲属的死亡；其他的冲突是由作出捐献决定导致的。这些决定不是发生于真空的中立环境中，而是发生于情绪激发的环境。所以，当研究对象受到劝告，甚至可能违背他们的信念来承兑死者的愿望时，冲突更是令人伤心至极。当要求他们接受一个非传统的死亡定义——脑干死亡为真正的死亡时，研究对象的决策冲突会增加（参见 Sque and Payne，1996：1362-1363）。脑干死亡的含义超出了常人关于死亡的一般经验，所以对研究对象来说，做决定时缺乏可以参考的角色榜样。

在器官捐献中减少冲突而做出决定，符合复杂决策环境下的标准。除了其他的特征，奥勒沙纽和康诺利（Orasanu and Connolly，1993）认为，人们解决问题所经历的不确定性是复杂决策的重要特征。有的研究对象不能确定死者的愿望，甚至那些对死者愿望有明确了解的人们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取出器官过程中的身体毁损，以及察觉到在器官摘取中亲人持续的痛苦。研究对象需要在同意器官捐献之前解决这些问题。这些研究对象的价值观、知识信息、亲属影响力、承诺及情感成分会影响结果。 230

帮我们理解研究对象决策过程的基本影响因素是什么？詹尼斯和曼恩（Janis and Mann，1997）指出，当着手重要的决定时，无论选用的行动过程是什么，个体都会对遭受严重损失的风险变得警觉。他们将使用很多的策略来应对。其中的策略之一是“推诿责任”，即将决策的责任转移给其他人。这是捐献者亲属与家庭成员共同决议

广泛采用的策略吗？看起来是这样，因为当他们重新进入假设的世界时，这些外在支持将给他们的决定以合理性。这可能就是决策仅与最亲近的家庭成员分享的原因。凡参加者都知道可能有一些家人或朋友反对，他们就保守捐献的秘密。

一般认为，决定做出前的情境是人们在经历冲突。冲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至少有两种互不协调的倾向同时存在。根据詹尼斯和曼恩（Janis and Mann，1977）的理论，为做捐献决定，研究对象首先要知道亲人愿望，并确保实现捐献的前提，比如确认脑干死亡。有了这些信息，他们就会评估他们拥有的器官摘取及其可能结果的信息。这些信息依赖于医护人员。

因此，研究对象又是如何做出决定的呢？伊兹欧尼（Etzioni，1992）认为，选择是建立在情感卷入和价值承诺基础之上的。信息处理经常被排除在外，或作为次要关注的方面。决定主要取决于道德承诺、情感和社会因素，如规范和习惯。情感和价值观的重要性，以及他们选择的方式表明，信息和推理的作用是有限的。同样，情感和价值观影响我们能吸收什么信息、吸收的方式以及我们的解释。决策不是个人头脑中孤立的个人的事，而是受嵌于文化中的价值观的驱动。这是将人视为理性行为者的对立面。事实上，正如惠特克（Whittaker，1990）所说，如果他们不在痛苦的情绪状态中，同意器官摘取的研究对象是否会更多，这将会是个新问题。看起来，研究对象的决策策略既有詹尼斯和曼恩（Janis and Mann，1977）的理性视角，也受伊兹欧尼（Etzioni，1992）所提出的诸因素的影响。

231

方法的讨论

专栏 R2.5　方法的反思

对发现和文献进行整合之后，我们在接下来的部分只讨论了方法。尽管样本很小，但我们相信扎根理论在本研究中应用得很好，我们能够提供一个潜在有用的框架，此框架增加了这个领域的知识，为临床医生提供了检查他们业务的向导。

此研究通过建立归纳性的“丧失失调理论”，给出了捐献者亲属经验的一种解释。即便用小样本，扎根理论分析法也使我们得到了一个理论视角，我们认为能帮助解释捐献者亲属的经历。尽管从一个小样本概括出结论时，必须特别慎重，但我们相信，这个刚刚获得的理论提出了一些可能有用的解释。

让捐献经验明晰，可能有助于理解捐献与移植中所涉及的心理问题。增进对此过程的理解，会给其他捐献者亲属护理的适当性提供指标，也为专业护理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此理论为继续研究我们所知甚少的群体（例如，拒绝捐献的亲属）提供了可信的基础。本研究为其他关注捐献亲属的研究提供了支持性的证据（例如 Coupe，1991；MORI Health Research Unit，1995；Pelletier，1992）。

对质性研究的主要批评之一是其可重复性。如果不能重复，这个研究如何可靠？斯特劳斯和科尔宾（Strauss and Corbin，1990）明确指出，即使与原始研究条件精确匹配，社会现象也是不能重现的。不过，对于本研究发现的主题，欢迎其他的研究者支持或反驳。

叙事知识将叙述者、研究者和读者置于解释的诠释圈中，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和

兴趣将影响所从事活动的意义。所以,研究的场景信息、研究者的反思过程以及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相互影响的确很重要。本研究的人员是致力于捐献的护士, 232 这确实提出了关于搜集信息及其解释本质的问题。第一作者(麦吉·斯圭厄)的专业背景可能影响了其与研究对象的相互作用,以及她研究日程的设计和执行。麦吉认为,在此微妙情境中建立与亲属融洽的关系时,表明她自己的护士和研究者身份是很重要的元素。她觉得自己的专业背景使她做好了敏感和移情方面的准备——她能,就是因为它是可能的——得到了研究对象的合作,而这些研究对象则很感激有机会表达悲痛、诉说他们过世的亲人(关于此方法的更多内容,参考 Coyle and Wright,1996)。正如一个人的评论:

> 我发现这个访谈对我很有用。仅仅是向理解我们的人谈话就求之不得——以一种迂回的方式,这就是一种治疗。

对有的研究对象来说,访谈者关于捐献的观点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与反对捐献者会谈会感到不舒服。尽管这不是所要求的,但斯圭厄仍保持了一种尽可能公正的立场。然而她的专业背景会使研究对象产生顾虑,他们会考虑是否对护士吐露这种经历。我们认为这不会发生,因为研究对象意识到研究者并不隶属于任何移植协调中心或医院。这确实通过研究对象突出了访谈资料有效的问题。尽管此活动的价值仍然是有疑问的(Henwood and Pidgon,1995),但我们认为,这项工作使我们能够确定我们能把握好这些问题,而我们的访谈评估使我们了解了访谈经历对亲属的影响。

小 结

虽然有很多关于丧失和分离的理论,却没有理论来解释捐献者家庭的经验。我们的理论表明了帮助可能给予的重点领域,丧失失调理论应用于其他涉及冲突和复杂决策的情境中可能是有用的。很明显,我们对捐献过程及其心理影响还有很多未知的地方。丧失失调理论为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我们也希望展示我们的工作、我们对分析过程的反思,以帮助那些追随扎根理论的人形成清晰的认识,了解扎根理论研究最终结果的样子,以及这类研究如何写作。

参考文献 233

Bartucci, M. R. (1987) 'Organ donation: A study of the donor family perspectiv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Nursing*, 19: 305-309.

Bowlby, J. (1980) *Attachment and Loss* 3: *Loss, Sadness and Depression*. London: Hogarth Press.

Callahan, J. C. (1987) 'On harming the dead', *Ethics*, 97: 341-352.

Coupe, D. (1991) 'A study of relatives', nurses' and doctors' perceptions of the support and information given to the families of potential organ donors'. Unpublished M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Wales College of Medicine, Cardiff.

Coyle, A. and Wright, C. (1996) 'Using the counselling interview to collect research data on sensitive topics',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1: 431-440.

de Raeve, L. (1994) 'Ethical issues in palliative care research', *Palliative Medicine*, 8: 298-305.

Etzioni, A. (1992) 'Normative-affective factors: Toward a new decision-making model', in M. Zey (ed.), *Decision Making: Alternatives to Rational Choice Models*. Newbury Park, CA: Sage. pp. 89-111.

Feinberg, J. (1985) *The Moral Limits of the Criminal Law: Volume II-Offence to Oth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enwood, K. and Pidgeon, N. (1995) 'Grounded theory and psychological research', *The Psychologist*, 8: 115-118.

Higgins, E.T. (1987) 'Self-discrepancy: A theory relating self and affect', *Psychological Review*, 94: 319-340.

Janis, I. L. and Mann, L. (1977) *Decision-making: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Conflict, Choice and Commitmen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La Spina, F., Sedda, L., Pizzi, C., Verlato, R., Boselli, L., Candiani, A., Chiaranda, M., Frova, G., Gorgerino, F., Gravame, V., Mapelli, A., Martini, C., Pappalettera, M., Seveso, M. and Sironi, P.G. (1993) 'Donor families', attitudes toward organ donation', *Transplantation Proceedings*, 25: 1699-1701.

MORI Health Research Unit (1995) *Report of a Two Year Study into Reasons for Relatives' Refusal of Organ Donation.* London: Department of Health.

Orasanu, J. and Connolly, T. (1993) 'The reinvention of decision making', in G. A. Klein, J. Orasanu, R.Calderwood and C. E.Zsambok (eds), *Decision-making in Action: Models and Methods.* Norwood, NJ: Ablex. pp. 3-20.

Parkes, C. M. (1993) 'Bereavement as a psychosocial transition: Processes of adaptation, to change', in M. S. Stroebe, W. Stroebe and R. O. Hansson (eds), *Handbook of Bereave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91-101.

Pelletier, M. (1992) 'The organ donor family members', perception of stressful situations during the organ donation experience',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17: 90-97.

234 Pelletier, M. (1993) 'Emotions experienced and coping strategies used by family members of organ donors' *Canadian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25: 63-73.

Perez-San-Gregorio, M. A., Blanco-Picabia, A., Murillo-Cabezas, F., Dominguez-Roldan, J. M. and Nunez-Roldan, A. (1992) 'Psychological profile of families of severely traumatized patients: Relationship to organ donation for transplantation', *Transplantation Proceedings*, 24: 27-28.

Sque, M. and Payne, S. A. (1996) 'Dissonant loss: The experiences of donor relative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43: 1359-1370.

Strauss, A. and Corbin, J. (1990)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Whittaker, M. (1990) 'Bequeath, bury or burn?', *Nursing Times*, 86: 34-37.

报告三

话语分析

咨询心理学家如何看待变态心理学和诊断分类：对话语分析研究的反思

马克·克雷文 & 阿德里安·考利

本章的撰写目的在于让读者了解话语分析研究的结果，知道在撰写期刊文章或学生论文时如何呈现话语分析的结果。在第3章的话语分析研究中，我们对几位咨询心理学家就其对精神病理学的看法以及如何在实践中应用诊断分类标准进行了访谈。之所以选择这些问题加以探讨，是因为这些问题涉及咨询心理学家专家身份的建构。接受访谈的咨询心理学家在建构自己的专业身份问题上，提到了作为咨询心理学家可能具有的截然不同的两种语库。在呈现研究报告时，我们运用了专栏来呈现整个话语分析中需要强调的一些问题。

引 言

在英国，咨询心理学是一个比较新的心理学分支学科，它源于1982年英国心理学会（BPS，Britain Psychology Society）创立的咨询心理学处（Counselling Psychology Section）。英国心理学会各分处注重心理学某一具体分支学科的发展，而英国心理学会分会（BPS Division）关注的则是心理学具体分支在学术领域和实践领域的发展，关注从业人员的专业教育、知识及其行为。经过长期的发展后，咨询心理学分处在1994年获得了心理学分会的地位。

经过长期的发展，英国咨询心理学界开始通过各种方式来确立自己的专业地位。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与相关学科（尤其是临床心理学）的比较，咨询心理学在价值系统和心理学标准模式方面的建构越来越明确（Pugh and Coyle，2000）。同时，咨询心理学专业地位的确立也得益于研究者在其他治疗专业相关问题上的一系列争论，如基于证据的治疗（争论的问题在于应该提供干预方案有效性的证据）（Milton，2003），使用心理测量工具对心理问题进行诊断和测量（Kanellakis，2004），使用精神病理学的诊断标准描述患者面临的问题（Strawbridge and James，2001）。在这些问题的争论中，研究者试图让咨询心理学在这些问题的解决上有自己特有的位置，即使这种位置不能在本质上同其他治疗专业区分开来，至少也要在理论基础上有自己的独特性。

在对待精神病理学及诊断标准的运用方面，研究者争论的焦点在于咨询心理学是应该基于人本价值的基础之上，还是应该侧重于采用美国心理治疗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制定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来对来访者的心理障碍进行分类。前一种观点侧重于让来访者了解自己的心理问题,而不是想方设法用专业知识对来访者的障碍进行归类。后一种观点是基于医学模式来建构对心理问题的认识,其理论基础源于实证—经验主义科学,认为可以对精神疾病进行合理而准确的归类(Boyle, 1999)。尽管这种思想近来受到批判(例如,见 Fee, 2000; Parker et al., 1995),但仍然在精神病理学领域占据统治地位。

为了了解咨询心理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在下面的研究中,我们呈现了咨询心理学家对精神病理学的看法,及其在咨询实践中如何看待诊断标准的价值/用途。我们的目的在于了解接受访谈的咨询心理学家是如何对"对象(object)"(即他们对精神病理学及诊断分类标准的认识)进行建构的,以及在建构中他们运用了哪些话语资源。

专栏 R3.1　撰写社会建构主义论文时存在的问题

本研究报告的引言较为简短。一方面是因为研究报告有字数限定,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如果采用更多的篇幅来讨论咨询心理学、精神病理学和诊断分类的话,读者会认为我们过于烦琐地叙述研究问题的建构过程。当然,我们也无法完全避而不谈这个问题。正如大家所看到的,即使在简短的引言中,我们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建构了咨询心理学、精神病理学和诊断分类。

237

引言的简短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避免撰写社会建构主义论文时容易出现的问题。在撰写这类评论时,尽管研究者阅读的相关文章或研究可能是从其他不同的认识论角度进行的,但是他们还是应该采用社会建构主义的范式。当然,这样做可能有些困难,但这有助于研究者呈现文献中出现的各类观点。这是因为,研究者对研究主题进行建构的目的不在于呈现某个"事实",而在于对事件的某个说法进行定位和"合法化"。

方　法

本研究中,我们通过个人联络和"滚雪球"的方式(即让最初的被访者向访谈者推荐其他可能参加这项研究的个体),对八位执业咨询心理学家进行了访谈(6 位女性,2 位男性)。其中,4 位咨询心理学家在过去的 5 年中取得了从业资格,另外 4 位由于具有足够的从业经验而获得了执业心理学家地位(在最近才有对后者进行访谈的可能性,因为执业心理学家的称号刚刚确立不久)。这些被访谈的咨询心理学家分别在私人健康护理中心,初级、二级和三级健康护理机构有过从业经历。

专栏 R3.2　在话语分析报告中对样本进行情境化

研究者建议,质性研究者应该对研究的样本进行情境化——也就是对被试及其生活环境进行描述,目的在于帮助读者判断研究结论适用的范围及情境(Elliott et al., 1998: 228)。许多质性研究报告在样本的情境化问题上进行了细致的描述。采用话语分析法的研究报告也应该对研究对象进行情境化,但同时研究者(也包括读者)应该记住:不论对研究对象的描述多么细致,这些描述都不可能囊括他们所有可能的谈话立场。例如,我们的研究对象皆为咨询心理学家,但我们不能据此就认为他们在谈话中自始至终都站在一个立场上说话。正如我们在第 7 章中看到的,对于任何一个访谈对象而言,他谈话时的某些立场可能是持久性的,但也有些立场是暂时性的。因此,研究对象在访谈中可能站在不同的角度来谈论某个问题。例如,他可能是站在咨询心理学家的立场来谈问题,也可能是从临

床医学家、心理学家的角度来谈论问题;既可能是从男人的角度来谈论问题,也可能是从女人的角度来谈论问题;或是作为一个激进的工作者来谈论问题,或是从一个敬业的工作者的角度来谈论问题。尽管如此,研究者还是应尽可能对研究对象进行细致的描述,尽可能帮助读者了解研究结果的适用情境,帮助读者认识到未来研究应该针对的人群或情境。

238

本研究通过个体访谈的方式来收集相关资料。在访谈中,采用开放式访谈提纲让研究对象回答如下问题:从个人角度或专业角度来看,您是如何看待精神病理学的? 您是如何看待咨询心理学家在实践中对精神障碍进行分类这个问题的? 马克·克雷恩为本研究的访谈者,访谈地点分别在研究对象的家中、工作的大学或是其他工作场所。我们对访谈进行了录音,并采用阿特金森和赫瑞艮(Atkinson and Heritage,1984)①开发的编码方案对录音进行了转录。

专栏 R3.3 话语分析收集资料的方法

经过短暂的发展,话语分析在心理学中的应用已从通过访谈获取资料迈向在自然情境中获得资料,如借助媒体工具对自然情境中的社会互动进行记录。在运用访谈法获取资料时,话语分析法更倾向于采用团体访谈而不是个人访谈。原因在于,个人访谈中被访者可能会受到访谈情境的限制而使得访谈的真实性受到影响。通过个体访谈获得的资料颇受研究情境的局限,这也就限制了研究的价值。团体访谈获得的资料,虽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但出现这种问题的几率可以降低——通过访谈者事前精心的准备,借助访谈者熟练的访谈技能——可以使团体访谈进行得相对更加自然、顺利。考虑到本次访谈的对象工作繁忙,因此难以以团体访谈的形式来获得资料。出于这种考虑,我们采用了个人访谈的方法。尽管这会给访谈的结果带来一些影响,但我们认为,这总比无法获得资料、无法进行相关方面的研究好得多。

对转录结果所进行的话语分析是从相对微观的层面上进行的——不但注意分析话语的修辞性功能和资料的行为指向,而且也注意到被访者运用了哪些话语资源来建构自己的观点(Potter and Wetherell,1987;Wetherell,1998;Willig,2001)。在初级编码阶段,研究者首先对整个访谈转录的文本至少仔细阅读了两遍,辨别出与研究问题相关的文本,然后再对这些经过筛选的资料进一步阅读,并随时留意如下一些问题:"为什么被访者在此处以这种方式来说话?""研究对象用这种方式说话可能是在做什么?""这种说话方式可能会引出什么样的话语?"

239

上述分析不仅是对资料的一种反映,同时也反映了我们作为批判咨询心理学家(Mark Craven)和社会心理学家(Adrian Coyle)在理论上的兴趣点。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彻底弄清了咨询心理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我们只是发现了一些情境性的、具有暂时性的"事实(truth)"。尽管如此,我们仍在分析中对研究对象的相关话语进行了直接引用,为我们对资料的解释提供支持,这样读者也可以对研究对象观点的正确性加以判断。需要注意的是,在分析结果中,对研究对象的引用语

① 虽然这些转录符号未在第7章和第8章中使用,但它们却是话语分析工作中一种标准的符号。读者可能会发现它有助于了解在资料提取省略中出现的一些特征。括号内的数字表示暂停的时间,以秒计时。括号内的句号表明这是明显的停顿(英语句号"."，翻译时未转换为汉语句号"。"——译者),能注意到但太短不足以计时。下划线标注是表示对所说的话加以强调。大写字母的文字表示说话的声音较临近的高(翻译时采用黑体表示。——译者)。圆括号表示在括号内的材料或者是听不见的,或者准确性有疑问。方括号表示一些转录内容已被故意忽略。方括号内的材料则旨在澄清信息。

部分,一部分使用特殊的字体标注,一部分使用双引号标注,而单引号表示的是对我们的研究问题具有重要价值的一些观点。

分 析

从咨询心理学家们对精神病理学和诊断分类标准使用问题的叙述来看,我们发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我们将其称作是经验主义语库和权变性语库。在分析这两种语库的相互关系前,先对两者的重要特征做一个介绍。

经验主义语库

此处我们所称的"经验主义语库(empiricist repertoires)"涉及现代主义的一些观念和设想,如"现实"、"知识"、"科学"、"心理障碍及其治疗"等基本问题,同时也涉及当代心理学中隐含的现代科学的一些原则。这种看待问题的视角通常与"实证主义"、"天真的现实主义"和"已被认同的观点"是同义的(具体取决于说话者自身的立场)。该视角为经验主义语库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我们的访谈中,被访者在对客体(即对精神病理学和诊断分类的看法)进行描述、解释和分类时,或是以隐含的方式,或是以外显的方式表现出了自己的经验主义观点。被访者这样做可以起到很多作用,但最重要的是通过这样描述、解释对象,他们能够对"事件"进行建构,使得精神病理学作为一个独立实体的地位能够得到承认。被访者在建构这样一个事件的同时是与对诊断分类的"合法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对经验主义语库的具体应用可以从下面这个访谈片断中得到体现:

> 我想你可能是想寻求一些事物(4),是的。我以前没有考虑过类似的问题,但是,呃(.),但是这能够(.)例如,通过他人在某一具体情景中的<u>反应</u>,可以(.)区分出某人是否具有心理障碍,或者如果他们(1)如果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超出了你所认为的正常范围。
>
> (戴安娜)

240

> 她是一个有幻视、幻听和许多许多其他**明显症状**(1)的妄想精神分裂症患者(1.5)
>
> (纳特)

被访者以科学发现作为比喻,通过使用一些可见的、可观察的和合理(legal)的术语,如"寻求一些事物"、"<u>**明显症状**</u>",使得其对精神病理学的一系列看法跃然纸上。更为重要的是,运用这种比喻的方式,被访者将心理学家(事实的发现者)建构为仅仅是发现某一客观存在事物的人:精神病学的存在具有其客观性,所以能够被发现。在这些摘录中,变态心理学存在的事实以"证据"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证据"是由一系列可以辨认的"症状"构成的。

借助经验主义话语中的二元术语(这些二元术语将主体和客体、认识者和被认识者作出了区分),我们可以对目标的客观性有清楚的了解。这种二元性在纳特的访谈摘录中非常明显。在对纳特的访谈中,当他谈论一位来访者时,他说"她是一名妄想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这里,他运用了诊断分类,并通过参照患者具有"幻视、幻听",运用专业的词汇对患者进行了诊断归类。同样,在对戴安娜的访谈中,她谈到"如果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超出了你所认为的正常范围"。他们在谈话中把

说话者(心理学家)(同时也包括听者/访谈人员)放到了"认识者"的位置上,认为认识者是一个在来访者经历方面有特权的"专家",所以,通过认知者的专业逻辑推理,他们能够合理地将来访者的思维方式确定为是不正常的并将其归类为是病态的。

在整个访谈摘录中,这种经验主义语库特征是很常见的,正如安纳贝尔在谈到心理学家时,他说"你是一个具有(.)经验和知识的(.)专家(.)你知道(.)提供治疗";亚尼内认为"有人出现了明显的恐慌障碍";凯特提到了"厌食症":"你能够看到它(.)毫无疑问"。

权变性语库

在被试的叙述中,尽管经验主义语库看上去占据了主要地位,但研究对象同时也运用了我们所称作的"权变性"语库(cogtingent repertoires)。经验主义语库更多的是从客观的、理论的、非情感的层面上谈论"精神病理学"和诊断分类,而权变性语库则是在以一种更为委婉的方式来谈论对诊断分类的看法,这种对诊断分类的看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来访者的理解和期望的成效"(戴安娜),"人格因素"(尼克),"个人经历"(夏绿蒂),"训练"(苏),"治疗趋向"(亚尼内)和"哲学观"(纳特)。例如,在谈到诊断标准及其分类时,尼克说:

> "我认为这取决于(.)你知道,有些诊断标准或分类是非常有用的,有些则是没有用的[]因此,我想在诊断分类的使用上我是有所保留的(.)因此在最后结束时,我认为来访者对于诊断的理解(.)来访者的顾虑(.)嗯(.)来访者表达出来的一些东西,或是能够表达出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我做了什么(.)不是他们接受了什么样的诊断。"

241

这里,尼克在谈论精神病理学和运用诊断分类能否发现某些"客观的"或固定的事实时,把自己定位在了一个有些矛盾的位置上。这使得他叙述的重点重新指向了他事实上关心的是心理学家的投入和与来访者的互动("来访者对于诊断的理解(.)来访者的顾虑"),同时也提出了一个与经验主义语库相反的看法,即诊断和分类标准的使用只有在一定的情境中才是有效的。照此而言,"理解"可以看作是以一种话语的方式与行为、举动联系在一起的。

两难问题

专栏 R3.4 话语分析报告中应该呈现多少资料

话语分析研究在不同的报告中呈现的资料量是不同的。有些研究报告中,研究者只是对资料进行简短的摘录;有些报告中资料的呈现却相对详细些;有些报告则是上述两种方式的结合。在我们的报告中,我们采用了较为简短的方式对访谈资料进行呈现,以考察被访者在访谈问题上所持的观点。我们也意识到这样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由于我们呈现的资料缺乏具体情景性,因此读者无法得知这些资料是从哪些问题的访谈中得出的,无法确定访谈者在形成这些资料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尽管我们自身也希望能够以更为详尽的方式来呈现资料,如将访谈者在谈话中介入的语言也纳入进来,但受到报告篇幅的限制,我们不得不放弃了这一想法。话语分析研究者在撰写用于发表的报告时通常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既要对问题作出情境化的解释,又要强调调查情境的广泛性,力

图在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起初我们考虑到可以在报告的其他部分用较小的篇幅来呈现资料，在本部分中用较多的篇幅来详尽地呈现资料。但这样一来又会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只对少数几个访谈摘录资料进行详细的报告，读者可能会认为我们的分析缺乏广泛性和实证性。因此，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我们在呈现资料时只呈现了资料的开头部分。

我们的被访者并不是只具备经验主义语库或权变性语库中的一种，在同一个研究对象的叙述中，我们发现实际上两种语库同时存在。这两种在本质上截然相反的语库通常会让被访者置身于一个矛盾的位置上。例如，在谈到两种语库时，苏说“这是两种完全对立的哲学观”，夏绿蒂说“问题就出现在这个地方”，戴安娜说“因此你会自动地处在一个有趣的位置上”，亚尼内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问题”。在这里我们特别集中于考察被访者的这种矛盾位置，是如何体现在他们对精神病理学和诊断分类的看法之上的。在转录的原文中，与这两种语库对立性相关的问题有好几个，此处我们集中于探讨权威性与平等性之间的矛盾。

在下面这部分访谈摘录中，夏绿蒂谈到了使用诊断分类的问题，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一名咨询心理学家，夏绿蒂在专家意见权威和医患平等之间存在的矛盾性：

368 夏绿蒂：我不是说我认为诊断分类是完全
369 有必要的，不是说我们应该使用它，那是我们如何(.)应该思考问题(.)的方式，你知道
370 (.)我们如何确定患者的问题或其他的什么事，但(.)，至于它的必要性
371 (1.5)不一定是必需的，但(.)，是的，至于是否有必要
372 理解心理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能够使用它(.)，能够，你知道的
373 使用诊断术语(2).但这不一定(.)会影响我(.)我的从业实践，
374 当我一对一地面对一位来访者时。
375 访谈者：是的。
376 夏绿蒂：我不会，你知道，称呼任何人边缘型障碍(人格障碍)，或
377 其他的什么，我不会，你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378 访谈者：是的。我正尽量整理思路(.)你的谈话看上去好像
379 对不同的对象以不同的方式谈论你的临床工作[ ]因此我
380 想知道你能否详细说一下这种不同，这种
381 不同可能是什么样子的？
382 夏绿蒂：好的。哦，例如，我有一位来访者被诊断为
383 边缘型人格障碍，她存在严重的人格问题，哦，
384 我同其他心理学专家谈论她的人格问题的方式会不同于我与这位来访者的交谈，你知道
385 (.)我可能不会跟她说(.)“你有边缘型人格障碍”或“考虑到
386 你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你最好应该这样做”。我可能会说
387 这样的一些话
388 访谈者：[嗯]
389 夏绿蒂：‘(.)“你知道，<u>我们</u>在这里一起考虑你需要什么(.)
390 你知道，我们考虑如何才能更好地(.)，嗯，<u>帮助你</u>”。

391 访谈者:是的(1)。是的,是这样的。

392 夏绿蒂:哦,我可能会想对她而言怎么做才比较好或最好,

393 我不一定(.)我不会对她说"好,我想由于是患有边缘型障碍

394 我想你该去医院"或其他的什么话

395 访谈者:是的,是的

396 夏绿蒂:但我会尽力与她合作(.)看看她需要什么,什么对她而言是最好的。

在摘录的开始部分,夏绿蒂即把自己同运用诊断分类的观点区分开来,运用诊断分类的观点是建立在经验主义语库基础上的,持这种观点的心理学家把自己定位在专家的位置,认为自己能够科学客观地对心理问题作出辨别、诊断和治疗。夏绿蒂的回答内隐地对运用诊断标准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运用诊断分类并不是了解、治疗心理问题唯一的、恰当的途径。在摘录的开始部分,夏绿蒂先是采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经验主义语库观点提出了质疑,正如在第368—369行中所看到的("我不是说我认为诊断分类是完全有必要的"):对诊断分类的绝对必要性提出质疑。在第369—370行中,我们可以推断出,夏绿蒂所反对的观点是:诊断分类是理解来访者心理问题的基础("那是我们如何(.)应该思考问题(.)的方式,你知道(.)我们如何确定患者的问题或其他的什么事")。需要注意的是,她并没有以外显的方式来表明自己与这种观点的对立,这样做可能是出于自己作为一名咨询心理学家负有制度上的责任的需要。在第368—370行中,为避免别人认为她的叙述完全是出于个人偏好,她还使用了复数第一人称"我们"用于更进一步地阐述她的观点。当然,夏绿蒂以一种不明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作为读者也可能引发这样的想法:她之所以含蓄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是由于在接受访谈时,她不清楚同样是咨询心理学家的访谈者在这个问题上会持什么样的观点。 243

随着叙述的进一步深入,夏绿蒂表现出了一些犹豫和矛盾。在谈话的第370—373行中,她出现了言语上的踌躇以及会话分析专家所称的"言语修补(repair)"(Nofsinger,1991)。夏绿蒂提出自己在诊断分类的使用上实际上是没有选择的("至于它的必要性(1.5)不一定是必需的,但(.),是的,至于是否有必要理解心理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能够使用它(.),能够,你知道的使用诊断术语(2).")。在此她认为从专业和从业制度的角度而言,自己应该在一个具体的框架内运用相关的词汇对来访者的问题作出理解。但是,尽管夏绿蒂这样去做(即运用专家知识对来访者心理问题作出判断),她却又提出,她的咨询并没有因为使用诊断分类而受到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前面提出的观点对立(第373—374行)。这可能是由她作为咨询心理学家所处的矛盾位置造成的,因为作为一个咨询心理学家既要重视咨询者与来访者之间的关系,又要在心理健康的背景下工作,而在这个背景中,大家基本上都认同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来进行谈话,认同诊断分类工具的使用。尽管如此,夏绿蒂还是认为在这种经验主义话语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自己有一些选择权、主动权。第383—384行的摘录,反映了她是如何与专家、来访者谈论来访者的边缘型人格障碍问题的,在这里她和专家的谈话与她对来访者的谈话形成了一个对比。这种谈话的方式,能够让她在拥有专业权威知识的基础上(经验主义语库),依据具体的使用情境(权变性语库)有选择地使用术语和诊断语言来谈论患者 244

的问题。对治疗实践的谈论能够让夏绿蒂站在与来访者更平等的位置上来谈论心理异常问题。她特别运用了两种资源来建构咨询者与来访者之间的这种平等地位。

专栏 R3.5 利用被访者的内隐立场

在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咨询心理学家的夏绿蒂可能发现自己处在一个矛盾的立场上。然而,夏绿蒂并没有以一种外显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样一来,我们不免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对访谈资料进行解释的时候,是否可以运用被访谈者并没有明显表达出来的观点或是其他信息。在这个问题上,话语分析专家持有不同的意见,有些话语分析专家认为我们只能运用那些以外显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信息,而有些则认为无需如此严格。当然,如果谈话者这种隐含的观点在资料中的其他地方也出现了,那么我们可以运用这种隐含的信息(只要分析者能够说服读者即可)。但是,如果分析者认为被访者的话语里隐含了某种观点或立场,甚至分析者也对此进行了相应的解释,但倘若分析者不能举出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的话,问题就出现了。例如,我们注意到在专栏 R3.2 中,如果我们认为既然访谈的对象全部是咨询心理学家,他们在谈话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就应该保持一个同样的观点,那我们就错了。对于夏绿蒂,我们认为可以利用她话语里隐含的立场,原因在于:①在访谈的其他地方,她以外显的方式表达了这种立场;②她将自己与经验主义语库的观点区分开来,并想象如果自己是一位经验主义语库的拥护者的话,将会采取哪些行为,这在很多方面反映了咨询心理学家的一些特征(如,见 Strawbridge and Woolfe,2003)。

首先,在第 385—386 行中("我可能不会跟她说(.)'你有边缘型人格障碍'或'考虑到你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你最好应该这样做'"),她假设一些将自身定位于权威地位的咨询心理学家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话语。这些假设的谈话方式正好与夏绿蒂在实际咨询中的谈话方式形成了对比。第二,在第 389—390 行里,值得注意的是,她采用"我们"这样一个体现平等的词语来叙述问题("我们在这里一起考虑你需要什么(.)你知道,我们考虑如何才能更好地(.),嗯,帮助你")。这种谈话方式更体现了一种礼貌邀请的语气,而不是专横命令的口吻,咨询心理学家使用民主的方式表达对来访者的要求,运用体现自由和平等的语言来进行交流。这种谈话方式有助于咨询人员在面对来访者时,是"我们(夏绿蒂和来访者)"共同解决来访者面临的问题,而不是"我(专家)"告诉"你(来访者)"你的情况是怎样的。这种建构问题的方式让夏绿蒂放弃了自己专家权威的地位,而是将自己重新定位在一个更加温和、更加平等的位置上。然而,这种温和、平等的定位似乎又面临着自身的矛盾,夏绿蒂在对自己做这种定位的同时,又没有放弃运用专业权威的权力。夏绿蒂在谈话中还是以相关治疗知识作为指导(正如在第 392 行中,"我可能会想对她而言怎么做才比较好或最好")。这种矛盾心理在第 396 行的话语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我会尽力与她合作(.),看看她需要什么,什么对她而言是最好的"),在这一行里,夏绿蒂在开头表述了自己与来访者共同解决问题的意愿,然后优先考虑来访者的要求("看看她需要什么"),最后以一句比较含糊的话结尾("什么是最好的"),这里并没有清楚地表明谁有最终的权力决定什么是最好的。这种话语方式被称作是"不平等的平等主义"或"不独裁的独裁主义"(Wetherell et al.,1987)。

结 论

考虑到本研究的样本量相对较小,我们难以得出结论,宣称完全弄清了咨询心

理学家是从哪些主要方面来理解“精神病理学”的，以及他们是如何看待咨询实践中诊断分类的使用的。我们的取样具有多样性，但在访谈获得的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经验主义语库和权变性语库（以及它们之间错综复杂、充满矛盾的相互关系）都存在于其中。对于咨询心理学家而言，当根据不同的情境选择、运用这些语库时，这些语库便是有意义的。对于其他精神卫生职业者而言，这些语库也是进行行业操作的标准，如哈珀（Harper，1994）在报告中发现，精神病学家和临床心理学讲师在谈论“偏执狂”时，也是使用了这些语库。其他研究者可能也希望探讨在变态心理学及其他专业问题上，这些语库是否也适用于其他样本的咨询心理学家。

本研究表明，在咨询心理学领域，在“精神病理学”和诊断分类的使用上，“理想”和“现实”之间可能存在差距，也就是说，在理论和来自实践的报告之间存在差距。在访谈话语中，我们发现，咨询心理学中有一些原则和价值标准——如以人本价值为基础，咨询者和来访者之间的关系不应是按照医学模式建立的，重视来访者的幸福感而不是病症（Strawbridge and Woolfe，2003）——而现实中的咨询经常不是 246 这样的。考虑到当前的咨询实践受到所处环境文化差异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会由于专业方面意识形态的作用而日益加深，这使得咨询心理学家在咨询实践中常处于两难境地（正如我们在资料中所看到的），使得整个咨询心理学在学科地位、学科认同和学科发展上也处于尴尬境地。如果咨询心理学想要发挥自己在文化方面的作用，能够反思自己与社会的关系，在维护和改变现有社会结构方面起到自己的作用的话，咨询心理学家就应该对他们的理论和实践采取一种批判和解构的立场——尤其是在一些基本的问题上，例如“精神病理学”问题，这对于相关工作者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小 结

本报告向读者阐明了如何呈现话语分析研究的结果。然而，我们也该注意到，不同的话语分析报告，由于侧重点不同，其形式也存在差异，这就要求研究者在呈现研究报告时应该具有选择性。我们希望读者能够感受到话语分析研究方法的价值，并能够激发他们对这种研究方法进行探索。

参考文献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00)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4th edition-text revision).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tkinson, J. and Heritage, J. (eds) (1984) *Structures of Social Action: Studies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illig, M., Condor, S., Edwards, D., Gane, M., Middleton, D. and Radley, A. R. (1988) *Ideological Dilemmas: A Social Psychology of Everyday Thinking*. London: Sage.

Boyle, M. (1999) 'Diagnosis', in C. Newnes, G. Holmes and C. Dunn (eds), *This is Madness*. Ross-on-Wye: PCCS Books. pp. 75-90.

Elliott, R., Fischer, C. T. and Rennie, D. L. (1999) 'Evolving guidelines for publication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studies in psychology and related fields', *British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38: 215-229.

Fee, D. (2000) *Pathology and the Postmodern: Mental Illness as Discourse and Experience*. London: Sage.

247 Harper, D. J. (1994) 'The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of "paranoia" and the discursive use of diagnostic criteria', *British Journal of Medical Psychology*, 67: 131-143.

Kanellakis, P. (ed.) (2004) 'Counselling psychology and psychological testing', *Counselling Psychology Review*, 19(4): 4-44.

Milton, M. (ed.) (2003) 'Evidence-based practice', *Counselling Psychology Review*, 18(3): 3-35.

Nofsinger, R.E. (1991) *Everyday Conversa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Parker, I., Georgaca, E., Harper, D., McLaughlin, T. and Stowell-Smith, M. (1995) *Deconstructing Psychopathology*. London: Sage.

Potter, J. and Wetherell, M. (1987) *Discourse and Social Psychology: Beyond Attitudes and Behaviour*. London: Sage.

Pugh, D. and Coyle, A. (2000) 'The construction of counselling psychology in Britain: A discourse analysis of counselling psychology texts', *Counselling Psychology Quarterly*, 13: 85-98.

Strawbridge, S. and James, P. (2001) 'Issues relating to the use of psychiatric diagnostic categories in counselling psychology, counselling and psychotherapy: What do you think?', *Counselling Psychology Review*, 16(1): 4-6.

Strawbridge, S. and Woolfe, R. (2003) 'Counselling psychology in context', in R. Woolfe, W. Dryden and S. Strawbridge (eds), *Handbook of Counselling Psychology* (2nd edition). London: Sage. pp. 3-21.

Wetherell, M. (1998) 'Positioning and interpretative repertoires: Conversation analysis and post-structuralism in dialogue', *Discourse & Society*, 9: 387-412.

Wetherell, M., Striven, H. and Potter, J. (1987) 'Unequal egalitarianism: A preliminary study of discourses concerning gender an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6: 59-71.

Willig, C. (2001) *Introduc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Adventures in Theory and Method*.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报告四

叙事分析

口腔癌患者对生活的适应:对叙事分析研究方法的反思

米歇尔·克罗斯利

本篇报告简要呈现了一位口腔癌患者生活经历的个案研究,讲述了患者的生活经历是如何与“治疗情节(therapeutic emplotment)”的意会文化过程(tacit cultural process)联系在一起的。该意会文化过程指的是患者如何对自己的疾病作出了解,知道疾病的真实情况,以及可能的发展趋势。在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一些同解释过程相关的问题。这些解释过程不仅与叙事分析有关,同时也与其他基于现象学的质性分析有关。

引 言

> “不久前的一天,有人说我这样的情况就像是一个生死之争。实际上,这种比喻较他们想象中的还要贴近。我已经被作出了宣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政府部门会打来电话推迟处决日期,但这并不代表我就会相信某天判决会变得有回旋的余地。”(Diamond,2001:244)

本报告以详细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应用叙事分析法来探究一位成年男性在患有口腔癌的情况下如何继续生活,同疾病抗争并最终死去的经历(Crossley,2003)。该报告最早产生于我与加拿大的同事合作的一项课题,该课题的研究目的在于评估是否有可能为口腔癌患者提供心理干预,以便为改进他们的生活质量做出一些努力。在做这项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显然缺乏从患者角度对口腔癌进行的研究。我们进行过一次广泛的文献检索,发现很少有研究能够在口腔癌患者的情感和心理问题方面提供较为深入的信息。

已有研究表明,严重的疾病会对患者的心理产生巨大的潜在影响,人们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要让患者重新认识到生命的意义。许多研究调查了人们对慢性疾病和急性疾病(如癌症和艾滋病)的应对方式。这些研究强调了故事和“叙事重构(narrative recogfiguration)”在个体应对疾病带来的沉重打击和不安全感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见 Crossley,2000a)。研究表明,患者对于自己经历的认识会影响到痛苦的产生和缓解。个体认识自身经历的一个主要机制就是通过叙事和叙述,这两者在个体对疾病的适应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为设计而阅读》一书中,布鲁克斯(Brooks,1984:xi)将叙事定义为我们就现

实问题尤其是当前问题、具有时间限制的问题以及有限生命中的存在感问题进行协商时所使用的理解种类和系统之一。布鲁克斯提及了一个积极的细节过程，人们依靠这个过程，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来对发生的事情加以理解，确定事情真实进展状况，并且随着事件的进展对未来作出预测。德尔·维齐奥·古德等人（Del Vecchio Good et al.，1994:885）将此概念应用于个体对疾病的了解，他们认为，这个细节过程构成了个体在面临突发而来的疾病威胁时，所进行的主要想象。他们使用了"细节治疗"这样一个概念，并认为疾病的细节是临床医生和癌症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一项主要工作（要了解更多关于这些概念的信息，见第9章）。

在搜寻对口腔癌患者患病经历的深入研究的过程中，身为记者、专栏作家和广播员的约翰·特拉华所写的作品引起了我的注意。特拉华在1998年首次出版的自传体叙述《C：因为懦弱者也会患癌症》中描述了他自己的口腔癌经历。在该书中，他还写到了他在《时代周刊》上连载的日记专栏文章。《时代周刊》从1996年9月特拉华的诊断结论出来前就开始刊登他的日记专栏文章，一直持续到他于2001年3月病逝的前一个星期。特拉华的这些日记构成了一个癌症对患者生活影响的连续研究。在特拉华死后，他全部的连载日记都被编写成了一本书——《万灵油和其他关注的事物》（Diamond，2001）。本报告的主要材料就是以这个自传体文件中所展现的连载日记为基础的。

在阅读特拉华四年日记的过程中，我被这些记录提供的"细节治疗"的解释性个案的研究方式所打动，德尔·维齐奥·古德等人（Del Vecchio Good et al.，1994）认为该个案研究对癌症的治疗极其重要。然而，在德尔·维齐奥·古德等人的著作中，是从肿瘤学专家的角度来探究这种"细节治疗"的。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样通过精心安排时间和范围来为患者阐述经历的，同时，在对时间和范围进行精心安排的时候，他们是以一种抱有希望、建议在痛苦和有毒的治疗中增加投入和排除绝望感的方式进行的。相反，就特拉华的日记可为我们了解一个癌症患者的生活经历来说，这些日记是独一无二的。叙事心理学方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探讨生活经历的社会化建构，考察个体如何运用意会的文化叙述来对（创伤性）事件加以理解。以此同时，该方法还力图抓住患者正经历的经验现实。因此，本报告呈现了一个对口腔癌患者患病经历的详细个案研究的总结，以及这种经历集中与"细节治疗"意会文化过程相联系的方式。

250

方　法

该个案研究使用"治疗情节化（therapeutic emplotment）"这一理论概念，对约翰·特拉华的经历作出进一步的了解。"治疗情节化"指的是个体通过融合某一特定时间结构来对疾病作出适应的方式，这种适应方式对疾病的治疗有着特殊含义。通过把特拉华的各部分日记描绘成具有各自主题的"治疗情节化"故事，我们就可以阐明何为"治疗情节化"这一概念。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理论文献有充分的了解，然后把这种理解应用到对特拉华日记的分析中（见专栏R4.1）。

在一篇使用叙事分析研究法的实证论文里，方法部分要对相关的问题加以介绍，如资料分析的详细过程。由于在第9章和第10章中我们对话语分析的详细步骤进行了呈现，此处我们不再重复赘述。我们把重点放在资料分析的结果上。

专栏 R4.1 对理论与实证资料之间关系的思考

在叙事心理学中,一直存在着悬而未决的问题:研究者是在将理论的文献资料应用于实证资料之前就对理论文献资料有所了解,还是先分析实证资料,之后为了对分析有进一步的了解才涉及理论文献资料呢。在多数情况下,了解理论和实证资料的过程是相辅相成的。

分析:患者的"时间表"

本章在针对特拉华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将特拉华的日记划分为六个主要阶段。通过这种划分,可以阐明每个阶段具有的特定主题。这六个阶段表明了特拉华在不同的时间段内,为了适应现实而进行的努力。这六个阶段如下: 251

1. 患癌症之前:"但愿走好运"。
2. 适应"治疗情节化"的生活。
3. 在地狱中:"屏住呼吸"。
4. 病情复发:继续"治疗情节化"。
5. 逃避现实:进行"无语叙事(unspoken narrative)"。
6. 结局还是结束?

每个阶段的具体内容如下:

1. 患癌症之前:"但愿走好运"

1996 年 9 月 14 日,约翰·特拉华在《时代周刊》的每周幽默专栏里刊登了一篇名为《我以为我患了癌症》的文章。但是,他以这个题目作为文章的题名,则是为了说明自己实际上没有患癌症。约翰·特拉华通过使用过去时态"**我以为我患了**"(此处的强调是我加的)清楚地向读者表明,作者认为自己实际上并没有患病。尽管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约翰·特拉华却以幽默的风格将自己与患有癌症这件事情分隔开来,他在文章中扮演着"一个想象着自己患了癌症的人"。他告诉我们,"这样的表达方式对我来说很轻松,但是在了解到**一个人可能**真有癌症的时候我有一种被释放的感觉"(p. 159,此处的强调是我所加的)。人人都会这种迷信的把戏,好像只要把某些事情说出来或写下来,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了。然而,6 个月以后,特拉华的医生告诉他,他已经患有癌症一段时间了。

2. 适应"治疗情节化"的生活

在接下来的六个月(从 1997 年 4 月到 9 月)里,特拉华的专栏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调——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地对各种治疗方法以及它们的副作用进行叙述。此时,特拉华对自己未来的焦虑开始减轻,但他在很多情况下都不允许自己接受具体的治疗方法,而抱着结果将会有所好转的希望。从更广泛的程度上来说,当特拉华进入到"治疗情节化"的状态后,理智的沉思和认为自己没有患病的想法消失了,他把希望放在了将要进行的化疗上,希望它能够帮助他恢复健康。

3. 身在地狱:“屏住呼吸”

六个月之后,即1997年11月22日,特拉华报告说:他的手术和放射性治疗到现在都结束了,但是他现在又有新的困难需要克服,就是要适应自己当前的状况。252 就在他的治疗开始之前的1997年4月,特拉华进入到了“治疗情节化”中,医生鼓励他及时接受治疗,鼓励他相信在接受六个月的放射治疗、切除一半的唾液系统……播音生涯停顿一段时间后(p.178),可以达到某种确定的治疗效果。但特拉华现在觉得“事实情况是,我依然不知道自己是否被治愈,在今后的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是几年里我可能还是不知道”(p.206)。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特拉华对癌症所做出的抗争,正如其他的自传叙述报告中所写的,这种治疗的现实结果会对患者的“微弱希望”带来沉重打击(见Crossley,2000b,第5章)。在接下来的十个月中,在特拉华的日记专栏里几乎没有出现过有关癌症的文字。他似乎正在屏住呼吸、等待着、正处于不安定的状态,同时他感觉太害怕以至于不敢提与癌症相关的东西。

4. 复发时期:继续“治疗情节化”

1998年9月12日,即治疗结束两个月之后,“癌症似乎又重新出现了。或许更可能的是它压根就没有被治愈”(p.227)。这次,特拉华直接就切入到了“正题”上来。他还谈到了一些什么呢?以下就是他所说的:

“他们上次切去了我舌头的三分之一,并且将两个切口缝合了起来。这次,所剩下三分之二的舌头的大部分也不见了。他们用从我后背取下的一块带有皮肤的肌肉代替所切去的舌头,我就靠它来说话。”(p.228)

5. 逃避现实:“无语叙事”

1998年10月3日,特拉华接受移植手术之后自嘲地说:他对现代医疗技术的水平所抱的天真希望正在消失(p.229)。他告诉我们说:“上次的时候,我知道我曾经说过手术可能真的会改善我的嗓音,但事实证明,这种想法就好比要求舒加马(Shergar)复出夺取全国大马赛的冠军一样”。(p.229)他还说到:“也有我的一部分原因,那就是我完全陷入了医学的骗局当中”。(p.230)外科医生花了时间和精力所要“取走”的不是特拉华的舌头或其他的发声器官,而是“所有这些逐渐形成的且不可见的必然性、黑变白的迅速性以及我通过镜子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p.230)。

6. 结局还是结束

“有时候,”特拉华在2001年2月10日写道,“我感觉我在进行一个长期的、徒然的斗争。”(p.280)他第一次提及他得癌症的时候几乎是在四年以前,在他看来,那可是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但现在他则写到:

253 “这股新鲜感觉很快就过去了,随之而来的是:癌症来了,动手术;癌症不见了,什么也没发生;癌症回来了,放射疗法,等等。到现在,诊断,七次手术,多次放疗,某种化疗和各种较小的医学干预。所以当我说‘你猜怎样?癌症又回来了’,这就是我要说的。它之前也复发过。癌症治好了,它还会复发。那就是

所谓的癌症……它变得那么没趣,以致我都不想提起,还不如节省点篇幅来讲述一些平常生活。"(p. 280)

一个星期之后,当特拉华正在写一本反对另类疗法的书时,他在最后写到"让我来解释",但他被匆匆送往医院并于第二天离开了人世。特拉华之前曾经希望自己在最后能有一个好的结局,即希望他的病情能得到康复,但他的这个愿望最终未能实现。最后出现的另一种结果是死亡。

讨 论

正如之前所提到的,德尔·维齐奥·古德等人(Del Vecchio Good et al., 1994: 855)开创"治疗情节化"这个概念的目的,在于描述肿瘤学专家如何在病人接受治疗期间创造和达成"一种情节化的结构"来帮助病人适应患病这样一个现实。这种情节结构将每次具体的治疗放到一个范围更广的"治疗故事"背景中来看待。跟"治疗故事"更为密切相关的是,肿瘤专家们会尝试着通过激发病人的希望,避免病人产生无助感的方式来帮助病人构筑积极的体验。要做到这一点,可以通过运用一些叙述策略。一种策略是当治疗专家试图让患者产生一种时间上的"即时"感时,可以将时间说成一个概念:"没边界的"或是"被缩短了边界"。通过治疗对话和互动过程,患者的体验会由一些"暂时性"的事件构成。"暂时性"意味着关于治疗和病情预测的消息是严格按照治疗阶段来提供的。肿瘤学专家们主要关注的是较为乏味但实际的治疗问题,例如,优先采用哪种治疗方法,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可能的治疗效果,等等。由于治疗中强调"暂时性",患者对未来就难以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即使患者为了未来的生活努力抗争着。尽管在医患接触中出现的这些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治疗叙事中,这些结果体现得还不够具体。

德尔·维齐奥·古德等人在临床观察中发现:通过强调"暂时性"来激发患者的生活希望,会导致患者产生焦虑情绪。尽管如此,患者还是参与了这个构建希望的过程。患者与临床医生共同构建了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中,积极的治疗效果得到了承诺。在学会适应即时性治疗决定和治疗活动的过程中,患者进入到一种叙事形式中,在这种叙事形式中,很少有一个明确的治疗结果,对于治疗的进程也是以很小的单位来测量的。

特拉华在叙事中运用了"情节化"治疗的一种典型方式,我们可以从对特拉华的日记分析中发现这一点。例如,从特拉华早期诊断到第一次复发来看,他主要关心的是具体治疗方法的"即时性",并表达了他对治疗的信心(通过回顾)。正如德尔·维齐奥·古德所预测的那样,该过程对患者来说会伴随着焦虑的产生。尤其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考虑致命性疾病所隐晦涉及的许多深刻问题,例如,"将来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这种治疗方法有效吗"和"接下来会怎么样呢"。因此,紧迫性的治疗叙事经常与其他的"无语叙事"同时存在就很正常了。这些就涉及了不确定性和恐惧感,以及这种担忧对患者脆弱的希望所带来的正面冲击。 254

"无语叙事"在特拉华后期的日记中变得更为明显起来。此刻,特拉华开始认为自己当初对于现代医疗技术的看法过于天真。医生曾经告诉他康复的机会"非常大",然后是"很大",之后是"一般";开始医生告诉他可能再做一次手术就康复了,然后又说再过"一个月、两个月,或者六个月"。得知这些后,他还是不知道自己

是否康复了。对他而言,"好消息"已经不是身体得到了康复,而只是病情有所缓解。他不再相信"外科医生的话",并且他已被疾病带来的令人烦躁的不确定性所吞噬。

德尔·维齐奥·古德等人(Del Vecchio Good et al.,1994)认为:"结局(endings)"经常是肿瘤专家们所建构的故事的一部分。但是,人们害怕得到自己不希望的"结局",或是害怕结局来得太突然,这种恐惧,无论是对医生还是对患者而言,都会对他们的情节化治疗形成一种阻力。因此,通常到治疗的最后,人们还在通过治疗缓解病情这个问题上不断做着决定。如果人们已经不需要继续做这个决定,那说明患者对治疗的希望、对治疗的努力全部崩溃了。在特拉华的案例中,他日记的最后一部分表明他对整个"治疗故事"彻底失望了,他对各种治疗技术已经慢慢失去了信心。在第六阶段("结局还是结束"),特拉华的医生承认病情又复发了,这也就暗示了从医学的角度而言,通过"治疗故事"所建构的希望正在坍塌。尽管如此,在日记的最后,在特拉华病情的最后阶段,他依然靠每三周进行三次化疗来支撑着自己。鲍曼(Bauman,1992)提醒人们,现代生活是一个我们"解构死亡命运"的过程,我们通过将这个过程分解成很小的组成部分,来减少我们对死亡的恐惧感。现代医学技术分成很多细小的分支,其目的也在于能够对这种"解构"产生一定的作用。

在特拉华日记的最后部分,他(Diamond,2001:280)通过叙述病情反复的、无休止的出现,表达了自己对病情的担忧:癌症来了;动手术;癌症走了,之后什么也没发生;后来癌症又发作,紧接着放射治疗,等等。特拉华说到:"如果暂时被治好了,它还会复发。"但这次癌症再也没有被治好过,等着的是癌症自己灭亡,这样的结果也255 终结了特拉华自己创作的故事。在他死后的那一天,其内弟说特拉华的电脑屏幕还在闪烁着——只是特拉华的智慧已经随之消失了,他再也无法叙述自己的故事。

对方法与理论方面相关问题的思考

从方法学角度来说,如果通过分析一些出版的文本或资料(如本章中特拉华的日记)来达到对某种个体经历或体验的深入了解,那么这些文本或资料的有效性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只要我们不把这些材料仅仅看作是对现实的一种简单反映,那么这些材料就是有效的。特拉华的内弟多米尼克·劳森(Dominic Lawson)在《万灵油和其他关注的事物》一书中所写的序言,让我们意识到,患者所提供的个人陈述(无论是在采访中的口头叙述还是自传和日记中的笔记)不能仅仅被当作是一种对个人生活中所发生事情的简单描述。相反,这种叙述是按照叙述者本人的方式构成的。通过对事实进行的这种建构,他们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加以了解并努力着去适应它。

用特拉华自己的话来说,他(Diamond,2001:275)变得有名起来,因为他树立了一个"乐观自信并且不得不向着事情好的一方面看"的例子,"人们已经将他的名字等同于安乐死"。事实上,在《万灵油与其他关注的事物》一书的封面部分,劳森已经将特拉华描述成一个这样的人:他耸着肩膀站在那里,脸上挂着幽默的笑容,坚强地面对着命运所带给他的不幸。用心理学术语来说,他构成了一个有着积极应对方式的病人典型案例。然而,劳森却悲痛地说到:

"应该知道约翰的'勇气日记'……并不是他对自己灵魂的完全展现……

事实上，他的读者们一直不了解他当时的情绪有多么抑郁，他在生理和心理上承受着多大的痛苦和折磨。那些栏目中所描述的约翰·特拉华，是特拉华理想自我的一部分，特拉华这样描述自己是为了帮助自己应对自己的疾病。”(Diamond，2001：序言)

上述内容清楚地表明，我们应该认识到，个体在写作或是谈论自己的想法、经历时，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建构一定的形象并将自己的想法投射到这些形象身上，这样做的目的是帮助自己应对严重的病情(见专栏 R4.2)。

专栏 R4.2 一种分析困境

当对患者的叙事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对于患者个人经验的分析能否做到保留其原有的个性化的、经验性的本质？能否为了解释个体经历的社会(文化本质)而对这些经历进行解构？这种解构过程是否会破坏个体的心理现实？

我认为，从理论上而言，按照本文的方式将特拉华的日记分为几部分，比最初的文献资料更加具有连贯性。根据事件本身的发展将故事分成几个阶段所带来的连贯性，增加了故事的意义性，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正如布鲁克斯(Brooks，1984：22-23)所建议的，“只有故事的结尾才能决定故事的意义”，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叙事包含着一种“必要性的回顾”。当我们全面地对特拉华的连载日记进行阅读的时候，我们是在回顾他的死亡过程。因此，作为特拉华连载日记的读者，我们面前立即呈现的画面比当事人本身意识到的更加连贯、全面。我们知道故事的结局，而特拉华本人大概却不知道，因为在生命中最后一次被匆匆送往医院前他还在电脑上写下了这样几个字——“让我来解释”。 256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进行的分析是否正如在分析部分所假设的，对“患者时间表”进行了探讨？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口腔癌患者经历的个案研究，以及这种经历与“情节化治疗”过程所存在的联系。但“情节化治疗”仅仅是强加于特拉华生活经历上的一个理论概念吗？我们是否能以更准确的方式，将这个概念描述为“通过特定的分析框架而感知到的患者时间表”？也即“细节化治疗”这个概念所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我想这个说法可能会更准确，但我认为这并不会削弱我们的分析。特拉华本人也许没有从“细节化治疗”的角度来思考他的经历，但这并不会影响我们对他的经历进行深入的理解——我们将对他经历的理解与文献中相关领域的研究联系起来，帮助我们对特拉华的经历与其他人的类似经历进行对比。确实，我认为这种能力帮助我们将已有的理论观点与个人经历的叙述联系了起来，而将二者联系起来的方式能创造深广的讨论分析。正是这种能力构成了综合性叙事分析的重要、核心成分(见专栏 R4.3)。

专栏 R4.3 叙事分析中突出了谁的理解？

- 在对患者的叙事进行分析的时候，患者需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用以分析的叙事是有效的吗？
- 如果患者不需要这样做，叙事心理学还依然要坚持尊重患者情感的整体性吗？
- 除去一个人叙述中所做出的尝试的文化成分，会与维持个人的心理现实而做的努力不相符合吗？

257

小 结

本报告简要地探究了“情节化治疗”的概念，以及该概念如何使由患者适应患口腔癌生活而产生的叙事形成一个体系。尽管有证据表明“细节治疗”在诊断早期的作用是很明显的，但当特拉华的病情进一步发展的时候，他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外科叙述”和对此的信任，继治疗细节之后是对恐惧和不确定性的“无语叙述”。在一种以现代肿瘤学为特征的方式中，尽管特拉华依然处于三期化学治疗中，但最后还是死了。这就提出了一些有关患者与肿瘤学家处理“结局”的能力的问题，以及各种治疗方法可否用来代替更多与死亡现实相关的困难任务。然而，本报告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个患者患病经历叙事心理学分析的总结性实例。

参考文献

Bauman, Z. (1992) *Mortality, Immortality and Other Life Strateg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rooks, P. (1984) *Reading For the Plot: Design and Intention in Narrative*. New York: Vintage.

Crossley, M. (2000a) *Introducing Narrative Psychology: Self, Traum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Crossley, M. (2000b) *Rethinking Health Psychology*.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Crossley, M. (2003) 'Let me explain: Narrative emplotment and one patient's experience of oral cancer',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56: 439-448.

Del Vecchio Good, M., Munakata, T., Kobayashi, Y., Mattingly, C. and Good, B. (1994) 'Oncology and narrative time',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38: 855-862.

Diamond, J. (1998) C: *Because Cowards Get Cancer Too*. London: Random House.

Diamond, J. (2001) *Snake Oil and Other Preoccupations*. London: Vintage.

参考文献

Abraham, C. and Hampson, S. E. (1996) 'A social cognition approach to health psychology: Philosoph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Psychology* and Health, 11: 233-241.

Alcoff, L. (1994) 'The problem of speaking for others', in S. O. Weisser and J. Fleischner (eds), *Feminist Nightmares-Women at Odds: Feminism and the Problem of Sisterhood*.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pp. 285-309.

Allport, G. W. (1942) *The Use of Personal Document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New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Allport, G. W. (1962) 'The general and the unique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30: 405-422.

Anfara, V. A. and Mertz, N. T. (eds) (2006) *Theoretical Framework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Antaki, C., Billig, M., Edwards, D. and Potter, J. (2003) 'Discourse analysis means doing analysis: A critique of six analytic shortcomings', *Discourse Analysis Online*. Retrieved 13 October 2006, from www. shu. ac. uk/daol/articles/v1/n1/a1/antaki2002002-t. html.

Ashburn, A., Murphy, C., Payne, S. and Wiles, R. (2004) 'Discharge from physiotherapy following stroke: The management of disappointment',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59: 1263-1273.

Ashworth, P. (2003) 'The origins of qualitative psychology', in J. A. Smith (ed.), *Qualitative Psychology: A Practical Guide to Research Methods*. London: Sage. pp. 4-24.

Atkinson, J. M. and Heritage, J. (eds) (1984) *Structures of Social Action: Studies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ugoustinos, M. and Walker, I. (1995) *Social Cognition: An Integrated 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Barker, M., Hagger-Johnson, G., Hegarty, P., Hutchinson, C. and Riggs, D. W. (in press) 'Responses from the Lesbian & Gay Psychology Section to Crossley's "Making sense of barebacking"',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Barnes, R., Auburn, T. and Lea, S. (2004) 'Citizenship as practic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3: 187-206.

Bartlett, D. and Payne, S. (1997) 'Grounded theory-its basis, rationale and procedures', in G. McKenzie, J. Powell and R. Usher (eds), *Understanding Social Research: Perspectives on Methodology and Practice*. London: Falmer Press. pp. 173-195.

Benton, T. and Craib, I. (2001)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Palgrave.

Billig, M. (1988) 'Methodology and scholarship in understanding ideological explanation', in C. Antaki (ed.), *Analysing Everyday Explanation: A Casebook of Methods*. London: Sage. pp. 199-215.

Billig, M. (1991) *Ideology and Opinions*. London: Sage.

Blumer, H. (1969)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Bramley, N. and Eatough, V. (2005) 'The experience of living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An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case study', *Psychology and Health*, 20: 223-235.

Brannen, J. (ed.) (1992) *Mixing Method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Aldershot: Avebury/Ashgate.

Breakwell, G. M. (1986) *Coping with Threatened Identities*. London: Methuen.

Breakwell, G. M. (1996) 'Identity processes and social changes', in G. M. Breakwell and E. Lyons (eds), *Changing European Identitie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alyses of Social Change*. Oxford: Butterworth Heinemann. pp. 13-27.

Brown, S. D. (2001) 'Psychology and the art of living', *Theory & Psychology*, 11: 171-192.

Broyard, A. (1992) *Intoxicated by My Illness, and Other Writings on Life and Death*. New York: Clarkson Potter.

Bruce, V. (2002) 'Changing research horizons', *The Psychologist*, 15: 620-622.

Bruner, J. (1990) *Acts of Mean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urgess, R. (1984) *In the Field*. London: Hyman.

Burman, E. (1992) 'Feminism and discourse i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Power, subjectivity and interpretation', *Feminism & Psychology*, 2: 45-59.

Burman, E. (1995) '"What is it?"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i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of childhood', in S. Wilkinson and C. Kitzinger (eds), *Feminism and Discourse: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Sage. pp. 49-67.

Burman, E. and Parker, I. (1993a) 'Introduction — discourse analysis: The turn to the text', in E. Burman and I. Parker (eds), *Discourse Analytic Research: Repertoires and Readings of Texts in Action*. London: Routledge. pp. 1-13.

Burman, E. and Parker, I. (eds) (1993b) *Discourse Analytic Research: Repertoires and Readings of Texts in*

Action. London: Routledge.

Burr, V. (2003) *Social Constructionism* (2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Camp, D., Finlay, W. M. L. and Lyons, E. (2002) 'Is low self-esteem inevitable in stigma? An example from women with chronic mental health problem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55: 823-834.

Carr, D. (1986) *Time, Narrative and History*.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Carradice, A., Shankland, M. and Beail, N. (2002) 'A qualitative study of the theoretical models used by UK mental health nurses to guide their assessments with family caregivers of people with dement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Studies*, 39: 17-26.

Chambers, N. (2006) 'A portfolio of academic, therapeutic practice and research work including an investigation of father absence'. Unpublished PsychD portfolio (Practitioner Doctorate in Psychotherapeutic and Counselling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Surrey.

Chapman, E. (2002) 'The social and ethical implications of changing medical technologies: The views of people living with genetic conditions',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7: 195-206.

Charmaz, K. C. (1990) ' "Discovering" chronic illness: Using grounded theory',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30: 1161-1172.

Charmaz, K. C. (2006) *Constructing Grounded Theory: A Practical Guide Through Qualitative Analysis*. London: Sage.

Clarke, A. E. (2003) 'Situational analyses: Grounded theory mapping after the postmodern turn', *Symbolic Interaction*, 26: 553-576.

Coffey, A. and Atkinson, P. (1996) *Making Sense of Qualitative Data*. Thousand Oaks, CA: Sage.

Constantinople, A. (1973) 'Masculinity-femininity: An exception to a famous dictum?'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0: 389-407.

Coyle, A. (1996) 'Representing gay men with HIV/AIDS', in S. Wilkinson and C. Kitzinger (eds), *Representing the Other*. London: Sage. pp. 72-77.

Coyle, A. and Olsen, C. (2005) 'Research in therapeutic practice settings: Ethical considerations', in R. Tribe and J. Morrissey (eds), *Handbook of Professional and Ethical Practice for Psychologists, Counsellors and Psychotherapists*. Hove: Brunner-Routledge. pp. 249-262.

Coyle, A. and Rafalin, D. (2000) 'Jewish gay men's accounts of negotiating cultural, religious, and sexual identity: A qualitative study', *Journal of Psychology & Human Sexuality*, 12(4): 21-48.

Crites, S. (1986) 'Storytime: Recollecting the past and projecting the future', in T. Sarbin (ed.), *Narrative Psychology: The Storied Nature of Human Conduct*. New York: Praeger. pp. 152-173.

Cromby, J. and Standen, P. (1996) 'Psychology in the service of the state', *Psychology, Politics, Resistance*, 3(Spring/Summer): 6-7.

Cronin, A. (2001) 'Focus groups', in N. Gilbert (ed.), *Researching Social Life* (2nd edition). London: Sage. pp. 164-177.

Crossley, M. (2000a) *Introducing Narrative Psychology: Self, Traum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Crossley, M. (2000b) 'Narrative psychology, trauma, and the study of self/identity', *Theory and Psychology*, 10: 527-546.

Crossley, M. (2000c) 'Deconstructing autobiographical accounts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Feminism and Psychology*, 10: 73-90.

Crossley, M. (2003) 'Let me explain: Narrative emplotment and one patient's experience of oral cancer',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56: 439-448.

Crossley, M. (2004) 'Making sense of "barebacking": Gay men's narratives, unsafe sex and the "resistance habitus" ',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3: 224-244.

Crossley, M. and Crossley, N. (2001) 'Patient voices,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habitus: How psychiatric survivors "speak out" ',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52: 1477-1489.

Crossley, N. (1996) *Intersubjectivity: The Fabric of Social Becoming*. London: Sage. Dallos, R. and Draper, R. (2000) *An Introduction to Family Therapy: Systemic Theory and Practice*.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Davies, B. and Harré, R. (1990) 'Positioning: The discursive production of selves',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20: 43-63.

Davies, B. and Harré, R. (1999) 'Positioning and personhood', in R. Harré and L. van Langenhove (eds), *Positioning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pp. 32-52.

Davies, M. (1997) 'Shattered assumptions: Time and the experience of long-term HIV positivity',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44: 561-571.

Denzin, N. K. and Lincoln, Y. S. (2005a) 'Introduction: The discipline and practic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K. Denzin and Y. S. Lincoln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3rd edi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pp. 1-32.

Denzin, N. K. and Lincoln, Y. S. (eds) (2005b)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3rd edi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rrida, J. (1976) *Of Grammatology* (trans. G. Chakravorty Spivak).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Dithey, W. (1984) *Descriptive Psychology and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English Translations 1977). The Hague: Martinas Mithaf.

Drew, P. (2003) 'Conversation analysis', in J. A. Smith (ed.), *Qualitative Psychology: A Practical Guide to Research Methods*. London: Sage. pp. 132-158.

Dunne, J. (1995) 'Beyond sovereignty and deconstruction: The storied self',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21: 137-157.

Eatough, V. and Smith, J. A. (2006) ' "I feel like a scrambled egg in my head": An idiographic case study of meaning making and anger using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79: 115-135.

Edley, N. and Wetherell, M. (1999) 'Imagined futures: Young men's talk about fatherhood and domestic lif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8: 181-194.

Edwards, D. and Potter, J. (1992) *Discursive Psychology*. London: Sage.

Elliott, R., Fischer, C. T. and Rennie, D. L. (1999) 'Evolving guidelines for publication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studies in psychology and related fields', *British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38: 215-229.

Fallowfield, L. (2001) 'Participation of patients in decisions about treatment for cancer (editorial)',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23: 1144.

Field, D. and Copp, G. (1999) 'Communication and awareness about dying in the 1990s', *Palliative Medicine*, 13: 459-468.

Fielding, N. and Schreier, M. (2001) 'Introduction: On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um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Forum: 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 [online journal], 2(1). Retrieved 15 May 2002, from http://qualitative-research.net/fqs-texte/1-01/1-01hrsg-e.htm.

Fine, M. (1994) 'Working the hyphens: Reinventing self and other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K. Denzin and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Sage. pp. 70-82.

Finlay, W. M. L. and Lyons, E. (2000) 'Social categorizations, social comparisons and stigma: Presentations of self in people with learning difficult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9: 129-146.

Finlay, W. M. L. and Lyons, E. (2001) 'Interviewing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A review of question phrasing, content and the use of self-report scales',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13: 319-355.

Finlay, W. M. L. and Lyons, E. (2002) 'Acquiescence in people with mental retardation', *Mental Retardation*, 40: 14-29.

Fiske, S. and Taylor, S. (1991) *Social Cognition* (2nd edition). New York: McGraw Hill.

Flowers, P., Smith, J. A., Sheeran, P. and Beail, N. (1997) 'Health and romance: Understanding unprotected sex in relationships between gay men', *British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2: 73-86.

Forbat, L. (2005) *Talking about Care: Two Sides to the Story*. Bristol: Policy Press.

Foss, C. and Ellefsen, B. (2002) 'The value of 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in nursing research by means of method triangulation',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40: 242-248.

Foster, C., Eeles, R., Ardern-Jones, A., Moynihan, C. and Watson, M. (2004) 'Juggling roles and expectations: Dilemmas faced by women talking to relatives about cancer and genetic testing', *Psychology and Health*, 19: 439-455.

Foucau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London: Penguin.

Fowler, D. D. and Hardesty, D. L. (eds) (1994) *Others Knowing Others: Perspectives on Ethnographic Careers*.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Frank, A. (1995) *The Wounded Storyteller: Body, Illness and Ethic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reud, S. (1909/1955) 'Notes upon a case of obsessional neurosis', in J. Strachey (ed. and trans.),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10). London: Hogarth Press. pp. 151-318.

Frosh, S., Phoenix, A. and Pattman, R. (2003) 'Taking a stand: Using psychoanalysis to explore the positioning of subjects in discours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2: 39-53.

Gergen, K. J. (1991) *The Saturated Self: Dilemmas of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Gibbs, G. R. (2002)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Explorations with NVivo*.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Gilhooly, K. and Green, C. (1996) 'Protocol analysis: Theoretical background', in J. T. E.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Psycholo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eicester: BPS Books. pp. 43-54.

Giorgi, A. and Giorgi, B. (2003) 'Phenomenology', in J. A. Smith (ed.), *Qualitative Psychology: A Practical Guide to Research Methods*. London: Sage. pp. 25-50.

Glaser, B. G. (1978) *Theoretical Sensitivity*. Mill Valley, CA: Sociology Press.

Glaser, B. G. (1992) *Emergence vs Forcing: Basics of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Mill Valley, CA: Sociology Press.

Glaser, B. G. and Strauss, A. L. (1965) *Awareness of Dying*. New York: Aldine.

Glaser, B. G. and Strauss, A. L.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 York: Aldine.

Golsworthy, R. and Coyle, A. (1999) 'Spiritual beliefs and the search for meaning among older adults following partner loss', *Mortality*, 4: 21-40.

Graham, H. (1986) *The Human Face of Psychology*.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Green, C. and Gilhooly, K. (1996) 'Protocol analysis: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in J. T. E.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Psycholo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eicester: BPS Books. pp. 55-74.

Hacking, I. (1990) *The Taming of Ch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rper, D. J. (1994) 'The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of "paranoia" and the discursive use of diagnostic criteria', *British Journal of Medical Psychology*, 67: 131-143.

Harré, R. and Secord, P. (1972) *The Explanation of Social Behaviour*. Oxford: Blackwell.

Heartfield, J. (2002) *The 'Death of the Subject' Explained*. Sheffield: 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 Press.

Heath, H. and Cowley, S. (2004) 'Developing a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 A comparison of Glaser and Strau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Studies*, 41: 141-150.

Hegarty, P. (2003) 'Homosexual signs and heterosexual silences: Rorschach research on male homosexuality from 1921 to 1969',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12: 400-423.

Hegarty, P. (2007) 'What comes after discourse analysis for LGBTQ psychology?' in E. Peel and V. Clarke (eds), *Out in Psychology: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 and Queer Perspectives*. Chichester: Wiley. pp. 41-57.

Henriques, J., Hollway, W., Urwin, C., Venn, C. and Walkerdine, V. (1998) *Changing the Subject: Psychology, Social Regulation and Subjectivity*. London: Routledge.

Henwood, K. (1996) 'Qualitative inquiry: Perspectives, methods and psychology', in J. T. E.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Psycholo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eicester: BPS Books. pp. 25-40.

Henwood, K. and Pidgeon, N. (1992)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psychological theorizing',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83: 97-111.

Henwood, K. and Pidgeon, N. (1994) 'Beyond the qualitative paradigm: A framework for introducing diversity within qualitative psychology',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4: 225-238.

Hepburn, A. and Wiggins, S. (2005) 'Size matters: Constructing accountable bodies in NSPCC helpline interaction', *Discourse & Society*, 16: 625-645.

Heron, J. (1996) *Co-operative Inquiry: Research into the Human Condition*. London: Sage.

Holloway, I. (1997) *Basic Concept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Oxford: Blackwell.

Hollway, W. (1989) *Subjectivity and Method in Psychology: Gender, Meaning and Science*. London: Sage.

Human Genetics Commission (2004) *Choosing the Future: Genetics and Reproductive Decision Making*. London: Human Genetics Commission.

Hutchby, I. and Wooffitt, R. (1998) *Conversation*

Analysi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James, W. (1890)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2 vols). London: Macmillan.

Jarman, M., Walsh, S. and DeLacey, G. (2005) 'Keeping safe, keeping connected: A qualitative study of HIV-positive women's experiences of partner relationships', *Psychology & Health*, 20: 533-553.

Jefferson, G. (1990) 'List construction as a task and resource', in G. Psathas (ed.), *Interaction Competence.*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pp. 63-92.

Joffé, H. and Yardley, L. (2004) 'Content and thematic analysis', in D. F. Marks and L. Yardley (eds), *Research Methods for Clinical and Health Psychology.* London: Sage. pp. 56-68.

Kevles, D. (1968) 'Testing the army's intelligence: Psychologists and the military in World War 1',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55: 565-581.

Kitzinger, C. and Wilkinson, S. (1996) 'Theorizing representing the Other', in S. Wilkinson and C. Kitzinger (eds), *Representing the Other.* London: Sage. pp. 1-32.

Kleinmann, A. (1988) *The Illness Narratives: Suffering, Healing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Krippendorf, K. (2004) *Content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to its Methodology* (2nd edi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Kvale, S. (1996) *Interviews: 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Interviewing.* Thousand Oaks, CA: Sage.

Lewis, C. S. (1952) *Mere Christianity.* New York: Macmillan.

Lincoln, Y. S. and Guba, E. 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Newbury Park, CA: Sage.

Livia, A. (1996) 'Daring to presume', in S. Wilkinson and C. Kitzinger (eds), *Representing the Other.* London: Sage. pp. 33-42.

Lyons, E. (2000)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Data display model', in G. M. Breakwell, S. Hammond and C. Fife-Schaw (eds), *Research Methods in Psychology* (2nd edition). London: Sage. pp. 269-281.

Lyons, E., Chrysanthaki, T. and Barrett, M. (2006) 'The role of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nd political trust in fostering social cohesion: The minority perspectiv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29th Annual Scientific Meeting, Barcelona, Spain, 12-15 July.

Madill, A., Jordan, A. and Shirley, C. (2000) 'Objectivity and reliability in qualitative analysis: Realist, contextualist and radical constructionist epistemologie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91: 1-20.

Mair, M. (1989) *Between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London: Routledge.

Marks, D. (1996) 'Able-bodied dilemmas in teaching disability studies', in S. Wilkinson and C. Kitzinger (eds), *Representing the Other.* London: Sage. pp. 64-67.

Mason, J. (2002) *Qualitative Researching* (2nd edition). London: Sage.

Mayring, P. (2001) 'Combin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Forum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Forum: 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 [online journal], 2(1). Retrieved 15 May 2002, from http://qualitative-research.net/fqs-texte/1-01/1-01hrsg-e.htm.

McAdams, D. P. (1993) *The Stories We Live By: Personal Myths and the Making of the Self.* New York: Morrow.

McAdams, D. P., Josselson, R. and Lieblich, A. (2001) *Turns in the Road: Narrative Studies of Lives in Transition.*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McLean Taylor, J., Gilligan, C. and Sullivan, A. M. (1996) 'Missing voices, changing meanings: Developing a voice-centred, relational method and creating an interpretive community', in S. Wilkinson (ed.), *Feminist Social Psychologie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pp. 233-257.

McLeod, J. (1997) *Narrative and Psychotherapy.* London: Sage.

McLeod, J. (2000)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Counselling and Psychotherapy.* London: Sage.

Mead, G. H. (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 Chicago, IL: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Miles, M. B. and Huberman, A. M. (1994)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 Sourcebook of New Methods* (2nd edition). London: Sage.

Millward, L. J. (2006) 'Focus groups', in G. M. Breakwell, S. Hammond, C. Fife-Schaw and J. A. Smith (eds), *Research Methods in Psychology* (3rd edition). London: Sage. pp. 274-298.

Moran, D. (2000)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 London: Routledge.

Moran-Ellis, J., Alexander, V. D., Cronin, A., Dickinson, M., Fielding, J., Sleney, J. and Thomas, H. (2006) 'Triangulation and integration: Processes, claims and implications', *Qualitative Research*, 6: 45-59.

Murray, M. and Chamberlain, K. (eds) (1999) *Qualitative Health Psychology: Theories & Methods.* London: Sag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linical Excellence (2004) *Guidance Manual: Improving Supportive and Palliative Care for Adults with Cancer.* London: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linical Excellence.

O'Connell, D. C. and Kowal, S. (1995) 'Basic principles of transcription', in J. A. Smith, R. Harré and L. van Langenhove (eds), *Rethinking Methods in Psychology.* London: Sage. pp. 93-105.

Oguntokun, R. (1998) 'A lesson in the seductive power of sameness: Representing Black African refugee women', *Feminism and Psychology*, 8: 525-529.

Palmer, R. (1969) *Hermeneutics.*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arker, I. (1992) *Discourse Dynamics: Critical Analysis for Social and Individual Psychology.* London: Routledge.

Parker, I. (1997) 'Discourse analysis and psychoanalysi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6: 479-495.

Parker, I., Georgaca, E., Harper, D., McLaughlin, T. and Stowell-Smith, M. (1995) *Deconstructing Psychopathology.* London: Sage.

Payne, S. (1992) 'A study of quality of life in cancer patients receiving palliative chemotherapy',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35: 1505-1509.

Payne, S., Seymour, J. E., Chapman, A., Chau, R. and Lloyd, M. (2004) 'Attitudes and beliefs about end-of-life care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Challenging stereotypes', *Palliative Medicine*, 18: 153.

Pidgeon, N. (1996) 'Grounded theory: Theoretical background', in J. T. E.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Psycholo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eicester: BPS Books. pp. 75-85.

Plummer, K. (ed.) (1981)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Homosexual.* London: Hutchinson.

Polkinghorne, D. E. (1988) *Narrative Knowing and the Human Sciences.* Albany, NY: State of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Pomerantz, A. M. (1986) 'Extreme case formulations: A new way of legitimating claims', *Human Studies*, 9: 219-230.

Popper, K. R. (1969)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Potter, J. (1996) *Representing Reality: Discourse, Rhetoric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London: Sage.

Potter, J. (2003) 'Discourse analysis', in M. Hardy and A. Bryman (eds), *Handbook of Data Analysis*. London: Sage. pp. 607-624.

Potter, J. and Collie, F. (1989) '"Community care" as persuasive rhetoric: A study of discourse', *Disability, Handicap & Society*, 4: 57-64.

Potter, J. and Wetherell, M. (1987) *Discourse and Social Psychology: Beyond Attitudes and Behaviour*. London: Sage.

Pratt, L. M. (1986) 'Fieldwork in common places', in J. Clifford and G.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27-50.

Radley, A. and Chamberlain, K. (2001) 'Health psychology and the study of the case: From method to analytic concern',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53: 321-332.

Reason, P. and Rowan, J. (eds) (1981) *Human Inquiry: A Sourcebook of New Paradigm Research*. Chichester: Wiley.

Reicher, S. (2000) 'Against methodolatry: Some comments on Elliott, Fischer, and Rennie', *British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39: 1-6.

Rennie, D. L. (2000) '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y as methodical hermeneutics: Reconciling realism and relativism', *Theory and Psychology*, 10: 481-502.

Richards, L. (2000) *Using NVivo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ition). Melbourne: QSR International.

Richardson, J. T. E. (ed.) (1996)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Psycholo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eicester: BPS Books.

Ricoeur, P. (1970) *Freud and Philosoph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Rowlands, J. (2005) 'To tell the truth', *Cancer Nursing Practice*, 4(5): 16-21.

Sarbin, T. R. (ed.) (1986) *Narrative Psychology: The Storied Nature of Human Conduct*. New York: Praeger.

Schreier, M. and Fielding, N. (eds) (2001)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Conjunctions and divergences', a special issue of *Forum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Forum: 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 [online journal], 2(1). Retrieved 15 May 2002, from http://qualitative-research.net/fqs/fqs-eng.htm.

Sedgwick, E. (1990) *The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London: Penguin.

Senior, V., Smith, J. A., Michie, S. and Marteau, T. M. (2002) 'Making sense of risk: An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of vulnerability to heart disease',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7: 157-168.

Shepherd, R., Barnett, J., Cooper, H., Coyle, A., Moran-Ellis, J., Senior, V. and Walton, C. (forthcoming)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British public attitudes concerning human cloning',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Shevlin, M. (2000) 'Surgery in a sewer? [Letter]', *The Psychologist*, 13: 181.

Shotter, J. (1993) *Cultural Politics of Everyday Life: Social Constructionism, Rhetoric and Knowing of the Third Kind*.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Shotter, J. (199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our inner selves', *Journal of Constructivist Psychology*, 10: 7-24.

Silverman, D. (1993) *Interpreting Qualitative Data*. London: Sage.

Simpson, M. (ed.) (1996) *Anti-Gay*. London: Freedom Editions.

Sinister Wisdom Collective (1990) 'Editorial', *Sinister Wisdom*, 42(4): 1-6.

Smith, B. and Sparkes, A. C. (2006) 'Narrative inquiry in psychology: Exploring the tensions with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3: 169-192.

Smith, J. A. (1993) 'The case study', in R. Bayne and P. Nicolson (eds), *Counselling and Psychology for the Health Professionals*. London: Chapman Hall. pp. 249-265.

Smith, J. A. (1996) 'Beyond the divide between cognition and discourse: Using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in health psychology', *Psychology & Health*, 11: 261-271.

Smith, J. A. (1999) 'Towards a relational self: Social engagement during pregnancy and psychological preparation for motherhood',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8: 409-426.

Smith, J. A. (ed.) (2003) *Qualitative Psychology: A Practical Guide to Research Methods*. London: Sage.

Smith, J. A. (2004) 'Reflect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qualitative psychology',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1: 39-54.

Smith, J. A. and Dunworth, F. (2003) 'Qualitative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development', in K. Connolly and J. Valsiner (eds), *The Handbook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London: Sage. pp. 603-621.

Smith, J. A. and Osborn, M. (2003)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in J. A. Smith (ed.), *Qualitative Psychology: A Practical Guide to Research Methods*. London: Sage. pp. 51-80.

Smith, J. A., Harré, R. and van Langenhove, L. (1995) 'Idiography and the case study', in J. A. Smith, R. Harré and L. van Langenhove (eds), *Rethinking Psychology*. London: Sage. pp. 59-69.

Smith, J. A., Flowers, P. and Osborn, M. (1997)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and the psych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in L. Yardley (ed.), *Material Discourses of Health and Illness*. London: Routledge. pp. 68-91.

Smith, J. A., Michie, S., Allanson, A. and Elwy, R. (2000) 'Certainty and uncertainty in genetic counselling: A qualitative case study', *Psychology & Health*, 15: 1-12.

Smith, J. A., Brewer, H., Eatough, V., Stanley, C., Glendinning, N. and Quarrell, O. (2006)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of Juvenile Huntington's Disease: An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of parents' accounts on the primary features of a rare genetic condition, *Clinical Genetics*, 69: 486-496.

Smith, M. (2005) *Philosophy and Methodolog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Sage.

Spriggs, M. (2004) 'Commodification of children again and non-disclosure of 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 for Huntington's disease',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30: 538.

Sque, M. and Payne, S. A. (1996) 'Dissonant loss: The experience of donor relative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43: 1359-1370.

Strauss, A. and Corbin, J. (1990)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Thousand Oaks, CA: Sage.

Strauss, A. and Corbin, J. (1998)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2nd edi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Tajfel, H. and Turner, J. (1986)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ur', in S. Worchel and W. G. Austin (eds),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Chicago, IL: Nelson. pp. 7-24.

Taylor, C. (1989)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aylor, S. and Bogdan, R. (1998)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3rd edition). New York: Wiley.

Thomson, R. and Holland, J. (2003) 'Hindsight, foresight and insight: The challenges of longitudinal qualitative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 6: 233-244.

Todd, Z., Nerlich, B., McKeown, S. and Clarke, D. D. (eds) (2004) *Mixing Methods in Psychology: The Integr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Triandis, H. C. (1996) 'The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of cultural syndrom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1: 407-415.

Triandis, H. C., Leung, K., Villareal, M. and Clack, F. L. (1985) 'Allocentric vs. idiocentric tendencies: Convergent and discriminant validatio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19: 395-415.

Turner, A. J. and Coyle, A. (2000)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 donor offspring? The identity experiences of adults conceived by donor insemination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counselling and therapy', *Human Reproduction*, 15: 2041-2051.

Turner, B. (1981) 'Some practical aspects of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One way of organising the cognitive processes associated with the generation of grounded theory', *Quality and Quantity*, 15: 225-247.

Turpin, G., Barley, V., Beail, N., Scaife, J., Slade, P., Smith, J. A. and Walsh, S. (1997) 'Standards for research projects and theses involving qualitative methods: Suggested guidelines for trainees and courses', *Clinical Psychology Forum*, 108: 3-7.

Ussher, J. (1991) *Women's Madness: Misogyny or Mental Illness?*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Vignoles, V. L., Chryssochoou, X. and Breakwell, G. M. (2004) 'Combining individuality and relatedness: Representations of the person among the Anglican clerg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3: 113-132.

Wallwork, J. and Dixon, J. A. (2004) 'Foxes, green fields and Britishness: On the rhetorical construction of place and national identi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3: 21-39.

Warnock, M. (1987) *Memor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Weille, K. L. (2002) 'The psychodynamics of consensual sadomasochistic and dominant-submissive sexual games', *Studies in Gender and Sexuality*, 3: 131-160.

Wetherell, M. (1998) 'Positioning and interpretative repertoires: Conversation analysis and post-structuralism in dialogue', *Discourse & Society*, 9: 387-412.

Wetherell, M. and Potter, J. (1992) *Mapping the Language of Racism: Discourse and the Legitimation of Exploitation*.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Wheatsheaf.

Wetherell, M., Taylor, S. and Yates, S. J. (eds) (2001a)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A Reader*. London: Sage/Open University Press.

Wetherell, M., Taylor, S. and Yates, S. J. (eds) (2001b) *Discourse as Data: A Guide for Analysis*. London: Sage/Open University Press.

White, H. (1987)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Widdicombe, S. (1995) 'Identity, politics and talk: A case for the mundane and the everyday', in S. Wilkinson and C. Kitzinger (eds), *Feminism and Discourse: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Sage. pp. 106-127.

Wiggins, S. (2004) 'Good for "you": Generic and individual healthy eating advice in family mealtimes',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9: 535-548.

Wilkinson, S. (1996) 'Feminist social psychologies: A decade of development', in S. Wilkinson (ed.), *Feminist Social Psychologie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pp. 1-18.

Wilkinson, S. (1997) 'Feminist psychology', in D. Fox and I. Prilleltensky (eds), *Critical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pp. 247-265.

Wilkinson, S. and Kitzinger, C. (eds) (1996) *Representing the Other*. London: Sage.

Willig, C. (1995) '"I wouldn't have married the guy if I'd have to do that": Heterosexual adults' accounts of condom use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sexual practice', *Journal of Community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5: 75-87.

Willig, C. (ed.) (1999) *Applied Discourse Analysis: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Willig, C. (2001) *Introduc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Adventures in Theory and Method*.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Wooffitt, R. (2001) 'Analysing factual accounts', in N. Gilbert (ed.), *Researching Social Life* (2nd edition). London: Sage. pp. 324-342.

Wynne, B. (2006) 'Public engagement as a means of restoring public trust in science: Hitting the notes but missing the music', *Community Genetics*, 9:211-220.

Yardley, L. (1997) 'Introducing discursive methods', in L. Yardley (ed.), *Material Discourses of Health and Illness*. London: Routledge. pp. 25-49.

Yardley, L. (2000) 'Dilemmas in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Psychology and Health*, 15: 215-228.

Yin, R. (1989) *Case Study Research* (rev. edition). Newbury Park, CA: Sage.

姓氏索引(中英对照)

主题索引(中英对照)

万卷方法总书目

万卷方法是我国第一套系统介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大型丛书，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两百余名学者参与了丛书的写作和翻译工作。至今已出版图书近70个品种，其中绝大多数是2007年以来出版的新书。

2010，2009年版

1 **心理学质性资料的分析**
伊凡希雅·莱昂斯，阿德里安·考利 主编
毕重增 主译
书号：978-7-5624-5363-5

2 **质性访谈方法：聆听与提问的艺术**
Herbert J. Rubin，Irene S. Rubin 著
卢晖临 译
书号：978-7-5624-5307-9

3 **量表编制：理论与应用（校订新译本）**
德维利斯 著
魏勇刚 席仲恩 等译 李红 校
书号：978-7-5624-5285-0

4 **实验设计原理：社会科学理论验证的一种路径**
戴维·威勒 亨利·沃克 著
杜伟宇 孟奇 译
书号：978-7-5624-5187-7

5 **结构方程模型——AMOS的操作与应用**
泰勒 等著 葛道顺 译
书号：978-7-5624-4947-8

6 **质性研究：反思与评论（第贰卷）**
陈向明 主编
书号：978-7-5624-4936-2

7 **标准化调查访问**
福勒 著 孙龙 等译 张小劲 校
书号：978-7-5624-5062-7

8 **混合方法论：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的结合**
阿巴斯·塔沙克里，查尔斯·特德莱 著 唐海华 译
张小劲 校
书号：978-7-5624-5110-5

9 **量化研究与统计分析：SPSS中文视窗版数据分析范例解析**
邱皓政 著
书号：978-7-5624-4821-1

10 **如何解读统计图表：研究报告阅读指南**
纳迪 著 汪顺玉 等译
书号：978-7-5624-4906-5

11 **泰利的街角：一项街角黑人的研究（个案阅读）**
列堡 著 李文茂 等译
书号：978-7-5624-4937-9

12 **心理学研究的要义**
埃文斯 著 苏彦捷 等译
书号：978-7-5624-5098-6

13 **客厅即工厂（个案阅读）**
熊秉纯 著 杜芳琴 译
书号：978-7-5624-4886-0

14 **校长办公室的那个人：一项民族志研究（个案阅读）**
沃尔科特 著 杨海燕 译
书号：978-7-5624-4880-8

15 **质性研究的理论视角：一种反身性的方法论**
艾尔维森 等著 陈仁仁 译
书号：978-7-5624-4889-1

16 **解释互动论（校订新译本）**
邓金 著 周勇 译 刘良华 校
书号：978-7-5624-4936-2

17 **社会评估：理论、过程与技术**
泰勒 等著 葛道顺 译
书号：978-7-5624-4975-1

18 **调查研究方法（校订新译本）**
福勒 著 孙振东 等译 沈崇麟 校
书号：978-7-5624-3289-0

19 **质性研究中的访谈：教育与社会科学研究指南**
赛德曼 著 周海涛 译
书号：978-7-5624-4679-8

20 **案例研究方法的应用（校订新译本）**
殷著 周海涛 译
书号：978-7-5624-3278-4

21 **教育研究的方法论探索**
孙振东 著
书号：978-7-5624-4649-1

22 **参与观察法**
乔金森 著 张小山 译
书号：978-7-5624-4616-3

23 **分析社会情境：质性观察和分析方法**
洛夫兰德 等著 林小英 译
书号：978-7-5624-4690-3

24 **建构扎根理论：质性研究实践指南**
卡麦兹 著 边国英 译 陈向明 校
书号：978-7-5624-4747-4

25 **公共管理定量分析：方法与技术（第2版）**
袁政 编著
书号：978-7-5624-3640-9

26 **AMOS与研究方法**
荣泰生 著
书号：978-7-5624-4806-8

27 **文化研究：民族志方法与生活文化**
格雷 著 许梦云 译 高丙中 校
书号：978-7-5624-4698-0

28 **质性研究方法：健康及相关专业研究指南**
普拉尼 等著 郑显兰 译
书号：978-7-5624-4720-7

29 **如何做质性研究**
希尔弗曼 著 卢晖临 等译
书号：978-7-5624-4697-2

2008年版

30 **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第8版）**
赫文 著 李涤非 译

书号:978-7-5624-4465-7

31 **应用 Stata 做统计分析(Version 9)**
汉密尔顿 著　郭志刚 译
书号:978-7-5624-4483-1

32 **实用抽样方法**
亨利 著　沈崇麟 译
书号:978-7-5624-4487-9

33 **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
邓晓芒 著
书号:978-7-5624-4446-6

34 **质性研究:反思与评论**
陈向明 主编
书号:978-7-5624-4462-6

35 **社会研究方法**
仇立平 著
书号:978-7-5624-4456-5

36 **质性资料的分析:方法与实践(第2版)**
米尔斯,休伯曼 著　卢晖临 译
书号:978-7-5624-4426-8

37 **实用数据再分析法(第2版)**
利普西 著　刘军 译
书号:978-7-5624-4296-7

38 **质性研究的伦理**
丁三东 译
书号:978-7-5624-4304-9

39 **叙事研究:阅读、倾听与理解**
利布里奇 著　王红艳 译
书号:978-7-5624-4303-2

40 **质化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第2版)**
麦瑞尔姆 著　于泽元 译
书号:978-7-5624-4349-0

41 **爱上统计学(第2版)**
萨尔金德 著　史玲玲 译
书号:978-7-5624-4196-0

42 **复杂调查设计与分析的实用方法(第2版)**
雷同能 著　王天夫 译
书号:978-7-5624-4290-5

43 **美国心理协会写作手册(APA 格式)(第5版)**
美国心理协会著
书号:978-7-5624-4130-4

2007 年版

44 **做自然主义研究:方法指南**
欧兰德森 著　李涤非 译
书号:978-7-5624-4259-2

45 **多层次模型分析导论(第2版)**
Ita kreft 著　郭志刚 译
书号:978-7-5624-4060-4

46 **评估:方法与技术(第7版)**
罗希 著　邱泽奇 译
书号:978-7-5624-3994-3

47 **焦点团体:应用研究实践指南(第3版)**
克鲁杰 著　林小英 译
书号:978-7-5624-3990-5

48 **质的研究的设计:一种互动的取向(第2版)**
马克斯威尔 著　朱光明 译　陈向明 校
书号:978-7-5624-3971-4

49 **组织诊断:方法、模型和过程(第3版)**
哈里森 著　张小山 译
书号:978-7-5624-3055-1

50 **民族志:步步深入(第2版)**
费特曼 著　龚建华 译
书号:978-7-5624-3996-7

51 **分组比较的统计分析(第2版)**
廖福挺 著　高勇 译　沈崇麟 校
书号:978-7-5624-3942-4

52 **抽样调查设计导论(第2版)**
扎加,布莱尔 著　沈崇麟 译
书号:978-7-5624-3943-1

53 **定性研究(第1卷):方法论基础(第2版)**
邓津 等主编　风笑天 等译
书号:978-7-5624-3851-9

54 **定性研究(第2卷):策略与艺术(第2版)**
邓津 等主编　风笑天 等译
书号:978-7-5624-3286-9

55 **定性研究(第4卷):解释、评估与描述的艺术及定性研究的未来(第2版)**
邓津 等主编　风笑天 等译
书号:978-7-5624-3948-6

56 **定性研究(第3卷):经验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法(第2版)**
邓津 等主编　风笑天 等译
书号:978-7-5624-3944-8

57 **研究设计与写作指导:定性、定量与混合研究的路径(第2版)**
克雷斯威尔 著　崔延强 译
书号:978-7-5624-3644-7

58 **社会网络分析法(第2版)**
约翰·斯科特 著　刘军 译
书号:978-7-5624-2147-4

59 **公共政策内容分析方法:理论与应用**
李钢 著
书号:978-7-5624-3850-2

2007 年以前版

60 **论教育科学:基于文化哲学的批判与建构**
申仁洪 著
书号:978-7-5624-3641-6

61 **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研究**
黄欣荣 著
书号:978-7-5624-3825-0

62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评论**
陈向明 著
书号:978-7-5624-3689-4

63 **电话调查方法:抽样、筛选与监控(第2版)**
拉弗拉卡斯 著　沈崇麟 译
书号:7-5624-3441-7

64 **科学决策方法:从社会科学研究到政策分析**
沃恩 著　沈崇麟 译
书号:7-5624-3669-X

65 **研究设计与社会测量导引(第6版)**
米勒 著　风笑天 译
书号:978-7-5624-3295-1

66 **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第3版)**
殷 著　周海涛 译
书号:978-7-5624-3266-1

为了建设好“万卷方法”，更好地服务学界，现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和人大经济论坛做出决定，凡购买重庆大学出版社的万卷方法系列图书的读者，填写以下信息调查表（复印即可），邮寄给我们（400030　重庆大学出版社　林佳木），经过认证后，我们将会赠送人大经济论坛币100个（可免费下载丛书相关学习资料并与教师及学友进行交流）：

读者情况调查表	
姓名	
单位	
联系电话	
Email	
论坛 ID	
使用书籍	
购买渠道	
对丛书建设的建议	
邮政地址（邮编）	

人大经济论坛

——国内最大的经济、管理、金融、统计类在线教育网站

人大经济论坛（网址：http://www.pinggu.org）依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于2003年成立，致力于推动经济学科的进步，传播优秀教育资源，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经济、管理、金融、统计类的在线教育和咨询网站，也是国内最活跃和最具影响力的经济类网站。

1. 拥有国内经济类教育网站最多的关注人数，注册用户以百万计，日均数十万经济相关人士访问本站。

2. 是国内最丰富的经管类教育资源共享数据库和发布平台。

3. 论坛给所有会员提供学术交流与讨论的平台，同时也有网络社交SNS的空间，经管百科提供了丰富专业的经管类在线词典，数据定制和数据处理分析服务是您做实证研究的好帮手，免费的经济金融数据库使您不再为数据发愁，更有完善的经管统计类培训和教学相关软件，只要您是学习、研究或从事经管类行业，人大经济论坛就能满足您的需要！